

廿一世紀文庫

運

明報出版社

本書提供大量第一手資料，可以說是第一部最為全面最為深入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著作。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下）



王若水 遺著

毛澤東的心病

接班人的造神運動

毛澤東的「鬥爭哲學」

劉少奇的完結

林彪的覆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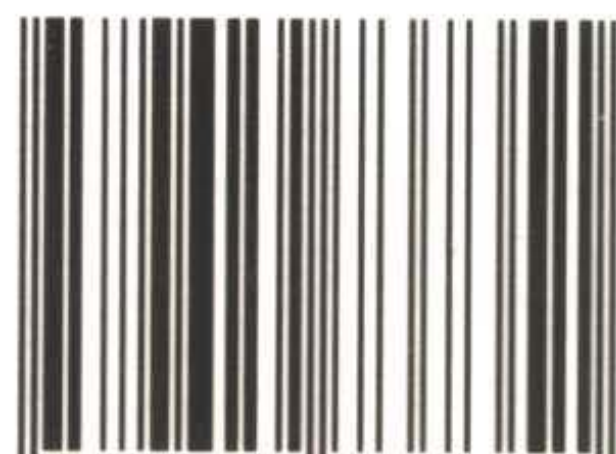
毛澤東的遺言

新發現的毛澤東

—— 僕人眼中的偉人（下）

近半個世紀以來，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主宰着中國的命運，回首當年神州大地風起雲湧，巨浪滔天，特別是在他的晚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毛澤東逝世後，他的影響猶在，迄今仍未有一部對毛澤東及他的思想作全面解讀的作品，誠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大空白。本書作者王若水先生是中國著名的理論家，曾任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長期從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本書是他傾大半生心血的遺作，書中對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性格、他的心態、他的權謀作了全面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其中蘊含大量從未聞問的第一手珍貴史料，可以說是第一部最為全面最為深入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著作。自出機杼，論點精確，可讀性極高。

ISBN 962-973-735-3



9 789629 737351 >

CE02

HK\$ 69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廿一世紀文庫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下）

王若水 遺著

明報出版社

廿一世紀文庫

主編

潘耀明

新發現的毛澤東

—僕人眼中的偉人

(下冊)

王若水 遺著

馮 媛 編

責任編輯

陳佩森

封面設計

易 水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〇二年七月初版

ISBN : 962-973-735-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TEL : 2595 3215 FAX : 2898 2646

<http://books.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承印

目 錄

總序：「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

——從《2000年文庫》到《廿一世紀文庫》

潘耀明

前言 毛澤東的新畫像——僕人眼中的偉人

從回憶錄開始的「毛澤東熱」

新發現的毛澤東

毛澤東的一個側面

孤獨的老人

沒有私人情誼的同志關係

門檻

逞強好勝

身邊的女同志

閒談中的流露

二 四 六 八 二 一 五 九 一 一 二 四

周恩來逝世

二七

不走回頭路，不幹後悔事

二九

第一部 毛澤東的權術

第一章 延安整風（上）：毛澤東最高權威的確立

三四

整風之前

三五

毛澤東討好斯大林

四三

整風運動的準備和開始

五五

清算王明

六六

第二章 延安整風（下）：審幹運動

七五

毛澤東為何發動審幹

七六

王實味的悲劇

八一

「搶救運動」

九一

整風運動：總結階段（一九四五年春—一九四五年夏）

一〇〇

中共「七大」

一〇八

第三章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肅反——文革做法的歷史淵源

對A B團的整肅

一二〇

富田事變

一二五

王明搬來蘇共做法 毛澤東執行左傾路線

一三〇

利用肅反進行大規模迫害的始作俑者

一三九

第四章 一九四五年：在美蘇兩個大國之間

中共聯美拉蔣抗日

一五一

斯大林：寧要軟弱的國民黨政府，不要不聽話的共產黨

一六二

一個2 + 2的政治遊戲

一六六

第五章 斯大林和毛澤東

劉少奇訪蘇

一七六

毛澤東訪蘇

一八八

第六章 怎樣總結蘇共教訓？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一九六

毛澤東的反應

二一八

二一九

二二九

二三三

第七章 一九五七年：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到反右派

知識分子問題

二五四

毛澤東總結蘇聯經驗

二五八

從整風到反右

二六八

對《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再評價

二七七

第八章 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冒進的由來

二八八

從南寧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反「反冒進」

二九七

必須崇拜班長

三一〇

大躍進的契機：誰將是國際共運的領袖

三一二

又多又快又好，總路線的確立

三二一

從十年到兩年——鋼鐵超英

三二八

人民公社

三三四

第九章 廬山會議與彭德懷

尋找海瑞

三四一

三四〇

第二部 毛澤東與文革浩劫

「海瑞上疏」

三四九

轉折

三五三

第十章 文革的準備（上）：個人崇拜的發展

三七〇

毛澤東的心病

三七〇

七千人大會

三七四

階級鬥爭

三八四

接班人的造神運動

三八六

第十一章 文革的準備（下）：鬥爭哲學和批修

三九一

兩樁哲學公案的背景

三九三

轉折點：用「一分為二」反對「合二而一」

四〇三

綜合：「一個吃一個？」

四一二

對「否定的否定」的否定

四一七

黑格爾的三段式

四二一

兩段式還是三段式？

四二七

從「兩條戰線的鬥爭」到只反右不反「左」

四三四

毛澤東爲什麼需要「鬥爭哲學」

四四五

第十二章 文革的發動：打倒劉少奇

四五〇

精心的策劃，巧妙的部署

四五〇

造反狂瀾

四五五

劉少奇的完結

四六三

「二月逆流」

四七〇

「文革」初期的毛周關係及「七·二〇」事件

四七八

中共「九大」

四八三

第十三章 文革的失敗：林彪的覆滅和毛澤東的遺言

四八七

明批林孔暗批周

四九〇

從再批鄧到天安門事件

四九七

結語：毛澤東現象的基礎

五〇二

制度與人

五〇二

淺談「毛澤東」現象的基礎

五〇六

第二部 歷史的見證

偶像的幻滅——我在《人民日報》的一些經歷

開國前後

批判胡適

《人民日報》挨批

風雲突變的「反右派鬥爭」

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哲學分歧

桌子的哲學

「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

「文革」初期

批左批右之爭

上書惹禍

毛、周之間

千秋功罪，何時任人評說？

五一〇

五一〇

五一六

五二三

五三五

五四四

五四七

五五二

五五八

五六六

五七一

五八八

五九九

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

六〇六

周恩來大力糾「左」

六〇六

爭奪《人民日報》的陣地

六一〇

批「左」還是批右？

六一二

一塊版引起的風波

六一五

我的一封信

六一九

周恩來的講話

六二三

江青放炮

六二八

張、姚的表演

六三一

一顆新星升起

六三八

毛澤東講漢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

六四一

評毛的一段曲折

六四七

起草決議產生分歧

六四七

不能丟掉毛澤東這面旗幟

六四八

附錄

附錄一：一九二一年	六五六
附錄二：民主·引論	六六八
附錄三：王實味文字獄剖析	六七三
三篇文章的背景	六七四
《政治家·藝術家》	六七九
《野百合花》	六八〇
《三八節有感》	六八四
中央研究院整風動員大會的風波	六八七
王實味代表什麼思潮	六九一
立場問題	六九七
觀點和方法問題：所謂「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	七〇二
背景分析	七〇六
「四三」決定	七一一

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

七一四

丁玲的過關

七二三

從思想問題到政治問題再到敵我問題

七二八

作者歷年來寫作和發表的有關文章

七三九

王若水的「美麗境界」

馮媛
七四一

編後記

七四八

第二部

毛澤東與文革浩劫

第十章

文革的準備（上）：個人崇拜的發展

毛澤東心病

上面已經說到，從蘇聯批評斯大林之後，特別是「大躍進」失敗，彭德懷上書之後，有一個陰影籠罩着毛澤東的心靈，像夢魘一樣纏着他，使他無法擺脫，這就是赫魯曉夫的陰影。斯大林在國際共運中本來享有極高的威信，甚至到了神化的地步，可是赫魯曉夫一個秘密報告，斯大林就從神壇上跌落下來，激起了世界上非共產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同聲譴責。在西方，許多共產黨人要退黨，許多同情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感到幻滅；在東歐，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這一切，不能不使毛澤東感到十分震驚，不能不使他想到自己。他本來可以引以為自豪地說，他沒有犯斯大林那樣大的錯誤。可是從一九五八年以

後，他不能這樣說了。單是三年困難時期以千萬計的人口餓死這件事，就足以使全世界震動了。

毛澤東害怕遭到斯大林那樣的命運。他既不能容忍有人在他活着的時候批評他，他也不允許有人在他身後這樣做。換句話說，他不允許中國有人效法赫魯曉夫。斯大林活着時沒有識破赫魯曉夫，反而信任他，讓他爬了上來。毛澤東絕不能重蹈覆轍。赫魯曉夫是以批判個人崇拜的名義來揭露斯大林的，毛澤東要預防中國出赫魯曉夫，第一步就要反對批判個人崇拜。

本來，在一九五六年，中國共產黨是支持蘇共對斯大林的批判的。這從一九五六年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中共八大上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在八大的閉幕詞中，毛澤東只是一般地讚揚蘇共二十大「批評了黨內存在的缺點」，沒有提「個人崇拜」。在一九五六年年的《論十大關係》中，在一九五七年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也一字不提「個人崇拜」，照理在這些文章中是應當談到這個問題的。

這並非偶然的疏忽，從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會議講話中，我們就可以了解毛澤東的心思了。他把個人崇拜分為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

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毛澤東沒有明確說對自己的崇拜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但聯繫到後來毛澤東對斯諾說「需要搞一點崇拜」，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

在毛澤東講完後，柯慶施發言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陶鑄也說了類似的話。毛當時沒有說什麼話。但成都會議後不久，柯慶施就進了政治局。

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共中央發表了致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列舉了兩黨之間的一系列原則分歧。其中一條是關於斯大林問題的，說：「幾年以來，有些人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錯誤的，有害的。」「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有些人大肆進行所謂『反對個人迷信』，而在實際上竭力醜化無產階級政黨，醜化無產階級專政……」不久，《人民日報》和《紅旗》兩個編輯部在聯名發表的《關於斯大林問題》一文（「九評」中的第二篇）中，又把公開信中關於「反對個人迷信」的論點發揮了一通。

把這些言論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時所表示的態度相比，可以看出變化之大。一九五六年是讚揚蘇共對個人迷信的批判，雖然毛澤東後來表示了一些保留，那也不過是覺得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在具體做法上太過分，「一棍子打死」。現在確是從原則上反對批判個人迷信了。但是，拿出來的理論根據卻是根本站不住的。說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了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係的學說，可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八大上，鄧小平正是代表中共中央依據這個學說來肯定「反對個人迷信」的正確性。當時，鄧小平是這樣說的：「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在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的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許多嚴重的惡果。」

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斯大林只是不滿，對赫魯曉夫則是痛恨。原先只是說赫魯曉夫不該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現在卻要一棍子打死赫魯曉夫了。毛澤東不能容忍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因為他需要別人崇拜他。

有一個人看透了毛澤東的心思，並且馬上抓住機會加以迎合來實現自己的野心。這個人就是林彪。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林彪就以毛澤東權威的忠心維護者的面目出現。他聲色俱厲地斥責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說，「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當英雄。」在這次會議後，林彪被任命為國

防部長，在中央軍委組成人員中，排名僅次於毛澤東。從此林彪開始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林彪宣稱：「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首先在軍內發動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他說：學習毛著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可以一本萬利。根據林彪的提議，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政治思想工作成爲中心議題。林彪在會上說：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時代的思想頂峰。我們這種政治思想統統叫做階級思想，就是階級鬥爭的思想。會議做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的第一，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個軍隊建設的方向」。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不同意林彪這些說法和做法，受到批判，並被打爲反黨宗派集團。（《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一九一—一九二頁）

七千人大會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幹部七千零九十人與會，故稱「七千人大會」。

根據中共中央的通知，之所以要召開這次會議，是因爲一九五八年以來工作中發生了

一些缺點和錯誤，需要統一思想和認識。

劉少奇的發言比書面報告更坦率一些。他提出了兩個比較尖銳的觀點：

一、他不同意「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成爲一個公式，說「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雖然他仍然認爲就全國範圍來說，成績還是主要的，但他說這種缺點和錯誤的關係，「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不管劉是不是真的相信成績是主要的，他提出了一個讓人思考的問題，同時，又小心地注意不觸犯毛澤東。所謂缺點錯誤是三個指頭的說法，應該是毛允許的，因爲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

二、缺點和錯誤是否可以歸因於自然災害的問題，根據農民和一些省市負責幹部的反映，他認爲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三、人爲的錯誤又是什麼原因呢？過去的說法是「沒有經驗」。劉少奇的書面報告也說「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但在討論中，有些與會者認爲這種說法不能服人。於是，劉少奇在講話中補充說，除了經驗不夠外，還有不夠謙虛謹慎、驕傲自滿等原因。

劉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報告中說：有的同志說，人民公社辦早了。不辦公社，是不是更好一點？當然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遲幾年辦是可以的。我們總結了十六條經驗。

這是初步的總結，現在也只能做初步的總結……再過五年或者再過十年，我們還要做進一步的總結。那個時候總結出來的經驗，……一定會比現在總結的更好。他還說，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最近幾年，提出高指標，用各種組織手段去堅持實行這些任務，因而也在組織上犯了许多錯誤。這些組織上的錯誤，最主要的是我們黨的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違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劉少奇的書面報告提到：「有些事情，是經過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應該擔負責任。」他只是提到政治局的集體責任，沒有提到毛澤東應該擔負的個人責任。毛澤東是事先看了這個書面報告的，儘管他後來說「第一個應當負責的是我」，但是，他沒有提出要在書面報告中把這一點加進去。這樣，他就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的地位：他可以表示承擔責任，顯示他的高姿態；但是，黨的文件是不能指名道姓地批評他的錯誤的。

在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時，彭真把人們心裏的疑慮挑明了。他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帳，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〇二六

頁)

這一段話表明，在最初的草稿裏，只是說中央書記處要負責，後來才修改成中央政治局要負責。但是，也就到此爲止了。照彭真說來，毛主席的錯誤不過是幾車水和海洋、幾噸土和泰山的比例，講一下不會影響到他的威信。

細究起來，彭真的話並不符合毛澤東倡導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原則。如果毛的錯誤不止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如果批評了毛的錯誤會損害他的威信，似乎就另當別論了。這裏隱含着一個意思，就是維護毛的威信比堅持黨的原則更重要。鄧小平轉述毛的話，也是毛爲自己開脫的：既然沒有缺點錯誤的聖人是沒有的，那麼毛的缺點錯誤，也只是表明他不是聖人而已。

如果毛是一個普通黨員，犯了錯誤而用「經驗不夠」來搪塞，是絕對過不了關的。同志們會紛紛批駁他，要求他深挖錯誤的認識根源和階級根源，諸如「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樣的帽子並不算大。毛一貫奉「批評與自我批評」爲黨的法寶，他批評周恩來的反冒進是嚴厲的，批評彭德懷是「一棍子打死」；可到事實證明他自己犯了錯誤時，他就輕描淡寫地對付過去了。

即使是這樣，還有人出來保駕。彭真講話的第二天，陳伯達發言說：「彭真同志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作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

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按陳伯達的話，「亂七八糟」的事情，都是別人做的，不是毛做的，毛的工作是不受檢查的。可是如果不檢查毛的工作，又怎樣能夠肯定毛沒有做過「亂七八糟」的事情呢？又怎樣能夠肯定毛沒有責任或沒有多少責任呢？而如果毛要負的責任都不能肯定，又怎麼追究別人的責任？

陳伯達講完後，彭真辯白：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彭真的話提出了一個原則問題，然而這個問題沒有受到認真對待，更沒有展開討論。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也說過類似的話，和他的遭遇相比，彭真的話沒有受到追究就已經很幸運了。我相信彭真的話也反映了許多與會者的意見，只是他們沒有如此明白地說出來而已。

使毛澤東感到不安的，更是會上反映出來的同情彭德懷的情緒。劉少奇說彭德懷的意見「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並不算犯錯誤」，「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人，只要不是裏通外國的，就可以翻案。」劉少奇說彭德懷是高饒集團的餘孽，毛澤東打斷他說：「是主要成員，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

本來，會議主要是討論劉少奇的書面報告，預計於一月二十八日結束。一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開「出氣會」，一再邀請大家在北京過春節，「白天出氣，晚

上看戲，兩乾一稀，大家滿意。」這樣，會議有了另一個高潮。

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又一次講話，他號召發揚民主，讓大家講話，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在講話中也作了自我批評。他承認，「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不再提出在二十或十五年間超英趕美，而說，「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考查一下他的這個自我批評的說法，是很有意思的。一月二十九日，他說：「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直到講得人家不願聽了，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橫直是有錯就要改，誰的錯誤就誰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麼官僚主義，搞了這麼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麼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志報告出來我才知道。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這裏毛沒有說中央要負主要責任，特別是他自己要負主要責任。「誰叫你當主席？」這個話，聽起來好像是說，他之所以有責任，是因為他有主席這個職務，而不是由於他做錯了事情。那麼，他要負什麼責任呢？他只說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意思是下面犯了錯誤他不知道。

一月三十日的講話中，毛這樣自我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

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八二二頁）

毛說，他過去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但他沒有說他是怎樣講的。他批評許多地方當時沒有傳達，但他為什麼不說凡沒有傳達的地方一定要傳達呢？為什麼不把他過去的講話印發給大家呢？這個會上的許多地縣級幹部，是不知道毛的那個自我批評的內容的。

毛在這個講話中，專門講了「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從哲學的高度，講「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他說中共從建黨到七大，一共花了二十四年時間，中間經過兩次勝利，兩次失敗，又經過三年半的整風運動，才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弄清了民主革命的路線和政策問題。因此，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現在還缺乏經驗。這從理論上說，當然是對的。問題在於：這種說法只是表明一般來說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表明人民公社、大躍進這樣的具體的錯誤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具體分析一九五八年以來錯誤的原因，單講哲學上的道理就不夠了。

哲學道理，使「缺乏經驗」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毛說自己「經濟建設中的許多問題

懂得不多」。他說，民主革命時期，一開始也是沒有經驗。這時，他顯得很有自知之明。可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他卻並沒有因為「懂得不多」而缺少自信。既然經驗不夠，為何不謹慎一點呢？這就要涉及「驕傲」和「好大喜功」這樣的問題了。可是，毛用哲學的大道理掩蓋了這個實質性的問題。

劉少奇的正式報告倒是談到了這個問題。報告認為犯錯誤的一個原因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裏談的是「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但是這不能理解包括毛澤東在內。劉少奇內心深處如何想，我們不得而知。但他的這個報告絕不代表他個人，是二十一人起草委員會搞出來的，而且要在全會上聽取大家的意見進行修改。這句話之所以能夠通過，正因為沒有人認為它是針對毛的。

毛本人在大會上的講話的中心內容是「民主集中制」，他絲毫沒有說到他自己違反了這個原則，只是尖銳地批評有些同志還不理解民主集中制，論據之一就是聽不得批評。毛還講了「霸王別姬」的故事，說這些同志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他還說：「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據在場的人說，毛講到這裏時，聲音很大，震動全場，顯得十分生氣。他很少在大會上發如此大的火。

毛感到很多人沒有把話講完，還憋着一肚子氣，就建議延長會期，讓大家「出氣」。從一月三十日以後就是「出氣」會，對工作提出批評。這次來開會的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很多，他們當然對中央提不出什麼批評，而是對省委很有意見。這樣，毛澤東就成功地把大家的怒氣引到省委頭上。他作為罪魁禍首，不但躲過了批評的矛頭，而且還儼然是支持大家暢所欲言、反對壓制民主的。

周恩來在二月三日福建組討論會上說，五年來五大運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八年拔白旗，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一九六〇年整風整社，一九六一年民主補課，奪取領導權。這五大運動每年一個，偏差不少。主要責任在中央。因為是中央提倡的。搞錯了的要平反，要做細緻的工作。周沒有提到反反冒進，但他提到的五大運動，都是毛澤東發動的。

朱德說：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了，吃了一些虧，打擊面大了，傷了人。黨內鬥爭有時同對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

鄧小平也講了「黨內鬥爭發生了一些偏差」，幾次運動中，「傷害了一些不應當傷害的幹部」。

也有一些幹部認為劉少奇的報告對過去幾年的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質問「《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要不要」、「十五年趕上英國還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

但是，出來大唱讚歌的，只有林彪。他說：「我們黨作了很多工作，取得的成績是偉大的。如果說有缺點的話，比較起來，次要得多，是次要的方面。事情總是不完全一樣的，有成績，就不會沒有缺點。可以說，沒有缺點的事情是永遠沒有的。」「我們黨在這幾年內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是人民的創造，是黨的創造。」「多快好省，毫無疑問，應該採取這樣的做法。我們能夠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幹勁，需要力爭上游，而且能夠力爭上游。」「大躍進，事實證明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人民公社，具有很多優越性。……人民公社在實踐中更加證明它是正確的，對社會發展是有利的，使我們找到了正確的發展形式，可以幫助我們更快更好地發展。」

在毛澤東的處境再次不利的時候，在很多人都在談論工作中的缺點的時候，林彪講了一通成績如何大，缺點如何小，成績要歸功於「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而困難之所以產生，恰恰是因為毛澤東思想受到了干擾：「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會小得多，彎路會彎得小一些。」「過去的工作做得好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在困難的時候，要更加依靠中央的領導，更加

依靠毛主席的領導，相信毛主席的領導。只有這樣，才更容易克服困難，」——只有這樣，黨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國家才能更好起來。」

林彪的發言結束後，毛澤東帶頭鼓掌。毛澤東還對羅瑞卿誇獎林彪的講話水平如何高，說「你就講不出」。

毛澤東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儘管大家對他還是那樣尊敬，他的內心肯定是疑慮重重的。三年困難是誰造成的？——他能逃脫責任嗎？經濟又是怎樣恢復的？——還不是別人的功勞嗎？黨內會不會有人認為，彭德懷是對的，當初聽了他的意見就好了？

主要由於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和李富春等人對一九六一年初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准的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貫徹，到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經濟已經明顯好轉了。

階級鬥爭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看清了黨內的形勢：劉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懷的，是對「三面紅旗」有所保留的；林彪是維護毛澤東的，是「緊跟」和「高舉」的。我們可以推斷，毛澤東是在這時開始想到林彪作接班人。毛已經從劉少奇身上看到了赫魯曉夫的影子。

形勢對彭德懷有利，彭德懷也許認為，現在到了解決他的問題的時候了。一九六二年

三月，彭德懷寫了八萬字的長信，六月，這封信送到了中央。彭德懷請求毛澤東和黨中央全面審查他的歷史。八月，彭德懷再次寫信，要求查證他的問題。毛澤東從這兩封信再次警覺到彭德懷翻案的危險。實際上，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號召大家講話不過是「引蛇出洞」的故伎。他肯定從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講話中嗅到了某種危險：黨內高層還有不少人同情彭德懷。不過他當時什麼也沒說。

直到這年的七月和八月，在北戴河會議和九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開始算帳了。認爲一九六二年春天劉少奇、陳雲、周恩來等人對經濟形勢的估計是「黑暗風」，對他從未表示反對的安徽等省的包產到戶說是「單幹風」，指彭德懷向中央遞交的申請書是搞翻案活動，不能給他平反，對錯整的人的甄別和平反工作是「翻案風」。把一些正確的意見斥爲右傾機會主義，說這是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的表現。他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他強調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從這以後，毛澤東不斷給階級鬥爭加溫，他同時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作戰。一九六三年五月，他主持制定了有關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文件，其中說，「當前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提出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鬥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同

年六月，中共中央發表了給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當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聯名發表了批判蘇共中央的重頭文章（「九評」）。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寫了有關文藝的第一個批示，嚴厲批評文藝界。一九六四年六月，他又寫了第二個批示，提出文藝界的「修正主義」問題。隨後文藝界開始整風，並對一些文藝作品展開批判，這個批判迅速擴大到整個學術界（如對揚獻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最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批判海瑞點燃了「文革」之火，這不是偶然的，他表明了「文革」和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懷這兩件事的聯繫。實際上，學習海瑞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這是他又一次「釣魚」。海瑞敢罵皇帝，彭德懷敢頂撞毛澤東，這就是這兩個人物之間的相似之處；另外一個相似之處是「罷官」。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接班人的造神運動

一九六四年五月，林彪授意下，總政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總政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林彪說毛

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此後，掀起一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了「無產階級接班人」的問題。他說，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這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着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在這裏，已經埋下了用林彪來換掉劉少奇的伏線了。從文字上看起來，毛澤東說的是下一代的問題，實際上，他是認為老一代也有問題。兩年後，毛澤東和胡志明談話，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四八九頁）這意思就很明白。

根據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他定下這個決心的時間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這個文件的時分，當時毛澤東提出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概念，劉少奇不同意，兩人有過爭吵。這個爭吵對劉少奇是致命的。他成了繼彭德懷之後敢於冒犯毛澤東權威的又一個領導人，等待着他的也是和彭德懷一樣的命運。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他就是這個時候下決心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的。劉少奇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年多以後，他成了「頭號黨內走資派」。

和彭德懷、劉少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林彪。他善於對毛澤東察言觀色，並千方百計加以迎合。在「文革」剛剛開始發動的時候，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在一篇經過精心準備的長篇發言中，說出了毛澤東最喜歡聽的話：「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主席所經過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

「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說彭羅陸楊要搞政變。

為配合會議，《解放軍報》五月四日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的會上，批評朱德，說他不同意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是反對毛澤東思想。

林彪的講話震動了整個會場，這就是有名的「五·一八」講話。九月二十二日，事先

也得到過毛澤東的認可，這個講話經中共中央批示同意，轉發到全國。毛澤東應該感到滿意，現在終於有人公開說他超過馬克思了。然而，毛澤東這樣做是有些不安的：講話是高度吹捧他的，他同意轉發全國，豈不是有些不謙虛嗎？毛澤東採取的辦法，就是一方面批示同意，一方面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對林彪講話中的某些提法表示保留。這封信的內容，我們後面還要談到。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林彪確實是出了大力的。在這裏，我們接觸到了另一個問題：毛澤東爲什麼能夠發動「文革」？林彪說過，「我們發動文化大革命靠兩個條件：一是靠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軍的力量。」（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見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及劉豐的談話）這個說法是可以同意的。不過，第一條的正確表達應該是「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第二條是由於林彪控制了軍隊。林彪之所以掌握軍權也是靠搞個人迷信，林彪帶頭在軍內搞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這個運動影響了全國，正如毛澤東說的，「全國學解放軍」。

從一九五九年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經過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和一九六三年的「四清」運動，和六十年代前期對國內外「修正主義」的一系列批判，這期間，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階級鬥爭的調子越來越高，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也越來越加深，這就爲「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今天有許多年輕人會對當時有那麼多人響應毛

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感到奇怪；在那時，這確是十分自然的。

個人迷信，是「文革」能夠產生的重要條件。毛澤東鼓勵個人崇拜，就是參與創造這樣的條件。「文革」又反過來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到頂峰，而這也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之一。

毛澤東不是沒有對「文革」中狂熱的個人崇拜現象做過任何批評；他批評過「大樹特樹」、「絕對權威」的提法，然而那效果卻像在一團大火上撒幾滴水一樣。只是到了一九七一年，當他已經對林彪的問題有所察覺的時候，他才在接見斯諾時說了個人崇拜應當「降溫」，「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這是林彪對毛澤東加的四頂桂冠）的提法「討嫌」的話，那已經晚了，而且仍然是很不徹底的。

「文革」不僅和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有密切聯繫，也和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有密切聯繫。江青在「文革」中說：「七千人大會，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這話確實泄露了毛澤東的滿腹心思。廬山會議後的七年，「七千人大會」後的四年，毛澤東開始報復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

第十一章

文革的準備(下)：鬥爭哲學和批修

尼克松的女兒朱莉是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會見的少數外國人之一。一九七六年初，她和丈夫應邀來到北京，受到毛的接見。朱莉在第二年寫的一本書《特殊人物》中，詳細敘述了這次會見。毛這時已體弱多病，衰老不堪。當朱莉看到毛在兩個穿着毛式服的年輕女人的攙扶下掙扎着站了起來時，不禁感到驚訝。「不管我是多麼急切地想見到主席，當我們實際上站在他面前時，我不知爲什麼感到在這種情況下見他是一種打擾。明顯地是由於一次中風，他的下顎下垂，使得他的樣子有些發呆。他的黃皮膚差不多是半透明的，像蠟一般，而且幾乎完全沒有皺紋。他的乾淨的毛式服——和他的僕人的衣服是一樣的灰色——鬆鬆垮垮地掛在身上。他的長長的臂和巨大的手像不堪忍受的重擔懸吊在身旁。當他說話時，聲音是咕噥咕噥的，刺耳，粗糙，吃力。」

這樣一個將要見上帝（或馬克思）的人，心裏想着什麼呢？

「年輕人吃不了苦，」他對我們說。「要告訴他們需要鬥爭。」在這次會見中他第一次顯得有生氣了，像一個年輕人。他有力地戳着食指來強調鬥爭的需要。……「黨內要有鬥爭。階級和階級要有鬥爭。除了鬥爭，什麼都是靠不住的。」（Julie Nixon Eisenhower: *Special People*, P.161.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7）

朱莉評論說：「對毛來說，鬥爭不僅僅是一個詞而已，那是他的哲學的基本原則。」這是說得對的。鬥爭——這是毛至死念念不忘的信條。

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毛澤東主義的重要內容，是毛澤東的「左」的政治路線的哲學辯護；作為一種「黨文化」的因素，它表現在各個方面，對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特別在「文革」期間達到頂峰。儘管「鬥爭哲學」現在已經成了一個貶義詞，但由於它以辯證法的名義出現，對真正的辯證法造成了很大的誤解和混亂，迄今沒有很好地澄清。「鬥爭哲學」之所以能一度大行其道，和長期以來我們對辯證法的了解不夠是有關係的。在從馬克思主義到列寧主義再到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的過程中，黑格爾辯證法的一些重要內容被丟掉了。爲了肅清「左」的流毒，應該作正本清源的工作，恢復辯證法的本來面目。

兩樁哲學公案的背景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的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討論和一九八四年對「合二而一」的批判，表面上好像僅僅是圍繞楊獻珍的觀點，其實背後都有國際背景；前者牽涉到斯大林，後者牽涉到赫魯曉夫。

《實踐論》和《矛盾論》都寫於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蘇聯出版了《聯共黨史》，其中第四章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斯大林親自撰寫。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哲學觀點加以整理，構建了一個體系。

斯大林把辯證法概括為四個特徵，第四個特徵是承認事物內部的矛盾。他說：

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不是通過現象的和諧的開展，而是通過對象、現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過在這些矛盾的基礎上活動的對立傾向的『鬥爭』進行的。

「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是列寧在《哲學筆記》中講過的話，但列寧同時還說過「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斯大林只講前面一句話，不講後面一句話。不但如此，斯大林還給「和諧」一詞賦予一種貶義，聲稱發展過程不是通過「和諧」的開展。這就把列寧說的「發展是對立面的同一」否定了。

一九五一年，毛把《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論文相繼公開發表。

《實踐論》在《人民日報》發表後，蘇聯方面的反應是熱烈的。《真理報》全文譯載，還配合發表了一篇社論。此外，還有一些著名哲學家發表評論。

《矛盾論》發表時，情況就有些不同了：不是由《真理報》發表，而是由聯共的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登載，而且不是一次登完，而是分兩期登完。是因為文章太長了嗎？《矛盾論》雖然長了一些，但蘇聯刊物上長篇文章有的是，並不是非得分兩次登不可。做過編輯工作的人會懂得，這是一種委婉的降低文章的重要性的方式；而且，可能特別是降低文章的後一半的價值。果然，當登出文章的後半時，有些懂俄文的中國讀者發現，原文中講到戰爭與和平的「同一性」的地方，俄譯文改成了戰爭與和平的「互相聯結」；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這個詞也改成了「統一性」。這就暴露了聯共中央對《矛盾論》的不同意之處。

一九五四年付印的《蘇聯大百科全書》中有「毛澤東」一條，其中說：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寫了兩篇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其中闡釋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對立的鬥爭是運動泉源的規律。

這個敘述歪曲了毛澤東的原意：只提對立的鬥爭，不提對立的同一。蘇聯共產黨的作

風就是這樣怪，他不是客觀地介紹某人的觀點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敘述別人的觀點。大概編者和作者覺得他們不能無批判地介紹毛澤東「矛盾的同一性」的觀點，於是只好不提，似乎毛澤東根本沒有過這樣的觀點。

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作他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講演時，他的主要參考書籍並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或列寧的哲學經典，而是當時蘇聯一些哲學家如米丁、西洛柯夫、愛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參考了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自從一九八八年國內出版了《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以後，這一點已經十分清楚了。

《實踐論》是講認識論的，《矛盾論》是講辯證法的。這兩篇文章都是列寧在《哲學筆記》中的思想的解釋和發揮。這個解釋和發揮的功勞屬於蘇聯哲學家；毛澤東並沒有什麼增添。但是蘇聯哲學家的著作寫得冗長累贅，加上翻譯的問題，讀起來佶屈聱牙；毛澤東把這些著作中的精華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煉的語言表達出來，因此，應該說他在普及化方面作了貢獻。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所謂矛盾，就是「對立統一」（而不僅僅是對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可以注意到，毛澤東在這裏說的是「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而不單單是相互鬥爭，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

毛澤東沒有照搬斯大林；當蘇聯哲學家不再提自己過去的著作時，毛澤東還繼續堅持《實踐論》和《矛盾論》中的基本觀點。其中《矛盾論》對對立統一規律的闡釋，特別是對「矛盾的同一性」的闡釋，明顯地與斯大林的不同。

可以看出，正確的是毛澤東，而不是斯大林。毛澤東的觀點雖然是來自西洛柯夫和米丁等人，但是他們後來把這個觀點放棄了，而毛澤東卻仍然堅持着，沒有盲從斯大林。

蘇聯著名哲學家羅森塔爾起初顯然對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興，他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中肯定了這個原理。可是不久，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期的《哲學問題》上，出現了一篇批評他的文章。這篇文章似乎是有來頭的。文中說，「我們認為羅森塔爾教授所使用的『對立的統一』及『對立的統一和鬥爭』等名詞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經典著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已規定『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最新成就」，而「對立的『同一』或統一」是黑格爾表達方式的殘餘」。

同年《哲學問題》第四期，羅森塔爾發表了自我批評。

以後，在尤金和羅森塔爾合編的《簡明哲學詞典》的一九五四年第四版的「同一性」這一條中，加進了如下的話：

有時，有些人錯誤地把馬克思主義的同一性原理應用於一些根本對立的現象。例如：

一些人說，和平和戰爭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同一的，等等。這樣簡單的理解同一性其實就是濫用黑格爾的術語。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格外熱衷於這種做法。像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生和死等等現象不能是同一的，因為它們是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

這裏面談到的「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生和死」這三個例子都是《矛盾論》中用來說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顯然，這是不指名地批評《矛盾論》。羅森塔爾這樣做，當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歸正」；但是，批評毛澤東這樣的事，如果沒有斯大林的授意，羅森塔爾是不敢的。

生與死的同一性是黑格爾首先提出來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講到這一點；例如他在《自然辯證法》中說：「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質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質上包含在生命自身的生理學，已經不被認為是科學了，因此，生命總是和它的必然結局，即總是以萌芽狀態存在於生命之中的死亡聯繫起來加以考慮的。辯證的生命觀無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着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三七〇頁）

《簡明哲學詞典》的第四版在一九五五年譯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條一字未改地發表了出來。毛澤東當然不會不把這個批評放在心上，但在當時，他只能忍耐。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後，在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

夫作了批判個人崇拜的報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這個報告震動了全世界。毛澤東覺得可以在這個哲學問題上對斯大林進行反批評了。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斯大林「只講對立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說《簡明哲學詞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毛澤東再次闡述了戰爭與和平、生與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性，然後說，「對立面的這種鬥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繫不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七—三四八頁）

接着，二月，毛澤東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毛再次強調：「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基本規律」，「矛盾着的對立面又統一，又鬥爭，由此推動事物的發展和變化。」

毛在這篇演講的開始部分含蓄地批評了斯大林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說對許多人說來，承認對立統一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處理問題又是另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着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

毛澤東還進一步說，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內部也可能發生對抗性的矛盾。這是毛的新

觀點。

雖然毛在這一次反駁了《簡明哲學詞典》，但那是在黨內高層會議上說的，廣大黨員並不知情，更不消說黨外了。毛顯然認為，既然《簡明哲學詞典》是公開發行的，那麼，也需要在公開的刊物上進行反批評。

一九五八年，《紅旗》總編輯陳伯達（他也是毛的政治秘書之一）找到了中央黨校的副校長楊獻珍，問他「敢不敢批評尤金」，對《簡明哲學詞典》提出不同意見，闡明一下矛盾的同一性問題。楊獻珍接受了這個任務，在這一年的八月寫出了《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表明，陳伯達找錯作者了。

當時，在中央黨校內部，正在進行一場爭論。這個爭論是在講授恩格斯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時產生的。恩格斯講到，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問題以外，還有另一方面，就是：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二二一頁）這個意思很清楚，恩格斯把世界可不可以認識的問題用哲學的語言概括為「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承認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意味着承認思維能夠與存在符合一致，承認

世界可以認識；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論了。

這裏的「同一性」在德文原文裏是 *Identität*，就是英文的 *identity*。中文譯作「同一性」，譯成「一致性」也可。說兩個東西是 *identical*（同一的），可以意味着這兩個東西是一個東西（如說「啓明」和「長庚」是同一顆星）；但也可以意味着這兩個東西是相似的、一致的、符合的（如說譯文和原文是同一的）。恩格斯當然是在後一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因此，「同一」在這裏是「一致」或「統一」的同義語。列寧就說過「對立面的同一」（他們的『統一』，也許這樣說更正確些吧？雖然同一和統一這兩個名詞的差別在這裏並不特別重要。在一定意義上這兩個名詞都是正確的）。（列寧《哲學筆記》，三九七—三九八頁）

恩格斯是把「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作為各派哲學家的共同問題提出來的。唯心主義者也好，唯物主義者也好，都要回答世界可不可以認識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思維和存在有沒有同一性的問題。問題就在這個「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爾常用的語言，而黑格爾是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來解釋和論證這個原理的。黑格爾認為一切都是精神，他把整個宇宙和歷史都當做絕對精神的顯現，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因為這樣，世界才可以被精神認識的。但在黑格爾的體系中，自然和精神又是不同一的，有區別的，自然只是精神發展的一個階段，是理念的外化。黑格爾批評謝林，就因為謝林主張思維和存在

的「無差別的同一」。把黑格爾的體系顛倒過來，唯物主義者也可以說：一切都是物質，精神不過是物質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物質和精神有共同的規律，因此物質可以認識。這就是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這個觀點是楊獻珍不能接受的；他認定，唯物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承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儘管黑格爾主張的是一「具體的同一性」，它包含差別於自身，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但楊獻珍根據自己的理解，以為承認這種同一性就意味着思維和存在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同一個東西，說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能再說思維和存在是不同一的。他的這個觀點和艾思奇發生了分歧；艾認為恩格斯也是肯定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

看來陳伯達事先並不清楚黨校內部的這場爭論。當陳伯達找到楊獻珍寫文章時，他的意圖是希望這篇文章能夠闡明「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批評《簡明哲學詞典》說的「根本對立和相互排斥」的矛盾沒有同一性。楊獻珍寫的文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批評了尤金和羅森塔爾，闡述了戰爭與和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生與死這樣的矛盾有同一性。如果寫到這裏就交卷，那麼這篇文章也許還可以發表；但是楊獻珍卻同時企圖利用這個機會來批評艾思奇，於是他在文章的後半大講「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義的原理。這樣，他的文章的前半和後半是矛盾的：前半說根本對立的矛盾也有同一性；後半卻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

自然，《紅旗》無法發表這篇文章，但是，楊獻珍卻通過他的追隨者把他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觀點發表到刊物上去，批評與艾思奇相同的觀點。這就引發了一場長期的爭論。

楊獻珍在「文革」後把這場爭論說成是「批判」。實際上當時雙方都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批評也是相互的。筆者當時也屬於爭論的一方。我們批評對方是機械唯物論，對方則批評我們是唯心論。楊獻珍當時沒有發表文章，並非因為報刊上拒絕刊載，而是他不願意發表（據我所知，《哲學研究》雜誌曾約請楊獻珍寫文章）。正因為如此，不同意楊獻珍的一方並沒有提他的名字。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間，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順帶談到他同意說思維和存在有同一性，說：

思維和存在有沒有同一性這個問題，爭論很久了。認為思維只是思維，存在只是存在，思維不能達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認識，客觀不能被主觀所認識，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最後走到康德那裏去。

思維和存在不能劃等號。說二者同一，不是說二者等同，不是說思維等同於

* 對楊獻珍這篇文章的詳細評論，請參看我的《辯證法的命運》一文。此文收入《爲人道主義辯護》，三聯書店，一九八六年。本文的有些部分取自這篇文章。

存在。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了。然後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被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還是馬克思說的那些話對，思維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說思維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對的，但是因此就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則是錯誤的。

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勢必走到反對恩格斯的論點。

不過毛澤東並沒有干預這場討論。作為參加爭論的一方，我當時也根本不知道毛澤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時，增寫了一段話，就是後來發表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其中毛講到有很多同志對「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覺得不可理解。這是針對楊獻珍的，不過說得很含蓄。

到了一九六四年，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報刊才開始了對楊獻珍的有組織的政治批判。

轉折點：用「一分為二」反對「合二而一」

毛最早使用「一分爲二」這個詞，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的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當時毛說，「其實我們的支部書記是懂得辯證法的，當他準備在支部大會上作報告的時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寫上兩點，第一點是優點，第二點是缺點。一分爲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九八頁）這是說要看事物的兩重性或兩個方面，避免片面性。這裏是含蓄地批評赫魯曉夫沒有對斯大林「一分爲二」，其水平還不如中國的一個支部書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澤東在爲黨中央起草的《關於加強相互學習，克服故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中批評有些幹部對工作不採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一分爲二，即有成績，也有缺點錯誤）」，並號召共產黨人掌握「對於成績與缺點、真理與錯誤這個兩分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

同月，毛在審閱周揚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一文時，加進了這樣一段話：

怎麼有些人會從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擁護者，竟然墮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學的修正主義道路上去呢？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世界上無論什麼事物，總是一分爲二。學說也是這樣，總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學的學說，就一定會在其內部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它的對立物，產生反革命的、反科學的學說。……這個理論早已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和各個社會科學的歷史所說明了，也爲自

然科學的歷史所說明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四〇一—四〇二頁）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用「一分爲二」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對立。在此之前，「一分爲二」的「分」是指分析、區分；在這裏，「分」卻是指分化、分裂了。

「文革」時期的中國報章雜誌曾吹捧說，提出「一分爲二」是毛澤東對辯證法的新貢獻。其實，這只不過是對立統一換了一個表述方式，算得了什麼呢？而且，毛的這種說法是從列寧那裏來的。列寧說過，「統一物之分爲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列寧《哲學筆記》，三九七頁）這就是「一分爲二」的意思。這種說法本來沒有錯，但不如「對立統一」的提法完整；而毛澤東把它稱爲「兩分法」，常常排除了事物的中間狀態，變成了「兩值邏輯」。

例如，在毛澤東看來，文學藝術的作品，要麼是「香花」，要麼是「毒草」。那麼，有沒有不香的花和無毒的草呢？其實，這種作品是大量的。有許多作品的內容有不健康的東西，但沒有嚴重到有毒的地步；另外也有許多作品有可讀性，但未必夠得上「香花」的美稱。再如，五十年代開始，毛澤東把中國知識分子分爲兩類，要麼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要麼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再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其實，怎麼能把知識分子這樣簡單地歸類呢？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上，也有類似的情況：要麼革命，

要麼反革命。其實很多不是反革命的人，未必就是革命的，而很多不革命的人，也並非反革命。

還有，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中這樣提出問題：「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之後，中國要向哪裏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是思想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毛澤東在這裏說的「社會主義」，就是指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那麼，此外就沒有別的道路了嗎？毛澤東原來提的是「新民主主義」，它既不同於蘇維埃式的社會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而這條道路要走相當長的時期；這個思想本來是很清楚的，是毛澤東自己說過的。現在毛澤東改變了問題的提法，於是三種選擇變成兩種選擇了。

這種「兩分法」的思維方式明顯地帶上黑格爾說的「知性」的特點：非此即彼。它的好處是明確，不含糊，但是失之簡單化和僵化，缺乏辯證法應有的靈活性。

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爭論情況來看，楊獻珍一派似乎是處於劣勢，至少在哲學界同意他們的觀點的人不多。到一九六三年底，楊獻珍想擺脫被動局面，表示自己並不是如對方所說的只講唯物論不講辯證法，他開始在中央黨校講授辯證法，講「對立面的同一」了。楊獻珍在講課中引用了明代哲學家方以智的

「合二而一」這個話來解釋對立的統一；又說，「所謂統一，就是不可分地聯繫着的」。可以看出，他局部地改變了自己的觀點。

然而，當楊獻珍開始轉向辯證法的時候，毛澤東卻從辯證法後退了。

毛澤東抓住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這句話，認為這是和自己講的「一分爲二」唱對台戲。其實，楊獻珍並沒有否定「一分爲二」。「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並不是非此即彼地對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爲二」，正因爲這個「一」裏面已經潛在地包含了「二」，這個「一」是「合二而一」的「一」。這就好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從這面看是「一分爲二」，從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觀點本來和毛在《矛盾論》裏的觀點是一致的。《矛盾論》曾說矛盾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不就是「合二而一」嗎*？爲什麼毛澤東改變了自己本來正確的觀點呢？

這個原因不能從理論本身去找，而要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這個時期毛正致力於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而在他眼中，楊獻珍並不是他的忠實信

*可以注意的是，《矛盾論》引證了列寧的話：「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這裏明確地把「統一」和「合一」看作一回事。雖然後來譯文有修改，這個「合一」改爲「均勢」，但這是一九九〇年的事（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三四〇頁的注〔三三〕），毛澤東本人並不知道。當時他引用這一段話，表明他並不認爲「合一」這個詞是不能用的。

徒。楊是一個正統的共產黨員，他為何觸怒了毛？毛自己的解釋是，他關於「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以及哲學要從課堂和書齋裏解放出來的話「觸到有些人的痛處，他們出來搞『合二而一』反對我」。（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參見本書四一三頁）

這個話是不足信的。楊獻珍不會故意提出「合二而一」來和毛澤東唱對台戲。我認為真實的原因有兩件事：一是楊獻珍在中央黨校講哲學課，只是抱着列寧的一本《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不講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彷彿讀通了列寧這本書，弄懂了「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之後，別的書就不用讀了（楊獻珍被撤職以後，他的繼任者林楓吸取教訓，把讀毛著列為中央黨校的首要任務）；另一個原因是楊獻珍在一九五八年直率地批評了「大躍進」中的主觀主義，說「衛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歡楊獻珍。

在我看來，只講《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而不講《實踐論》是不對的。列寧的這本書只講了認識論的唯物論，對認識論的辯證法很少涉及；其次，列寧對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講得不夠，只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有講實踐是認識的起源。這兩個缺點，在《實踐論》中得到了彌補（自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的觀點來自蘇聯哲學家）。至於第二點，楊獻珍當然是正確的，表現了他的實事求是的勇氣。

不過毛的轉變的最重要的原因，還要到國際背景中去找。

六十年代初，蘇聯哲學界提出了對立面可以「融合」的論點（米丁、費多謝也夫），這是為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和平共處」的概念作辯護。共產黨對意識形態的重視，使得他們的領袖在提出一條路線和一項基本政策時，一定要證明它的背後有一條普遍的規律。這樣，赫魯曉夫為了肯定新路線的合理性，就需要從哲學上來論證並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而毛澤東也需要通過批駁矛盾「融合」的觀點來證明赫魯曉夫背叛了馬列主義。

其實，蘇聯哲學界使用的「融合」這個術語是來自馬克思，本文的前面已經提到了馬克思的有關原文。採用這個概念，是同斯大林的觀點背離而向馬克思的靠近；從理論上說，這是一個進步。但毛澤東是從政治需要來評價這種轉變的。

這個時期，毛澤東正在加緊進行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部署。一九六三年，中蘇兩黨的論爭進一步公開化。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報》和《紅旗》兩個編輯部陸續發表了九篇批評蘇共的文章（「九評」）。在國內農村，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文化領域，一九六三年毛作了對文藝界進行嚴厲批評的批示。在外事領域，毛批評了對外聯絡部的所謂「三和一少」路線（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各國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共已和蘇共分道揚鑣。毛需要宣傳中蘇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這時楊獻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認爲這可以抓住這個機會從哲學上來論證矛盾的不可調和，反對妥協與合作，反對聯合。

毛囑咐《紅旗》對正在進行的關於「合二而一」的討論發表一篇評述。這篇題爲《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的評述經過陳伯達的審閱和修改，在該刊一九六四年的十六期發表。於是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開始了。

這篇文章說：「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現在，實際上反帝反修的鬥爭正在蓬勃發展，國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正走向一個新的階段。面對這種形勢，毛澤東強調要用「一分爲二」的觀點來進行鬥爭。楊獻珍在這時宣揚「合二而一」論，就是適應修正主義和敵對階級的需要，宣傳階級合作和矛盾調和，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頂帽子是很大的。楊獻珍是不是真有這個目的，這對毛澤東並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澤東也要這樣說。這是政治的需要，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中還批評說，有人「裝着要對矛盾作具體分析的樣子，將矛盾劃分爲『以同一性爲主』和『以鬥爭性爲主』兩類，說什麼處理『以同一性爲主』的矛盾要『合二而一』」。這牽涉到劉少奇的觀點。一九五七年，劉少奇在闡述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講話時，曾提出人民內部矛盾是「以同一性爲主」，敵我矛盾是「以鬥爭性爲

主」。此外，這篇文章還批評楊獻珍「大講特講研究對立面的統一的任務僅僅在於尋找『共同要求』，『求同存異』」；這是周恩來提出來的外交上的一個方針。

這些言論體現了毛澤東的觀點。楊獻珍後來說，這是康生在整他。其實，這是毛澤東的部署。當然，毛澤東可能是聽了康生的報告。

這篇評述被《人民日報》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轉載。隨後，報紙上出現了一系列批判楊獻珍的文章。^{*}這場批判甚至擴展到工人和軍隊之中，成為群眾性的批判運動。這裏隨意從當時的報紙上舉一個例子。一位大慶油田的工人說：「原來『合二而一』論是主張階級調和，主張不鬥爭，不革命，反對革命。誰反對革命？只有資本家、地主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才反對革命，才會歡迎『合二而一』；真正的工人、農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絕不能同意『合二而一』的謬論。我們一定要認清『合二而一』論的危害，堅決同它作鬥爭。」這樣，政治聲討代替了理論批判。中國的人民群眾普遍在思想上做好同蘇聯分裂的準備了。

就在轉載《紅旗》文章的同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登出了中共中央對於蘇共中央

^{*}作者也曾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評楊獻珍同志的矛盾觀》的文章，其中批評楊獻珍否認「一分為二」，還給楊獻珍戴上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黨的路線的修正主義」的政治帽子。我已經不止一次承認了這個錯誤，現在再次在這裏提一下。

七月三十日來信的覆信。蘇共中央的這封信是邀請中共派代表參加籌備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工作。中共中央的回信斥責蘇共執行了一條「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線」，斥責這封信是「發出了公開分裂國際共產主義的號令」。覆信斷然宣稱「決不參加你們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會議」，「決不能分擔你們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責任」。並說，召開這種分裂小會是「自尋絕路」，「我們已經警告過你們：你們召開分裂會議之日，就是進入墳墓之時。」

這封信的語氣之強烈和措辭的尖刻令人震驚。我毫不懷疑這是毛澤東的口吻。（參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〇七頁）

毛澤東準備「一分爲二」了！

綜合：「一個吃一個？」

用「一分爲二」去否定「合二而一」，這在理論上是很難說通的。在初期，當這個問題還在自由討論的時候，不少人提出了質疑。有人說，單提「一分爲二」不提「合二而一」是片面的。有人說，有分析就有綜合，因此，有「一分爲二」就有「合二而一」。還有人說，水不就是氫和氧的「合二而一」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伯茂的文章《淺評關於「一分爲二與合二而一」的討論》。作者提出，有一種類型的

矛盾是針鋒相對、水火難容的，必須通過你死我活的鬥爭來解決；但還有另一種類型的矛盾，如紅與專、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勞與逸、工業與農業等，解決的方法就應該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相互促進，合二而一，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

當時我是《人民日報》理論部的編輯。我聽說，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把康生叫去，說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難題，不好辦。但是毛並不想吸收正確的反對意見。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在北戴河和《紅旗》雜誌組織的一個準備寫「一分爲二」問題的班子談話。二十四日，他又找于光遠和周培源談日本科學家坂田昌一關於基本粒子無限可分的文章問題。這兩次談話的記錄從未公開發表，但它們卻是研究毛澤東晚年哲學思想的重要材料。「文革」的混亂時期，有些紅衛兵組織把它印出來了。

這兩次談話都涉及氫氧化合成水的問題。毛表示他贊成北大化學教授傅鷹的觀點，他也提到《光明日報》八月二十一日發表的文章。^{*}但是，他並沒有對這種觀點作出清楚的解釋。他說：「地球原來是死的地球，沒有植物，沒有水，沒有空氣。傅鷹說，不知幾千

^{*}這篇文章題爲《氫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嗎？》（署名郁之）。其中說，氫和氧化合成水是「矛盾雙方激烈鬥爭的結果」，其間要經過許多複雜的步驟，有很多一分爲二的過程，例如一個氫分子分解爲兩個自由氫原子（ $\text{H} \downarrow \text{H}$ ）。毛肯定了這篇文章。其實在文章列舉的方程式中，還隱藏着諸如一個氧原子和一個氫原子結合爲一個自由基（ $\text{O} + \text{H} \downarrow \text{OH}$ ）這樣的情況。作者說這是「由一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組成的新的統一物」，卻不說這是「合二而一」。而且，無論過程多麼複雜，最後結果還是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的「合二而一」（ H_2O ）。

萬年才形成水，水不是隨便一下就變成的。」（《光明日報》上前兩天有一篇文章，講氫和氧化合成水要經過幾百萬年，北大傅鷹說要幾千萬年，不知道《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鷹討論過沒有。」

毛的這種解釋是完全不能說明問題的；氫氧化合成水是不是「合二而一」，同這個過程需要多長的時間，這完全是兩個問題。毛澤東在這裏講的同他在一九五七年講的不一致，當時他說，「所謂對立統一，就是不同性質的對立的東西的統一。比如水，是由氫和氧兩種元素結合的。如果沒有氧，光有氫，或者沒有氫，光有氧，都不能搞成水。」（《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一九—三二〇頁）這不就是氫和氧的「合二而一」嗎？

對我們的問題更爲重要的是第一次談話。這個談話顯示，毛澤東還是把某些反對觀點放在心上的。這些反對觀點最有力的一個是：如果「一分爲二」是分析，那麼「合二而一」就是綜合；不能只有分析而沒有綜合，因此也不能只講「一分爲二」而不講「合二而一」。

毛試圖從理論上來回答這個問題，他說：

歷來講分析，綜合，講得不清楚。分析比較清楚；綜合，沒有講過幾句話。

我曾找艾思奇談話，他說現在只講概念上的綜合、分析，不講客觀實際的綜合分析。

現在毛澤東要講實際的綜合分析。他以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為例，說分析就是說雙方各有多少力量，多少軍隊，多少地方，各有什麼強處和弱點。那麼怎樣綜合呢？「就是這麼綜合的：他的軍隊來，我們吃掉，一塊一塊地吃。不是兩方面和平共處地綜合。」

「所有的槍炮都綜合到我們這裏來，兵士也都綜合了。」

毛把這種現象提升為一個普遍原則。他繼續說：

「一個吃一個，大魚吃小魚，就是綜合。」

「一個消滅一個，發生、發展、消滅，任何東西都是如此。不是讓人家消滅就是自己滅亡。」

毛以「大魚吃小魚」和共產黨軍隊消滅國民黨軍隊為例來說明綜合並不是兩者並存，這種舉幾個例子來證明一個普遍原理的方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人們完全可以舉出相反的例子。男女結婚，組合成一個家庭，這應當是一個實際的「綜合」例子，可這是誰吃掉誰呢？共產黨喜歡講「領導和群眾結合」，這又是誰吃掉誰呢？說任何東西都是在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中，這當然是辯證法的常識；但把「你死我活」的現象普遍化，這倒是像霍布斯說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只使人感到恐怖。從社會歷史來看，「你死我活」的現象當然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情況；不然的話，人類社會早滅亡了。

毛迴避了紅與專、革命精神與科學態度、工業與農業這樣相反相成的矛盾，把「分」與「合」截然對立起來，只許講「分」，不許講「合」。這既違反現實生活，也違反辯證法。

這次講話明確地否定了對立面的共存，明確地否定了對立面的不可分割的聯繫。毛批評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說：

世界上有什麼不可分割的聯繫？有聯繫，但總是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只消從自然科學中舉一個例子就可以駁倒這個論斷：磁鐵的南北極就是不可分割的。把一塊磁鐵分成兩半，每一半仍然有南北兩極；再分也是這樣。毛澤東這個論斷，和他過去的觀點也不一致。《矛盾論》裏說，矛盾雙方不能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難道「相互依存」不就是「不可分離」或「不可分割」的意思嗎？這是邏輯上的不可分離，並不否定矛盾雙方的分化和分裂，並不否定「一分為二」。

過去，毛澤東批評斯大林只講鬥爭不講統一；現在，毛卻從這個立場後退了，和斯大林站在一起了。

本來，在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上，楊獻珍是錯誤的；到了批「合二而一」的時候，毛澤東是錯誤的了。

從哲學上看，「一分爲二」也好，「一個吃掉一個」也好，都是很淺薄的，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思想，本來是不值得重視的；我們之所以要在這裏討論它，只因爲它在政治上起了重要作用。毛在這時提出這樣的觀點，也反映了毛澤東當時的心態：他要同「修正主義」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

對「否定的否定」的否定

值得重視的倒是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對「否定的否定」的否定。這個觀點涉及一些有學術價值的問題，而且同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有密切關係，值得我們詳加討論。

馬克思恩格斯對「否定之否定」都是肯定的。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指出，從小生產的私有制到資本主義私有制，再到以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爲基礎的個人所有制的恢復，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出了辯證法的三條規律：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他是從黑格爾的《邏輯學》的三個部分概括出這三條規律來的：「有論」闡述了質量互變規律；「本質論」闡述了對立統一規律；「總念論」闡述了否定之否定規律。*

列寧沒有機會讀到恩格斯的這部著作。他在《哲學筆記》中記下這樣的觀點：對立統一 是辯證法的核心。不過，他對「否定之否定」也是肯定的。

在一九三八年《聯共黨史》出版之前，蘇聯的哲學教科書都是依據恩格斯的提法，講「辯證法的三大規律」。斯大林在他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講辯證法，改為講「四個特徵」，其中拋棄了「否定之否定」。此後，這條規律就從蘇聯的教科書中消失了。

毛澤東想沿着列寧的「對立統一」是辯證法的核心」這個觀點前進，把「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都納入「對立統一」這一條規律中去。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毛說到：「對立統一的規律，量變質變的規律，肯定否定的規律，永遠地普遍地存在。」在這裏，毛引人注目地把「否定之否定」規律改變為「肯定否定的規律」。不過毛當時沒有對這種新的表述加以說明。

毛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的哲學談話中進一步提出：恩格斯提出辯證法有三條規律是不必要的，只要「對立統一」這一條規律就夠了。「質量互變」可以看作是質與量的對立統一關係。「否定之否定」就是「再肯定」。事物發展的過程可以表述為「肯定」，

*「總念」的德文是 Begriff，英譯作 notion。現在中譯多作「概念」，雖然看起來很通俗，但一般人所解的「概念」通常指抽象概念，而黑格爾的 Begriff 是指具體概念，兩者意義不同，很容易產生誤解。已故的黑格爾《小邏輯》中譯者賀麟教授曾用過「總念」這個譯名；雖然他在一九八〇年的新版中又改用「概念」，但他也說「『總念』這一譯名也不是不可以用的」。我認為還是「總念」這個譯名較好。另外，「有論」賀譯為「存在論」。我這裏採納了楊一之教授的意見，將黑格爾的 Sein 改譯為「有」。

「否定」，「再肯定」，「再否定」……根本用不着什麼「否定之否定」：

恩格斯講了三個範疇（應為三條規律——引者注），我就不相信那三個範疇。對立統一是最基本的範疇，質量互變是質和量的統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沒有。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同對立統一規律平行地並列，這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最根本的是一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就是質與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什麼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事物的發展，每一個環節，既是肯定，又是否定。

這個意思，毛澤東後來在一九六五年寫成了文字，如下：

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範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繫、發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蓋所謂聯繫就是諸對立物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繫，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鬥爭的結果。至於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應與現象本質、形式內容等等，在核心規律的指導下予以說明。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並列的方法不妥，這在列寧已基本上解決了，我們的任務是加以解釋和發揮。（《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八四七頁）

在這裏毛澤東企圖把列寧關於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的論點做出提綱式的解釋，把辯證法的其他內容——不僅是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還有聯繫與發展——都合併

到對立統一規律中去。在他看來，一切聯繫都是對立物的聯繫。這樣，他就把「差異」和「對立」混爲一談了。這個觀點，在《矛盾論》中已經有了，其中說：「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差異可以發展爲矛盾，但並非一切差異都是矛盾。黑格爾是區別這兩者的；他舉例說，一個駱駝和一支鉛筆的關係，就是「差異」而不是「對立」。每個事物都處在極其繁多的關係中，有許多和它有關的東西，這種狀態是「雜多」。雜多的事物都是相異的，但只有本質的差異才是對立。「在對立裏，相異者並不是與任何他物相對立，而是與它正相反的他物相對立。」（《小邏輯》第一一九節附釋）

但這不是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我們主要的討論問題是否定之否定。

毛澤東並沒有理解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的深刻性。他對這三條規律的理解，顯然只是從蘇聯哲學讀物中來的；這些讀物確實是把這三條規律平列的。另外，恩格斯的概括也容易導致誤解。「質」和「量」只是黑格爾邏輯學中的一對範疇；黑格爾還討論了許多其他範疇（如同「一和差別，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原因和結果，必然和偶然，普遍與特殊，等等」），不知爲什麼恩格斯單單抽出質和量這一對範疇來，並把它們的關係提升爲規律。黑格爾雖然在「本質論」中講到了對立面的互相滲透，但在別的部分也講到了，不是單單在這個部分講的。而且，要把這個規律講透，就要同「否定之否定」規

律結合起來。三條規律確實像是平列，看不出它們之間的聯繫。這樣一來，辯證法的規律就好像成了「實例的總和」。毛澤東說質和量的關係就是對立統一的關係，這是對的。

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中，舉了大量例子來說明這三條規律。以後蘇聯的哲學讀物也照此辦理。「質量互變」規律之所以引起共產黨人的興趣，主要是由於它可以用來論證革命的必要性：改良是量變，革命是質變，質變優於量變，因此，要作革命派，不要作改良派……。

這牽涉到如何繼承黑格爾的辯證法遺產問題。這個問題並沒有很好解決。

黑格爾的三段式

在黑格爾本人那裏，和這三條規律相對應的邏輯學的三個部分「有論」、「本質論」、「總念論」不是平列的，而是代表了辯證邏輯和認識發展的三個層次：

「有論」中討論了「有」和「無」，「質」和「量」等範疇。它們代表人的最初的認識階段——簡單的感知。某物有或者沒有。糖是甜的，花是紅的：這是事物的質。山是大的，沙是小的：這是事物的量。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最簡單最基本的東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就是從這裏開始的。這些範疇的特點是直接性，彼此之間似乎是獨立的，不相干的；如果它們之間有聯繫的話，這種聯繫也是外在的，只是從一個「過渡」

到另一個（如從質過渡到量）。它們之間的真正的內在聯繫還是隱而不顯的。

黑格爾指出：「事物真正地並不像它們直接表現的那樣。所以要想認識事物，僅僅從一個質反覆轉變為另一個質，或僅僅從質過渡到量，從量過渡到質，那是不行的。」（《小邏輯》第一一二節附釋）因此就要把事物分為表裏兩層，由表及裏，這樣我們就進入「本質論」這個較高的層次。「本質論」中的範疇不再是直接呈現在感官前的東西，而是要靠抽象的思維來把握的。黑格爾稱這個階段為「反思」階段或「知性」階段。這個階段出現的範疇是間接性的、二重性的、互相依存的；如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原因與結果，必然與偶然。說「本質」就必然意味着有它的「現象」，沒有現象的本質就不是本質；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內容與形式，原因與結果，必然與偶然的關係也是這樣。「本質論」中的範疇是科學家最常使用的範疇；科學研究的任務就是要給事物分門別類，把不同的事物區別開來，在現象背後發現本質，從結果中探尋出原因。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常常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看成是固定的：現象就是現象，本質就是本質；必然的就不是偶然的，偶然的就不是必然的。界限分明，非此即彼。這是知性思維的特點，也是黑格爾常常批評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特點；它所遵循的是形式邏輯的規律。

「總念論」是最高階段，這就是「理性」的階段。如果思維的運作方式在感性階段是「由此及彼」，在知性階段是「由表及裏」，那麼在理性階段就是「由偏及全」或者

「由分而合」。思維看到，如果對立的每一方總是絕對肯定自己，絕對排斥對方，這是不能解決矛盾的；因此，需要把肯定的一方與否定的的一方結合起來，得到一個較全面的真理。這就是黑格爾說的「具體概念」，即總念。讓我舉一個中國哲學的例子來說明，就是公孫龍子的「白馬論」。

「白馬是馬」這個命題，大家習以為常。但細究起來，這裏面是有矛盾的。「馬」是一般概念或普遍概念，「白馬」是特殊概念，兩者的內涵是不同的：「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兩者的外延也是不同的：「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我說要一匹馬，這對馬的顏色沒有限制，牽黃馬黑馬來都可以；我說要一匹白馬，黃馬黑馬就都不行了。公孫龍子第一次發現了日常語言中的這個矛盾，這是他的貢獻。但他對待這個矛盾的方法是抓住矛盾的一個方面來否認另一個方面。

黑格爾也發現了這個矛盾，但他不是用矛盾的一方來否定另一方，而是承認矛盾的真實性。如果我們採納他的觀點來看，大家習慣於說「白馬是馬」，誰說「白馬非馬」就會被認為胡說，這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遵守形式邏輯，而且只遵守形式邏輯就夠了。可是要作為一個哲學問題來探討，形式邏輯就不夠用，而需要辯證邏輯了。大家都說「白馬是馬」，誰都不感覺有什麼問題。但如果我說「特殊是普遍」，大家就會驚訝了：特殊是特殊，普遍是普遍，怎麼能說特殊是普遍呢？其實，「白馬」是特殊，「馬」是普遍；

說「白馬是馬」，不就等於說「特殊是普遍」嗎？

問題在於：說「特殊是普遍」固然沒有錯，但是我們必須補充說，這個說法是不全面的，因為說「特殊不是普遍」也沒有錯。同樣的道理，一般人說「白馬是馬」是對的，公孫龍子說「白馬非馬」也沒有錯。但如果用「白馬是馬」來否定「白馬非馬」，或者用「白馬非馬」來否定「白馬是馬」，那就都是片面的、錯誤的。「白馬是馬」這個命題是表明「白馬」和「馬」的同一性；「白馬非馬」這個命題是表明「白馬」和「馬」的差異性。「白馬」和「馬」之間既有同一性又有差異性。這個差別性，是存在於同一性之中的差別性；這個同一性，是包含了差別性的同一性（黑格爾稱之為「具體的同一性」）。既不應該用同一性來排斥差別性，也不應該用差別性來排斥同一性。因此，從辯證邏輯的觀點來說，白馬是馬，白馬又不是馬。*這樣，我們就可以較好地了解恩格斯為什麼批評那種「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話」的觀點是形而上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三六〇頁）恩格斯指出，辯證的思維方法不知道什麼普遍絕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

*我在這裏對公孫龍子的闡釋不同於馮友蘭氏和任繼愈氏；他們在自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中，都對公孫龍子採取了簡單否定的辦法，斥為形而上學。其實，我認為公孫龍子的觀點應屬於黑格爾說的「消極理性」範疇。關於這個概念的含義，請參看本文後面的解釋。

按照形式邏輯，「馬」這個一般概念，是從所有的特殊的個別的馬中概括出來的，其方法是把它們的特殊性全部抹去，只留下共同點。這樣得出的概念，是抽象的概念。由於把「特殊」排除在外了，這個「普遍」就同「特殊」成了不相容的東西。黑格爾的一個獨特貢獻，就是提出了「具體概念」，提出了包含差別的同一，包含特殊的普遍。按照這個觀點，「馬」這個普遍概念不是空洞的、抽象的、僵死的，而是有內容的、具體的、活生生的，它體現在千差萬別的特殊之中：白馬、黃馬、黑馬；老馬、小馬；公馬、母馬；蒙古馬、阿拉伯馬……。所有這些特殊的馬，都構成「馬」這個普遍概念的各個環節，是普遍的「馬」自身內部的區別和分化。*

黑格爾看到，如果普遍的東西僅僅是普遍的，特殊的東西僅僅是特殊的，那麼雙方都沒有真理性，或者只有片面的真理性，而真理應當是全面的。因此，需要一個第三者，由於它的中介，對立雙方的片面性就得到克服，被整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了。如「普遍」與「特殊」的對立，在「單個」這個範疇中得到了克服；「單個」就是「普遍」與「特殊」

*實際上，如果停留在思維的領域，從普遍概念是不能推導出千差萬別的特殊事物的。黑格爾從他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學說出發，堅持認為，從普遍到特殊的發展並不僅僅是他的頭腦中發生的過程，而且也是頭腦以外的現實發展的過程，這就是他的唯心主義的表現。青年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一書中，曾以一般的「水果」和蘋果、梨、扁桃的關係為例，批判了黑格爾的這個觀點。參看該書第五章第二節「思辯哲學的秘密」。

的統一。舉例來說：項羽常騎的駿馬名「錐」，它有馬的普遍性，又有「駿」（良馬）的特點，還有「蒼白雜色」等特殊性的特點；這樣，這匹個別的馬就把馬的普遍性與它獨有的特殊性統一在自己身上了。「普遍」是「正」，「特殊」是「反」，「單個」就是「合」。在合題中，「正」「反」兩方面得到了統一，但同時又保持它們之間的區別。這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正題、反題、合題，也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好像是向「肯定」的回歸，但這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更高階段的回歸，有如螺旋形的發展。

「正、反、合」的三段式，不止是「總念論」的原理，而且貫徹在黑格爾的整個體系之中。例如，質和量的統一是一「度」，本質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實在」。本文開始部分所引馬克思的話：辯證運動就是一「設定自己，自己與自己對立，自相結合」；「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鬥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範疇，就是辯證運動。」就是想說明這個意思的。

如果用中國哲學的語言來表達，我們也不妨說，宇宙的三段式是：

（一）太一，或太極。這是混沌的元氣，或原始的統一，其中的對立是潛伏着的。

（二）一分為二。這是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對立展開了。我們還可以把「天」與「人」的對立放在這個階段，如荀子的「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西方，這種思想的先行者是弗蘭西斯·培根，他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號。在實踐上就是工業革命。這種觀念起過偉大的進步的歷史作用。但過度的榨取自然破壞了環

境，反過來使人自身嘗到苦果。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中的「自然鬥爭」，就屬於這種過時的思想。毛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了「向自然開戰」的口號，在實踐中就發展爲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所採用的方法：千萬人民齊上陣，「戰天鬥地」，結果是對自然環境的大破壞。

(三) 合二而一。對立得到解決，陰陽調和，或天與人重新處於一種和諧的關係中。這就是今天出現的環境保護思想或「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只有經過工業化的「征服自然」階段，才會產生這種現代的思想。人與自然的鬥爭並沒有消失，但這種鬥爭受到節制。人把自然更多地看作是母親而不是敵人。這裏我沒有用中國傳統哲學的「天人合一」概念，雖然這個概念近年受到一些學者的高度評價；在我看來，這種「合一」並不是經過矛盾的展開和克服而達到的「辯證的綜合」。

從這個角度看，「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就不再是一枚錢幣的兩面，而是代表了兩個發展階段。*

兩段式還是三段式？

現在我們可以把毛澤東的觀點和黑格爾的作一個比較。

毛澤東的觀點是：對立雙方鬥爭着，待到「一個消滅一個」後，矛盾就解決了。「否

定」的一方戰勝了「肯定」的一方。這個「否定」又遇到一個對方，雙方展開新的鬥爭，最後這個「否定」又被對方所否定，這就是「再肯定」。「再肯定」之後又是「再否定」……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稱爲「肯定」，也可以稱爲「否定」。因此，三段式是沒有必要的，肯定與否定的兩段式就夠了。毛澤東的這個觀點，同他的「兩分法」是聯繫着的。

那麼黑格爾爲什麼要用三段式呢？

因爲在黑格爾看來，甲被乙否定，乙被丙否定，丙又被丁否定……這樣否定來否定去，可以無窮無盡。黑格爾稱這是「壞的無限性」。用中國古話來說是「往而不復」；如果「復」的話也是回到原來的地方（兩個否定等於一個肯定）。這只能表明「變化」或

*不論毛澤東的「一分爲二」還是楊獻珍的「合二而一」，都沒有表達出辯證法的本質。楊獻珍局限於強調「合二而一」，只是說「任何事物都是由兩個對立面構成的」，對立統一只是說對立方面是「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這是不夠的，甚至沒有達到方以智的深度。方以智說：「大一分爲天地，寄生偶而兩中參，蓋一不住一而二即一者也。」「盡天地古今皆二也。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者，相反相因，因二以濟，而實無二無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這裏說的「交」，「相反相因，因二以濟」，就有對立雙方互相作用的意思。「合二而一」（對立統一）不是兩者簡單地相加或合併，它所產生的「一」是一個新的一，而在這個新的統一體中，兩個對立方面都不再保持原樣了，所以說「而實無二無一也」。方以智《東西均》一書一九六二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侯外廬在序言中認爲：「方以智的樸素的辯證法在形式上觀察到了否定之否定的規律，這是超越前人的大發現……」不過方以智說的「合二而一」並沒有包括天人關係在內。

「循環」，並不能說明「發展」。要有發展，就要真正解決矛盾，而矛盾並不能依靠「你死我活」的鬥爭，依靠「一方消滅一方」的方式得到真正的解決。如果乙方要絕對地排斥甲方，拋棄甲方，消滅甲方，那麼甲方也會對乙方採取同樣的方式。但甲方之所以出現，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的根據或理由；它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只是它的真理性是片面的。而乙方對它採取簡單排斥和拋棄的態度，就說明自己也有片面性。要真正解決矛盾，就要給矛盾雙方以適當的地位，承認雙方各有道理，同時克服雙方的片面性。這就產生新的第三方，即丙。如果甲是「肯定」，乙是「否定」，丙就是「否定之否定」。如果「正題」是甲，「反題」是乙，那麼「合題」就是非甲非乙，亦甲亦乙的「丙」。這就是「辯證的綜合」。從「正」到「反」再到「合」，這是走了一個圓圈，但並沒有簡單回到出發點，而是上升到一個更高的階段；確切地說，是一個螺旋形的梯子。當然，這個丙又會產生新的矛盾，開始新的一輪三段式發展。這樣，在事物或範疇前進的過程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沒有被拋棄，而是被帶進了新的階段，得到了豐富和發展。

在黑格爾的三段式的第一段和第二段，「肯定」與「否定」雙方的名稱是可以互換的：把「肯定」叫做「否定」，「否定」叫做「肯定」，均無不可。之所以可以這樣互換名稱，因為雙方都是對自己簡單肯定，對對方簡單否定。但是第三段的「否定之否定」超越了這種僵固的二元對立，它是辯證的否定，是包含了肯定的否定。這種否定，黑格爾用

的是 *aufheben* 這個德文詞，它有三義：舉起；取消；保留。中文譯為「揚棄」：又「揚」又「棄」，也就是又否定又保留，但這是在更高階段上的保留。因此，把這種「否定之否定」或「揚棄」同簡單的否定或簡單的肯定混淆起來，都是不可以的。*這就是黑格爾爲什麼不用兩段式而用三段式的理由。

毛澤東雖然也想說明「綜合」，可是他的「綜合」並不是黑格爾的「合題」。他說，任何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這意思就是，矛盾雙方的鬥爭，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沒有第三種可能。這和他早年接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綜合」其實就是簡單的「否定」。毛澤東用戰爭爲例來說明他的觀點是很恰當的：對待矛盾的對方就像對待敵人一樣，「必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之。」（毛澤東語）

「一個吃掉一個」的現象是存在的，但這不是辯證的否定。恩格斯對這種情況作了很好的解釋。在《反杜林論》中，他在用大麥和昆蟲的生長例子來說明「否定之否定」之後，設定了這樣的問題：如果我把大麥粒磨碎，如果我把昆蟲一腳踩死，這不也是否定嗎？恩格斯回答說：「在辯證法中，否定不是簡單地說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種方法把它消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四八四頁）上面這種否定是

*時下有些文章把「揚棄」當作「拋棄」的同義詞來使用，這是誤解。

外在的否定，它所產生的結果是發展過程的中斷。麥粒和昆蟲只能被否定一次，不可能再有否定之否定了，因為它們已經消滅了。辯證的否定則是內在的否定，在「否定」之後還有「否定之否定」，而前者為後者準備了條件。

簡單的否定並不是完全要不得。如果有人說「地球是扁的」，或者預言二〇〇〇年是世界末日，對這種說法，只能簡單地否定。但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還是對不應該簡單否定的東西予以簡單的否定。

毛澤東犯的正是這種錯誤。他不但對對方總是絕對否定，也總是對自己絕對肯定。他靠絕對否定對方來絕對肯定自己，也靠絕對肯定自己來絕對否定對方。這樣，他就總是要強調「你死我活」的鬥爭。徹底的辯證法不同，它採取了一種謙遜而又勇敢的態度：在否定對方的同時也能夠看到對方的正確東西和長處，在肯定自己的同時也敢於批判自己的錯誤和不足。

如果要從人類的活動中找出一件事來代表辯證法的精神，那麼與其說是「鬥爭」，不如說是「對話」。辯證法（*dialectic*）一詞就它的希臘語源說，本來就是和對話、辯論相關的，它是一種探求真理的方法。這和那種「我就是真理」的態度不同。我對自己意見的肯定和對對方意見的否定，都只是在討論開始時採取的一種暫時的立場；這種立場是否正確，還要通過互相詰問和回答來考驗。我隨時準備聽取對方的批評意見而進行修正，或者

把對方的觀點吸收到自己的觀點中，或者對自己的觀點提出補充的論證。這樣，在對話結束時，雙方的觀點就會比開始時有或多或少的發展，或者變得一致。只要對話雙方的目的都是尋求真理，那麼誰勝誰負就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了——真理的勝利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再來考查一下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講的矛盾如何推動事物發展和矛盾的同一性的含義，它和毛澤東在六十年代講的有一些不同。

《矛盾論》說：

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為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着起變化。

矛盾的兩個方面（新與舊，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依存，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就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一種含義。鬥爭的結果，矛盾雙方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含義。這裏說的轉化，是矛盾雙方所處的地位的轉化，如「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而成爲統治者，原來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卻轉化爲被統治者，轉化到對方原

來所佔的地位。」經過這種轉化，統一體的性質就改變了。但矛盾並沒有完全解決，對立雙方仍然存在，繼續着鬥爭，直到舊的方面歸於消滅。當然，這時又會有新的矛盾產生。

毛澤東的這種解釋，給人一種感覺，就是他不過是把社會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現象擴大為宇宙的普遍規律，然後又用這種普遍規律來說明階級鬥爭。他在這裏說的「統一體」，並不是合題，它並不能解決雙方的對立，只是給它們之間的鬥爭提供了一個地盤。勝利的

一方並沒有從對方吸收任何東西，它的變化只是由小變大，由非主要方面變為主要方面。但是，如果堅持認為矛盾的一方對另一方是簡單否定的關係，那麼，即使指出對立面是互相依存和互相轉化的，這從黑格爾的觀點來看仍是不夠的；他稱這個是「消極理性」的觀點。之所以是「理性」，因為它已經不同於知性而有了辯證法，它承認事物的矛盾；之所以是「消極」，因為在這裏對立雙方只是單純否定對方，不能產生積極的結果。

黑格爾認為，最高級也最困難的思維方式是「積極理性」，或「思辯理性」。它和「消極理性」不同：它所主張的否定，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辯證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把對立面排除在自身之外，而是把對立面加以改造，吸收到自身之內；同時，爲了吸收對方，自身也作了改造，雙方融合爲一個新的有機的整體。在這個統一體中，雙方的差別和對立並沒有消失，但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或互相排斥，而是和諧的、互補的關係；用中國古話來說，就是「和而不同」，「相反相成」。這就是黑格爾說的「具體的同一

性」。黑格爾說的「對立的統一」，就是指這種具體的同一。只有這樣理解黑格爾說的「對立的統一」，才算是理解了辯證法的精髓。

這樣看來，否定三段式，否定「否定之否定」，就把黑格爾理解的「對立的統一」也否定了。

從「兩條戰線的鬥爭」到只反右不反「左」

根據上面的敘述來判斷，需要對毛澤東的辯證法造詣重新評估。毛澤東在前期的有些著作中，確實對辯證法的運用達到了很高很熟練的水平，令人讚嘆；但是，他的辯證法從總體上說仍是處於「消極理性」的層次。難怪毛澤東的辯證法最好地表現在他的軍事著作中。也難怪毛澤東會把辯證法歸結為「鬥爭哲學」。

在少數的場合，毛澤東也曾表現出「辯證的綜合」的觀點。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在談到向外國借鑒的問題時，主張「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的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吸收外國的東西，要把它改變，變成中國的。」他指出：魯迅的小說，就既不同於外國的，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西洋的東西也是要變的。」「不中不西的東西也可以搞一點，只要有人歡迎。」這個「不中不西」，我們可以了解為「中」與「西」的融合。毛澤東用驟

子來作比喻，說：「非驢非馬也可以。驢子就是非驢非馬。驢馬結合是會改變形象的。不會完全不變。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自己的基礎上面，吸收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

在醫學方面，毛澤東還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在另外的地方，毛澤東在說到中醫和西醫的前途時，說到將來可能產生一種統一的醫學，既不是單純的中醫也不是單純的西醫。

這種觀點，和上面所說的「一個吃掉一個」顯然不同，倒是可以說是「辯證的綜合」，是符合「否定之否定」原理的。

共產黨的歷史上有「兩條戰線的鬥爭」的說法，說的是黨要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一條戰線是反右，一條戰線是反「左」。如果說右是肯定，「左」就是否定（反過來說「左」是肯定，右是否定也可以）。這兩種傾向是截然相反的，互相排斥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曾說到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的路線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這是右（陳獨秀是否如此，這裏暫不論）。王明批判了陳獨秀的路線，但他是採取簡單否定的方法，因此走到另一個極端，即土地革命後期的「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這是「左」。那麼什麼是正確的路線呢？毛澤東認為應當是「又統一又鬥爭」：既應當建立統一戰線，又要對統一戰線內部的錯誤傾向進行鬥爭。這是一種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性政策。（參看

《毛澤東選集》中的一九四〇年的《論政策》和一九四一年的《農村調查·跋》）實際上，這就是對王明路線來一個「否定之否定」，對王明路線和它的對立面陳獨秀路線雙方的合理因素都加以吸收，同時批評雙方的片面性。可惜的是，毛澤東只是在很少的場合才表現出這種「辯證的綜合」的思想。

「左」和右的爭論是共產黨歷史的一個大問題。毛澤東說過，「只有鬥爭，不要團結，是『左』傾錯誤；只有團結，不要鬥爭，是右傾錯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一〇頁）他還批評過黨內的「『左』比右好」的錯誤思想。（同上書，一五二頁）雖然如此，他自己也認為「左」比右好一些，說「真正的教條主義分子覺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要革命。」（同上書，四二四頁）一九五七年，在批評陳其通等人對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左」的錯誤態度時，他沒有忘記肯定他們「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可是在批評鍾惦斐的所謂「右」的錯誤時，卻沒有這樣說。難道鍾惦斐就不要革命，就不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嗎？

此後毛澤東越來越陷入「左」的片面性，變得越來越只反右不反「左」了。

毛澤東曾提出這樣一個處理黨內矛盾的公式：「團結—批評—團結」，也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六九頁）這最後達到的團結，似乎是經過否定之否定的程序

達到的，是在更高的層面上恢復了團結。但是，仔細了解一下就會看出，在這裏，毛澤東的意思只是用黨中央的思想（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去克服不同的意見，統一全黨的思想，絲毫沒有從不同的意見的爭論中得出正確的思想的意思。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得到廣泛讚揚的毛澤東的「百家爭鳴」方針。

在中國哲學史上，歷來就有兩種對待不同學派的傳統，一種以孟子和荀子為代表，一種以《莊子·天下篇》和《漢書·藝文志》為代表。孟子以替天傳道者自居，要「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詞」。荀子在《非十二子》中雖然承認這些派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卻認為它們全是「欺惑愚衆」，大罵了一通。總之，除了舜、禹、仲尼、子弓，其他都一無足取。這種觀點導致後來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莊子·天下篇》採取了不同的態度，肯定各家「皆有所明」，「皆有所長」，問題只是「不能相通」，不識大體。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序》裏列舉了諸子十家，一一加以評論，說「可觀者九家而已」。對這九家他都肯定了其所長，也指出了其流弊，包括儒家在內。他認為各家是相反相成，殊途同歸，最好是對它們「捨短取長」。這種態度，就是五四時期蔡元培辦北大所提出的「兼容並包」的方針，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方針。

毛澤東的「百家爭鳴」方針絕不是自由主義的，而只不過是一種消滅非馬克思主義的異端思想的手段而已。它和公開的思想專制只有方法的不同：一是不採用行政的手段去禁

止，而是允許發表，發表出來再加以鑒別；二是對「毒草」不是採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來消滅，而要採用細緻的講理的方法來消滅。即使這樣，他自己也從來沒有認真地遵守過。毛澤東說「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三九〇頁）毛澤東根本不承認，一種比較正確的思想也需要從反對意見中受到啟發，使自己更加完善。毛澤東說百家爭鳴可以使馬克思主義得到鍛煉，也說過毒草鋤掉以後可以肥田。他本來可以從毒草肥田這個比喻中得出結論，說毒草中也可能有合理的有用的東西；但是，他從沒有明確這樣說過。他從不認為馬克思主義也可以從對立的學說中吸取正確的有用的東西，彌補自己的不足或改正自己的錯誤；相反，他像斯大林一樣，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永遠正確的，違反這一條的修正主義是絕對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就是不斷地駁倒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觀點，而絕不是要肯定和吸收其中的任何東西。更糟糕的是，毛澤東把自己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權威，而他既然掌握了最高權力，就壟斷了話語權；誰是馬克思主義，誰不是馬克思主義，是由他說了算的。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在同黨內外的正確思想（被稱為「毒草」、「右傾觀點」、「修正主義」、「假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一九五七年，毛在一次談話中說：敵我之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是絕對地相互排斥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沒有兩重性，只有一重

性。」（《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九七頁）

「絕對地互相排斥」，這個說法顯然是從列寧的「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這個命題來的，而這也就意味着「只有一重性」。這個觀點既違反辯證法原理，也經不起事實的檢驗。

五十年代，毛澤東發動了對胡適的唯心主義批判。當時黨中央發出通知，要大家普遍學會分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從那以後，「唯心主義」成了錯誤的代名詞。批評什麼人的觀點，只要扣上一頂「唯心論」的帽子，對方就緊張起來了。

那麼唯心論有什麼特點？毛澤東說，「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一五九頁）

毛澤東的這種觀點，是同斯大林和日丹諾夫一致的。列寧對這個問題的觀點要多一些辯證法。他在《哲學筆記》中把那種認為「哲學唯心主義不過是胡說」的觀點斥之為「粗陋的、簡單的、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的觀點」。他說：人的認識是沿着近似螺旋形的曲線進行的；這條曲線的任何一個片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加以誇大，變成一條直線，這就是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根源。（參看《哲學筆記》，四〇三—四〇四頁）這是對的。例如，人的認識是從感覺到思想；如果截取感覺這一個片段，使之變成一條直線，就成爲（唯心主義

的）經驗論；如果截取抽象思想這個片段，使之絕對化，就變成（唯心主義的）唯理論。

列寧認為，「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主義。」（同上書，三〇六頁）他又說：唯心主義「不是沒有根基的，它無疑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然而卻是生長在活生生的、結果實的、真實的、強大的、全能的、客觀的、絕對的人類認識這棵活生生的樹上的一朵不結果實的花。」（同上書，四〇四頁）這就是說，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都是生長在人類認識之樹之上的花朵（這就是兩者的同一性），不過前者是不結果實的，後者是結實的。這個比喻很好。不過我認為，唯心主義也是結實的。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就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還把形而上學和辯證法的關係看作是絕對對立，像他理解的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關係一樣。這又是和斯大林一致的。影響所及，在我們國家，「形而上學」已經變成一種錯誤的思想方法的代名詞。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其實，無論黑格爾或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這樣認為的。

黑格爾把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列入知性的範疇，它屬於思維的初級階段。他指出，

* 恩格斯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就是想說明這個問題的。書名中的「終結」在德文原文中是Ausgang，有「出路」「結果」「結局」之意。恩格斯的原意是要說明，德國古典哲學不是簡單地消滅了，而是被「揚棄」了：「揚」其辯證法而「棄」其唯心主義，其結果就是馬克思主義。

「對於這種認識方式，只要其目的可以說是僅僅在於求日常淺近的知識，當然無可非議……」（《小邏輯》第一二一節附釋）知性的功能是将整體事物分解為各種成分和因素來加以分析。它是認識的一個必經階段，我們應該承認它的權利和優點。沒有知性，就沒有思維的確定性。只是我們不應該停留在這裏，而應該把這些被知性分解的成分或因素綜合起來，還原為一個整體。這就是思辯哲學或積極理性的工作。前面說過，黑格爾的邏輯學分為三個部分，相當於認識的三個階段：有論（感性）；本質論（知性）；總念論（理性）。這是一個三段式，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前兩個階段的統一。理性超越了知性的局限性，但是它必須善於吸收和利用知性的勞動成果。黑格爾用下面的話來表述理性和知性的關係：「理性沒有知性就不成其為理性，而知性正是沒有理性才是知性。」*所以，理性是「揚棄」了知性而不是「拋棄」了知性。把辯證法同形而上學絕對對立起來，這本身就是違反辯證法的。

恩格斯繼承了黑格爾的這個思想。他論證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產生的歷史背景時說：古希臘的世界觀「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自然的和歷史的聯繫中抽出

*這是我的意譯。原話是：Die Vernunft ohne Verstand ist Nichts... der Verstand doch Etwas ohne Vernunft.

直譯為：理性沒有知性就是無，而知性只是沒有理性的某種東西。

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地加以研究。」恩格斯高度評價了這種方法的成果，說「這是最近四百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繫去進行考查」。（以上引文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三五九—三六〇頁）這種思維方法又從自然科學移植到哲學中，成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在一定範圍內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對於日常應用，對於科學上的細小研究，形而上學的範疇仍然是有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三一—三一九頁）但是它遲早會遇到一個界限，一旦超出這個界限，它就變成片面的和狹隘的了。

關於辯證法和形而上學思維方法的關係，或理性和知性的關係，最好的例證是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同牛頓力學之間的關係。相對論和量子力學超越了而不是拋棄了牛頓力學，它指出了後者的局限性。牛頓力學可以看作是相對論的特殊情況。在宏觀和低速的範圍內，牛頓力學仍是有效的。牛頓力學的方法是形而上學的，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方法是辯證的。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也是有同一性的，不然，怎樣從哲學上說明馬克思主義關於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的原理？怎樣說明毛澤東反覆強調的社會主義產生資本主義復

辟的可能性？從當前的現實來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每一方都從對方學習和吸收了許多東西，怎麼能說是絕對地相互排斥呢？《矛盾論》曾經講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有同一性的，這也意味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有同一性的。現在毛把自己否定了。

毛澤東對無產階級絕對肯定，對資產階級絕對否定。他把「資產階級」作為一切邪惡的代表，「無產階級」作為一切美德的化身。於是，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時，對道德上的缺點或思想上的錯誤，總要歸咎於受資產階級的腐蝕或影響。毛還提出「興無滅資」這種「左」的口號。

如果無產階級是完美無缺的，那麼無產階級還要不要消滅自己呢？如果無產階級思想總是完全正確的，那麼它豈不變成了絕對真理嗎？如果資產階級思想完全是錯誤的，那麼馬克思恩格斯為什麼要吸收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的成果？毛在一九四〇年時還只是把現代資產階級文化用「帝國主義反動文化」一詞來加以抹殺，至於西方古代和啓蒙時代的文化還是要批判地吸收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七〇七頁），現在卻連這也不提了。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曾批評許多黨員幹部「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三九頁）他還評論五四時期的許多領導人物使用的方法是形式主義的方法，說他們反對舊八股、舊

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這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同上書，八三一頁）後來就走到反面，產生了洋八股和黨八股。可是毛澤東自己也走上了這條路。毛澤東主義成了五四以來危害最大的新八股、新教條。教條主義發展到極端，就是個人迷信。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扯皮的主義」。這個話表明，毛澤東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作為「消極理性」來理解的。辯證法當然可以說包括了「扯皮」，但不能停留在這裏。不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各的理，誰也不讓誰，這樣吵架下去，爭鬥下去，永遠沒個完。甚至同一個人，今天可以抓住這一方面來反對另一方面，明天又可以抓住另一方面來反對這一方面；每次這樣做都可以講出一番道理，因為事物總是包含着相反方面的。知性容易產生教條主義；消極理性的好處是對這種知性的教條提出挑戰，指出它必然陷入矛盾。但消極理性也會產生懷疑主義，或者變成詭辯。

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毛澤東如何把辯證法變成了詭辯。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武昌會議上，在談到作假問題時，他雖然明確地表示了反對虛報成績，但又說：「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沒有假的比較，哪有真的？」這幾句話，沖淡了作假的嚴重性，似乎作假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似乎虛報成績的現象存在，是足以證明生產有

偉大成績是真的了（當然，這實際上不是真的）。誠然，真是與假比較而存在的，但人人都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難道如果現實中不存在虛報成績的現象，人們就不懂得什麼是真了嗎？另一個例子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文革」初期，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上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用這個話來為「文革」辯護，是完全站不住的。這等於說，一個人想要身體健康，就必須大病一場。誠然，事物發展到極端就會走向反面。但大亂之後也許是中治，也許是小治；為什麼一定是大治呢？如果天下大亂一定能達到天下大治，那麼就不怕天下大治又會達到天下大亂嗎？這完全是玩弄概念，不是具體分析。「文革」後期，天下已經亂了多年了，毛還說「八億人口，不鬥行嗎？」而不說「八億人口，不和行嗎？」

毛澤東為什麼需要「鬥爭哲學」

對「合二而一」的批判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變不僅是理論上的，也是實踐上的。爲了政治上的需要，毛澤東犧牲了理論的一貫性和嚴密性。

在民主革命時期，毛反對過「只要鬥爭不要團結」的錯誤，現在，他自己也走上這條路了。從此，毛澤東就沿着這條路滑下去，一直滑到「文革」時期大行其道的「鬥爭哲學」。「團結—鬥爭—團結」，變成「鬥、鬥、鬥」了。這不是說毛澤東後來絕口不提團

結，在政治的意義上他有時還講團結，但是，再也沒有提到哲學的高度了。

在一九七四年初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遲群和謝靜宜一唱一和地叫囂：「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垮！」把矛頭對準周恩來。這雖然不是毛澤東的話，卻是符合他的「鬥爭哲學」的。並不是一切鬥爭都是推動事物進步的；像「文革」這樣的鬥爭只是給我國帶來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面大倒退。

批判「鬥爭哲學」，絕不是說要從此拋棄一切鬥爭。我們提倡保護環境，但同時也不能放棄自然鬥爭，例如對付洪水和疾病。我們需要社會安定和人民團結，但也不能取消社會鬥爭，例如反對專制和腐敗。在有的時候，這種鬥爭可以尖銳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並不是一切鬥爭都是如此。鬥爭的激烈程度和方式是要看具體條件而定的。無節制的鬥爭和無原則的和平都是我們所不取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並非由於他在哲學理論上的失誤而導致他行動上的錯誤，相反，他的哲學觀點的改變是為他的錯誤行動做辯護。我們不要誤以為，毛澤東是因為接受了「鬥爭哲學」，然後才變得很「左」，很好鬥；不是的，毛澤東這種在哲學上的倒退，是他在政治上搞極左路線的反映，是適應他發動的「反修鬥爭」和「文革」的政治需要的產物。

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的哲學講話中說過：「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基礎是階級鬥

爭，然後才能研究哲學。」「搞哲學的人，以為第一是哲學，不對；第一是階級鬥爭。壓迫者壓迫被壓迫者；被壓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學。從這一點出發，才有馬列主義，才找到了哲學。我們都是這樣過來的。」

從認識的順序說，哲學當然不是最先的。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無疑對作為意識形態的哲學有深刻的影響。然而哲學又應該批判地考察實際的東西，包括階級鬥爭。從五十年代中期起，毛澤東發動了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他把這些運動都說成是「階級鬥爭」，或「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其實不過是用「階級鬥爭」這個口號來使他進行的政治迫害披上一件合理的外衣而已。哲學應當關心政治，但哲學不能把統治者的意志和政策當做先驗的前提來接受，哪怕它打着「人民」的旗幟。那種要哲學為政治服務，為階級鬥爭服務的觀點，取消了哲學對政治和階級鬥爭進行獨立審查的作用。在中世紀的歐洲，哲學曾淪為神學的奴婢；現在毛也要哲學成為黨的奴婢，這被他說成是「理論聯繫實際」。

毛澤東是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成為英雄和領袖的。一旦沒有敵人，沒有鬥爭的對象，革命領袖的光輝就有變暗淡的危險。在革命取得勝利以後，本來應該進行和平建設。新時期需要的是另一種類型的領袖人物。然而毛澤東對經濟建設是不在行的；搞政治鬥爭，特別是玩弄權術卻是毛澤東的拿手。於是，國家就不得安寧了。

一九九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在他的小說《耶穌基督眼裏

的福音書》裏，敘述魔鬼曾想改邪歸正，向上帝懺悔。但上帝拒絕了，而上帝拒絕的理由是驚世駭俗的：因為我不能沒有你所代表的邪惡而存在。如果魔鬼不是魔鬼，上帝就不成其為上帝。

上帝的敵人是魔鬼，可是上帝又不能沒有魔鬼。魔鬼與上帝同在，絕對的惡與絕對的善共存，這就是神聖的辯證法。上帝無所不能，只是不能消滅魔鬼。魔鬼是上帝存在的理由。正因為有魔鬼的誘惑和對魔鬼的恐懼，人們才感到需要上帝；否則，上帝也就可有可無了。

毛澤東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為他們受到階級敵人的壓迫。敵人越多越凶惡，越不能沒有毛澤東。毛澤東既要消滅敵人，又不能沒有敵人。一旦外敵打倒了，毛澤東就要在內部搜尋新的敵人，搞內鬥了。不過毛澤東搜尋的「敵人」不再是真正的敵人，只不過是他認為試圖或可能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內外或多或少有一些獨立思想的分分子，這些人被毛澤東說成是「反黨」「反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和鎮壓，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造成一種恐怖感，加上系統的強化的政治思想灌輸，人們變得盲目地跟隨共產黨和毛澤東。儘管這樣，人們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不知道哪一天會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這種政治迫害到「文革」發展到頂峰。為了搜尋和肅清他視為心腹之患的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式人物」，毛在人民群眾中製造一種虛假的危機感，似乎資本主義復辟的大禍

臨頭，修正主義篡黨的危險迫在眉睫，只有拜倒在毛澤東的腳下，一切聽從他的指揮，鬥爭鬥爭再鬥爭，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於是，下級和上司鬥，群眾和領導鬥，同事和同事鬥，學生和校長老師鬥，「紅五類」和「黑五類」鬥，子女和父母鬥，朋友和朋友鬥，「造反派」和「保皇派」鬥，「造反派」的這一派和那一派鬥……直鬥得中華大地昏天黑地，日月無光，直鬥得八億人口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所有這些人都聲稱他們誓死保衛毛主席。「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誰敢動毛主席一根毫毛，我們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在這種鬥爭的狂熱中，任何被懷疑為對毛澤東不忠的人就面臨滅頂之災了。

這就是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的實際意義。

（一九九八年）

（本章有關理論分析，參見王若水《辯證法和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第二十七期，四三—六七頁，一九九九年秋季號。）

第十二章

文革的發動：打倒劉少奇

從一九五九年提出「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經過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和一九六三年的「四清」運動，和六十年代前期對國內外「修正主義」的一系列批判，這期間，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階級鬥爭的調子越來越高，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也越來越加深，這就為「文化大革命」做好了充分的輿論準備。今天有許多年輕人會對當時有那麼多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感到奇怪；在那時，這確是順理成章的。

精心的策劃，巧妙的部署

純粹從認識上的「失誤」來說明「文革」，例如說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階級鬥爭的形勢，錯誤地理解了「修正主義」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種解釋方法，假定毛澤東發動

「文革」是一個理性的行動，是受他的理論指導的。實際上，毛澤東的動機有很大的心理的、性格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毛是一個富有個人魅力的人物。我們從毛身邊的服務人員的回憶中可以看到，毛在日常生活中是多麼富有人情味。不過我們應當承認，毛的性格中有任性、驕傲、固執和多疑的一面，不能容忍別人冒犯他的尊嚴，聽不得別人的批評意見。毛批評過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過他本人在政治鬥爭中也是殘酷無情的。這些缺點出現在一個像毛澤東那樣掌握巨大權力並且被億萬人民敬若神明的「卡里斯馬」(charisma)型領袖身上，就是巨大的災難了。

如果我們按照字典上的解釋來理解毛澤東使用的一些詞匯，就不明白毛何以那樣擔心「修正主義」，何以如此誇大「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在六十年代的中國，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們通過心理分析來解讀這些符號的隱秘含義，一切就豁然開朗了。所謂「修正主義」，在字典上的含義是指出現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修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主張，它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影響。毛本人也這樣解釋過「修正主義」，所以他並不是不懂什麼是修正主義。但是，毛澤東把要求糾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錯誤的意見稱爲「翻案風」，又把「翻案風」當做「修正主義」來批判。這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什麼關係呢？在「文革」中，「修正主義」一詞的實際用法發展到指對毛澤東任何一句話（包括錯誤的話）的不同意見。這就隱含着一個意思：毛澤東的任何一句話都代表

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都是不能修正的。這樣一來，任何人都休想效法赫魯曉夫來批判毛澤東了。「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也是這樣，按照字典上的解釋，它是指建築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制度。按照這樣解釋，也不會懂得毛澤東為什麼會那樣害怕「資本主義復辟」，為什麼要指責彭德懷和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彭德懷和劉少奇都是忠誠的共產黨人，他們的共產主義信念和毛澤東一樣堅定；除此以外，「官僚主義」和「腐化」這樣的污點他們也不沾邊。對這些毛澤東實際上是很清楚的。劉少奇和彭德懷等人被打倒，真正的原因並不是毛澤東誤認為他們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而是毛澤東懷疑他們有朝一日會來糾正他的錯誤，對他的「三面紅旗」改弦更張。要維護「三面紅旗」，把它們說成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唯一道路，就必須把任何改變這條路線的企圖斥為「資本主義復辟」。劉少奇不是赫魯曉夫，他儘管認為毛澤東有錯誤，但是不可能在毛澤東身後用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那樣的方式來對待毛澤東。有可能的是他會採取一種溫和的方式來有限地糾正毛澤東的錯誤（例如改變人民公社的體制），他也可能用一種委婉的方式表示過去中央的工作有不恰當之處。即使這樣，也是毛澤東不能容忍的。

所以，支配毛澤東發動「文革」這一行動的，主要並不是他的理論認識，而是他的情緒和性格。甚至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不過是給這種動機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毛澤東需要誇大「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只有這樣

才能把全黨全民動員起來以維護他的權威並打倒劉少奇。

發動「文革」是非理性的行動，但是毛澤東準備和進行「文革」的部署，確是經過深思熟慮和精心安排的。毛澤東是非凡的軍事家，他把一套對付敵人的戰略戰術巧妙用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了。

毛澤東首先是確定打擊目標。所謂「修正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主要來自何方呢？根據上文說的這兩個名詞的隱秘含義，這兩個危險主要來自中央。毛澤東說過，「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轉引自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紅旗》評論員文章）「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轉引自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紅旗》社論）林彪也對此作了注解：「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五·一八講話）另一個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是知識界——特別是文藝界、大學、新聞界。知識分子往往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喜歡發議論，喜歡提意見，不那麼聽話。毛澤東歷來不喜歡知識分子。延安時期他把大部分知識分子劃入「小資產階級」範疇，建國後他卻把他們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他從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中看到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這使他警惕。他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

也是這樣。」（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吳晗的《海瑞罷官》使他疑心知識分子要替彭德懷翻案，而鄧拓在雜文中諷刺「大躍進」，甚至影射毛澤東得了「健忘症」，更使他惱怒。在對文藝界作了兩個批示之後，毛澤東又提出，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也正是因為有一個改造意識形態的任務，所以叫「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結尾說：「戲裏那個假海瑞，就是代表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反對資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化身。《海瑞罷官》大力吹捧一個因搞『退田』『平冤獄』而被『罷官』的『海青天』，就是支持在廬山會議上因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而被黨和人民『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重新上台執政，為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復辟開路。」

姚文元文章是張春橋、江青一九六五年初在上海炮製的，江青特別交代，此文「不能叫周恩來看」。

這樣以來，「敵人」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五·一六」通知就是

這樣說的：「這次大鬥爭的目的就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共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批這樣的代表人物）的批判。」

過去搞政治運動，在中央內部不過是每次搞掉一兩個、三五個。這是「各個擊破」的辦法。現在毛澤東已經不耐煩用這樣的方式了，他要來個全面大掃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談話裏，他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見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造反狂瀾

既然毛澤東主要想打擊的是中央第一代，他不能指望得到黨中央多數的同意，因此他只能對自己的意圖秘而不宣，暗中策劃，只向林彪、江青等極個別的人交了「底」，黨中央是蒙在鼓裏的。（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鄭州，二六頁）並且採取「迂迴戰」的策略。第一炮是《評〈海瑞罷官〉》，粉碎了「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第二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轟垮了文化部和中宣部。這兩炮直接打擊的都是文化界，使人誤以為這真是一場「文化革

命」，但這只不過是一場前哨戰而已。第三炮是《五·一六通知》，宣告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下台——深入到政治陣地了，這是「掃清外圍」。第四炮是毛澤東親自放的，這就是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目標對準劉少奇。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原來是「政治大革命」。

五月十八日，鄧拓自殺；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殺。

六月一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一八講話若干內容捅向全國。

毛澤東要打擊的目標不僅是中央第一線，而且是黨內各級幹部中有可能跟着中央第一線走的人。這個打擊面是很寬的。既然如此，他就不能採取過去那種整風運動的辦法。道理很明顯，整風要靠各級黨組織的領導，而現在在各級領導本身就可能是毛澤東所謂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正如《五·一六通知》所說，「要清理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要信用這些人去作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因此毛澤東就要撇開黨的組織直接向群眾發出呼籲，要他們「自己解放自己」，起來「造反」、「奪權」，並且把這稱爲「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是想依靠群眾來摧毀黨，然後重建一個黨。毛澤東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承認，外國人說共產黨在重建是有道理的，「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了，叫整

黨建黨。」事實是需要重建。九大的統計數字很能說明問題：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二百七十九人中，原八屆中委和候補中委只保留了五十三人，不到九屆中委的五分之一。

毛澤東所依靠的力量是黨外群眾，特別是紅衛兵。他們狂熱地崇拜毛，無限熱愛他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還有一個依靠力量就是軍隊，這個軍隊已經為林彪所牢牢控制，而林彪是「毛澤東著作學得最好最好，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最高最高」的。

斯大林把一批老一輩革命家當作異己清除，他採用的辦法是秘密逮捕和處決。斯大林死後翻案活動出現了，受害者一個一個得到了平反，斯大林本人則因此受到譴責。毛澤東吸取了這個教訓，他不用秘密逮捕的辦法，而是讓紅衛兵來對付那些膽敢「反對毛主席」的「走資派」，對他們實行「群眾專政」；同時，開展聲勢浩大的、持久的「革命大批判」，務必把這些人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毛澤東以為這樣做，那些觸犯他的人就會遺臭萬年，永世不能翻案了；即使最後證明確實搞錯了，那也是群眾的責任，要「正確對待群眾」。

就領導藝術的高明來說，毛澤東在這裏是表現得無與倫比令人嘆服的。所有的敵人都被打得暈頭轉向，潰不成軍，就連劉少奇這樣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老政治家也想不到，一覺醒來，就由國家元首變成了階下囚。所有這些部署都不是非理性的任意胡來，而是經過深

思熟慮的。周密而巧妙的「文革」初期那幾仗，打得如此漂亮，成果如此輝煌，完全可以和消滅國民黨軍隊的「三大戰役」媲美，只是這次是消滅共產黨的司令部。動機的非理性和手段的理性，就是這樣奇妙地結合在一起。

正像《一千零一夜》裏的漁夫打開了瓶子，放出了魔鬼，就無法征服它一樣，毛澤東按照自己的意志發動了「文革」，然而「文革」一旦發動起來，就按照自身的規律進行，不是毛澤東能控制得了的。

最初，一切都很順利。毛澤東把學生和工人發動起來後，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號召他們在全國範圍內「奪權」，建立軍、幹、群「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奪權進展得很快，毛澤東預計，到二、三、四月份就可以看出眉目來。然而，奪權後的局面不僅沒有趨於穩定，反而更亂了。不僅支持原來黨政領導的「保守派」和奪權的「造反派」矛盾尖銳，這一派奪權組織和那一派奪權組織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打倒一切」變成了「全面內戰」。各派都自稱毛澤東是他們的「紅司令」，但各派都對毛澤東的指示各取所需，相互打「語錄戰」。毛澤東不得不派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來穩定局勢。然而軍隊的介入，一方面維護了秩序，另一方面又引起了新的矛盾。一九六七年春開始，在中央文革出面煽動下，全國又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毛澤東想用這種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然而卻是促進了大動亂。困擾中南海的「揪劉

火線」、「砸爛公檢法」，武漢的五·二〇事件，火燒英國代辦處、「揪軍內一小撮」，交通被破壞、武鬥升級、打砸搶之風颳遍全國……這是亂上加亂，亂到了毛無法駕馭。儘管毛澤東在當年七月至九月視察大江南北時說「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這話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後來對斯諾說，「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奪權的事登了報。這個消息前面加的《人民日報》編者按，是毛口授的。接着，毛要周主持討論一下中央發賀電的問題。中央賀電的署名本來是三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毛說，要加上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本是中央領導的一個下屬機構，無權向各級黨委發指示，但這個賀電一發，中央文革升級了，和中央並列向各級發指示了。

毛在一月中旬的一次常委擴大會上講奪權，肯定「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奪一小撮走資派以及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分子的權」，《紅旗》發了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表達了毛講話的思想，提出黨權、政權、財權都要奪，這篇文章震動很大，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奪權運動。這篇文章是由王力、關鋒執筆，交給陳伯達，由陳伯達送毛審閱批准，當天就廣播。這篇文章沒有給林彪和周恩來看。

在其後的一次常委擴大會上，周提出對領導幹部要分析：第一種是黑幫；第二種是走

資派；第三種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四種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第五種是犯了個別性一般錯誤的，這最後一種是絕大多數。毛當時同意這個意見，還提出了五種不同的處理辦法：一，全部改組；二，監督留用；三，停職留用；四，撤職留用；五，撤職查辦。這最後一種要極少。這個意見當時執行了一些。

但不久，毛又說，不要仔細分了，把權奪過來再說；到運動後期再去分。這以後，周講的分幾類就被拋棄了。

《紅旗》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是奉毛之命寫的，根據毛的多次講話整理而成。其中最核心的一點是要打碎國家機器，用新形式代替舊形式。

奪權後，全國形勢大亂，出乎毛的預料。這一段時間，他着重講不准武鬥的話（打人的要法辦，對老幹部怎能向對地主一樣，他們都是對革命有功的），又說，「各省第一書記不能都打倒，最好能站出來」，此外，他又批判「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大講大聯合，提出「軍、幹、群」三結合的領導班子。

毛後來也看到，各省都是自下而上地奪權，自發地建立政權（這是他的「革命浪漫主義」），是不行的。所以決定要由中央批准，並要周總理負責。

毛說了一句：「衝衝中南海有什麼關係？人家不過是想來看一看，只有你能保衛主席，人家就不能嗎？」三月中央發出了《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其中有這樣的話：「許

多外地學生幾次衝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都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止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區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這個意見是毛加上的。

反對武鬥的「六六通令」是毛要搞的。從奪權後，他不斷反對武鬥反對打砸搶。那時出現了私設公堂，毛叫「文革」小組到各地去看，看到這種事，一律解散，把人放了。但後來他又變了。

毛也認為需要提高批判的理論水平，「不能光喊砸爛狗頭」，還有什麼「油炸」「火燒」。毛說：什麼狗頭，是人頭嘛！他認為要從政治理論上打倒才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周年。毛指示寫一篇社論。這篇社論由王力起草，把毛在北戴河會議和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歸納了一下，後來這段話就被稱為黨的「基本路線」。

這篇社論的後半部分提出了「六條標準」。主要是防左，這反映了周恩來的觀點，也是毛贊同過的。本來兩部分的份量相當，但在「文革」小組會上討論時，戚本禹首先說：「這篇文章究竟是反右還是反左？」江青、關鋒也齊聲反對，周儘管是會議主持人，也無可奈何。後一部分就刪掉了。只保留了毛批判「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段和「六條標準」的引文。而「六條標準」也可做反右的解釋。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毛給江青一封信，提出：一，武裝左派；二，群眾專政。在此之前，江青大概聽了一點風聲，所以她在七月二十一日，講了「文攻武衛」。在林彪主持的軍委擴大會上，江青得意洋洋地把毛的信拿出來傳閱。信中還談到了「奪槍問題」，說奪槍問題並不很嚴重。

後來又把奪槍問題當成嚴重問題了。

八月四日後，由於廣東奪槍嚴重，連勞改犯也奪槍了，林彪主持起草了一個嚴禁奪槍的通告，周在群眾大會上宣布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同曾思玉、劉豐談話，十月十九日，中央批轉，並給予高度評價。從此，社會秩序大亂。

毛說：亂它幾個月沒有省委也不要緊。

「文革」後一年多，我國與三十多個國家發生外交糾紛。

一九六八年夏，毛澤東決定向各學校派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人民日報》在七月二十六日發表社論：《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當初爲了造成大亂，毛澤東曾經鼓勵學生起來反對工作組；現在他爲了控制局勢，又要派工宣隊來管住學生了。

上面是說的群眾方面，那麼在最高層的鬥爭又是怎樣呢？我想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劉鄧（從「文革」的開始到一九六九年的「九大」），第二階段是「批林批

孔」（從一九七〇年的廬山會議到一九七四年），第三階段是再批鄧（一九七五年以後）。在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還時起時伏地興起了不點名的「批周」之風。在毛澤東的原定計劃中，是只有第一階段的，後來被迫延長了。

劉少奇的完結

劉少奇是怎樣被打倒的？

「五一六通知」提到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連張春橋、戚本禹當時都不知所指。（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五頁）

第一炮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親自寫的《炮打司令部》，這張大字報攻擊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大批領導幹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措辭激烈，語調嚴厲，帽子極大，可實際上沒有多少內容。劉少奇當時不過是提出派工作組（這還得到過毛的同意）和轉發了一個關於制止亂打亂鬥的文件而已。可是這一炮把劉少奇在中央的位置從第二位打到第八位。

在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的指責從嚴厲到更嚴厲，說是鎮壓，是恐怖，而這恐怖來自中央。根據他的意見，會議議程改變。七日，全

會印發《炮打司令部》，會議立即轉為批劉。

八日，林彪講話，說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着，無產階級也睡不着，要鬧得天翻地覆……

十日下午七時，毛澤東到中央接待站，對慶祝「十六條」的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十一日，根據毛的意見，全會印發了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九月二十二日，中央又批轉。

劉空出來的位置由林彪佔據了。在十二日改組的中央領導機構中，林彪和劉少奇互換了位置。此後，除林彪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副主席頭銜不再被提及。十八日，新華社電訊披露了這一人事變動。

全會公報說：林彪號召解放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八月十三——二十三日，中央工作會議。十三日，林彪講話：對幹部要全面考查，全面排隊，全面調整。根據毛主席講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原則，提出了三個辦法：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同思想政治工作搗亂、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完全沒有革命幹勁的，罷官。這次「文化大革命，要觸及每個人的靈魂，要衝破一切阻力，把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批准印發了這個講話。

八月二十一日，《紅旗》重新刊載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對其中一段作了修改，在「我們無條件地接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之後，加上「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同期，《紅旗》發表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勝利前進》：「任何人，不管他的職務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公開點了劉少奇、鄧小平的名：「由於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鬥爭，這樣，兩條路線的問題就必然產生」，「一條是以劉鄧為代表的路線，是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當頭的路線，……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個是群眾路線，一個是反群眾路線。這就是我們黨內兩條路線的尖銳對立。」

根據毛的意見，林彪、陳伯達的講話會後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二十三日，劉少奇、鄧小平在會上做檢查。

以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以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文革」中的「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王光美專案組成立。

由於奪權引起了紅衛兵兩派的鬥爭，對省一級的當權派，一派要保，一派要打倒；一派擁護這個幹部進革委會，一派擁護那個幹部進革委會，互相攻擊，全國大亂。毛澤東感到收不了場了。他想到一個辦法，就是「用大批判來促進大聯合」，讓紅衛兵把仇恨集中在劉少奇爲代表的「走資派」身上。爲此，他指示《紅旗》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毛在審閱時加了一段對《修養》的批判。其實毛在延安整風時期就看過《修養》，而且是他把這本書定爲整風文件的。現在卻說這本書是「欺人之談」。毛對這本書的主要指責是其中沒有談「無產階級專政」，這似乎就說明劉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就說明劉是「修正主義者」。

另一篇是《「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原來是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學生造反，保護當權派，現在卻轉過來說他們推行「打擊一大片」的政策，要批判。

這兩篇文章都發表在《紅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這一期發表的最重要文章是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是第一次在報紙上公開批

評劉少奇。雖然還沒有點名，但誰都清楚指的是劉少奇。這篇文章真可以說是「小題大作」的典型：由十七年前（一九五〇年）放映的一部電影《清宮秘史》為由頭，寫了洋洋萬餘字。毛說這部影片是「賣國主義」的，劉說是「愛國主義」的。劉否認這樣說過，文中也沒有引劉少奇的原話，而是根據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的轉述。可是戚本禹就大加引申，從劉少奇的歷史一直講到「文革」，歷數劉的罪狀，已證明劉少奇說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絕非偶然。而且斷言這就表明劉少奇等人「積極充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是「假反帝、真投降」，「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壞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文章惡狠狠地加了幾十頂帽子之後這樣說：

「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篇文章毛澤東改了三次，發表時周恩來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使人震驚的是，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不經過任何審判，甚至也沒有經過黨內討論，就由這樣一篇文章定為「反革命」罪犯了。「五一六通知」中說的「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原來就是劉少奇！這是一個迹象，表明毛已決心置劉於死地。

難道只是到這時，毛才下決心這樣做嗎？如果他當初沒有這樣的意思，那麼，後來並沒有什麼原因使他改變主意。可見，毛以前說過的劉少奇還可以留在中央一類的話，不過是一種緩兵之計，以減少阻力。對劉少奇，毛是一步步加碼的，直到把劉打入十八層地

獄，永不能翻身的地步，這完全是早有計劃的。

一月十三日，劉少奇應邀到人民大會堂去見毛，向毛提出辭職，毛沉吟不語。

一九六七年，「一月奪權」後，劉少奇向毛澤東寫信提出：

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盡快把廣大老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

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與君同舟風雨無悔——王光美回憶劉少奇》，《炎黃春秋》一九九八年十月）

劉少奇這種高姿態的表示，不但不會得到毛澤東的原諒，反而會使他更加憤怒，因為這會讓人感到，劉少奇是在顧全大局。那麼，誰是不顧全大局的呢？毛所要作的不僅是從肉體上折磨對手，而且要使他名譽掃地。

三月二十八日，劉少奇給毛寫信，駁斥小報上關於他說《清宮秘史》的事。

三月二十日，戚本禹文章發表後，劉少奇說：「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他於四月六日對造反派的勒令寫出答辯，工作人員把原件上送，抄了一份貼在中南海，幾小時後，被撕得粉碎。

四月一日以後，全國掀起批判劉少奇、打倒劉少奇的狂瀾。

四月下旬，毛又否定了「反革命復辟逆流」，除劉、鄧、陶鑄外，其他人都可以上天安門。四月下旬就讓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了。

五月八日，《人民日報》《紅旗》發表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審閱過。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北京中南海面對面地鬥爭了劉、鄧、陶。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是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揪鬥劉少奇和王光美。造反派命令劉少奇背毛主席語錄，當時是冬天，他們還把劉的帽子奪去；第二次是二月九日，劉少奇和鄧小平、陶鑄一同被帶到群眾批鬥大會，戚本禹當天接見「批陶聯絡站」成員，鼓勵他們把劉、鄧、陶批倒批臭。而在這之前，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衝進劉少奇的家，在院內、辦公室內貼滿了侮辱性的標語，並批鬥他；十八日，他們撤掉了劉少奇的電話機。四月六日，在江青的策劃下，中南海揪鬥劉。

七月十八日這一次鬥爭，毛在外地，他叫汪東興告北京，說他不贊成面對面的鬥爭。這一次是很野蠻的，叫劉、鄧、陶夫婦跪下，揪頭髮，按腦袋。林彪看北京搞得很亂，他也學毛的辦法，離開北京到外地轉圈去了。

八月四日，劉鄧陶夫婦再次被批鬥。

九月初，廣播姚文元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這篇文章在毛澤東閱後發表，毛加了

一段話，第一次提出在全國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集團」。（《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三〇一頁）

九月十三日，賀龍專案組成立。

所有這些批判儘管是鋪天蓋地，聲勢浩大，但無論從黨紀和國法上都是不足以給劉少奇定罪的。最後，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當劉少奇已病得奄奄一息的時候，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作出決定，以「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只有一個中委陳少敏沒有舉手）。這樣，劉少奇的政治生命和肉體生命都完了。儘管這個決定案和處理都是在批判劉少奇兩年之後，可是在此之前誰都能料到，劉少奇必然是這樣的結局。毛澤東已經把事做絕了，他沒有後退的餘地，置劉少奇於死地是既定方針，「叛徒、內奸、工賊」這樣的罪名，不過是爲了使這樣的處理合法化罷了。因此，劉少奇專案組使用的誣陷、羅織以及逼供等手段是毫不奇怪的。合法的外衣掩蓋不了非法的事實。劉少奇是共和國的主席，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選舉產生的，中共中央無權不經過人大而撤銷他的主席職務。然而，早在這之前，劉少奇不但事實上不能履行國家主席的職務，連普通公民的權利也被剝奪了！

「二月逆流」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毛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

一月份，陶鑄被打倒。毛當時也批評陶不好。但後來，毛看到陳伯達對「專揪王任重代表團」的講話記錄，不滿了。二月十日，毛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為打倒陶鑄的事，批評陳伯達和江青。毛對陳伯達說，「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劉少奇之間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又罵江青：「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

這次會上，毛對林彪說：「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實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

毛還決定，以後他主持的會議要擴大，提名增加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謝富治、關鋒、戚本禹、楊成武、葉群。

毛還講了三個問題，一是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問題，決定改稱革命委員會，另一個問題是「要黨，不能不要黨」。（十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曾說，學校黨組織不要忙於恢復）但此時整個黨組織都癱瘓了，最後結論是成立核心小組。

第三件，是要王力寫一篇《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例會，原定議程是經濟問題。出席的政治局委員有陳伯達、康生、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

候補委員有謝富治，其他有余秋里、王力、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剛受批評，躲到後面桌子角去坐，總理叫他坐在原來的位置上。

由於會前幾位國務院副總理都從李富春那裏知道了毛澤東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以爲他們說話的機會到了，所以會議一開始就火藥味很濃。幾位老帥你一句，我一句，發洩對文革的不滿。開頭是譚震林批評上海打倒陳丕顯和汛期要漁船停產鬧革命，和張春橋吵起來。謝富治倒是站得穩，不斷插話說：「譚老板，不要這樣，不要這樣。」陳毅說：「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結果怎麼樣呢？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又怎麼樣了？」意思是現在林彪怎麼樣了。徐向前拍桌子說：「還要不要解放軍？」葉劍英、李先念也發泄了一通。葉對陳伯達說：「我們不讀書，不看報，政治水平低，向你請教一下，巴黎公社是怎麼回事？爲什麼要搞上海公社呢？」

周恩來很有技巧地處理了當時的局面。李先念批評《紅旗》第十三期社論說：「這篇社論一出，幹部都被打倒了。」周就對康生說：「十三期社論，這麼大的問題，你們也不跟我打個招呼，送給我看看。」康生撒謊說他沒有看，周又問陳伯達，陳也撒謊說沒有看。

譚震林要退出會場，周恩來拍了桌子：「回來！」

後來，周恩來說：「對待這樣的組織問題，我是不能讓步的。這是黨的政治局會議

嘛！」又說：「我這個人，對待黨的內部問題，我是不那麼尖銳的，但是牽涉到原則性的問題，一個敵我問題，一個違反黨的組織原則，我這個認識不會含糊的。」

王力、張春橋、姚文元在會上沒有說話，只是記錄。

會議從三點開到七點，周說：「現在時間到了，以後再說吧！」就宣布散會。

剛散會，張春橋就把王力、姚文元叫到他房間，把會上各人講的話對了筆記，接着一起齊去報告江青。江青很興奮，說：「這是一場新的路線鬥爭，陳毅、譚震林、徐向前是錯誤路線代表，葉劍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錯誤路線，總理、康生、陳伯達在路線鬥爭中動搖，只有謝富治一個人是站在正確路線一邊。」四人當即去見毛澤東。

剛開始，毛澤東聽張春橋匯報還只是覺得有趣，直笑。講到陳毅的話以後，臉變沉了，再也不笑了——陳毅是譏笑他啊！張春橋接着講到了周恩來，說：「先念同志講打倒幹部是從《紅旗》第十三期社論開始的，總理也對這篇社論沒有送他審閱不滿。」毛澤東不高興地說：「黨章上沒有這一條，黨報黨刊社論要送常委審查。」張春橋又說：「主席還記得去年總理送的一個文件嗎？要把所有幹部放到火裏燒一燒。打倒幹部，是他們這些人搞起來的。總理還說這個文件很好呢。」毛說：「你把這個文件馬上找出來，送給我再看看。」

這個文件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國務院副總理和各口負責人開會，部署文化大革命，會後

寫的「紀要」。其中說到要把司局長以上幹部都放到火裏燒一燒。這個話首先是毛澤東說的，他還說這是一「反修防修大演習」，所有幹部都要「表演一番」。會議接受了毛這個提法。文件是李富春、陶鑄搞出來的，周恩來閱後批示：「我看這個文件很好，請文革小組同志閱後送主席。」《紀要》送毛以後，毛壓住未發，毛當時要陳伯達把意見告周，陳沒有執行毛這個指示，讓周知道。

當時，毛澤東還沒有生很大的氣。十八日，情況陡然變化。那一天，江青跑去見林彪，林彪講了譚震林的信，這封信罵江青是「當代武則天」，說「這個反我造定了，下了決心，不怕犧牲，鬥下去，拚下去」。毛得悉後，大發雷霆。深夜召集周恩來、林彪（由葉群代表參加）、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開會。毛說：「這麼着吧，我馬上走，林彪也走，槍斃陳伯達、江青，康生充軍，文革小組改組，讓他們來搞。陳毅當組長，譚震林、徐向前當副組長，余秋里、薄一波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

周恩來起了緩衝作用，勸毛不要生氣，並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好，毛的氣稍平。決定舉行會議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

王力說道，他根據主席總理反覆講的幹部政策，寫了一篇《必須正確對待幹部》的社論，已送上，不知主席看過沒有？毛要王力再送。看後，毛指示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討論

這篇社論。

王力將此事向周恩來報告，周問：去年那個文件，主席壓下以後，爲什麼不給我打招呼？

毛這次發脾氣把康生嚇壞了。他對陳伯達、王力、關鋒說：「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他發這麼大脾氣。」從此他在江青面前俯首貼耳，小心翼翼，他表示慶幸說：好了，這回解決問題了。伯達同志不用檢討了，不反左而反右了。

當時毛很欣賞謝富治在懷仁堂會上的表現，說：「謝富治是小平用的人，小平同志還是會用人呀！」毛讓陳毅、譚、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批了一陣後，毛又派江青代表他去看望陳毅。

懷仁堂事件的直接後果是周失去了一部分權力。毛說過「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江青就用毛的話壓周恩來，要周像對待書記處一樣對待文革小組。周恩來只好說：「我以後只主持國務院辦公會議。」不久，在軍委擴大會議，江青、張春橋又提出這個問題，嫌周讓權不夠。逼得周只好說：「以後你們作決定，我給你們辦事。」張春橋反而倒打一耙說：「總理怎麼說出這樣的話？」

再一次，江青說，「地方成立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總理不要多管了。他們到北京來匯報，總理太忙，不要總理組織了，由文革小組組織了。」以後，這樣的會，除謝富治外，

其他副總理都不參加。周還主持會，但實際作用不大了。

從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在懷仁堂開了七次批陳、譚、徐的會，毛叫周主持。名稱叫「政治局生活會」，參加者有政治局委員、文革小組成員，加蕭華、葉群、余秋里、谷牧、汪東興。張春橋想借機整周恩來，在國務院整理的《紀要》上做文章，他問陳毅、譚震林：「是你們搞的嗎？」這些會直接批評的是陳毅、譚震林、徐向前，間接地是批評周。江青直接說周「動搖」。最後周只好檢討，說自己在路線問題上不敏銳、遲鈍。李富春本來不在受批評的範圍，可是他主動承擔責任，說他是總理指定的國務院副總理小組組長，主席批陳江的指示是他向其他副總理轉達的，許多議論是在他家裏說的。康生就攻擊李富春是「俱樂部主任」。會上發言最凶的是康生和謝富治。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召開部隊軍以上幹部會議，江青多次提議把懷仁堂會議的文件發到會議上去，毛澤東壓住了，因為牽涉到周。

林彪在這次會上大講了一通階級鬥爭，提出「帶槍的劉鄧路線」，這是針對趙永夫事件講的。

趙永夫事件：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青海西寧市發生的流血事件。趙為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當時中央要求對報紙電台實行軍事管制。但《青海日報》已經被西寧市的造

反組織控制，他們還擁有一批槍支彈藥。在阻撓軍管時，雙方發生武裝衝突，群眾死亡一百六十九人，部隊死亡四人。任現場總指揮的趙永夫說事前請示過林彪辦公室。

趙永夫開槍，死傷共一百多人，死的約二十多個。趙報告林彪，林彪說：「打得好！」開會時，林彪又把這件事推到葉劍英頭上，開始本想把這件事作為典型經驗推廣，會結束時，又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復辟逆流」的典型，把趙永夫抓起來了。

這個會是周恩來提議召開的。因為當時全國大亂，周希望軍隊能把地方的工農業擔子挑起來。討論一下軍管。周報告了林彪，林彪批准了。江青質問說，這件事為什麼不在文革小組討論？調一個營都要主席批准，為什麼開軍以上幹部會這樣大的事不報告主席？周只好向毛作檢討。他解釋說，不解決這問題不得了，生產沒人搞，飯沒的吃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毛也讚成開這個會，沒有責備周。

陳毅本來檢討過了關，毛批示：「很好。」可是陳毅在飛機場當着各派群眾組織說：「我是假檢討，是江青逼的。」毛對此很不高興。

七月緬甸發生打死我國一個專家的事件，外交部的一些群眾要提「打倒奈溫」的口號，康生為此去請示毛主席，群眾喊打倒奈溫是可以的。又說：「現在在我們國家裏，群眾今天喊打倒這個，明天提打倒那個，沒有什麼了不起。還說，群眾喊打倒朱德、打倒陳雲、打到陳毅的口號沒有什麼了不起。」

「文革」初期的毛周關係及「七·二〇」事件

「伍豪事件」。關鋒、戚本禹找周少華談話。周後來專門在「文革」小組會上說了一下這件事。當時康生竭力為周證明，說這件事是敵人搞的，發生以後由康生本人處理的。周查了報紙（關於伍豪委托律師的事），親筆寫了一個材料，給林彪、「文革」小組閱。毛閱後批「閱存」。

伍豪是周恩來曾經用過的別名。一九三二年二月，國民黨特務偽造《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啓事》，刊登在上海的多家報紙上，企圖污蔑周恩來和瓦解共產黨在白區的力量。對此，當時共產黨用多種形式（包括以毛澤東的名義）公開闢謠。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林彪江青等利用早已查清的偽造材料，攻擊周恩來。十九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說明原委。毛明確指示：此時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晚，毛突然想到要發表「五一六通知」。這件事沒有開「文革」小組會討論，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康生、江青、陳伯達、王力知道，大概周恩來和林彪都不知道。

早在二月，毛就交代王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還要把它歸納歸納。顯然，毛覺得是樹立他的理論的歷史地位的時候了。

爲了發表通知，需要寫一篇社論。陳伯達、王力、關鋒連夜起草，寫出一篇《偉大的歷史文件》，其中提出了「三個階段」和「三個里程碑」。毛本人作了修改，加進了一段對斯大林的評論，意思是斯大林沒有解決的問題，現在解決了。毛現在是躊躇滿志，他自認爲代表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權威和頂峰。

六月初，毛覺得不對，決定要保周。他有一個批語給江青。把這件事委托給江青，等於不辦。江青沒有傳達批語內容，只說主席交辦，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謝富治主持，也沒有說是什麼會。江青第一個講話，不着邊際地講了一通「文革」形勢，強調批劉鄧，卻一句都沒講不能涉及總理。接着陳伯達講話，不知所云。以後其他人各講了幾句，都不涉及正題，只有葉群講了一句「總理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周沒有參加，拉了一條線在人民大會堂的另一個地方聽，對這個會很不滿意。

二月批「二月逆流」，四月六日下達「十條」，五月發表「五一六通知」，這一切都使周的處境更爲困難。大廈將傾，只有他在頂着。天塌了一半，他是能補多少就補多少。各種會都要他參加：毛召集的會，「文革」小組的會，國務院的會，接見各地代表的會，中央各部救火的會，還有鐵路阻塞、煤炭生產停頓、農業生產管理、外交事務，等等，還有紅衛兵橫衝直闖，各地武鬥不斷。這些統統要他來處理。從下午到凌晨天亮，他還不能休息，要處理文件。這一段國家的局面還能延續，生產還能進行，生活還能維持，主要要

歸功於周，他的健康水平下降，白髮明顯增多，七十多歲的人了，還承受如此沉重的負擔，完全成了超負荷運轉的機器。

總理主持的「文革」碰頭會，除了規定的議程外，就是大家哇啦哇啦一通，既無主題，又無結論，周有什麼事要做到這裏通過，這裏有什麼事要周去辦也在這裏議一下。實際上周並不是什麼主管（周恩來在中央「文革」中沒有任何職務）。

各地建立革命委員會，毛要周管，各地代表匯報，陳伯達、康生、江青講話，最後周還要講。副總理只有謝富治一人參加，有時江青打着主席的旗號，周很難辦。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毛認為運動搞得差不多了。「文革」的時間一再延長，這時他講「一年發動，一年勝利，一年掃尾」。他想解決南方的問題，到了武漢，毛要謝富治負責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的問題。雲南的問題出在軍隊，大軍區政委李成芳和省軍區政委張力雄各支持一派，鬧得不可開交。毛指示多做兩派的團結工作。他布置時，沒有找周恩來，也沒有找林彪。

毛要到武漢，說是要「游泳」，實際上是想親自解決武漢問題。大家勸他不要去，他偏要去。七月十三日，周打電話給謝富治，要他馬上去武漢，他自己也馬上趕到武漢，爲了保障毛的安全。毛住在東湖賓館，東湖賓館的工作人員多半是「百萬雄師」一派的，周預先把他們都換了。毛十七日到達武漢。第二天一早，他找謝富治、王力匯報西南情況，

並表示要坐鎮武漢，就地解決武漢問題；解決方針是先從部隊解決。周主持軍區黨委擴大會，從十五日到十八日，周在會上傳達了中央的方針。

周講話的意思是三條：一，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要公開檢討；二，三鋼三新是革命群眾組織，要以他們為核心來團結其他組織；三，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他們自己會起變化，這是中央在北京定的方針，也是毛說的。

七月十五、十六日兩天，周先對三鋼三新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派」講話，要他們離開據點，放棄武鬥，回到本單位，並把武器交給軍區。七月十七日，又對「百萬雄師」講了相同的話。

但是，到了七月十八日，毛講話的精神變了。他對兩派都支持，說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麼左，一派那麼右，不能聯合起來，工人階級沒有根本得利害衝突，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組織，就可以聯合。這是當晚召集周恩來、謝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鵬，汪東興、楊成武、陳再道、鍾漢華開會時講的。毛還說：「爲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後來周在北京沒有傳達這句話）這一下，就把中央精神推翻了。這是毛的慣伎。他先讓周出來講話，然後再出來把周的話推翻。

當然，毛沒有說「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主張大聯合，這是對的，可是，爲什麼在北京討論時不提，臨時又變卦呢？而改變了想法也不同中央其他人打個招呼就說出去呢？

至於違反中央精神而提出武裝工人學生，這就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組織上都是極端錯誤的了。

對「七·二〇事件」，毛當時很激動，後來冷靜下來了，說不是什麼「兵諫」，不是什麼「謀害主席」，不是什麼「反革命事變」，不是什麼「住到賊窩裏去了」而是「不過要王力作爲人質，迫使中央改變處理武漢問題的方針」。

那一次，由於確也危險（難免個別壞人乘機），毛打破了慣例，乘飛機到上海。周部署毛由賓館後門轉移到機場，改乘軍隊的小汽車，用武漢軍區空軍的車號，大卡車在前面開路。毛對如此被迫離開武漢很惱火，這是他成爲黨的領袖以後從未發生過的事。

周廢寢忘餐，周密布置，救出了謝富治、王力。北京機場舉行盛大歡迎儀式，後來在天安門又舉行萬人大會，這些做法是林彪布置的。王力表示不理解爲什麼要搞這樣的規模。江青說，這不是爲了你們，是爲了主席。

討論「七·二〇事件」處置時，「文革」小組康生等提出：「爲什麼『黨內軍內一小撮』不能提？他們說：這件事的後台是葉（劍英）、徐（向前），討論上天安門名單時，他們提出葉、徐不能上，這其實都是林彪的意見。林彪參加了天安門大會。」

毛同意了這個方案，從此，「揪軍內一小撮」的火點起來了。這是林彪的意圖，他說：過去有三個軍區不聽我的話：北京、武漢、成都。我對他們沒有辦法（學毛的腔

調)；他還說：陳再道就是不聽話。以後在京西賓館鬥陳再道、鍾漢華的會，林要周主持，會上攻得最凶的是林彪一伙：葉群、吳法憲、黃永勝、王宏坤，還有謝富治，周的講話比較溫和。

「七·二〇事件」後，湖北在武鬥中打死打殘打傷的人十八萬四千，僅武漢被打死的人就有六百多。(《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二九九頁)

八月中旬，江青對姚文元布置：現在的權都由總理掌握了，會議由他支持，匯報也是他聽，主席指示也要由他傳達。會上你還要去摸摸主席的底。

一九七〇年大抓「五·一六」，周也講了很厲害的話。後來緩和了。北京市公安局抓了一個「五·一六」分子，周指示立即釋放。周說：「五·一六」成立時，不過三十多人，積極活動的只有十多人，壞人只有個把人，時間又很短，不過兩三個月，不要小題大作。這才代表了周的真實思想。但後來在林彪、江青、康生的策動下，全國搞了一千萬人，抓了三百五十萬。

中共「九大」

九大宣布：

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根本勝利。但是，毛澤東沒有宣布「文革」結束，看

來他要保持主動權，留下餘地。他說：「文化大革命沒有完，還要我們細緻、認真地抓下去。」

二、新黨章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明確宣布「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三、新黨章還破例地規定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這次黨章修改很大，但奇怪的是，九大沒有按照慣例，有一個修改黨章的報告，而只有林彪一個人做報告。爲什麼呢？因爲如果要有一個修改黨章的報告，就要輪到周恩來來作這個報告了。所以，取消這個報告，就是有意壓低周恩來的地位。

九大選出的新的中央委員會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五分之四是新選上的，且工人農民增加很多，但最多的是來自軍隊，佔百分之四十五；原中委保留的不到五分之一，原一百六十七名中委只有五十三人重新當選。這是一次真正的重建（和斯大林比較）。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的主題是落實政策，團結大多數。北大一萬人，抓了九百人。這個比例達百分之九。毛顯然覺得太高了，他說：「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餘的放回去。教授、講師、副教授手無寸鐵，他們造不了反，造反再抓嘛！」關於「二月逆流」的問題，毛說，「二月逆流幾個幹將，我就恨不起來。不止這幾個嘛，其他地方也有嘛，有八條嘛。他們是公開的，不是搞陰謀。他們反對中央文革，實際上就是反

對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寫上了。不像楊成武搞兩面派，他們只是一肚子氣。」「二月逆流那些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怎麼辦？不選怎麼辦？十幾位老同志，這些老同志功勞也有，錯誤不少，檢討甚多，別人不滿意，我看檢查就算了，以後看行動吧。」毛提議把陳雲、朱德、鄧子恢、張鼎丞、李富春、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張聞天、王稼祥都選進去。「不把幾個老同志選進去不好，黨內有幾個反對派有什麼要緊啊？你反你的嘛！」

毛還再次談到，要把鄧小平和劉少奇區別開來。

這時毛在認真考慮準備打仗的事了。他知道，「文革」不能再拖下去了，鬥爭不能再擴大化了。當前的問題是要團結，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這次會上，孫玉國成了風頭人物。他在會上發言前，毛同他握手致意，向大會介紹這位珍寶島「戰鬥英雄」。

在四月二十八日九屆一中全會上，毛強調「落實政策，準備打仗」：

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打進來了我們要應付。看小打還是大打。你大打我不打。讓出點地方，讓它進。中國地方很大，給它點好處，不然它進不來。它進來了我們就有理有利。……為了勝利，要團結的人多些。不管哪一個山頭的，哪一個省的，南方的、北方的。要多團結點好，還是少團結點好？我說還是多團結一點好。有些人和我們意見不一致，這是人民內部關係，人民內部關係何必那麼緊

張？你一派、我一派，搞那麼對抗幹什麼！

毛除了在正式會議講話外，還多次接見地方上的高級官員和將領，講了不少話。這些講話絕大部分是回顧黨史，很多重複，表現出一個老年人的特徵。

毛對「二月逆流」的寬容態度，並不符合林彪、江青的心意。林彪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說了一段譴責「二月逆流」的話：

「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為劉鄧翻案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實際上是不要以毛主席為首的黨的領導。……在『關心老幹部』、『抓生產』、『穩定部隊』等漂亮口號下實現他們的反黨活動。」

雖然林在下面講到毛對這些人寬大為懷，因此對他們要「一批二保」，但上面這一段話確是明顯把「二月逆流」作為敵我矛盾來看待，否定了保的合理性。

在九大報告中林彪繼續批判「一九六六年冬季至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現的那股逆流」，說它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撲」，想要「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翻案」。這不能理解為有意和毛澤東唱反調，因為林的報告當然是毛審閱同意的。毛讓林來嚴厲批評這些人，自己則出來對他們表示寬恕，這是一個扮白臉，一個扮紅臉。

（一九九六年八月）

第十三章

文革的失敗：林彪的覆滅和毛澤東的遺言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宣稱「文革」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九大黨章規定了林彪是接班人。看來大局已定，「文革」接近結束了。可是，一九七〇年春在籌備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時，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發生了分歧。這個分歧在八月的九屆二中全會（廬山會議）上爆發了出來。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展開了鬥爭，實質上是要在「權力再分配」中掌握優勢。毛澤東支持了後者，把投靠了林彪的陳伯達拋了出來。林彪預感到自己地位不穩，陰謀搶班奪權，沒有得逞，倉皇出逃，機毀人亡——這便是「九·一三」事件。

這件事對毛澤東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儘管他已開始不喜歡林彪，可是林彪敢於策劃暗殺卻還是使他震驚，這種事黨內還不曾有過。林彪是他親自選定的。打倒劉少奇，樹立林彪為接班人，這是文革的一個主要內容，林彪的叛變等於宣告了「文革」的失敗。毛對林彪寄予了那麼的信任和期望，到頭來這個人不過是利用他喜歡的弱點來達到自己

的卑鄙目的。所謂「緊跟」、「高舉」全是假的。他被林彪耍了。

毛澤東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極為尷尬難堪的境地。林彪本應受到比劉少奇更嚴厲的聲討和批判，然而毛本人過去說了那麼多讚揚林彪的話，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地位還寫進了莊嚴的黨章，這如何自圓其說？

一九七一年，林彪機毀人亡後，經過毛澤東同意，把毛在一九六六年給江青的信發表了。其中談到「五·一八講話」時說：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對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中這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這裏所謂「違心地同意」，指的是批發林彪的講話。他需要為自己的這一行動找出辯

解的理由。他本來是不喜歡的，可是「不同意不行了」，因為「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如果公開表示不同意，那就是「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於是，毛只好一方面「違心地」對中央表示同意，另一方面又私下給江青寫信，表白自己的無奈。

這封信公布後，姚文元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一文中解釋「爲了打鬼，借助鍾馗」這句話說，這時毛主席對林彪「內心世界」的分析，「借助」就是敲門磚，等到他們的目的達到後就不要這個「借助」，而要反過頭惡狠狠地搞掉這個「借助」了。按照姚文元這個說法，毛澤東是「洞察一切」的，早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就已經看透林彪了。這也可能是毛澤東同意發表這封信想給人造成的印象，因為姚文元這篇文章是經他審閱過的，他並沒有表示過不同意這個說法。但是，如果毛澤東早就看出林彪的「高舉」是假的，那他爲什麼不把林彪搞掉，反而讓他當自己的接班人呢？這是完全講不通的。當時《參考消息》上登外國通訊社的報道，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專家經過分析後認爲，這封信是偽造的。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沒有看懂這封信。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本意，完全不是像姚文元所解釋的那樣。他的這封信是寫給後人看的，是準備在他身後公布的，只不過是要表示他謙虛的美德，並不是要引起什麼人對林彪的警惕。他稱林彪爲「我的朋友」，說林是因爲要打倒劉少奇這個「鬼」而借助毛澤東這個「鍾馗」，因爲鬼是最怕鍾馗的。這是對林彪的動機作了好的解釋。

明批林孔暗批周

「九·一三事件」後，還有一件使毛澤東煩惱的事，那就是林彪空出來的位置怎麼辦？無論從那方面說，都應該是周恩來。但不管周恩來是多麼才華傑出，任勞任怨，對毛澤東又是多麼忠心耿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毛澤東並不喜歡周恩來。從「文革」開始不久，就有一股「倒周」之風，緊一陣鬆一陣，吹一陣停一陣。不過，這股風總是形不成氣候。毛澤東不能不依賴周恩來，因為像周恩來這樣的「好管家」，那些「左派」人物裏半個也找不出。周恩來沒有「靠邊站」，但他的日子比那些靠邊站的領導幹部的日子還要不好過。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辛苦勞累。他沒有助手，所有的副總理都被打倒了，唯一的副總理謝富治是林彪、江青的人，和他不合作。周恩來既要處理國務院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花大量的時間來應付「文革」的風浪；他既要執行毛澤東的指示，違心地簽署一些命令，又要儘可能地保護一些老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精英；既要抵制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這些人的「打倒一切」，又要同他們保持共事關係。儘管處處壓低周恩來，周還是贏得了黨內黨外廣大幹部和群眾的衷心愛戴。現在林彪完蛋了，毛澤東是否對「文革」的錯誤有所反省呢？他是否覺得有必要做一些糾正和彌補的工作呢？他是否後悔當初沒有更多地信任周恩來呢？他是否會讓周做他的接班人呢？「九·一三事件」後，

毛澤東起初似乎吸取了一些教訓，調整了一些政策。在周恩來的配合下，他爲「二月逆流」平了反，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並爲賀龍、羅瑞卿、楊成武等人恢復名譽。毛澤東在一段時間裏顯得很信任周恩來。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教、宣傳等等，事無巨細，全部壓在周恩來頭上。這些工作是足夠把一個人累死的。周恩來就像超負荷的機器一樣，夜以繼日地運轉，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他取得了毛澤東的同意，進行了一些落實政策的的工作。一九七二年，周恩來接受毛澤東的委托，過問《人民日報》的工作。四月，《人民日報》發表了經周恩來授意並審閱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指出革命老同志是黨的寶貴財富。一九七二年那一年，「批林」在報紙上冷冷清清，批不下去。周恩來提出了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整版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這使張春橋、姚文元大爲惱怒，認爲這些文章名爲批左，實爲否定「文革」。《人民日報》王若水在這種情況下上書毛澤東，告了張春橋、姚文元一狀，說他們的調子和周恩來不同。毛澤東看信後表示，王若水提出批極左思潮「並不高明」。這實際上是間接批評周恩來。從此以後，批左轉爲批右。《人民日報》內部掀起了長時間的批判「極右思潮」運動。一九七三年十月起，遲群、謝靜宜又在清華大學發動了三個月的「反右傾回潮運動」，這股風吹遍了全國，「批左」有罪了。

這是一個迹象，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糾左的疑慮。這是重蹈了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由

糾左轉為批右的錯誤，只是這一次沒有把周恩來拋出來罷了。「文革」本身就是極左思潮的產物。林彪在「文革」當中的言論，有的是頌揚毛澤東，有的是重複毛澤東的觀點，還有的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所以，初期的批林，只限於批「五七一工程紀要」批林彪在遼瀋戰役中的老帳，當中「文革」這一段批不下去了。批林發展下去，很可能導致否定「文革」，甚至有損於毛澤東本人的形象。周恩來當然沒有這樣的意圖，但毛澤東看到這樣的危險是不能不預防的。毛澤東這樣做，錯過了糾正「文革」錯誤的機會，而箇中原因是和一九五九年一樣的。

爲了減少突出周恩來，毛澤東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把王洪文從上海調到北京，讓他列席中央的會議，實際上是當接班人培養。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決定，鄧小平恢復副總理職務。

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澤東想到了「批儒」。他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時說，郭老尊孔反法，林彪也是這樣。不久，他又寫了一首贈郭沫若的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郭沫若當年罵秦始皇，是影射蔣介石。毛澤東要通過肯定秦始皇的專制和坑儒來肯定「文革」。這也是古爲今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批評了外交部（七三年七月三日）：「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還說：「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四六九頁）這個話裏有一種威脅的

意味，雖沒有點名，但矛頭所指，是洞若觀火了。

一九七三年八月召開「十大」，這一次，周恩來的政治報告是由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起草的。王洪文只安排做修改黨章報告（請對比一下：九大也修改了黨章，可是沒有讓周恩來作修改黨章報告；九大報告由林彪一個人包了）接着，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排名緊接周恩來之後。王洪文作為一顆政治新星迅速升起；誰都可以看出，他將要取代身患絕症的周恩來的第二把手的位置了。

七三年十一月，翻譯匯報，在和基辛格會談時，周恩來有的問題不請示、不報告主席，周恩來、葉劍英被美國的原子彈嚇破了膽（大約是指周講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打和不打）。毛於十一月十七日對少數人說：「講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它就不投降。」「當着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後面排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根據毛澤東的要求，政治局開會批評了周恩來。江青在會上說「周迫不及待」，與周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

十二月九日，在會見尼伯爾國王和王后後，毛澤東分三次與周恩來、王洪文、王海容、唐聞生談話。毛對周等人說：「這次會開得很好，很好。」他也批評了江青，但只是

說她講錯了兩句話。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通知：鄧小平為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在這一年年底，毛澤東又提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毛澤東批評了政治局和軍委，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還說，「要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打下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幾天以後再次提到「修正主義」的問題，說，「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大家要注意啊！」這些話聽起來叫人摸不着頭腦，不過，只要把這裏的「修正主義」理解為「修正『文革』」，就容易懂了。

毛澤東發出的這一連串信息，「四人幫」是心領神會的。一九七三年底，江青發動了針對周的反「右傾回潮」運動。「無標題音樂」事件，從七三年十二月到七四年二月，全國發表批判文章一百多篇。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給毛寫信，建議全國「批林批孔」，毛批示「同意轉發」。一時全國大亂，以為第一次「文革」還沒有結束，第二次「文革」又來了。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江青提出批「周公」，矛頭直指周恩來。毛澤東看到這樣下去不行了，批評了「四人幫」。一九七四年十月，毛澤東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行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但是，一九七四年四月以

後，影射周恩來的批判文章從《孔丘其人》開始，不斷發表。

圍繞着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緊張的權力鬥爭開始了。

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來住進三〇五醫院，從此未出院。

「四人幫」經過秘密策劃，由王洪文去向毛澤東告周恩來的狀，遭毛澤東駁回。後來，毛澤東明確表示，不要由江青組閣，支持周恩來繼續任總理。

六月十二日，江青等人名目張膽地批周。（如給天津一位女農民改名為周克周等）

然而，毛澤東卻破例地不當人大代表。爲什麼這樣，又不加說明，引起黨內外許多人不解，四屆人大召開前，（十二月二十三日，長沙）毛澤東同周恩來談到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說因爲我國實行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不平等，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四屆人大剛過半個多月，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就發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社論。接着，中共中央把毛澤東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指示發到全國。張春橋、姚文元又接着發表重頭文章。於是全國報刊都來討論怎樣防止「修正主義」，怎樣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下，關於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的宣傳，關於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的宣傳，關於「四個現代化」的宣傳，全都沖掉了。毛澤東再一次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經濟建設拉到階級鬥爭。可是林彪事件剛剛解決，四屆人大剛開完，爲什麼又要重複這個宣傳了多年的老生常談呢？毛澤東說「林彪一類」，是不是在林彪之

後還有什麼人要搞資本主義呢？這些都是當時人們想不清楚的問題。

在一段時間裏，毛澤東支持在四屆人大被選為副總理的鄧小平的工作（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來、王洪文去長沙時，毛建議增補鄧小平為副主席、常委），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對各條戰線作了全面整頓，糾正了一些過左的偏向，全國形勢明顯好轉。毛澤東在有些事情上，繼續批評「四人幫」，特別是江青。

可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毛又批准發動「評《水滸》」運動。他在回答盧荻時說，要把這本書「作為反面教材，使全國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說宋江「搞修正主義」。許多人以為這件事是偶然的。但是，姚文元在當天寫信給他，說評《水滸》不但本世紀有意義，下世紀還有意義，要在全國開展，他批示同意。而且，在盧荻問他時，張玉鳳在場，她記起一九七四年她在武漢讀《水滸》時，毛就說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

一時間，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投降派」的文章。曾受到批評的江青又活躍起來，叫嚷「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九月十七日在大寨談話）

大概江青解釋得不準確，並且打亂了毛澤東的部署，毛禁止發表江青的講話。病重的周恩來在病床上聽到評《水滸》的指示，他是了解這個信息的含義的。九月二十日，他在進入手術室時，激動地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壬年一

《大動亂的年代》，五五〇頁）

從再批鄧到天安門事件

一九七五年春，鄧小平開始得罪江青。「經驗主義」問題。鄧找毛，批江青。五月。七五年九月，農業學大寨會議上，鄧講全面整頓。實為糾正「文革」錯誤。

毛澤東處在矛盾中，一方面他覺得不能繼續動亂下去了，希望出現安定團結的局面，把經濟搞上去，這樣，他就需要依靠鄧小平；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擔心這樣做下去否定「文革」的「偉大成就」，會損害他的個人威信，他的心頭又出現了赫魯曉夫的陰影，他不放心鄧小平。十一月一日，毛遠新向他匯報，提到「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一九七二年的批極左還凶些」，「擔心中央，怕出反覆」。「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到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九月底以來，毛遠新作了几次這樣的匯報。對這些話，毛澤東聽進去了。

毛澤東找來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等，他說：對「文革」有兩種態度，一，不滿意「文革」；二，要算帳。

十一月二十日，根據毛的意見，政治局開會批評鄧小平。大概毛澤東意識到，「文革」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是無法掩蓋的，與其讓別人來議論長短，不如自己採取主動。他表

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又說，「文革」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他希望鄧小平主持草擬個肯定「文革」的決議，被鄧小平婉拒，「我是桃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表示由他主持不合適。於是對鄧小平的批評升級。並決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專管外事。

這是第一個迹象，表明毛澤東自己也認為，「文革」是有錯誤的。可是，他又陷入了自相矛盾：既然是「全面內戰」，又是「打倒一切」，怎麼只有「三分錯誤」呢？怎麼能說「基本正確」，只是「有所不足」呢？顯然，毛澤東是不願意承認這個錯誤的。照他的解釋，「全面內戰」和「打倒一切」的責任是在群眾。

「全面內戰」和「打倒一切」都是左的錯誤；既然承認了這個錯誤，就應當糾左吧？偏偏毛澤東又在一九七六年元旦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把鄧小平拋了出來。劉冰等人的信的事件成爲借口。毛澤東指示：「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原先說鄧小平「人才難得」，現在卻說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其實，鄧小平對「文革」之所以不滿意，主要也是由於「全面內戰」，「打倒一切」，而所謂他們的「翻案」，正是要糾正這種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的錯誤。毛澤東把這種糾左的措施指責爲沒有抓階級鬥爭這個「綱」。他說：「階級鬥爭是

綱，其餘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更荒唐的是說什麼「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剛剛說完要安定團結，現在又要鬥了。爲什麼不說「八億人口，不團結行嗎？」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終於與世長辭了。

噩耗傳來，神州大地一片哀悼，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失聲痛哭。各地群眾紛紛自發舉行悼念活動，用各種形式表達他們的哀思。然而所有這些在報紙上都沒有反映。「四人幫」發出種種禁令，干預群眾舉行悼念儀式和送花圈。一月十一日，當靈車開往八寶山時，首都上百萬人佇立在十里長街兩側，含淚送別。這種動人場景，在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但是第二天的報紙不但不報道這些，姚文元反而匆忙下令：「治喪報道要立即結束！」在周恩來追悼會的前一天（一月十四日），姚文元又指使《人民日報》刊登長篇文章《大辯論帶來大變化》，頭一句就胡說什麼「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着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

「四人幫」的這種態度，看來也並非是自作主張——像周恩來逝世報道的規格、版面的安排這樣的問題，姚文元個人是定不了的。人們可以注意到，經毛澤東審閱過的中共中央的悼詞對周恩來的讚揚寫得很有分寸，不但沒有說周恩來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甚至沒有說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然而人民的怒火爆發了。這就是首都的工人、學生、幹部，利用清明節的機會去天安門，獻花圈，題詩詞，表達他們對周恩來的懷念，對「四人幫」的憤恨，為鄧小平鳴不平。結果遭到鎮壓。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在「四人幫」的指使下，當時的《人民日報》向中央報送的關於天安門情況的「內參」，為給「四五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提供了材料。當時的北京市委也起了惡劣的作用。毛澤東在聽了毛遠新的匯報後，給天安門「四五運動」定了性，認為又燒又打，「性質變了」，指示公開發表《人民日報》記者的現場報道和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的廣播講話。同時，他以鄧小平是後台為理由決定撤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

毛澤東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處於一種十分矛盾、無法擺脫的心情。他清楚地知道，「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可是他不同意認錯，十分害怕有朝一日什麼人來翻案，從而否定他自己。他已經無法收拾局面，一方面是他已經沒有這種精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沒有承認錯誤的勇氣。他永遠是不服輸、不認錯的。在他已自知不久人世的時候，曾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講了一次話，表達了他的沉重心情和憂鬱。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是想後事。中國有句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接着，他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趕走了日本人和蔣介石，「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

「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是對他自己一生作了蓋棺論定。最後他說，「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的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這番話可以看做是毛澤東的最後遺言。在這樣的時刻，他主要關心的仍然是後人將如何對他評價。他知道反對「文革」的人不少，這使他憂心忡忡，但是他還說這件事沒有完，要交給下一代去完成，即使血雨腥風也不惜。關於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前途，他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決心不允許任何人來翻「文革」的案。然而對這件事，他的信心是不足的，他的話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

的確，毛澤東管不了身後的事。他死後一個月，華國鋒在葉劍英等人的支持下，沒有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幫」。從此，長達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動亂終於結束。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不管毛澤東如何諄諄囑咐不能允許翻「文革」的案，「文革」還是被否定了，毛澤東也無法逃脫歷史的判決。

（一九九四年八月）

（本章「明批林孔暗批周」一節，更詳細的論述參見本書第三部「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等。）

結語

毛澤東現象的基礎

制度與人

本書比較注重論述了毛澤東個人性格的因素，這是因為過去許多文章對這方面注意不夠。我希望不要造成誤會，好像別的原因——例如制度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就不重要了，不過篇幅和時間限制不允許我詳細涉及這些問題，只能在臨結束時簡單地談幾句。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說過：「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就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他又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

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很同意這個分析。前面說到過個人崇拜，這就有它的社會根源。小生產的生產方式決定人們的思維方式，決定人們易於迷信英雄。這也可以說就是弗洛姆（E. Fromm）稱之為「社會性格」的東西。小生產方式容易產生依附性，而有依附性的人都願意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大救星來支配。這是中國的也是俄國的傳統。人要依靠別人，也要依靠制度。人是社會的動物，社會沒有制度就不能存在，不能發展。但是制度也會反過來支配人、奴役人，阻礙社會的發展。這就需要革命或者改革。

從鄧小平援引毛澤東的話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曾經從蘇聯的經驗中注意到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危害的。但是，他沒有把這個觀點加以發揮。我們只是從一九五六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它無疑表達了毛本人和他同意的觀點）中看到這個思想的閃現，後來就越來越少看到了。毛澤東從一九五七年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後，越來越傾向於從另一個方面去總結蘇聯的經驗，不是說斯大林左了，而是說斯大林右了。這樣他就不可能從領導制度的改革方面來考慮問題，而是把問題歸結為階級鬥爭。

這一點在一九六七年毛澤東修改的下面一段文字表現得很明顯：

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實際上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

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們的缺點是理論上不承認在無產階級整個歷史時代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革命的誰勝誰負沒有最後解決，弄得不好，資產階級就有復辟之可能。（《偉大的歷史文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

報》）

這是毛澤東本人很重視的思想。他認為這個斯大林沒有從理論上解決的問題，由他解決了。他把這個思想同中國的現實相結合，得出的結論是：主要是反右。毛澤東多次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本來應當反左，卻提出反右，或者是在剛剛反左之後很快轉入反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文革」中的反「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無不如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錯誤本是左，爲了證明這不是左，他發動了「反右傾」；爲了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都是正確的，防止任何可能的赫魯曉夫人物來翻案，他發動了「文革」；爲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發動了「批孔」、「批《水滸》」以及批鄧小平。這就是說，毛澤東爲了證明第一個錯誤不是錯誤，就去犯第二個錯誤；又爲了證明第二個錯誤不是錯誤而去犯第三個錯誤。這樣，就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

爲什麼毛澤東總是犯左的錯誤？所謂左，在經濟上的表現就是「大躍進」，這和毛澤

東的好大喜功有關。左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又和毛澤東的缺乏容量和多疑有關。這裏是毛澤東的個性在起作用。單是制度的原因不能說明文革的產生，正如本文開頭所說，「文革」並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毛的個性爲什麼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呢？爲什麼他的這種個性能不受抑制地發展呢？這就有制度的條件和原因，也有文化（包括傳統文化和來自蘇聯的黨文化）的原因。毛澤東在吸取斯大林事件的教訓的時候，沒有把注意的重點放在制度方面，相反，他認爲這不是制度方面的問題。

（參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沒有去改革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權體制，反而把它強化了。在這種體制下，加上意識形態方面的個人迷信，毛澤東幾乎可以爲所欲爲。不管他發出多麼荒唐的號召，都會有千千萬萬的人去響應。沒有任何黨的機構能夠管他，沒有任何輿論工具能夠監督他，沒有任何民意機關能夠制約他。他凌駕在黨、國家、人民之上。

然而，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畢竟有它的不以個人的意志爲轉移的規律。毛澤東可以發動「文革」，但他無法使「文革」成功地結束，無法使國民經濟搞上去，無法使社會穩定下來，無法使老百姓的日子不越來越難過，無法使社會主義的前途越來越光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一個新時期，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洶湧的今天，我們已經開始正確地總結「文革」的經驗，開始深刻地體會到防左的重要性和艱巨性了。

淺談「毛澤東」現象的基礎

有些論述認為，毛澤東把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價值推翻了。中國人的善良、友愛、和諧、倫理親情，變為凶狠、仇恨、鬥爭、敗滅倫常。這是「文革」能夠發生的原因。我想民族性是個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人對同一個民族性可以有懸殊的看法，說好的可以說得很好，說壞的也可以說得很壞。我寧願從農民的階級性格來看問題。中國過去是一個農業國，農民是人口的主體。中共的大多數黨員是農民出身，毛澤東本質上是一個農民領袖。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中有一段對農民的精闢分析，大意說農民作為小生產者，必然是分散的、孤立的、無力的；他們需要有人來代表他們，從上面賜給他們陽光和雨露。這是小農的普遍性格。在中國，還有長期形成的宗法社會和家長制的傳統，這種傳統在農村中尤其根深蒂固。這種制度下的人缺乏獨立的自立意識，很容易崇拜權威。所以，「毛澤東現象」是有中國的滋生土壤的。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來自俄國的影響。毛澤東承認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從俄國學來的。這種俄國版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列寧把「民主集中制」作為建黨原則，這個原則後來又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結合，成爲一種國家制度。毛澤東把列寧的這一套搬到中國來，在中國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中央集權的、包羅一切的金字塔式的權力

結構，把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組織進一個「單位」，使每一個人都從屬於組織，依賴於組織。黨實行一元化領導，把全國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管起來了。這樣一種外來的制度和中國固有的家長制傳統結合，成爲一種強大的控制力量，它凌駕在社會之上，使每個人無力反抗。這就是黨國（Party-State）。

這裏還有強大的意識形態的作用。每一個人都要接受馬列主義的灌輸。學生必須學好政治課。工人和幹部有定期的政治學習制度。一切不符合馬列主義和黨的政策의思想和言論都要受到批評。全部傳播媒介只有一個聲音，所謂「輿論一律」。在這種條件下，加上毛澤東本來就有的豐功偉績和非凡魅力（Charisma），宣傳個人崇拜是很容易的，接受這種宣傳也是很容易的。而個人崇拜是毛澤東能夠發動「文革」的重要條件。毛澤東本人也參與了創造這種條件：他用種種方法鼓勵對自己的個人崇拜。

一個人若有毛澤東那樣崇高的威望，被人當做神來崇拜，又掌握着一個人數衆多的強大的黨，他要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念就不是什麼難事了。

「文革」把人性（或民族性）中最卑劣的一面喚醒了，但冠以「革命」的美名，這樣就把許多惡行變成了德行。善惡被顛倒了。相當多的人在迫害別人時，並不認爲自己在做壞事。

毛澤東說過，像斯大林那樣的問題，在英、美那樣的國家是不會產生的。我們也可以

說，像「毛澤東現象」和「文革」這樣的東西，在西方國家也是不會發生的。防止這樣的現象，最重要的不是恢復民族歷史傳統，而是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

（一九九四年）

第三部

歷史的見證

偶像的幻滅

——我在《人民日報》的一些經歷

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三年，我在《人民日報》工作了三十多年，其中又有二十多年是「毛澤東時代」（一九五〇——一九七六）。報社的滄桑變化和我的個人際遇，都和毛澤東有關係。回顧以往，我對毛澤東經歷了一個從尊敬走向信仰、崇拜，再到失望、懷疑和批判的曲折歷程。

開國前後

第一次見毛澤東，是在一九四九年開國前，共產黨解放軍進城後。那時我在中共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北平市委的地址，就在東交民巷原德國大使館。有一天晚上，市委禮堂舉行京劇晚會，毛澤東來看戲了。

我在禮堂の後排坐着，看見毛澤東走進門，在門口站着，對隨從交代些什麼。偶爾，他抬了一下眼睛，那眼光銳利到可以穿透一切。我感到在他面前，是什麼都隱瞞不住的。那一年毛五六歲，又值革命勝利，開國在即，給人的印象是雄姿英發，器宇不凡。那天晚上上台的最有名的演員是吳素秋。戲開演了，都是些小節目，是我這個京劇外行不熟悉的。記得有一個節目是兩個人打賭，議定誰輸了誰脫褲子。輸者一輸再輸，褲子脫了一條還有一條，一直脫了六七條，終於不能再脫了。毛澤東似乎看得很開心。我奇怪，毛澤東爲什麼喜歡這種庸俗不堪的戲呢？

那時，把一個幹部做檢查也叫做「脫褲子」，我很不習慣。心想，還有女同志在場啊，女同志做檢查也這麼叫嗎？

毛澤東對民間傳統戲曲有特殊的愛好。「文革」時期，傳統戲曲節目幾乎全被當做「四舊」而禁演。到了「文革」後期，毛澤東忽然擔心這些節目會絕迹，於是指示把它們錄像保存。當時的文化部把全國還活着的地方戲曲老藝人集中在北京（京西賓館）和上海兩地，專門表演老節目，由電視台錄像，作爲資料保存。每錄出一盒，就送給毛欣賞。

當時是「八億人民看八個樣板戲」的時候，那些節目都是所謂「毒草」，不准老百姓看的。負責這項工作的張耀祠，一個勁地催快錄，因爲毛主席等着看；張春橋等人則強調一定要高質量，不能草率。這件事對外嚴格保密。要說服那些老藝人這是「無產階級司令

部」下達的任務可不容易。起初那些老藝人都不敢表演，甚至懷疑這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陰謀：「文革」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牛鬼蛇神、才子佳人、帝王將相趕下舞台，現在又來錄像，是什麼意思？粉碎「四人幫」後，還一度把這作為江青的罪狀來批判。

話說回來，那天晚上晚會散場後，市委機關一些女孩子都搶着去和毛握手。她們興奮異常，歡呼雀躍。我沒有去湊這個熱鬧：當時我還不覺得握個手有什麼光榮。

我感到光榮的是在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上。當毛以他那雄渾有力的湖南口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時，全場歡呼，掌聲雷動。這是歷史的聲音。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奮鬥，終於勝利了。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誕生了！理想的新社會就在前面！而我，也是這偉大事業中的一個小兵。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自豪呢？

建國初期，社會風氣非常好。那時的共產黨是朝氣蓬勃的，向上的，完全不同於國民黨，給人民以面貌一新的印象。共產黨員都富於獻身精神，刻苦耐勞，嚴守紀律，不謀私利。他們的榜樣把全社會都帶動起來了。

他們都很崇拜毛澤東，以有毛澤東這樣的領袖為驕傲。

毛澤東瞧不起知識分子，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把知識分子狠狠挖苦了一通。這很投合那些工農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的幹部的心理。進城以後，他們要領導知識分子，然而他們又沒有那麼多知識，毛的那種貶低知識的態度，可以使他們取得某種心理平衡。

我初以為，我是名牌大學出來的大學生，又是地下黨員，搞過學生運動，也許會受到黨組織的重視。可是我很快就明白了：還是「夾緊尾巴」為好。那時我們這樣的人最容易受到兩點批評，一是驕傲，二是教條主義。

一些老幹部上台講話，喜歡說：「我是大老粗！……」有人這樣講，是真的感到自己不足；有人卻是透出某種自豪。

在北平市委會工作時，我寫過一篇學習哲學的筆記《普遍與特殊》。我把這篇文章送給一個上司看。他當過醫生，應該說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可是他在把文章退給我時毫不客氣地狠狠教訓了我一通。

「只會搞教條，玩來玩去玩概念，害死你！」

我無緣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可是我能夠感覺到這個運動的影響。毛對王明的教條主義的批評當然是對的，可是他說知識分子最無知識，靈魂也不如工農乾淨，把知識分子放在低於工農的不平等地位，這就是他的褊狹了。

從整風運動以後，強調調查研究，各級黨委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是鄧拓。他富有學識，又平易近人，大家都很喜欢他。鄧拓後來被調到《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輯。我給《人民日報》投了兩次稿，都登出來了。

副主任張文松給我的印象也很好，沒有架子。他喜歡讀書，在同我們談話時，常常有

很新的見解，比如：「文字改革，看來拼音的道路走不通，要搞民族形式。」這一類話很能啓發人的思路。後來我才知道，那些話都是毛說的。張不說他的觀點的來源，倒也不是顯示他自己，而是因爲毛的話是不能隨便傳播的。那時一些領導幹部做報告，也常常這樣。

一九五〇年底，鄧拓把我調到了報社，在理論組當編輯。

我到報社不久，便逢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人民日報》爲此發表的社論是由胡喬木起草的。毛澤東在修改時加了一大段話。黨中央出來對文藝和學術發表批評，我覺得這是從蘇聯學來的。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既然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那就應該能夠對一切問題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是當時流行的看法。理論部有一個編輯到上海去作了調查，回來說《武訓傳》的導演孫瑜是十分擁護共產黨的，我內心裏有些同情孫瑜。

批判《武訓傳》主要由文藝組負責，理論組配合。這期間我曾見江青來過一次報社。我有時去中宣部開會，偶爾聽一些老幹部談起江青最近說了什麼話，說「也不知是江青的話，還是毛主席的話」。說罷，大家哈哈大笑。看得出來大家對江青並不怎麼看得起。不過《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人對她還很尊重。那時文藝組是袁水拍任組長。江青化名李進，帶了個調查組到山東，袁水拍也在內。後來寫出了《武訓調查記》，毛澤東修改了多次，還請袁水拍去吃飯。看來毛當時在培養江青。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後，毛澤東沒有像其他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和社會主義國家首腦一樣，到莫斯科去參加葬禮。但是，他發表一篇文情並茂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其中對斯大林作了很高的評價。《真理報》和《人民日報》都刊登了這篇文章。我當時聽說，這篇文章是陳伯達起草的。

按照國際共運的傳統，應該有人繼承斯大林的共運導師地位。這相當於中國所說的「道統」吧。我所在的理論組有一場爭論。有人說，現在該提「馬、恩、列、斯、毛」了。另外的人說，不對，蘇聯是老大哥，應當是「馬、恩、列、斯、馬」。後面這個「馬」指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繼承人。我屬於「毛派」。後來馬林科夫下台，就沒有人再提「馬恩列斯馬」了。

在延安時期，有人提過「馬恩列斯毛」，毛曾表示不同意。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取得政權，斯大林還健在，而斯大林又不怎麼瞧得上毛澤東，毛懂得他必須謙虛。可是斯大林死後呢？

一年後，情況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爲了紀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人民日報》理論組想找蘇聯大使尤金寫一篇文章。我打電話給蘇聯大使館，接電話的秘書答允轉告尤金。過了一星期，我又打電話去詢問，這個秘書用典型的外交辭令回答我：

「尤金大使知道了你們約他寫文章的事。不過，他說他很忙。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他

寫出來。我想，你們是不是不用等了？」

蘇聯報刊上出現了批評個人崇拜的文章，這種思想影響到中國。一九五四年我寫了一篇長文《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文風》。鄧拓看後，寫了一條稱讚的按語，印發給編輯部參閱，並征求意见。過了一段時間後，我問鄧拓：「編輯部的同志並沒有提出什麼修改意見。這篇文章能公開發表嗎？」

鄧拓用猶豫的口氣說：「會不會有人說這有點個人崇拜啊？」

我這才明白，鄧拓之所以印發編輯部，就是不打算在報紙上發表的意思。但我不甘心，又送給胡喬木看。胡喬木說：「你要節制一下你的熱情。」

從這些小事可以看出蘇聯批判個人崇拜對中國的影響。

批判胡適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初，在《人民日報》開展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兩個月之後的一天，總編輯鄧拓走進我的辦公室，把一疊材料往我桌上一放，說：「你寫篇文章批胡適。明天發李希凡、藍翎批俞平伯的文章；後天發你的文章。」

我覺得突然，說：「這麼快？怎麼來得及？」

鄧拓說：「不一定要很長呀。就說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方法是從胡適那裏來的，要批

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唯心論，把對俞平伯的批判轉為對胡適的批判。這是主席的意思。」

我意識到這個任務的重要性。毛澤東說李希凡、藍翎兩個年輕人的文章是對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權威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那麼我將要寫的文章就是建國以後批判胡適的第一炮了。我是四十年代後期在北京大學學哲學的，當時的校長是胡適；鄧拓可能會認為我寫這篇文章比較合適。毛澤東的指示是要雷厲風行的，我必須趕快完成這個任務。

我看了鄧拓給我的一疊參考材料，又到報社圖書館借來了《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突擊寫了一篇《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在十一月五日的報紙上登出來了。

那時，毛澤東是親自抓這項工作的。我的文章發表當天，毛就看到了，還問鄧拓：「這個王若水是什麼人？」鄧拓告訴了他。毛說：「這也是新生力量呀！」

「新生力量」這個名詞，毛用來稱呼李希凡、藍翎後，一時成為時髦。現在毛這樣稱呼我，我當然很高興。

十二月八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郭沫若發表了《三點建議》的發言，除了批評俞平伯外，又提出批評胡適。郭讚揚了我的文章，認為「值得特別重視」，說「完全贊同王若水同志的說法」，其實是贊同毛的意見。

一個月前，十一月八日，《光明日報》曾發表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對該報記者的談話。這兩次郭沫若都以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為例說明自由討論對學術進步的

重要性，談到要「打破崇拜權威的思想」，「不論『大人物』或者『小人物』，不論黨員或者非黨員，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正確的主張往往是由少數人開始，而終於把不正確的定案推翻」，「服從黨的領導並不等於服從每一位黨員個人的意見。黨員個人的意見並不是沒有錯誤的」。批評「忽視和阻礙新生力量成長的資產階級的老爺態度」。這裏面大部分觀點是毛的指示，從中可以看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苗頭了。當時編輯部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內，看了報紙後都對郭很不滿，認為明明是毛主席的話，郭沫若怎麼當做自己的意見發表呢？這不是「貪天之功」嗎？這個意見後來反映了上去。毛說：郭老說出來好哇！你們不宣傳，反而怪郭老做什麼？誰叫你們不宣傳？

這以後，鄧拓說：「毛主席的話是公共財產，大家都可以用。」

毛很重視對胡適的批判運動。那時「抗美援朝」剛結束，毛覺得要借此機會肅清美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影響。胡適是親美派，又是跟國民黨的，毛覺得挑這樣一個人來批判很合適。也許毛和胡適還有宿怨。毛早年在北大旁聽胡適的課，有一次他舉手要提問題。胡適覺得這個年輕人不像正式學生，問他：「你註過冊嗎？」毛回答說沒有，於是胡適拒絕回答他的問題。這件事肯定深深刺痛了毛。

在批判胡適運動開始時，毛曾提出要「郭老來掛帥」。他說他讀過郭沫若過去批判胡適的文章，印象很好；他還認為郭是最早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的學者。

儘管毛提出要郭老掛帥，甚至還要周揚、鄧拓等人到郭沫若家開會，實際上還是他自己在領導，郭沫若並沒有出什麼主意。

由於受到了鼓勵，我繼續寫了一篇《五四時期的胡適與杜威》。這是一篇短文。五四時期杜威正在中國訪問，我把他當時的言論和胡適的言論對照，發現很多地方如出一轍，看來胡適是在複述他的老師。這些言論都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暴力革命。我的文章把杜威說成是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代表，胡適和他一唱一和，共同反對馬克思主義。

毛對這篇文章有意見，他不贊同我說他們之間有政治勾結。他舉孫中山為例，說孫中山在美國到處活動，籌集經費，這不能說孫中山投靠美帝國主義。

這些意見都是鄧拓轉告我的。當時他常去毛那裏聽指示，回來就向理論組和文藝組少數幾個人傳達。從這裏看，毛當時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不像後來。

毛問鄧拓《人民日報》下一步準備發表什麼文章，鄧拓說：「王若水有一個觀點，他認為胡適的實用主義是他政治改良主義的哲學基礎。他正在寫一篇文章闡述這個觀點。」毛似乎覺得這個觀點很新鮮，說：「哦，這個我還不知道。」停頓了一下，接着說：「寫出來再看吧。」

我寫出的這篇文章題目是《從實用主義到改良主義——胡適的「問題與主義」的解剖》。這是篇大文章，一萬二千字，用了一個整版。

毛看了加以讚許，認為「解決了問題」。但他也提出了文章中的一個缺點。我說，實用主義重視個人的、暫時的利益，馬克思主義強調集體的長遠的利益。毛澤東認為，應當說，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統一，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統一。

後來，根據毛的指示，中共中央發了一個關於《學習唯物論，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通知。毛要《人民日報》、中宣部等單位推薦一批好文章，供全國黨員幹部學習參考。後來選定了十篇，有胡繩、艾思奇等人的，有我的《從實用主義到改良主義》，還有北大汪子嵩等幾個年輕教師集體寫的一篇。

我現在對胡適的看法已有改變。現在看來，對胡適不是不可以批判，但有意地搞成一個大張旗鼓的批判運動是不對的。一旦採用這種方式，所有的觀點都一面倒，不同的聲音就被壓制了，而且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從這次運動後，形成了一種習慣，一遇到被自己認為是錯誤的觀點，就扣一頂帽子：資產階級唯心論。這是一種很壞的學風。

鄧拓寫了兩篇，一是《五四運動是誰領導的》，意思是說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者領導的。但登出來後，毛沒有反應。許多天後才有人向鄧拓透露，毛說不必去講這個誰領導的問題。鄧拓還寫了一篇談《紅樓夢》的時代背景，考證當時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那時，鄧拓常到毛那裏去，聽到毛講了一些話，回來就向我們傳達。有一次他告訴我，毛說他不相信將來永遠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總有滅亡的一天。鄧拓對這一點感

到困惑，對我說：「這一點我想不通。」我想起，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後一句是「俟諸百世而不惑」，毛卻沒有說，看來是有意義的。十年之後，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在《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中，毛澤東重提這個觀點，說：「我說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發生發展和滅亡。這好像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義說一切發生的東西都有它的滅亡，難道這話對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靈？說它不會滅亡是形而上學。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是有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的東西來代替它。」

毛還對鄧拓說過，將來有時間，他要把《矛盾論》《實踐論》改寫一遍，「有一兩個星期就夠了。」不過他這個願望始終沒實現。

一九五五年，毛還指示《人民日報》發動對胡風的批判，這件事是《人民日報》文藝組執行的，我沒有參與。把胡風定為「反革命」，是毛的決定。

一九五六年初，毛又指示批判梁漱溟。他的意思是不要發得太多，有幾篇就夠了。我寫了一篇《梁漱溟的「理性」是什麼？》

當我接着寫完批判梁漱溟的第二篇文章時，鄧拓說：不要登了。那時中央正準備開知識分子會議，不能搞批判了。

在這次會上，周恩來作了主要講話，對知識分子作了全面的分析，強調團結知識分子和發揮他們的作用，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毛也似乎改變了他一貫瞧不起知識分子的態度，

在講話中批評了有的黨員幹部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沒有你們也行」。毛生氣地說：沒有知識分子，光靠我們這些大老粗，行嗎？

那時，斯大林問題被揭露出來了。毛顯然想吸取蘇聯的教訓。一九五六年四月，他發表了《論十大關係》。

這一時期，鄧拓很受信任。他曾被提名為八大的中央委員，因為以《人民日報》重要地位，總編輯是應該有這個位置的。但是他表示謙讓，說這個位置應當留給別人。有一個時期，還傳說鄧拓要去給毛當秘書，也被他謝絕了。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鄧拓私下說了一句：「伴君如伴虎。」

但中共中央還是決定讓鄧拓列席政治局會議，以便多了解中央精神，及時在報紙上宣傳貫徹。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在中共黨內有限範圍內作過傳達。我聽後十分震驚。但中共並沒有組織黨內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論述個人崇拜的問題。我聽說初稿對斯大林的批評語氣很重，後來修改時大大緩和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決議表示支持蘇共對個人崇拜的批評，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也

提到了中共要防止個人崇拜。現在看來，這些表示是很不夠的。

但是，這些提法並不是毛澤東高興的。在一九五六年三月的《論十大關係》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以及同年三月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都一字不提反對個人崇拜。

毛並不同意人們把斯大林當神一樣看待，可是他需要人們崇拜他自己。

《人民日報》挨批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

講話的中心內容是兩點，一是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即批評自我批評）來解決。第二是雙百方針。這篇報告本來是反左的，毛不指名地批評斯大林不承認人民內部矛盾，因而在社會矛盾面前處於被動地位。毛澤東提出，在人民內部，政治上要實行「團結——批評——團結」，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科學和文化工作中，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團結全國人民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文化。

我聽過這個演講的錄音。毛講得很生動，什麼玉皇大帝、孫悟空大鬧天宮啦。但也給人一個印象：他不是經過充分準備的，有許多話像即興式的感想，缺乏嚴密的理論論證。

毛澤東大概意識到這一點，他不忙於發表，讓胡喬木修改。

毛想弄清的一點是，他提出的「人民內部矛盾」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史上是不是新東西，算不算一個發展。當時他身邊的助手都忙着從馬、恩、列、斯著作中去找有關言論，加以比較。那時康生做報告，大講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發展；說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新問題，馬恩沒有講過，列寧也沒有系統講過，斯大林雖然講過但不徹底。但毛澤東最後定稿時採取了謹慎的態度，說：「許多人覺得，提出採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是一個新的問題。事實並不是這樣。」

聽到這個報告錄音的黨外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的反應和許多黨員幹部（特別是工農出身的）反應是很不同的。前者歡欣鼓舞，後者沉默無語。許多黨員幹部覺得，毛太抬高黨外人士了，什麼「非共產黨員可以批評共產黨員」，「非馬克思主義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這些對五十年代的許多中共黨員的心態來說，是格格不入的。我聽說有個黨員在聽完報告後提出退黨，因為他覺得這個報告太右了。

這種情況也表現在報紙上。非黨報紙，如北京的《光明日報》，上海的《文匯報》，都熱鬧得很；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報卻冷冷清清。毛外出時覺察到這一點，他說他

喜歡看《文匯報》、《新民晚報》、《光明日報》，就是不喜歡看《人民日報》。偏偏這時《人民日報》又登了部隊作家陳其通等四人的一篇文章，字裏行間流露出對「百花齊放」方針實施後文藝界現狀的憂慮。毛澤東批評了他們幾個，但在批評之前還肯定他們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

毛在外出期間說了一句：回去要質問《人民日報》，到底是《人民日報》，還是《國民日報》（國民黨報紙）？《人民日報》聞訊，趕緊要我起草一篇《大膽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篇社論由胡喬木修改，加上批評陳其通等人的一段話，在四月十日發表了。

這篇社論馬上引起了外電和國外報紙的注意，一連幾天發了很多消息和評論。這是後話。社論見報的當天中午，我剛吃完飯，就接到通知：隨《人民日報》的編委去中南海見毛。

我有些緊張，不知道是什麼事，悄悄問鄧拓的秘書。他說：「主席點名叫你去的。他看了今天的社論。」我又問鄧拓，他說：「看來主席對《人民日報》有意見。」他預感到這次召見凶多吉少，停頓了一下，又說：「我在想，是不是就利用今天這個機會，辭掉這個職務算了……」

胡喬木帶着我們，分乘兩輛小汽車，進中南海，到毛的寓所豐澤園。使我驚訝的是，

毛就在臥室裏接見我們。當時，他半躺在床上，床上一半地方堆着書。臥房裏的書很多，絕大多數是線裝書，只有一本列寧的《哲學筆記》放在床頭櫃上，那是新出版的。毛的起居和工作都無定時，我不知道他是在睡午覺還是睡大覺，總之他穿着睡衣，蓋着一條毛巾被。他剛從南方回來，臉孔被太陽曬得黝黑，顯得很健康。

鄧拓向毛一一介紹《人民日報》的人，最後到我：「他就是王若水。」

「哲學家哲學家！你寫了好文章。」毛一口湖南腔，用一種長者的慈祥端詳着我。「很年輕哪！你多少歲？」

「三十了。」

「年輕年輕！……怎麼好久不看見你的文章了？」毛問。他看我一時答不上來，就用手指指自己的腦袋，說：「大概是好久沒有下去，頭腦閉塞了吧？」

勤務員在他床前擺了幾張椅子，讓我們坐下。毛開始抽煙——在整個接見時間，他沒有間斷過抽煙。我注意到他的牙齒很黑，大概是長期抽煙加喝茶的緣故。一會兒，陳伯達、周揚也來了。

這是一個「床前會議」。除毛之外，大家都衣冠楚楚，正襟危坐。

毛看大家坐定，就說：

「睡不着覺，找你們來談一談……」

他說，他看了今天的《人民日報》社論，雖然發晚了，還是好的，總算對陳其通等人的文章表了態。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而讓非黨的報紙舉着這面旗幟。毛要鄧拓談談對「雙百方針」的宣傳。

鄧拓匯報。毛多次插話批評，口氣很重。

「我看你多半是唱反調的，專給陳其通等人唱。」

「你們不是黨報，是派報。」

「過去我說你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

鄧拓解釋說，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沒有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生氣地說：「中央什麼時候有過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麼不發社論？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會議不發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有黨外人士參加，為什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沒有及時宣傳。我是黨的主席，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可是現在非黨報紙討論得很熱鬧，黨報冷冷清清，這面旗幟被黨外人士舉起了。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人民日報》有鬼！鬼在什麼地方？」

毛的怒火如此大，我們都很震動，坐立不安。

鄧拓只好說，他對這件事沒有抓緊。毛打斷他：

「不是沒有抓緊，是根本沒有抓！」

毛詢問了社論的寫作過程，表揚了我。我說：「這篇社論喬木同志作了很多修改。」毛說：「那總是要有基礎吧。這篇社論好，我要請你吃飯。」

鄧拓談到，他聽主席在一次會上講到陳其通等人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他以為毛是表揚。毛說，他不同意陳其通，這一點是明確的。鄧拓之所以會聽成表揚，是他「各取所需」。毛又談到，陳其通等人的文章，《真理報》轉載了；鍾惦斐的文章（《電影的鑼鼓》，此文後被被當做「毒草」批判）東歐報紙轉載了。「這就叫教條主義喜歡教條主義，修正主義喜歡修正主義。」

「叫你來列席政治局會議，中央精神你都知道，有什麼用？只有一個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舊費。你不要霸住茅坑不拉屎！以後誰寫文章，叫誰來開會！」

最後這句話，當時誰都沒有注意。二十多年後，胡喬木有一次對我提起這件事，說「誰寫文章，叫誰來開會」指的是我。毛後來還對胡喬木說，他的意思就是要王若水這樣的人來當總編輯。胡喬木沒有說為什麼後來沒執行。不過，我覺得幸而如此。《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有幾個有好下場呢？

毛批評了鄧拓後，又批評了在座的幾個副總編，說：「你們真怪，難道你們都同意他

嗎？是不是因為鄧拓會團結人？你們的意見都那麼一致？幾個副總編輯像鐵板一塊，不敢批評他，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有意見可以爭論嘛！要敢於給鄧拓提議見，頂多撤職。爲什麼一點風都不透，沒有一個人向中央報告情況？我的意見，你們只要不到馬路上去鬧，什麼意見都可以講。拍桌子、吵得臉紅脖子粗都是可以的。」

幾個副總編低頭不語。毛看看鄧拓，接着說：「大概鄧拓你有德，他們不忍心反對你。西漢後期幾個皇帝，元、成、哀、平，每況愈下。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要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鄧拓大概覺得現在是提出辭職的機會了，就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漢元帝，不過我實在感到自己能力不夠，希望主席考慮撤掉我這個職務。我幾次誠心誠意地提出這個請求……」

毛又打斷了他：「我就不相信你那麼誠心誠意！你只知道汽車進、汽車出，養尊處優。」

我驚訝地想，怎麼毛澤東會把鄧拓比做皇帝呢？說到哪裏去了？可是一看毛的半邊床上堆的那一大堆古書，我想他是讀歷史讀得入迷了。

坐在那裏看毛澤東對鄧拓發脾氣，心中很是不安。一方面，我熱烈擁護毛提出的「雙百方針」；另一方面，又很同情鄧拓。毛的火氣大概已經積累多日了。他剛從外地回來，

今天《人民日報》已發表了社論，他大概覺得，再不批評，就晚了。他表揚我，把這篇社論的功勞歸於我，這樣才好批評鄧拓。

看到毛的脾氣發得差不多了，胡喬木開始說話。他說這事不能全怪《人民日報》，他也有責任。《人民日報》曾送了一份宣傳計劃給他；他覺得沒有把握，壓下了。毛沒有批評胡喬木，只說了句：「我看你對《人民日報》是又管又不管。」

實際情況是，當時黨內一些高級幹部對「雙百方針」有抵觸情緒，胡喬木就是一個。鄧拓準備了一組題目，共十篇社論，這不可謂不重視，而且有些社論已經寫好，但胡喬木遲遲不批准。毛沒有批評胡喬木，而只是批評鄧拓，是不公道的。鄧拓說，中央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正式公布前不得引用，這也是事實。但胡喬木也有借口；文革結束後，他在一次會上說，毛在離京之前告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暫時不要宣傳。

毛大概是一個容易忘記的人。他在這次談話中批評《人民日報》出八個版太多了。「紙張那麼緊張，還辦八個版，內容那麼多，誰看？」「誰叫你們辦八個版的？」

胡喬木吞吞吐吐地說：「這件事是中央決定的。」

「中央是誰呀？」毛窮追不捨。

胡喬木沒有辦法，只好說：「主席，是你決定的。」

「我什麼時候做過這個決定？」毛反問。

胡喬木急了：「這種事我不能亂說，絕對不能亂說。是有一次……」

胡喬木說出了具體時間和場合，毛當時怎麼講的。毛無法否認了。可是，他又說：

「如果是我講的，那是我昏了頭。我講了那麼多話你們都不聽，爲什麼單單這句昏話你們就聽進去了？」還是他有理。

這裏我要插一段。文革初期，新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去見毛澤東。毛談到，《人民日報》出八個版太多了。主席指示，是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唐平鑄回來馬上把報紙改爲四個版。當時報上登的毛澤東和林彪的像很多，也很大，此外還有不少語錄、口號。毛看了兩天，覺得沒什麼內容，又說，還是八個版好。爲此，陳伯達把唐平鑄批評了一番：「誰叫你改成四個版的？」唐辯稱是主席指示。陳說：「那你爲什麼不先打一個正式報告，讓中央批准？」

鄧拓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說他的雜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文革」結束，給鄧拓平反，又有人寫文章說鄧拓是衷心擁護毛主席的，他的雜文沒有諷刺偉大領袖的意思。其實，《專治健忘症》，確實是暗指毛澤東的。健忘不要緊，但別人指出後卻不認帳，還要別人承擔責任，這就可怕了。鄧拓這篇雜文後來被中宣部內參《思想動向》轉載，未加任何評論，可是這就夠了，毛是絕不允許有人這樣諷刺他的。

那天，毛還談了一些問題，值得記下的有以下幾點：

一、「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這裏，他賦予「百家爭鳴」以階級內容，而且只是兩家，把封建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忽略了。

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評？可以，毛說。他本想說，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結論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評；後來覺得這樣說不妥，所以就籠統地說「馬克思主義允許批評」。我覺得這個觀點比較重要。一九三八年蘇聯出版的《聯共黨史》的結束語中曾說，馬克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結論是可以而且應當隨着條件的變化而修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則不然。毛的這個觀點進了一步。本文前面提到，毛認為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天會滅亡，毛再說這句話時也許想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後來沒有堅持這一點。

三、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現在很緊張。在這個時候，黨如果採取鬆一點的政策，知識分子就會靠近黨；如果緊一些，知識分子就離黨更遠了。這個觀點也很對。說明毛最初是誠心誠意實行「雙百方針」的，但他後來變了。

四、黨對知識分子也是採取贖買政策。毛說，「這是伯達同志提出來的」，他贊成。但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公開這麼說，對知識分子不好這樣說。這個觀點表明毛把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看成一路貨。

五、毛說：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由此說到對曹操的評價。他說：「你不要信那個《三國演義》，曹操是進步的，漢是沒落的。」

六、毛說他喜歡看《新民晚報》、《文匯報》、《光明日報》，不喜歡看《人民日報》。

七、大家談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黃炎培，喜歡寫詩，詩又不合平仄，還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毛的意見是，還要從政治上考慮。人家是歌功頌德，詩不好也是可以登的。

八、當時哲學界在爭論一個問題：是不是哲學史上的唯心論都是錯誤的？有的黨外老哲學家不以為然。胡繩寫了一篇文章肯定這個觀點。周揚說，有些人對這篇文章有意見。毛認為，這篇文章還是好的。

九、毛談到寫文章，說馬克思的文章難懂，恩格斯和列寧好些。斯大林的文章雖然清楚，但高高在上，有教訓人的口吻，是教條主義的。這是，他轉過頭對周揚說：「我看你的文章有教條主義呢！」

十、毛談到他有意用筆名寫一些雜文一類的東西。鄧拓說：「主席要寫文章，《人民日報》可以闢一專欄。」但毛又說，不好辦，用筆名，時間長了，人家也會猜出來。他這個主席的身份是不自由的。

十一、毛又談到他想辭掉國家主席。以便有更多時間做研究和寫文章。還問我：「王

若水同志，你贊成不贊成？」

這次談話後，鄧拓向報社編輯部做了傳達。編輯部人員的普遍反應是心情沉重，大家都同情鄧拓。

接着，我又寫了一篇文章《爭鳴雜感》。鄧拓沒有修改就送給胡喬木，胡喬木沒有修改就直接送給毛澤東。這種情況是很特殊的。大概是因為受了批評，特別慎重吧。我的原稿上有一句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結果，雖然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毒草，但也會放出一些香花。」毛澤東說：「說反了。首先是會放出一些香花，但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毒草。」就這樣一句話，也表明毛的原意是積極的，他想到的是些新生力量受壓制、一些好作品和正確觀點被視為毒草，「雙百方針」首先是把它們解放出來。我記得當時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受到批評，說小說揭露北京市委組織部有官僚主義，這是一種惡毒攻擊。毛為此不平，說：中央都有官僚主義，何況北京！

我認為，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毛最初提出「雙百方針」並不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詭計，而是真誠的。當時的背景是，蘇聯出了斯大林問題，赫魯曉夫批評了個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罪行，震動了全世界。毛想認真吸取蘇聯的教訓，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錯誤，所以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包括「雙百方針」。把這作為「陽謀」，是後來的事。

毛澤東提出這個「雙百方針」太突然了，黨內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因此，引起的不是熱烈的響應，而是一種沉默的抵制。不贊成的主要是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但也有不少教條主義的知識分子，如陳其通等人，他們打破了沉默，用一種很委婉的方式表達了不同意見。

風雲突變的「反右派鬥爭」

毛決定在黨內開展整風，同時也發動黨外人士對黨員提批評意見，這是三月的事。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是「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一九頁）毛喜歡搞運動，發動黨外人士批評，也採取了運動方式。當時統戰部召集多次民主人士和黨外知識分子開會，號召他們提意見；有些人沒有意見，或不願意提，也千方百計讓他們說話。毛澤東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從文藝和學術範圍擴大到政治範圍，稱之為「鳴放」。「鳴放」出來的意見都在報紙上發表。一般「鳴放」不夠，還要「大鳴大放」。於是氣氛越來越熱，謹慎的人變得敢開口了，敢開口的人變得毫無顧忌了。於是，批評中共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的言論出來了，要「黨委退出學校」的議論出來了，建國後幾年的工作是「缺點大於成績」的說法也出來了。

各級黨委書記成了運動的主要靶子，他們的日子不好過，自然有埋怨情緒，覺得毛澤東的「大鳴大放」把好端端的政治局面給搞糟了，害得他們威信掃地。

黨外批評的強度也超出了毛的預料，使他吃驚，特別是有人直接批評到毛頭上。張奚若批評毛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過去，迷信將來」；羅隆基說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章伯鈞提出「輪流坐莊」等等。這些都使自尊心很強的毛澤東惱怒，也使他擔心匈牙利事件會在中國重演。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這篇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以前毛是批評教條主義、批左，現在變成主要批修正主義、批右了。他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指責右派所說的「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都是假的。」從這時起，才有意識地在報紙上發表「毒草」文章，實行「釣魚政策」。

毛需要向黨內解釋，爲什麼要把那麼多的「烏烟瘴氣」的東西登在報上？毛說：「這是爲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二八頁）後來，毛澤東又說，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充分暴露自己，「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

（同上書，四三六頁）「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同上書，四三七頁）這個話是他在為七月一日《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說的，當時反右派運動已經開始了。

「反右派鬥爭」的公開信號是六月八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

七月九日，毛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說，他三月份在上海講話，「當時我們就料到這些事情了。」（同上書，四四〇頁）「讓那些毒草長嘛，讓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幹什麼呢？三月份那個時候我就講不要怕。」（同上書，四四一頁）

其實，毛的這種說法只是一種事後的自圓其說，企圖給人一種印象：他一開始就預料到會有「右派」進攻，一開始就有意識地「釣魚」，或「引蛇出洞」。這可以使黨內那些起初對「雙百方針」有埋怨的幹部變得高興，並且感到慚愧——他們太不懂得階級鬥爭的策略了。如果按照他們原來的想法，不讓黨外人士「鳴放」，那麼這些「右派」怎麼會跳出來呢！他們覺得毛主席這一着是太高明了。毛澤東就用這種突如其來的大轉彎，犧牲幾十萬知識分子，換取黨內保守勢力對他的支持。

《人民日報》由於需要對反右派提前做好準備，所以在正式反右之前半個多月，就在小範圍作了傳達。我所在的理論部是一個好發議論的集體，同事們常常在辦公室內激烈地

批評黨內一些幹部和工作。憑這些言論，是足夠把我們打成右派的。但我們得到通知後就趕緊收斂了，而且因為幾乎人人都有帳，後來部內也沒有過多地互相揭發。

當時我們得到的指示是，先找一些黨外中間派出來講話，下一步再讓工農出來批評知識分子。

在六月以前，由於對「雙百方針」的廣泛宣傳，大家都已接受了。現在突然又來這麼一個大轉彎，許多人思想不通。我記得有一天胡喬木來到報社，指示反右派宣傳。他坐在會議桌的一頭，開始的話就是：「這次反右派是個考驗。郭老擁護，宋慶齡就不支持。主席說，他們兩人的表現就不一樣……」

六月十九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時的政治氣候，同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這篇講話時已是大不相同了，「反右派鬥爭」已經開始了。拖了一百多天在報紙上發表，客觀上給毛一個機會來修改自己的觀點。毛的講話本來是重點防左，強調民主，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現在卻要突出反右，強調階級鬥爭，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誰勝誰負」還沒有真正解決。對講話的修改，既要適應反右的政治需要，又要照顧到和原講話的銜接，這很不容易。胡喬木先作了十幾次修改，毛澤東又親自修改了多次。胡喬木告訴過我們，他「改得很吃力」。

這樣，發表出來的定稿不僅觀點有矛盾，文字風格也不同了。原來毛講得生動活潑，現在由於作了過多的修飾，顯出一種拘謹。

反右派運動中，原來那些受毛表揚的報紙，《文匯報》、《新民晚報》、《光明日報》，一下子都成了右派報紙。毛指示《人民日報》轉載《解放日報》姚文元的文章《錄以備考》，並親自加了按語，冠以《文匯報在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的題目。毛還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發表。這篇社論半句肯定過去的《文匯報》的話都沒有，相反是嚴厲指責它執行一條「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指責它「為反動派作了幾個月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幾個月」是多久呢？毛對我們稱讚《文匯報》是在四月十日，「反右派鬥爭」開始是在六月七日，相隔兩個月。毛的意思不可能是說《文匯報》的「猖狂進攻」是在四月十日以後開始的。就是說，當毛在欣賞《文匯報》時，它已經是反動報紙了。

北大化學系知名教授傅鷹講過一些很尖銳的批評共產黨的話。毛要表明，他只是要反擊惡意的批評，並不反對善意的批評，就把傅鷹樹為「標兵」。那時我還去採訪了傅鷹，寫了一篇《傅鷹教授一席談》。但「善意」「惡意」是沒有什麼客觀標準的，後來許多人的言論遠不如傅鷹尖銳，只因被看成「惡意」，都打成右派了。現在看來，毛對這個運動是否會冤枉很多無辜者並不是真正關心；對他來說，重要的是不要漏掉一個「右派」。

費孝通在聽完毛在二月的報告後，興奮之餘，發表了一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時。當時有人批評這篇文章。毛一次接見費孝通，談到這篇文章時，毛表示欣賞，並對費說，有人要批評，「你同他大戰三百回合」。反右開始後，因為費的文章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算是《人民日報》「欠了帳」，要還（發表批評文章）。鄧拓覺得猶豫，對我們說：「費孝通逢人就說主席表揚他的文章。這件事大概是真的。」但後來在運動的壓力下還是批評了，而且把這篇文章定為大毒草；費孝通本人也被定為右派。毛肯定過的王蒙也被劃為右派。毛並沒有出來保護他們。他似乎絲毫不覺得要對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

反右開始後，《人民日報》的日子好過了。

開始我們很多人都想不通，但後來不斷開會、學習文件、閱讀報紙，漸漸地轉變立場了，覺得右派真是要「翻天」。我還寫了一篇社論《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這篇社論鄧拓沒有修改，送給胡喬木；胡喬木也隻字未改，批准照登。當時覺得寫這篇社論是理直氣壯，現在真覺得後悔。

鄧拓曾私下說，幸虧《人民日報》當時「按兵不動」，不然，還不知道報社有多少人犯錯誤、被打成右派呢。

鄧拓曾在延安時代提出過「毛澤東主義」的概念，那時也有別人這樣說，但被毛否定

了。鄧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數黨內幹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請胡績偉去潭柘寺散心時說毛這個人「翻手爲雲，覆手爲雨，自己講過的話，可以翻臉不認帳」。

毛在一九五七年底把吳冷西從新華社調到《人民日報》任總編輯；鄧拓改任社長，不大管事了。本來鄧拓對理論部和文藝部的事管得較多，後來只管文藝部，也給文藝部寫點散文。這樣過渡了一段時間，就到北京市委去了。傳說是彭真把他要去的。表面上看，鄧拓的離開《人民日報》是正常的，他走時報社還開了歡送會。吳冷西在會上講話，講得很分寸。鄧拓還寫了一首《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的詩：

筆走龍蛇四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烟。

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

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後爭先。

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

有一次我和一個同事去看鄧拓，談到一九五七年被批評的事，他仍然耿耿於懷，激動地說：「將來歷史一定會做結論的！」

鄧拓離開《人民日報》後，吳冷西吸收教訓，對毛採取「緊跟」的辦法。「大躍進」的一九五八年，許多聳人聽聞的東西都是在《人民日報》上出來的，對當時的浮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雖然我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中躲過了，但仍被認為是思想沒有改造好的幹部。一九五八年初，中共中央指示一批幹部「下放」到農村，勞動鍛煉。我是《人民日報》下放幹部之一，到湖北的棗陽縣一年。

那一年農民的幹勁的確很大，可是被浪費了。成立公社時，農民很興奮，爭先恐後要求加入。他們對毛澤東有盲目的信仰，他說人民公社好，那就不會錯。到了秋天，各種危機都出現了，首先是糧食不夠吃。我有一次在田間勞動，忽然心裏發慌，全身出汗，力氣全無，這才悟到是好幾天沒有吃飽飯了。可是幹部還在那兒吹牛皮，什麼畝產萬斤，消滅四害啦。我們對這種虛誇進行了抵制，同時把農村的真實情況向報社寫了報告。在這年年底的武昌會議上，吳冷西把我們的報告送給了毛，聽說還受到重視。但這一個舉動得罪了當地幹部，幾乎要把我們打成右派。

從農村回來後，別人告訴我，吳冷西有一次在會上說到，毛曾問《人民日報》有沒有什麼理論家。吳說沒有；毛說，王若水算一個。

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在廬山惹禍，引得毛發動了一場「反右傾運動」。我當時強烈地感到不能同意，因為這個錯誤太明顯了。我想很多別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法，只是大家都不敢說。「反右派運動」把我們整怕了。

我當時聽說：毛對彭德懷說，你是魏延，有反骨。又說，我同你訂個君子協定，我死

後你不要造反。

李銳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上沒有記載毛說過這樣的話。但是他敘述了小組會上一些人說彭德懷是魏延。我相信這個話源出毛澤東。當時毛和柯慶施那一幫拍馬屁的高級幹部有秘密接觸，商量如何對付彭德懷。

中國的魏延，就是蘇聯的赫魯曉夫。我認為，從大躍進失敗後，赫魯曉夫的陰影就籠罩在毛的心頭。他十分害怕百年之後有人效法赫魯曉夫的榜樣，攻擊他的錯誤。只有了解這一點，才能解釋從「反右傾」到「文革」的毛的一系列行動的動機。

在當時，只有赫魯曉夫在批評毛澤東。這種言論作為「毒草」發表在《參考消息》上，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氣忿和警惕。可是我內心想的是，赫魯曉夫是對的，現在只有他能公開批評毛了。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黨校參加關於編寫哲學教科書的討論會。康生來講了一次話。我記得他講到蘇聯「修正主義」時，臉孔突然脹得通紅，一副怒不可遏的樣子，大聲叫道：過去只知道斯大林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現在看來，斯大林肅反還肅得不徹底：他漏掉了赫魯曉夫！

這個話給我很深的印象。我相信這也是毛澤東的思想，不管是毛採納了他的話還是他轉述毛的話。這是毛的思想的一個重要轉變。

一九六一年，中共成立四十周年時，劉少奇要作一個講話。我參加了講話的起草小組。大家討論時，都覺得應該借這個機會代表中央做一個自我批評，講講一九五八年以來黨所犯的錯誤，向全國人民做一個交代。後來，陳伯達跑來了。他說，這個報告應該主要是講給國外聽的，不要多談缺點。陳伯達沒有說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但我們猜測這是毛的意思。結果，劉少奇這個報告沒有什麼實質內容，但說了一大通感謝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在困難期間對黨所給予的支持。

也是在這一年的秋天，劉少奇說，五八年的錯誤，中央一半責任，《人民日報》一半責任。《人民日報》在當時發表了許多錯誤觀點，應該予以清理。他舉出了批判「條件論」的例子，要《人民日報》澄清這個理論問題。這個任務落在我的頭上。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數易其稿，寫出了一篇《論條件》。文章批評了報紙上曾經流行過的說法：「這個地方能辦到的，別的地方也應該能夠辦到」。我說，這就是不顧條件的差別。當時我還不知道毛澤東說過類似的話。文章送到劉少奇那裏後，沒有下文。

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哲學分歧

斯大林和毛澤東一直有哲學上的分歧。毛繼承列寧的觀點，主張一切矛盾都是有同一性的。斯大林則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或同一）。

毛澤東的《實踐論》在蘇聯的《真理報》發表後，蘇聯方面的評價很高，但《矛盾論》在蘇聯發表後，蘇共方面的評價很謹慎。哲學家羅森塔爾寫了一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文章，表示贊同《矛盾論》中關於「矛盾的同一性」的觀點（實際上毛的這個觀點是從三十年代蘇聯哲學家的著作那裏來的，但因斯大林不贊成，他們都不敢提了）。羅森塔爾的文章發表後，蘇聯的《哲學問題》雜誌上出現了一篇批評文章，說羅森塔爾的觀點不符合斯大林的觀點。不久，羅森塔爾作了自我批評。一九五四年，尤金、羅森塔爾等人合編的《簡明哲學詞典》第四版出版，其中「同一性」這一條不指名地批評了毛澤東關於「矛盾同一性」的原理。

這肯定是斯大林的授意，否則，詞典的編者是不敢的。

當我從中譯本中看到這一條時，感到十分驚訝；同時，強烈地不同意這個批評。詞典說這是「孟什維克式的唯心主義」；我想，怎麼可以這樣亂扣帽子呢？

我不知道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批評和對《簡明哲學詞典》的反批評。毛的這篇講話，我在一九七七年《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時才看到。

一九五八年，陳伯達去找楊獻珍：「你敢不敢批評尤金？」楊獻珍說：「怎麼不敢？」陳就要他針對《簡明哲學詞典》寫一篇「矛盾的同一性」的文章。

楊寫出來了，文章前半部分論證生與死、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有同一性；但後半部分又大講思維和存在（這無疑也是一對矛盾）沒有同一性。這等於說，不是一切矛盾都有同一性。楊獻珍在一些具體例子上反駁了尤金，但又在另一個具體例子（思維和存在）上支持了尤金。

陳伯達找錯了人。當時中央黨校內部楊獻珍正在同艾思奇爭論恩格斯所說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是什麼意思。艾思奇說恩格斯肯定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楊獻珍說這是唯心主義的論點。從楊獻珍的立場來說，他必須在這篇文章中肯定自己的觀點。

這篇文章沒有被《紅旗》採用。但是，楊獻珍後來通過別人把他的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觀點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我寫了一篇文章和作者商榷，這就捲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大論戰。

「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論戰之初，《人民日報》並沒有興趣，也不想發表文章。後來開始注意了。據吳冷西透露，中央注意到了這個討論，而且似乎不贊成楊獻珍一派的觀點。

許多年以後，我才看到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中講的幾段關於「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話：

「思維和存在有沒有同一性這個問題，爭論很久了。認為思維只是思維，存在只是存

在，思維不能達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認識，客觀不能被主觀所認識，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論，最後走到康德那裏去。

「思維和存在不能劃等號，說二者同一，不是說二者等同，不是說思維等同於存在。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並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成爲事物。」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了界限了。然後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還是馬克思說的那些話對，思維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說思維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對的，但是因此就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則是錯誤的。」

「人們的主觀運動的規律和外界的可觀運動的規律是同一的。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爲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這是恩格斯多次闡明的論點。說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勢必走到反對恩格斯的論點。」

桌子的哲學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這是他在修改《中

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增寫的一段話。我看到這段話時，馬上想到八年前他說的想改寫《實踐論》的話。但這段話究竟過於簡短，新觀點也不多。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批評有些同志「對於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也覺得不可理解」這句話，這等於肯定了「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

我早就想寫一篇文章，批評哲學教學中那種簡單化庸俗化的做法，而我認為中央黨校有些人還在提倡這種做法。他們翻來覆去講「存在第一性，思維第二性，思維是存在的反映」。而他們所說的「反映」，又是像列寧那樣理解為「照相」或「拷貝」。他們以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華盡在其中；一切工作中的錯誤都是由於違背了這條原理；似乎只要弄通了這條原理，就可以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了。我記得當時報紙上宣傳河南三官廟農民學哲學的經驗就是這樣：教員搬一塊大石頭放在桌上，問大家：「這是什麼？」「石頭。」大家笑了。「是先有這塊石頭，然後你才感覺到它呢，還是你腦子裏先有石頭的感覺，然後才有桌子上這塊石頭呢？」「當然是先有這塊石頭，那還用說？」「對了，這就叫唯物論！」於是農民恍然大悟：原來哲學如此簡單！

針對這種庸俗化的教學，我寫了一篇《桌子的哲學》的對話體短文。我說明，桌子是人造的，木匠在造桌子時，腦子裏一定要先有桌子的觀念。當然，木匠的這個桌子的觀念

是他以前看到了別的桌子後產生的，別的桌子又是另一個木匠造的，他也是先有桌子的觀念；如此追溯上去，到製造第一張桌子的人，頭腦裏還是先有做桌子的設想。因此，歸根到底，是先有桌子的觀念，然後有桌子。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最初的桌子的觀念，雖然是一個發明創造，但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受了土墩、石頭等自然物的啓發；又由於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有了能夠造桌子的技術和工具，又有了使用桌子的社會需要，這樣才產生了做桌子的想法。這樣解釋，就不是唯心論，而是歷史唯物論。因此，不能只見物不見人，而要從物中見人，從桌子這個客觀事物中見到人的勞動，人的意志，人的智慧，人的力量。

文章登出來後，反應熱烈，大概讀者感覺新鮮。不久，我就聽說毛澤東表揚了，但原話究竟是怎樣說的，沒有人向我正式傳達。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應屆大學畢業生的大會上也推薦了我的文章，我猜想這是因為毛澤東已經表示了這樣的意思。

多年以後（一九七六年），日本學者竹內實寫了一篇分析《桌子的哲學》的論爭的長文，其中猜測我可能是受法國存在主義者薩特的影響。其實我是受馬克思啓發。我的文章裏有馬克思在《哲學手稿》中的觀點，也有《資本論》中講人的勞動和動物不同的觀點。馬克思說，人的勞動比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於：人在勞動之前就已經在頭腦中把產品構成了。

毛隨後也指出了我的文章中他認為不準確的一處地方：「人和動物不同在於人有主觀能動性。」毛認為，動物也有主觀能動性。後來我想起毛在《論持久戰》中說，人與物不同在於人有「自覺能動性」，這很對。於是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條「補正」。我認為毛的提法比我的更符合馬克思的觀點。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批評了《人民日報》不重視理論後，《人民日報》加強了這方面的版面，副總編輯陳某自告奮勇兼任理論部主任。他從來稿中挑了一篇反對我的觀點的文章發表了，說想引起討論。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桌子最初是人在偶然中做出來的；只有在桌子做出來後，人們才能產生做桌子的計劃。作者認為我的觀點是：人做出來的桌子，和他事先的桌子觀念是完全一樣的。但我在文章並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這以後，果然來了幾百篇討論的稿件。多數是支持我的觀點的，但理論版上發表出來的稿子卻多數是支持相反觀點的。這時傳來了毛的指示，授意我再寫一篇文章。毛把這意見告訴吳冷西；吳冷西並沒有直接告訴我，而是讓陳某轉告我。但陳某沒說清毛的意思，我要求他解釋，他解釋不出來。直到後來《人民日報》內參上登出來毛的原話，我才弄清楚，毛的意思是：

桌子是人造的。人從土墩、石頭一類的東西得到啓發，產生了做桌子的設想；在做桌子的實踐中，這個設想會得到修改和補充，而做出來的桌子，又會和原來的設想有所不

同，使桌子的觀念有所發展。然後人們又會根據這個修正和豐富了的觀念去做新的桌子。如此循環往復，不斷發展。若水同志可以再寫一篇文章，加以補正。

我這才明白，毛的意思是，我原來的文章沒有說到人們做出來的桌子，和他事先有的觀念可能不完全相同，這會使讀者誤解。我只說了做桌子的設想或觀念對做桌子的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沒有說做桌子的實踐和做出來的桌子反過來也會修正或補充原來的設想和觀念。這是不完全的。毛澤東指出這一點很重要。

我開始寫文章。覺得一篇文章說不清楚，於是分成兩篇文章。第一篇以飛機的發明創造為例說明人的創造，補正我的觀點。第二篇從理論上反駁批評我的觀點——主要不是針對《人民日報》上那篇文章，而是以楊獻珍一派的觀點為對象。

兩篇文章先後送到陳某那裏。他要求我在文章中承認錯誤，不要再反駁。我不同意，他就壓住文章不發。到一九六四年四月，他說，形勢變了，現在要批判楊獻珍了。我說，我的第二篇文章就和批楊獻珍有關啊。他還是不理。

這兩篇稿子始終沒有登出來。第一篇稿子也遺失了。第二篇我後來做了修改，收入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我的文集《在哲學戰線上》。

幾年以後，有同事對我說：「你爲什麼當時不把這篇文章直接寄給毛主席啊？」我想也對，毛主席指示我寫補正，《人民日報》不發表，我爲什麼不告到他那裏去呢？但

是，這時已經事過境遷了。

「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是毛的指示，但楊獻珍一直強調是康生的主謀。康生當然有意這樣做，但以楊獻珍在黨內的地位，要公開對他進行批判，沒有毛的點頭是不行的。我以為毛有兩個原因不喜歡楊獻珍。一是楊獻珍在中央黨校講哲學課，只捧着一本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很少談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楊獻珍被撤職以後，他的繼任者林楓吸取教訓，把讀毛著列為中央黨校的首要任務）；二是楊獻珍在一九五八年說了不少批評「大躍進」的話，說「衛星田」是「唯心田」等等。

但是，毛選擇這樣的題目批楊獻珍，卻有些自相矛盾。本來，把矛盾說成是「對立統一」，是完整的表達，就是說有分有合，「分」是對立，「合」就是統一。楊獻珍並沒有用「合二而一」來否定「一分為二」；毛卻用「一分為二」否定了「合二而一」。這樣，在否定楊獻珍的同時，毛也否定了他自己，因為《矛盾論》反覆講過矛盾既有鬥爭性又有同一性，而且毛和斯大林的主要哲學分歧在於斯大林只講鬥爭不講統一。如果說楊獻珍以前不承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錯的，那麼他現在講「合二而一」是對過去的觀點做一些彌補，為什麼還要批評呢？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毛過去並不反對「合二而一」，甚至是贊成的。批判楊獻珍之前，《人民日報》那位副總編輯兼理論部主任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短文，開頭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後面就講到事物不僅是一分爲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批「合二而一」後，人們問那個副總編輯：「爲什麼你的觀點和楊獻珍的一樣？」他說，他聽范若愚說，毛主席講不僅有「一分爲二」，還有「合二而一」，這才寫那篇文章的。范當時是《紅旗》的副總編輯，在釣魚台參加寫反修文章的班子，接近中央最高層。這件事應該是真的。那麼，毛的觀點爲什麼改變了呢？

我認爲，毛澤東的突然轉變，並不是基於理論上的認識，而純粹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除了他早已有意整楊獻珍外，當時中蘇論戰正酣，在赫魯曉夫提出「全民國家」、「和平共處」等口號後，蘇聯哲學界一些代表人物如米丁、費多謝也夫等人提出了「對立面可以融合」（這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過的）等論點，爲赫魯曉夫的政策提供哲學辯護。毛既然要在政治上批判赫魯曉夫並和蘇共分裂，他也需要批判「融合」論，他認爲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和「融合」論是一致的。

毛最早使用「一分爲二」這個表述，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他說，「其實我們的支部書記是最懂得辯證法的，當他準備在支部大會上作報告的時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寫上兩點，第一點是優點，第二點是缺點。一分爲

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四九八頁）這裏暗地批評赫魯曉夫不懂辯證法，沒有對斯大林「一分爲二」，其水平還不如中國的一個支部書記。這裏的「分」，還是「分析」的意思。

一九六三年，毛在審閱周揚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一文時，加進了幾句話：「世界上無論什麼事物，總是一分爲二，學說也是這樣，總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學的學說，就一定會在其內部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它的對立物，產生反革命的、反科學的學說。……這個理論早已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和各個社會科學的歷史所說明了，也爲自然科學的歷史所說明了。」這裏的「分」，已經變成「分化」的意思了。

當「合二而一」的問題還在報紙上自由討論、兩種意見都發表時，其實已經在爲批判作準備了。當時康生直接領導《人民日報》的理論宣傳，而他直接從毛那裏接受指示。初期，有不少人認爲，「一分爲二」是分析，「合二而一」是綜合，不能只要分析不要綜合；還有人說，水不就是氫和氧化合而成的嗎？這只能用「合二而一」來解釋；單提「一分爲二」，不提「合二而一」，是片面的。這種觀點肯定使毛不高興，因爲這等於說，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是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分爲二」的一種補充，糾正了毛澤東的片面性。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淺評關於「一分爲二與合二

而一」的討論》。作者是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姚伯茂。姚提出，區別兩類矛盾：一類是針鋒相對，水火難容的，解決辦法是通過激烈的鬥爭，一方消滅另一方；另一類矛盾的解決辦法不是這樣，而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相互促進，合二而一。後一類矛盾的例子有紅與專、革命精神和科學態度、勞與逸、工業與農業等。

據康生說，毛澤東當天看到這篇文章，就把他叫去，問他：「看過這篇文章嗎？」康生說還沒來得及看，毛還批評了幾句。毛說，你是管這件事的，這篇文章怎麼能不看？毛說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麻煩問題，不好辦。這表明毛的確感到單講「一分為二」，理論上有些問題說不清。他開始考慮到了這個難題。

但毛並沒有重新審查自己的觀點的意思，他只是要尋找一種論據來為自己原有的觀點辯護。他指示收集一些論分析與綜合的材料給他看。

八月十八日，毛找幾個哲學家談話。他說，歷來講分析、綜合，講得不清楚。分析比較清楚；綜合沒有講幾句話。毛企圖把這個問題闡明。分析好辦，就是「一分為二」；那麼，綜合如果不是「合二而一」，又是什麼呢？

毛說，綜合就是「一個吃一個，大魚吃小魚」。他舉國民黨和共產黨打仗為例，說「就是這麼綜合的：他的軍隊來，我們吃掉，一塊一塊地吃。不是兩方面和平共處地綜合」。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說綜合就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聯合在一起。「世界上有

什麼不可分割的聯繫？有聯繫，但總是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毛澤東在這裏忘掉了他自己在《矛盾論》中講的矛盾雙方的「互相依存」、「互相合作」，「失去了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就以國共兩黨為例，國民黨和共產黨並不是一直在打仗，而是有過兩次統一戰線。即使在打仗時，雙方也不是毫無聯繫地隔離得遠遠的；不然怎麼打得起來？

關於氫和氧化合成水的問題，毛引用北大化學教授傅鷹的話說，氫和氧要經過千百次的化合才成爲水，並不是簡單地「合二而一」。其實，這只說明氫和氧的「合二而一」有一個複雜的過程，並不說明這不是「合二而一」。

就在這次談話的結尾，毛指示《紅旗》寫一篇關於「一分爲二」與「合二而一」討論的述評。

《紅旗》的評述題爲《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關於楊獻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的報道》發表在一九六四年第一六期發表。這篇文章很好地體現了毛的觀點，一上來就說：「一分爲二」和「合二而一」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這場論戰是「當前國際國內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在意識形態上的一種反映」。接着說，國際工人運動同世界上任何時物一樣，總是一分爲二。後面說，楊獻珍宣揚「合二而一」，是「幫助現代修正主義宣傳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傳矛盾調和論」，也是適應國內敵對階級的需要，「對抗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

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接着，一場正常的學術討論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批判運動。

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關於坂田文章的談話》中，毛說：「雙十條第一個十條前面那一段（即《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我寫的。我講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我還講了哲學要從課堂書齋裏解放出來。我這些話觸到了有些人的痛處，他們出來搞『合二而一』反對我。」

我不相信楊獻珍講「合二而一」是反對毛澤東的。我認為毛之所以批「合二而一」，並不是出於理論上的考慮，而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第一，他在政治上不喜歡楊獻珍，這一點我在前面說了。第二，更重要的是，他要為同蘇共分裂做理論上的辯護。這一點在《紅旗》的文章中表現得很清楚。

但在當時，我自己的思想是不清楚的。討論「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我是積極的；批判「合二而一」，我卻不那麼積極，因為自己覺得沒有想通。那是一場全國性的大批判，工農兵學商一齊上陣，聲勢浩大。我在那種壓力下也寫了一篇文章。八十年代初，重新討論楊獻珍的哲學觀點時，我承認了這個錯誤。

批判「合二而一」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一個轉折點。從此他雖然還講「對立統一」，

但講得比較少了，更多的是講「一分爲二」，而且似乎所謂「對立統一」，就是「一分爲二」的意思。以前，他由於政治上的需要批評王明「一切鬥爭，否定聯合」；批評斯大林只講對立面的鬥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說「對立面的這種鬥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繫不起來。」現在，他用「一分爲二」來否定「合二而一」，也走上了同樣的道路；發展到後來，就成爲指導「文革」的「鬥爭哲學」。

「文革」初期

吳冷西在一個時期頗受毛澤東的賞識，成爲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秘書，列席政治局會議，也在起草反修文章的寫作班子裏起了重要作用。但「文革」前夕他失寵了，具體原因我不清楚，只記得毛批評的幾句話：「『三十而立』，你三十未立；『四十而不惑』，你四十半惑；五十要知天命。」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離開北京到外地去準備「文革」，這件事吳冷西是毫無所知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登出來時，《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人都不理解它的含義，對這篇文章反應冷淡。《文匯報》有人到《人民日報》來，以「串門」的形式找熟人閒談，探聽大家對姚文元文章意見。我感到她的到來是有「任務」的，但還是忍不住向她指出了姚文對古書斷章取義的地方。（後來我才知道，在上海，曾經採取

「引蛇出洞」的辦法，對一些發表了與姚文元觀點不同的學者大加批鬥。）到後來，形勢越來越緊，才覺得實際上是《文匯報》在領導潮流。《人民日報》落後了。大家都很困惑不解。

一九六六年初的一天，吳冷西找我，要我寫一篇批評吳晗的文章。他詳細口授了這篇文章要講些什麼內容，我記錄下來，整理成文。文章寫出來後，他又作了很大的修改，並把題目定為《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我覺得這不能說是我自己的文章，就署了一個假名。吳冷西想用這篇文章來扭轉《人民日報》的被動局面。

那時周揚的處境也很困難，爲了避免落後挨打，他也組織了中宣部的人寫了一篇批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署名方求。我覺得這篇文章比姚文元的好得多。

無論是吳冷西還是周揚都想用自己組織的文章來超過姚文元的水平，但都沒有能給自己幫忙。大概他們都覺得姚文調子太高，說理不夠（如說吳晗寫《海瑞罷官》是「爲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復辟開路」），想要避免這些缺點。他們都不知道姚文元的文章後面站着江青，而江青後面站着毛澤東。當時的趨勢是提高批評的調子。毛後來還說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打中要害。

後來毛曾問到：「爲什麼王若水、李希凡沒有發表文章？」吳冷西後悔地說，那篇文章用真名就好了。李希凡和我都趕緊寫批判文章，但由於思想跟不上，文章都沒能發表出

來。

吳冷西像一個斷線的風箏，失去了和中央最高層的聯繫。《人民日報》越來越落在形勢的後面。一九六六年五月底，毛派陳伯達領導一個工作組進駐了《人民日報》。

那天，《人民日報》編輯部部主任以上的幹部被召到中南海。先是鄧小平傳達中央的決定。鄧批評了幾句吳冷西，但很溫和。對《人民日報》內部批判吳的大字報，鄧說：「大字報要貼就讓他們貼，不要到處貼，弄一間屋子專門貼大字報。」接着康生講了幾句，主要講毛對吳的批評，要吳「換腦筋」。陳伯達最後講話，語調最重，說：「如果不換腦筋，人也要換掉。」聽說陳伯達和吳冷西早有矛盾，陳伯達大概想借此機會整吳冷西。

陳伯達召集全報社職工開會。一開始，他說：「工人同志來了沒有？怎麼你們不坐在前面？坐到前排來呀！」

接着，他一字一字地對編輯部的人員說：「你們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正在改造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這句話令我們大惑不解。在座的編輯和記者大部分是黨員，有的還來自延安，可是都被這樣定性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這是毛澤東的思想。

編輯部的多數同志一直對吳冷西的官僚作風不滿，又對《人民日報》竟然落後於《文

匯報》這樣一種形勢有氣，於是紛紛起來對吳冷西「造反」，大字報貼得很多。吳冷西終於被撤掉了。毛後來說：「陳伯達的掃帚不到，吳冷西的灰塵照例不會跑掉。」

陳伯達主持了一個短時間的報紙工作，扭轉了《人民日報》的被動局面，也就是讓《人民日報》轉到了極左的立場上來。後來他就不那麼具體管了，讓工作組的另一個成員，原《解放軍報》的總編輯唐平鑄負主要責任。毛說，他不贊成《人民日報》「另起爐灶」，所以編輯部的領導班子，除了吳冷西等幾個人換下來外，沒有全盤大變動。毛指示：《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同志，三分之一下鄉勞動，三分之一搞調查研究，三分之一工作。這樣《人民日報》在「文革」中不像其他單位那樣亂得無法工作，能每天堅持出報，沒有間斷過一天。

因為我究竟是受過毛表揚的人，在運動初期還受到工作組的信任。陳伯達同我和李希凡談話，給予「鼓勵」。

我的內心展開了激烈的思想鬥爭。長時間內，我隱隱感到鄧拓那首《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的詩流露了一種不滿的情緒。批判「三家村」時，報社有些大字報提到了這首詩對報社人員的影響，但沒有提到這一點，大概他們沒有看出來。鄧拓對我很好，我不忍揭露他。但是我又覺得，這是對毛主席的不忠誠，是辜負了毛主席對我的關懷，爲此又譴責自己沒有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終於，我寫了一個材料交了上去。不久，《紅旗》雜誌的

林杰在一篇文章裏引了這首詩。我聽說毛看到後很震驚。一九五七年他批評《人民日報》編委會不起來造鄧拓的反，想不到報社的人居然還和鄧拓「風雨同舟」！

今天談到這件事，我的內心是很負疚的。當時我也負疚，但負疚的不是揭發這個行動；恰恰相反，我悔恨自己的動搖和對毛的不忠，因為循於私情而遲遲不揭發。儘管這樣，我還是沒有揭發鄧拓說的那句「將來歷史一定會做結論的」！回過頭去看當時的我，真是哭笑不得。那是一個愚昧的、異化的我，而自己還以為是回到了正路。

我擔任了一個短時間的社論組組長。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毛在長江游泳，唐平鑄同我一同起草了一篇社論。社論題目《跟着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是我擬的，後來這句話流行開來了，我還很得意。那時我對毛崇拜得五體投地，決心投入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革命」。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批評說，「派工作組是錯的」。可是，「文革」中第一個工作組——駐《人民日報》工作組，就是他本人派的。當時我並不覺得毛出爾反爾，而是認為《人民日報》這個工作組和別的工作組不一樣，是發動和支持群眾起來「造反」的。事實上也是如此。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人民日報》一些同志參加了，我也在內。會上，周恩來傳達毛提出的「文革」

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並正式宣布撤銷所有工作組。劉少奇、鄧小平也在會上講了話，承認自己在領導這場運動中的錯誤。劉少奇說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正當劉少奇在台上講話時，周恩來宣布：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來了！毛從後台走出，馬上成了注意的中心。全場起立，掌聲雷動。「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此起彼伏。劉少奇的講話中斷了好幾分鐘。等他繼續講時，聽眾對他的講話已經不怎麼感興趣了。現在想起來，是毛有意安排了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場面，突出自己而壓倒劉。

我在《人民日報》多年，常常感到一種壓抑。我覺得我的能力沒有發揮出來。我喜歡鑽研理論，可是上級對我的愛好不感興趣，他們只要我完成組稿任務。有時我應別的報刊之約撰寫發表一些文章，他們就批評這是「名利思想」。作爲一個黨員，每次整風或總結工作，在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時，總要加上一大堆罵自己的話，什麼對不起黨啦，辜負了黨的信任培養啦。有時上級對我的批評明明是錯的也不敢反駁。我對他們的官僚主義作風和架子十分反感，但是不敢批評。現在，毛主席說，「造反有理」，「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我覺得解放了，我可以貼大字報理直氣壯地批評領導了。而且我還不必擔心報復，因爲大家都這樣做。終於，報社領導被撤換了。

那時，我對文化大革命是熱烈擁護的。

毛澤東巧妙地利用了群衆對官僚主義的不滿情緒，煽起了一把大火來燒所謂「以劉少

奇爲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毛寫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我極爲欣賞。短短二百多字，義正詞嚴，氣勢磅礴，音調鏗鏘：「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我反覆念這篇好文章，直到能背下來。至於劉少奇是不是真的如大字報攻擊的那樣，卻不多想了。

後來，戚本禹發表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說：什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我讀到這裏大爲驚訝：儘管劉少奇執行了反動路線，可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怎麼能給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呢？實際上，戚本禹不過是轉述毛澤東的話而已。據毛的醫生李志綏在一次接受訪問時說，毛那次在後台聽到劉的話就說了這樣的話。毛說這樣的話有證據嗎？毛不需要。對毛來說，不是根據證據來定罪，而是先定罪然後尋找證據，找不到就製造。毛哪裏是因爲劉少奇要復辟資本主義才要置劉於死地呢！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國文藝界的造反派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周恩來和陳伯達先後讚揚了江青對文藝革命的貢獻，接着由江青講話。那次會唐平鑄也參加了，坐在主席台上。他回來後說，那天其實毛也去了，是他上廁所時發現的。他走到後台，先看見了當時老跟在毛身邊的那個小護士，隨後看見了毛坐在那裏。毛是不是

還準備了適當時到前台去露面而後來放棄了這個打算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文革」初期，儘管「十六條」（《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上規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但與此同時又說「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所以打人事件發展得很快。離《人民日報》很近的王府井大街東風市場派出所，一個時期天天發生紅衛兵打死抓來的「四類分子」的事件。毛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很嚴重，說對打人要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過去打了，以後不打就是了。」這個話江青也照本宣科地講過。後來打人事件越來越嚴重。北京市大興縣和昌平縣都發生消滅整個村子的地富家庭嚴重事件。這時才聽說，毛生了氣：「我還有最後一句話：『過去打了，以後不打就是了』，怎麼不宣傳？」

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號召奪權後，《人民日報》的一派組織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奪了權。我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大概因為我寫過幾篇理論文章）的帽子，被勒令勞動。後來王力為我講了幾句話，就停止對我的批鬥了。不久，我參加另一派組織，這派組織也自認為是真正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造反派，但被對方稱為「老保」。我當時確實充滿革命的激情和理想，想投身這場運動，在大風大浪裏跟着毛主席游泳。現在看來，我夠左的了，但當時總被批評為「右傾保守」，這使我很苦惱。其時，對立的兩

派都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一派強調「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派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

批左批右之爭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動搖了我對毛的迷信。我們都震驚不已，並開始思索，毛爲什麼要選這樣一個人做接班人？是不是因爲他大搞對毛的個人崇拜？

「批林整風」開始時，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所謂批判，其實是「聲討」。接着中央發下來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戰爭期間的「遼瀋戰役」的軍事路線。這也很快結束了，下一步批什麼，不清楚了。

林彪一完蛋，政治局裏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垮台了，這是一大片。周恩來變成了二號人物。毛顯得很信任周的樣子，什麼事都要周來管，包括委托周恩來管《人民日報》。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個最強壯的人壓垮的。

這時的《人民日報》裏，唐平鑄已被打倒了，當年陳伯達率領的工作組中的其他人也先後垮台了，或是回原單位了，只剩下一個魯瑛。魯瑛在工作組成員中名列最後。《解放日報》的群眾組織曾想把他揪回上海去批判，張春橋不同意，留下了。以後成了《人民日報》的實際負責人。本來《人民日報》的人不了解他，對他並沒有什麼偏見。可他一旦成

爲負責人，笑話百出。上台講話、念文件，把「釣魚島」念成「鈎魚島」，把「墨西哥」念成「黑西哥」，把「羅馬尼亞」說成「羅馬尼西亞」，把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說成「貝多芬俱樂部」等等。可張春橋、姚文元就信任這樣一個人，只和魯瑛一個人聯繫。張、姚對報紙工作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凡事都往周恩來那裏推。於是一些文理不通的社論稿，也直接送到他那裏去了。周一面改稿一面對魯瑛嘆氣說，「你們以後不要叫我當小學教員好不好？」

周恩來決心改變報社領導無能的現狀。他在一九七二年初指示《人民日報》成立一個臨時的「看大樣小組」，負責最後審閱版面，成員要有「老、中、青」。顯然，周恩來的意思是，下一步就要成立正式領導班子了。

幾天以後，《人民日報》沒有動靜。周恩來給魯瑛打電話，問爲何沒有報名單。魯瑛說，他生了病，所以拖下來了。周恩來厲聲說：「你死了怎麼辦？你死了就不辦報了？」人們都知道周恩來溫文爾雅，可他也有令人生畏的時候。

名單終於定出來並由周恩來批准了。吳冷西是「看大樣小組成員」成員之一，我也在這個小組內。在此之前，他曾寫了一封檢討信給毛澤東。毛批示了八個字：「此件已閱，歡迎進步。」於是吳冷西解放了。

這時吳冷西對我的態度有些轉變了。請我到他家裏吃飯談天。他告訴我，毛讓喬冠華

復出時，曾讓喬讀桓伊的一首詩：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

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

周旦佑文武，金滕功不刊。

推心輔王權，二叔反流言。

毛沉湎於線裝書，常常產生一種時間的倒錯感。似乎他不是處身於二十世紀的、他所締造的社會主義中國，而是回到了古代。他在這裏把喬冠華看做是臣子，也就是把自己看做是皇帝。「文革」期間大反所謂封資修，如果是別人把毛和下屬的關係比做君臣關係，非挨批不可；可是這反不到毛澤東頭上。

周恩來開始採取一些措施，來有限地糾正「文革」的錯誤。第一步是解放一批老幹部。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恩來授意並審閱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其中提出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這篇社論起了很好的作用。

那一年，少數報刊批極「左」，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毛講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批判極左思潮」；而現在又說林彪是五一六的總後台，那麼批林當然要批極左了。

八月一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會議上說：「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

透，右的還會抬頭。」我們聽到這個指示都很高興。覺得周總理講得很及時，應當堅決執行。

一個星期後，張春橋、姚文元對《人民日報》的幾個負責人談話（那次我因病未參加）。主要意思有兩點：一，關於魯瑛。張春橋說：「我說魯瑛弱得很，他在《解放日報》也不是強的。可現在成了這個樣子，只能如此。你們在座的要多協助他工作。」當時《人民日報》正在籌建領導班子，張春橋說這個話就是暗示魯瑛要當總編輯。二，關於宣傳。張、姚說，批左不要過頭。張春橋說：現在有些地方批「精神萬能論」，可是毛主席說過「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有人說林彪是「唯意志論」，不對，他是「唯武器論」。

張春橋，姚文元的講話在編輯部傳達後，大家的思想很抵觸。一是覺得《人民日報》這麼多有能力的人，張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個草包魯瑛，這明明是「任人唯親」。二是覺得周總理明明講了要批左，張姚爲什麼要潑冷水。

用不用魯瑛當總編輯，這實際是讓不讓張姚來掌握《人民日報》領導權的問題；批左還是批右，這實際是要不要糾正「文革」錯誤的問題。在這兩個問題上，周和張姚之間展開了林彪滅亡後的第一次較量。

張姚講話和總理不同，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聽誰的？我當時的思想很明確：堅決批

左；不聽張姚那一套。不久，張姚去了上海。我乘這個機會，利用手中的一些權力，組織了一個版面，批極左思潮，批無政府主義。

這一版捅出去以後，社會上反映強烈。有九家省報隨後也登出了批左的文章。

不久，《文匯報》出了一期內參，報道他們召集上海工人座談《人民日報》的批左文章。奇怪的是這些工人的意見是完全一樣的：都說《人民日報》的文章是把矛頭對着群眾，是批判了「文革」；竟沒有一個人說那文章有道理。

姚文元把這一期內參批給《人民日報》，要我們討論。我們問他，他自己的看法是什麼？姚文元說他還沒有看。我心想，玩這種把戲，誰會上當？我去查閱中央轉發的好幾個省的「批林整風」文件，都說要批無政府主義，有的還說「林彪是五一六的總後台，是極左思潮的總根子」。於是我信心十足。我想，不管張姚怎麼說，我要和他們頂，因為我沒有錯。

從前我對張姚沒有很多了解，但從他們支持魯瑛這件事，我認定他們不是正派人。如果魯瑛當《人民日報》總編輯，這簡直是笑話，也是《人民日報》的恥辱。張春橋、姚文元明明知道魯瑛不行，卻非要扶持他不可，無非因為魯瑛也來自上海，和他們有一點老關係，可以成爲一個忠實的工具，便於他們控制《人民日報》。

這時《人民日報》不少人寫信給中央和周恩來，揭發魯瑛的笑話，提出這樣的人不能

當《人民日報》總編輯；《人民日報》並不缺乏適當的總編輯人選，如吳冷西和胡績偉，爲什麼非要魯瑛不可？

我覺得，告魯瑛可以，但還要告張姚，因爲是他們在支持魯瑛；他們支持魯瑛，和周恩來唱反調，這兩件事都暴露了他們的面目。反左還是反右，這是一件大事。林彪在整個「文革」中都在搞極左，這是無可懷疑的。現在要糾正「文革」的一些偏向，當然要反左。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本來應當反左，毛主席卻提出要反右，弄得出現了三年困難，餓死的人以千萬計。這個慘痛的教訓，毛主席能不吸取嗎？我不相信毛主席會主張反右；可他的意見究竟是什麼，我還要問個明白。

我決意給毛寫信。正在我考慮這個問題時，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我看了大吃一驚，心想，中央還沒有這種提法呢！難道《文匯報》要出來指導批林運動了？我又感到很困惑：《文匯報》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子？

上書惹禍

我花了兩天時間給毛主席寫信。信中我表示贊同周恩來提的批左，同時告了張姚一狀，逐條批駁了他們的論點。

這封信闖了大禍。在後來《人民日報》逼我交出信的底稿時，我悄悄燒掉了。我知道這封信的原件現在還在中央檔案館保存着，但我無法看到。以下是根據我後來的交代和回憶寫的。

毛主席：

現在報紙宣傳面臨一個困惑的問題，就是反「左」還是反右的問題，我想向您匯報並請示。總理在八月一日的講話中，說到極左思潮沒有批透，並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還會抬頭。」這個指示很重要。雖然總理說的是外交部、《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單位的內部工作，可是我覺得也完全適用於宣傳。

在總理講話一周之後，八月八日，春橋、文元同志對報社領導小組講話。在談到宣傳上批「左」的問題時，春橋同志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由於林彪利用批判劉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實右和過了頭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批林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不要重複過去批劉的錯誤。」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是過了頭，還是沒有批透？

我覺得總理的指示是正確的。對春橋、文元同志的講話，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剛剛開始，就提出不要過頭，這是給批「左」潑了冷水。春橋同志為了說

明批「左」中出現過頭的問題，舉了批「精神萬能論」和批「唯意志論」的例子，說主席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說「林彪是唯武器論，不是唯意志論。」我不懂為什麼因為主席講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萬能論」；我認為這是兩回事。我還認為，林彪既有唯意志論又有唯武器論；這兩個東西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蔣介石和希特勒就是這樣。文元同志說，林彪反對黨的領導，這是右。我想，就其表現形式來說，反對黨的領導可以從右的方面來反，也可以從「左」的方面來反。《紅旗》第十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說了這樣的話：「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當時報刊上還沒有公開點林彪的名字——若水注）散布無政府主義，是妄圖從『左』的方面來否定黨的正確路線。」文元同志的話，把這篇文章的正確觀點也否定了。

由於這兩個講話精神不一致，在報社編輯部已造成了思想混亂。我在十月十四日編發了一整版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龍岩（黑龍江省委寫作組）寫的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文章。十一月四日，《文匯情況》第三一二期登出了上海工人座談會的意見，這些意見是一面倒的，而且很尖銳。這是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文匯報第一次在內部情況上批評《人民日報》，而文元同志又特別囑咐我們討論，所以我覺得不同尋常，值得嚴肅地深思了。

對這份情況，我們感到很難討論，因為是工人意見。就在我們討論期間，文匯報陸續出現了一些新的提法。十一月六日的一篇評論說：要反對劉少奇一類騙子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過了幾天，又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類騙子一貫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搞了一點形左實右的東西。十一月二十四日，《文匯情況》第三三五期再次批評了《人民日報》。這一期的內容是《人民日報》反對無政府主義文章對各地的影響，其中包括某些地方報紙提出的有關論點。《文匯情況》沒有直接批評這些論點，但實際上是把他們作為反面論點拿出來示眾的。其中有一條是「反對無政府主義是批修整風的一項內容」。我想，如果這樣的觀點都錯了，那就不是龍岩這一篇文章的問題，而是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能不能批的問題了，不是龍岩的文章有什麼缺點的問題，而是《人民日報》是不是又犯方向性錯誤的問題了。

這些天，我反覆思索了這個問題。我想，劉少奇和林彪的實質都是極右，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就表現形式說，劉少奇有右的表現也有「左」的表現，主要表現為右；林彪有「左」的表現也有右的表現，主要表現為「左」。根據報社記者匯報的情況和來稿的情況來看，在實際工作中，「左」的干擾和右的干擾都有，但「左」的干擾是主要的。將來適當時候，可能需要強調反右，但目前還是需要

強調反「左」。只有克服了「左」的傾向以後才能有有力的反對右的偏向。林彪煽動極左思潮，流毒很廣，批林就要批極左思潮。中央所批發的好幾個省的批林整風文件中，也是強調批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就是極左。因此，我認為批左是中央精神。但是，文匯報的觀點是不是有什麼「來頭」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匯報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子？反過來說，如果是中央精神，為什麼《人民日報》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匯報的觀點是來自主席，因為我想，主席如果有什麼新的指示的話，是不會不向《人民日報》傳達的。正因為這樣，我才向主席寫這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敬祝

萬壽無疆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

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幾個領導幹部，包括我在內，被通知晚上八時到人民大會堂。我們都不知道什麼事，只知道是領導人接見。魯瑛可能誤以為我要受重用了，在汽車裏拍拍我的肩膀說：「若水同志呀！以後《人民日報》的事，你要多發揮作用啊！」

我們先到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廳（記不得是什麼廳了），領導人在隔壁一間房開會。接見時間比預訂的推遲了半個小時，顯然是領導人在討論什麼問題並沒能及時結束。待到他們走出來時，我看見是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汪東興，都是政治局委員。

周恩來和藹地和我握手，但我發現張、江、姚三人都繃着臉，怒形於色。

我坐在靠近周恩來的地方。周恩來問我是什麼地方人、哪個大學畢業的、什麼時候參加革命，等等。後來，他看大家都已坐定，就轉入正題：

「收到了王若水同志的一封信，主席批給政治局辦。還有《人民日報》理論部的和別人的，都聯繫到你的問題，就是左右問題。」

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這時我注意到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面前擺着一些信件，我的信也在其中，他們正在翻來翻去。我想，糟了，這封信是告張姚狀的，怎麼轉到了他們手上呢！

後來我聽說，毛對政治局委員談到了我的信，說：我認識這個王若水，他寫過《桌子的哲學》；他在信裏提出批極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

周恩來接着解釋了幾句他在八月一日的講話，說那是講外交和工作上的一些問題。至於林彪的路線，那是右到了極點了，不能說還有左的方面。但是，中央報紙上出現過這種提法，我們沒有指出，我們也要負責。周在這裏提到，「江青同志講我們務虛不夠」。當

然林彪也要利用群眾的極左思潮，搞形左實右，但那只是一段時間，就是六七年的三個月，火燒英國代辦處、香港事件，甚至鼓動出兵。但林彪害怕蘇聯核武器，反對同蘇修鬥爭，實際上不贊成利用美蘇矛盾。周恩來說，他只是看了王若水的信後才去看《人民日報》上的文章，他覺得那是錯誤的，「因為理論上沒有說清楚，聯繫實際也不恰當。」

「現在批林是要批他的反革命，揭露他，這是我們的主要矛頭。」

下面周講了很長的話，概括起來，有如下幾點：

一，關於《紅旗》和《人民日報》的觀點不一致的問題。黨報和黨刊對立起來了，對這件事外電有報道。美國記者說北京的官方報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周說，只要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馬上抓住。外國記者總是要挑撥的，但理論上為什麼讓他們挑撥？周又說，兄弟報紙要互相幫助，《文匯報》提出意見，是在內部情況嘛！要彼此通氣。

二，關於報紙領導班子問題。周說，「現在報紙國際部、理論部都給我寫信。又不是原則爭論，都集中力量攻魯瑛同志。我們覺得不妥當。」「如說魯瑛同志能力弱一點可以，但還是好同志嘛！」「《人民日報》遭遇也複雜。現在要建立一個領導小組。我說你們有些爭權。魯瑛能力弱一些，但維持了困難局面。這次無政府主義文章的問題，他看出來了。」周還提出，《人民日報》對新的同志吸收的不夠。「我們總是希望青年同志多一些，有些朝氣。」關於有些同志要求把建立報社領導班子的情況出簡報送到中央的問題，

周說，「文元同志不同意（姚文元插話：『我是怕你們相互點名，不是怕情況上報。』），我也不同意，因為那樣就亂了。要團結起來。」

周的話，顯得很散亂，缺乏條理性，也缺乏說服力。他本是卓越的演說家，但這次似乎變得平庸了。我想，一個原因是他究竟老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言不由衷。他講的不是自己的心裏話，而是別人（這些人有毛做後台）的話，甚至自己並不贊成的話，他陷入一種尷尬的局面。

周最後說：「我開個頭，你們三位講吧。」

張春橋說：「他們講吧。」

於是報社軍宣隊負責人和魯瑛講了一些話。魯瑛講話時，周恩來多次用插話打斷他。如魯瑛說到，他現在的辦法是，遇上報紙上出現批左的字樣，就刪掉。周說：「那也不是辦法。如果實際上是極左也不能刪。」

輪到我時，我講了如下的意思：

總理「八一」講話，是講的外交問題和單位內部要批左，但我認為，這也適用於宣傳。這是我的責任。林彪問題，我想過很久。現在中央提出林彪路線的實質是右的，這一點大家容易理解。現在的問題是它的表現形式是否也是右，或者表現為極左，也就是「形左實右」？林彪陰謀政變，這是極右，但這只能是暗中策劃，見不得人；一公布出來，就

完了。這是一個揭發和聲討的問題，沒有什麼可批判的。欺騙性大、流毒也廣的是林彪搞極左，這才需要深入批判，肅清影響。一九六七年主席講過「批判極左思潮，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毛主席也講過批判無政府主義，中央文件上也多次講到批極左。

講到這裏，我翻開了我的筆記本。念了三個中央文件中的關於要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提法，還念了中央一九七二年第三一號文件說的「『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總頭子就是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總根子還是林彪」。

然後我說：當前左右兩種干擾都有，問題是哪個方面是主要的？對形勢如何估計？是不是可以說：左的干擾是主要的，右的也要注意；只有認真糾正了左的錯誤才能很好地反對右的錯誤。批林以來，報紙上出現的批左文章較多，這是一種自然趨勢，因為大家感到，實際情況中左的危害大。最後，我提出自己不能勝任這個工作，要求以後不再看大樣。

我這一番話可能使張、江、姚感到意外，因為我不但沒有做檢討，還提出了問題。我講完後，江青講話了。她一講，音調就提高了八度：

「你組織的這篇文章矛頭是對着群眾！對《人民日報》的這篇鬼文章，我也勉強看完了。這不是對着林彪，是對着群眾。林彪路線是極右；至於在某一個時期，利用形左實右，那同時也是極右。我對《人民日報》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個感覺，這封信不管動

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挑撥作用。我看了很不高興。拿着總理在某一個場合的講話來利用。好像春橋、文元同志和總理鬧別扭。我認爲太過份了。怎麼可以把兩個政治局委員和一個政治局常委對立起來呢？」

周恩來講話時，儘管是批評我，甚至還說到毛澤東不同意我的信，但我並不感到緊張。因爲周恩來很明確地把我的「錯誤」看成是「認識問題」。江青一講話，調子就提高了，什麼「矛頭對着群眾」「挑撥中央」這些帽子都很大，變成立場問題了。我感到，她的這些話連周恩來都感到意外。本來，今天在接見我們之前，他們已經進行了討論，因此應該用一致的調子對我們進行談話，可是江青不管這些，這是存心使周恩來尷尬。於是，在這之後，周用插話的辦法，把他的調子也提高了；但如果稍加注意，仍可以聽出微妙的區別。

江青繼續說：「我今天還收到一封信。是理論部的部分同志寫的。還有另外幾個口袋。都是對魯瑛進行人身攻擊。當然我不是說魯瑛你這個同志沒有缺點。我也有官僚主義，沒有看。」

姚文元插話：「有的信那樣寫，簡直少有。簡直把一個人說得一塌糊塗。只有黃色小報才那樣寫。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說過，論戰可以，但這種手法我不欣賞。」

周恩來插話：「第一，你對形勢的估計不對。第二，怎麼能把我們對立起來呢？」

姚文元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全身埋在沙發裏，一只腿蹺在沙發扶手上。他喜歡插話，輪到他講時，話卻不多。他說：「我同意周總理、江青同志的分析：林彪是極右。我原來一片好意，我都不講。我一到上海就聽說對《人民日報》的文章有反映。我都把《文匯報》的內參批轉給你們了。」

張春橋：「怎麼能設想工農兵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呢？上海工人對這篇文章的意見可大了。我爲了維護黨報的威信，一句話都不敢說……」（張姚都在這裏撒謊。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工人揭發：以《文匯報》名義召集的那個工人座談會，完全是張春橋授意的，調子也是他定的。）

張春橋繼續說：「我沒想到底下的群眾有那麼多意見。你也不能低估群眾的覺悟。一方面說，無政府主義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方面怎麼能說群眾搞無政府主義（原文是說林彪煽動群眾搞無政府主義）。林彪怎麼會有那麼多群眾？那麼多群眾會接受林彪路線？這樣一個基本估計都沒有了？這是極右！」

姚文元：「標題特別大，很少有。我也有這個經驗：用大標題，說明編者要提倡這個東西。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新聞是有階級性的。」

周恩來：「說嚴重些，是適合敵人的需要。」

姚文元：「主席最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漆黑一團，還是略有光明？」

張春橋：「搞理論工作的也不到群眾中去。以爲天下都是搞無政府主義……」

姚文元：「主要問題是把無政府主義同林彪聯繫起來，同巴枯寧聯繫起來。我不贊成無政府主義。我看過無政府主義的一些書，早的不了解，我看過巴金，他不要群眾，要搞暗殺。難道幾億群眾也是這樣的？」

張春橋繼續講話，他針對我提出的四川文件的問題，解釋說：「四川文件主要是要糾正梁興初批極左，轉移大方向。爲了照顧參加批極左的同志，才說了那麼幾句。如同你在總理、文元同志和我之間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樣，在中央文件中找空子也是不行的。你這個人真有意思，在總理身上找根據，在中央文件中找根據。」

我心想：林彪是不是極左思潮的總根子，批林是批左還是批右，這是大方向問題，原則問題，怎麼可以爲「照顧」什麼人而隨便改變說法呢？如果可以照顧四川參加批左的同志，爲什麼不照顧照顧我呢？不根據中央文件辦事不行，根據中央文件又說是「找空子」，到底我該怎麼辦？總理是中央領導人，從他的話中找根據有什麼不對？就算錯了，從中央文件中找根據也不行嗎？

周恩來：「我看了外電。就說不要等了，明天晚上就開會。」

姚文元：「另外我要說明，同志們對我提意見，我還是歡迎的。當然有些原則問題我要堅持，如無政府主義，我採取幫的辦法。敵人千方百計挑撥我們。毛主席說三條，希望

你們在工作中堅持。」

江青：「我也想念一小段，看敵人怎樣說我們。洛杉磯時報，標題是《北京的官方報紙走着不同的道路》。……」她念了那一段，大意是：《紅旗》支持紅衛兵，而《人民日報》維護老幹部。念完後，她說：「敵人很注意。我不知道《人民日報》有什麼問題。」江青和張、姚都把西方報紙的記者稱爲「敵人」。

周恩來：「主席認爲你這封信是不好的。這篇文章不對，你的信超過了這篇文章。當然你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寫了一篇比較好的文章——《桌子的哲學》。」

下面姚文元提到我的信對「唯意志論」的批評，他剛開了頭，張春橋把話接了過去：「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一大段話，其實那些話也不是我的……」

我吃了一驚：不是張春橋的，那麼是誰的呢？糟糕！我批到毛主席頭上去了。難怪張春橋對我引用中央文件表示藐視。中央文件算老幾，尙方寶劍在我這裏呢！

周恩來也提到毛的某一次講話，他說：「主席說，舊的心理學分知情意，其實是一個東西。」姚文元：「蘇修罵我們是『唯意志論』，我們爲什麼要用敵人的語言？主席還說，我們坐在這裏講話，難道只有思想，沒有意志、感情？」

周恩來：「主席還要我們讀《傳奕傳》，主要是提倡主觀能動性，不吃藥。」

江青嚴肅地對我說：「恐怕你要在中央面前把這個問題講清楚。這篇文章起了很不好

的作用。批林到底是批什麼？黨報是指導全國的。它這一版有三篇文章，這麼一整版，都搞這個東西。」

汪東興一直在會場內外跑來跑去，雖是政治局委員，卻像個打雜的。這時，他講了一句，整個會見中他只講了這一句：「這三篇文章是互相配合的。」

張春橋：「這個問題《人民日報》還是要討論。這封信反映出來，不是王若水同志一個人的問題。這究竟是個什麼問題。其實林彪的實質中央文件反覆講了，可見沒有很好學習。王若水同志在信裏說，究竟表現形式是什麼？我認爲林彪只是有些時候表現爲極左，但從主要方面看，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江青：「文化革命有些左的東西，他就利用嘛！」

姚文元：「還是應該看主席在廬山會議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主席講的先驗論，最能抓住問題的本質。」

周恩來：「你是研究哲學的，要好好看看。」

張春橋：「不要搞很多名詞。我講過，不要批林彪的閉關自守。林彪家裏的東西都是洋的。編輯部的同志不知道工人農民在想什麼。剛才魯瑛講到教育革命的問題，有人說一代不如一代，這是九斤老太的思想。提出這個問題的罪魁禍首是我。我本不想宣傳，可一到上海，到處都在議論，無非說青年不好，文化水平低，等等。這不是批評文化大革命？

這不是算那幾年停課的帳？當時我正在讀魯迅的九斤老太。我說怎麼七十年代還是這個爭論？考試不及格，那個自來就有；但政治覺悟就是比過去高。老師在課堂教認字，說『財』就是『發財』的『財』，學生馬上站出來指着他說：『你反動。』」

姚文元：「現在家裏的孩子經常說：『你反動！』」

張春橋：「老中青要結合，但希望在青年。主席接見一千萬紅衛兵，我相信他們絕大多數會跟主席走的。」

姚文元：「報紙還有一種說法，講魯瑛是從上海來的。不應該這麼講。上海來的有好人也有壞人。陳敢峰、王維國也在上海嘛！」

周恩來：「但不管怎樣，上海工人是好的。」

張春橋：「成立文攻武衛時，向主席寫了報告，還問了問：發不發槍？主席想了一下說：你先不發槍，發棍子吧。」

周恩來（對着我）：「你是不是因為受了衝擊，有怒氣啊？」

我說：「沒有。」

「有一點吧。」周恩來溫和地說，「有一點也不好。」

以下是吳冷西講話。他說今天的會使他受到很大的教育，又談到報社領導班子的問題，一個版和一封信的問題，說王若水同志應當看做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好好檢查，吸取

教訓。說到魯瑛時，吳冷西說：「他的工作很不容易，如果我來，肯定會犯更多的錯誤。」

姚文元：「我也急了一些。總想先有個班子，沒想到醞釀出這麼多問題。」

江青：「《人民日報》批林大概是批得不好。如果批得好，就不會有這些問題。這些信是這個意思：原來的班子很好，就是魯瑛不好。這樣好像原來的班子沒問題，那麼爲什麼過去那麼多封資修？」

姚文元：「你們不批林，現在看起來後果很大。《人民日報》是否還有什麼別的問題，我不敢說。」

大概是看到我一直沒有承認錯誤，江青重複說：

「王若水同志，你還有什麼話，都說出來，在中央面前講清楚，不要隱瞞。」

我懂得這個話的含義：江青是希望我扯到周恩來頭上去，畢竟周恩來講了批左。我如果這樣講了，江張姚都會高興，雖然會在表面上批評我幾句。

姚文元進一步點到了關鍵：「在階級鬥爭這個時刻，你站到了哪裏？」

我沒有說話。

周恩來轉移了話題：「魯瑛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魯瑛吞吞吐吐地講到了他的工作難做，幹不了，夜裏還哭過，處理稿子發生爭論，他

也頂不住。

看到魯瑛提出幹不了的問題，張春橋感到不能不表態了，他說：「對兩位同志的精神狀態，我認爲不好。王若水同志你向主席寫信，完全是可以的。但既然寫了，正確與否，就可以討論。你卻提出不能看大樣了。爲什麼這樣提？沒人這樣提嘛！對魯瑛我也不滿意。現在叫吳冷西同志來主管，是不切實際的。他身體不好，又脫離了一段。這樣子叫他去，非犯錯誤不行。總理和我們都是支持你的；你爲什麼打退堂鼓？」

周恩來（對魯）：「我看你留一個時期有好處。」

張春橋：「我總覺得《人民日報》內部有一股勢力，一股邪氣，容不得外面的人。」

周恩來（對王）：「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你就要在自己的崗位上改。」

周恩來繼續說：「如同王若水同志剛才講的，我那天不是講整個工作，只是講外交工作。主席前天晚上說，現在批判極左要少一些。我也想到外交上要注意。因爲聯合時期容易出現右的偏向。國際問題上是這樣，國內更是這樣。王若水同志你是搞哲學的，應當搞清楚嘛！你的這封信一是把報社說得漆黑一團，一是從中央找漏洞。主席批交政治局處理。共產黨員要有勇氣承認錯誤嘛！你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

江青：「不能對中央同志的講話斷章取義……」

周恩來：「我講得也可能有不恰當。」

江青：「不能這樣。不管主觀動機如何，客觀效果很不好。」

魯瑛說了一句：「報社還有人說，十一次路線鬥爭開始了。」

他也許希望這個信息引起注意，但奇怪的是無論是周還是張、江、姚都對這句話保持沉默。將近一年以後，江青在政治局批評周恩來的會上用了「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說法，但被毛澤東批評了。

張春橋談建立領導班子：「報社就在批林問題上分清是非，經過這一場鬥爭，領導班子可能出來。」

江青：「這個版轉移了鬥爭大方向，在全國起了干擾批林的作用。就要從一個版入手，一封信入手，理論部入手，這次不要分割我們幾個人的講話。」江青講的這三個「入手」，後來就成爲報社「揭批」我的方針。

接見到此結束。我們和他們一一握手。我在最後同周恩來握手時，特別把手握得緊一些，同時看着他的眼睛，想趁這短短的一瞬間向他表示我的同情和敬意，同時也努力從他臉上讀出些什麼。但是周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

這次接見從十二月十九日晚八時開始，到二十日凌晨二時結束，整個五個半小時。

毛、周之間

回到住處，我的腦子像是麻木了，倒頭便睡。因為事情太大了，我反而不害怕、不着急了，對自己抱着聽天由命的態度。

真正使我震驚和痛苦的是認識到這樣一個無情的事實：毛澤東不喜歡周恩來。這是我第一次在近處觀察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他們幾個明顯地是在壓周恩來，而周恩來處於守勢，因為他們後面站着毛澤東。

事情清楚了。毛澤東對張春橋（或者加上姚文元）有一次談話。談話的時間，應該是在《紅旗》第十一期付印以後，張姚對《人民日報》談話之前。這次談話內容，沒有向周恩來透露，也只是對《人民日報》作了一點暗示。張、姚跑到上海去的目的之一，就是把這個精神告訴《文匯報》，叫《文匯報》搶在全國之前，首先公開提出批右。這叫做「抓旗幟」，也就是給上海撈政治資本。沒有想到《人民日報》不聽他們的話，偏偏大肆批左，一些報紙也跟着批起左來。這當然使他們大為惱怒。

我當時只是想通過批林，糾正「文革」的一些左的錯誤，並沒有想損害毛澤東。我想周恩來也是這個意思。但毛本人不是這樣想的。他當時正處於尷尬局面。毛和林彪在「文革」期間的關係是太密切了。林的許多東西是來自毛的，或者得到毛同意的，還有一些言論是吹捧毛和「文革」的。因此，批林和極左路線，發展下去，勢必影響到對「文革」的評價，甚至會損害毛本人的形象。這是毛不允許的。毛對批林不積極，但他又不能說不批

林。毛所積極想做的事是整周，但又苦於找不到借口，這時我的信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毛直接批評的是我，間接批評的是周恩來。

這次會見以後，報社領導很快就向全體工作人員詳細地傳達了中央首長的講話，而且是反覆念給大家聽。接着開始了一場大張旗鼓的運動，揭發和批判以我和胡績偉（當時是理論部黨支部書記）為代表的「一股勢力、一股邪氣」。前面提到的那位副總編輯陳某，「文革」初期被當做吳冷西的同伙而被打倒，後來「解放」出來，這時又投靠魯瑛，幫助他整人。他確實很賣力，把這個運動搞得有聲有色，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不消說，我的帽子最多，什麼「漏網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一大堆。批判我的大字報從一樓貼到五樓，大大小小的批判會不知開了多少次，連一些雞毛蒜皮的事也扯出來了，還連累了許多和我觀點接近的同志。這種情況下，一個人是沒有任何隱私的。還好，我在報社多年，大家對我比較了解，挑不出多少毛病。胡績偉更是如此。理論部是重點，結果，由於一個理論部編輯和別人常常一同走路上班，一邊走一邊閑談，於是成了「馬路俱樂部」。這次批判運動聲勢之大，時間之長，來勢之猛，動員之廣，都是《人民日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甚至超過了「文革」初期。

我想，以我這樣一個區區幹部，值得如此大動干戈嗎？他們還有一個大目標呢！

據姚文元說，毛後來有一次在同他談到我的這件事時，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對《人

民日報》的領導幹部的一次談話，說他當時講過漢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毛說，看來他們沒有聽進去，或者沒有聽懂。

漢宣帝一次和太子（即後來的漢元帝，史稱「柔仁好儒」）談話，太子批評他「持刑太深」，建議父親起用儒生。宣帝一聽，變了臉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評了一通儒生的無用，說：「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說完嘆了口氣：「亂我家者，太子也！」

我，還有當年參加會見的報社同人，都不記得毛在一九五七年講過這個故事，只記得毛說鄧拓像漢元帝，「你要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看來是毛澤東自己記錯了。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毛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什麼。

據史書載，漢宣帝對太子這一次講的話如此老大不高興和憂心忡忡，以至於從此對太子疏遠，甚至一度有意廢太子。

毛澤東講漢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就是暗示不能像周恩來那樣講王道，而要講霸道。這和五十年代罵鄧拓，是一脈相承的。同時毛講這個故事還表明，他對周恩來不放心，不願意周當他的繼承人。儘管周恩來忠實地執行了毛在文化革命中的許多指示，可是周是有偏重的。周以執行毛的政策為名（關於這些政策，毛只不過說說而已）保護了一大批幹部

和知識分子。毛看出來周在內心中是不同意文化革命的，所以，周提出批極左思潮，毛就懷疑這是要否定「文革」。從這以後，我預感到周恩來的厄運。果然，隔了一年，毛澤東就授意江青搞「評法批儒」，對周恩來極盡影射攻擊之能事。

一九七二年年底以後，周恩來再也沒有過問《人民日報》的工作。張春橋、姚文元牢牢地控制了《人民日報》，魯瑛也站穩了。

我給毛澤東的信，是通過總編室的秘書室送上去的。後來就加強了對秘書室的控制，規定不得私自給毛送信。姚文元還指示，凡《人民日報》編輯的內部情況簡報，一律要先經他看過後，才能送給中央。姚文元很重視這件事，每份簡報都仔細審閱修改。有時他要刪掉「毛主席」三個字，就很小心地用鉛筆在周圍劃個圈，而不是把名字塗掉，而且不讓鉛筆碰到這三個字，可謂恭敬之至。姚文元就通過這種送簡報的辦法讓毛對他領導的《人民日報》工作有好印象。有一次姚主持寫了一篇社論，發表後，就指示《人民日報》搜集讀者反映上報。這些反映當然大部分是說好，但其中夾了兩條說不好的意見，姚文元就不高興，刪去了。

《人民日報》對「一股邪氣、一股力量」的批判進行了幾個月，到了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因為要準備「十大」，停下來了。

「十大」由周恩來做政治報告，那是由張春橋等人起草的。給人突出印象的是王洪

文，他做修改黨章的報告。這件事當時激起了很多議論，誰都覺得他的資歷和水平都不夠，但誰也不敢明說。這件事標誌着王洪文作爲一顆政治新星正在迅速升起。可以和「九大」做一比較：「九大」通過一個新黨章，照例要做一個修改黨章的報告，結果沒有，只有林彪的報告。爲什麼？因爲如果要做修改黨章的報告，那就應該由排名僅次於林彪的周恩來來做，而毛卻不想突出周恩來。「十大」要抬高王洪文，於是讓他來做修改黨章的報告。

毛澤東多次用這類手法來打擊周恩來。有一次，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總理訪華。和中國政府會談時，商定了中國政府給予幾億元的貸款。這件事無疑是報告了毛澤東的，而且他當時並沒有反對。可是，當最後周恩來陪這位總理去見毛，向毛告別時，毛卻批評周恩來，說他太小氣了，爲什麼只給那麼一點貸款，他張口就把貸款的數字提高了若干億。這樣，他貶低了別人，顯示了自己的權威，還作了好人。

那時，中國的外交已打開了新局面。基辛格、尼克松先後訪華，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和日本也恢復了邦交。來訪華的外國元首和記者很多，外交工作十分活躍，周恩來異常忙碌。因爲總接見外賓，他的照片就常常出現在報紙上。許多外國客人回去後，也在報紙上發表感想和評論，盛讚周恩來的外交才能和風度。《參考消息》就登過斯諾的文章，說中國有兩個偉人，一個毛澤東，一個周恩來，這兩個人互相配合，誰也離不開誰。

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時，心裏感到很不安。斯諾無論如何不會想到，他這是在給周恩來幫倒忙。「毛主席像太陽」，太陽的光輝籠罩一切，怎麼可以允許別人和他並駕齊驅？何況，這個人又是周恩來。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一天，姚文元給《人民日報》來了個電話指示：

「最近報紙上的照片太多了，主席也曾提到這件事，今後照片一律不登；要登，要送總理和我批准。請從嚴掌握。可寫一報告給中央。」

這顯然是對周恩來的。毛看到周恩來太突出，不高興了。

《人民日報》把報告送上去，可是沒有下文。因為這是做不到的。外國元首來中國，和中國領導人合影，中國報紙能不登嗎？或者，中國報紙只登外國人的照片，不登他們和中國總理的合影，行嗎？要真是不登，事情可就大了，不僅是外交禮節問題，還會引起全世界的紛紛猜測和議論。

從此，毛澤東出面接見外國客人了。他身體有病，而且從前一直不喜歡外交禮節。現在，他親自會見來賓，而且，每次都由周恩來陪同前往，到了中南海毛的住處，則由王洪文在門口迎接，這樣來顯示毛的無上地位和尊嚴。

這時，我再也不用盲目信任的眼光來看毛了。同時，我越來越預感到周的厄運。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開始。那時，我已寫了多次檢討。因為我實在不願意檢討，

就在檢討裏埋了一些釘子；魯瑛看不出來，送到姚文元，姚都不吭聲。現在，他說話了：「王若水問題的性質，是代表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他這回寫的檢討，還在說一個政治局常委如何說，另外兩個常委如何說。他不久就會明白，他這樣說的嚴重性。」實際上，我的檢討根本沒有這樣說。姚文元硬要那樣講，無非是要引出「嚴重性」的話，無非是暗示不久就要揭周恩來的蓋子了。

從一九七四年初開始，我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對我的批判又逐步升級。原來說我寫信給毛主席是想奪魯瑛的權；現在說我想奪姚文元的權。這還不夠，一個老幹部在批判大會上說：

「王若水的這封信，性質和彭德懷的萬言書是一樣的。彭德懷是給毛主席下戰書，王若水也是給毛主席下戰書。他是不是想奪毛主席的權？」

會後，有人悄悄地對我表示焦慮：「會不會把你抓起來送監獄啊？」

我說：「不對，應該送瘋人院。」說的太離譜，太荒唐，我反而不怕了。

這時又有人貼出了轟動性的大字報，揭露我處理一篇來稿的「罪狀」。那是一九七三年，我雖然挨批，但還要「戴罪工作」，暫時還看稿子。有一篇理論性的來稿，已經排印出來，我覺得水平太低，不知所云，決定不用。大字報說那篇文章是一篇十分好的馬克思主義論文，我竟然加以壓制，足見資產階級反動本性未改。這件事報告到中央，據魯瑛

說：「江青同志很生氣，說『要批他』！」

那天晚上，消息傳來，幹校十分緊張。毫無疑問，新一輪的大批判又要開始了。我是千鈞壓頂。那時，我獨自住一間小屋。幹校的管理幹部大概擔心我晚上會自殺，跑來要我搬到大屋去住。我拒絕了，我說：「你們放心，我是要革命的。」當時，在運動中自殺的人，被稱之為「叛黨自殺」。我說我是要革命的，就是說不會自殺。

那天晚上，我喃喃不已：「我要革命，要革命，要革命……」我心裏想，要革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的命。當然別人不會懂我的意思。

那些天我確實非常痛苦，心像被一隻大手攥得緊緊的。這種巨大的壓力真讓我有些受不了。生命顯得那麼漫長，每一分鐘對我都是一種巨大的折磨，人好像在受煎熬。望着廣闊的田野，我真想撲在她懷裏。

大地啊，你承擔着一切，一切重壓對你都不算什麼。你替我承擔一下我的痛苦吧！

那時，我真想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大哭一場，或者，向一個知心的朋友傾訴，而只要他對我說一句：「我了解你，你不是敵人。」

「文革」中自殺的人很多，報社就有好幾個。我現在能夠了解，他們為什麼自殺。在今天，我會藐視給我加上的這些罪名，但在當時，這些精神上的壓力能夠把一個人壓垮。

但我不想自殺。「死是容易的，活着更難。」不記得誰說過這個話。我明白，死也是

白死。那些野心家才不會在乎你死不死呢。當然，我也認爲，毛主席如此批評我，我這一輩子不用想翻身了。我的後半生會是淒慘的，甚至會鬱鬱而終。但我不會消極無爲。既然已經看透了這幫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我就要想辦法和他們鬥。我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是我的精神支柱。

另外，我清楚地看到，許多同事儘管上台批判我，貼我的大字報，其實內心還是同情我的。有時一個同事在路上遇到我，看看旁邊沒人，會悄悄說一句「多保重」，再趕緊走開。我得了肝炎，一些朋友給我送來黃芪。後來，我又被送到農村，糧票不夠，還有人悄悄給我糧票。這些使我覺得不再孤立，相反，我在精神上是佔優勢的。

但我還必須在勞動之餘沒完沒了地寫檢討。一篇通不過，退回重寫。一遍、二遍、三遍……高高的一疊。這檢討太難寫了。每寫一句批評自己話，心裏就有十句反駁的話。逼人說違心的罵自己的話，不啻是一種精神強姦。

我也想法來對付。我可以用寫檢討的名義來請假，不去大田勞動。這時，我就在桌面上放着檢討稿，抽屜裏放一本小說。只要沒人，就拉開抽屜看《紅樓夢》（因爲毛澤東欣賞它，這時還能買到）；有人來了，就把抽屜一關。

我沒有錯，這一點我非常自信。要說我代表資產階級，姚文元代表無產階級，我死也不相信。沒完沒了的批判，摧殘了我的身體。嚴重的失眠，以至任何的安眠藥都無效。每

天早晨起床，枕頭上都留着許多斷髮。人瘦了，背也駝了。可是，我的精神沒有垮。有時回到報社，從一樓走到五樓，全是關於我的大字報。我就昂然從罵我的大字報小巷中穿過，心裏充滿了藐視。

一九七五年，我還在農村改造時，有時回城，就到歷史學家黎澍家。我們是無所不談的朋友。那時，毛對「四人幫」的批評已經傳出來，而且聽說政治局會議也批評了江青一伙。我們都感到高興，常議論這件事。毛支持鄧小平而批評江青，話說得那樣重（「她不代表我」），看來他似乎要大義滅親了。但又感到不很踏實：會不會又是一次「釣魚」啊？因為毛說，「『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時，張春橋、姚文元都表現得有些反常，他們離開了北京，也不講話了。魯瑛守在專用的保密電話「紅機子」旁，卻得不到任何指示。他六神無主，在辦公室裏走來走去。

突然，八月十四日，毛講批《水滸》，說「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姚文元馬上抓住這個機會，當天就向毛寫了信，說這個講話意義重大，牽涉到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提議組織評論文章。毛澤東當即批准了這個建議。

這一下，魯瑛像打了一劑強心針，馬上活躍起來了。《人民日報》根據姚文元的信，

立即發表社論。魯瑛召集會議，動員批《水滸》，並向全國各地派出記者，收集討論情況和思想動態，組織文章。他揮舞拳頭，高聲叫到：「拿出批林批孔時的勁頭來！」

毛澤東評《水滸》的話是對蘆荻說的。蘆荻後來寫回憶文章，說毛只是回答她的問題，並無其他用意。但問題是毛曾經不止一次說過類似的意思，而且這次又批准了姚文元要大做文章的報告，隨後就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批《水滸》的運動。改變了「四人幫」的困難處境。這又做何解釋呢？

當時很多人都在猜測，誰是宋江？誰是投降派？江青跑到大寨講了一通，說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要架空主席呀？結果毛把她批了一通，說她「放屁，文不對題」。有人據此認為，毛提出批《水滸》並沒有針對性。其實，是江青領會錯了毛的意圖，她想借批《水滸》整鄧小平，說鄧架空毛主席，而毛則是意不在鄧而在周。周恩來也明白，我曾聽說，康克清去醫院看周恩來，周對她說，我這個人一生犯了很多錯誤，但我不是投降派。

後來，毛也逐漸對鄧小平產生不信任。鄧小平主持工作以來，糾正了一系列「文革」的錯誤，毛擔心這樣做下去結果會否定「文化大革命」。

千秋功罪，何時任人評說？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傳來，我非常傷心。當時，我在北京紅星公社勞動，那些農村的青年人哭得很厲害，特別是女孩子。周恩來對農業管得並不多，可見他的精神感召力。說起來矛盾，儘管我知道毛要整周，我仍然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希望毛對周恩來的逝世，說幾句悼念的話，或者賦一首詩，或者發表一張他到醫院看望周恩來的照片……然而，我失望了。

報紙的版面安排，消息報道，都表現出要抑制人民的悼念情緒。群眾議論說，周恩來是累死的，氣死的，這話不假。後來我逐漸相信，毛完全是有意把周折磨死的，他不能讓周死在自己後面。周和毛的關係真是一個大悲劇。

清明節前後，我一有時間，就去天安門。一到天安門，我就覺得精神上解放了。那麼多人，那麼多的詩，說的和我心裏想的一樣。他們的恨與愛，就是我的恨與愛。原本只能關起門說的悄悄話，在這裏卻能大聲說了。好像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同志。二十多年前，我從北平去解放區，下了火車，過一條河，就到了根據地了，那時我們幾個大學生高興得直蹦，唱啊，叫啊，覺得自由了，可以隨便罵蔣介石、國民黨，不用害怕特務了。在天安門，我又一次有了這種感覺。

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一塊地方小得看不見。可是一塊地方有自由，哪怕是暫時的自由。

有的詩說：「秦始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我想，秦始皇還在，他就是秦始皇！他不是說，秦始皇還不如他嗎？

四月六日那天下午，我在天安門。到了傍晚，廣播裏一再重複吳德（北京市委書記）的講話，要大家離開。可是，離開的人不多。晚上，我感到餓了，便回了家。不久，民兵就出動了。

第二天，《人民日報》登出長篇報道，宣布廣場的群眾的悼念活動是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說過，「鎮壓學生的沒有好下場」。但當他覺得需要鎮壓時，他是毫不留情的。他沒有下令開槍，因為不需要；民兵的棍子就夠了。

《人民日報》的內參，對毛澤東決心鎮壓，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能猜想到，毛本來是準備在周死後，適當時候繼續批周的，不料，群眾對周表示出的如此巨大的懷念，當然使他震驚。

有一句毛說的話傳了出來：「反周民必反。」他不能不把批周的打算擱置起來了。

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是繼林彪事件後對毛澤東威信的又一次沉重打擊。表面上毛勝利了，他把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鎮壓下去了，而且撤掉了鄧小平的職務。可是，毛失掉了人心。我開始懷疑他的品質。

從前，我很擔心毛的死。每當想到這件不可避免的事，心裏就「格登」一下，彷彿天

要塌下來似的。可現在，我不再這樣想了。

在漫長的幾個月中，人們聽不到毛的任何消息，大家都在等待着什麼。

九月，爲了逃避地震，我請假送家屬到長春，暫住在一個部隊招待所。九日，當毛逝世的消息傳來時，我只看到一個軍人倒在床上哭泣，此外沒有人掉眼淚。走到街上，看見有不少人到布店買黑紗，其他和平常沒有兩樣。

第二天，我回北京。火車上，大家都很少說話，可是也沒有什麼人流露出哀傷。

毛澤東的葬禮盛大而隆重。然而周恩來逝世時那種「十里長街」的場面卻沒出現。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自己卻有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撥亂反正過程中，毛的面目一步步暴露出來。人們都禁不住問：能把一切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嗎？能夠用「兩個凡是」來限制對過去錯誤的糾正嗎？

在一九七九年初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我做了批評毛澤東的長篇發言。我說不僅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效果是壞的，毛發動文革的動機也是不好的；對毛的品質提出了質疑。發言稿被輾轉傳抄，香港刊物登出來了。有的報紙推測，我的發言是胡耀邦授意的。其實不是。在另一個發言中，我還對「堅持毛澤東思想」提出質疑。我說，毛澤東思想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要用實踐來檢驗；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東西，我們就不能堅持，如「無產階級

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三月三十日，鄧小平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批評有些共產黨員在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上動搖。他說：「有些同志說，我們只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們堅持的和要做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至於個別論斷，那麼，無論是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是，這些都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

但是，毛澤東指導「文革」的思想卻不是什麼「個別論點」，而是構成了一個體系，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當然它不是一個「科學體系」，但仍然是一個思想體系。毛澤東很重視這個思想，認為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貢獻，而且至死沒有放棄。

在參加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我提出，是不是可以用「毛澤東晚期思想」這個概念，把毛澤東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後的許多錯誤思想，特別是關於「文革」的思想，從「毛澤東思想」分出來，另行處理。這樣可以解決「堅持毛澤東思想」和清算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之間的矛盾。胡喬木起初同意這個意見，讓我寫「毛澤東晚期思想」這一節。可是，後來，這一節被棄而不用。

最初，胡耀邦說這個決議「成績要講夠，錯誤要講透」。但後來他說，對毛主席要厚道一些。不過，他同時也說：「毛主席搞權術。」起草決議的過程中，鄧小平作了十幾次指示，陳雲也講了幾次。中心意思都是要維護毛主席這面旗幟。對毛的這種維護態度，使我想起五十年代蘇聯批判斯大林時，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把斯大林這把「刀子」扔掉了。中共沒有認真從斯大林問題上吸取教訓，使毛澤東重犯斯大林的錯誤。

決議草稿出來後，曾在黨內徵求意見，參加的人有四千之多，其中許多是延安時代的老幹部。談起「文革」，談起毛澤東，都義憤填膺。有人說，「什麼文化大革命？這是文化反革命！」有人糾正道：「不對，是武化反革命！」還有人說，毛主席和曹操一樣，「寧願我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我」。他們還談到歷史上許多事情。我也在討論會上發了言。說實話，那些老幹部的講話比我尖銳很多，鄧小平後來顯得對這些討論不滿，不過他沒有批評那些老同志，只批評我，意思是他已經講了不同意毛有品質問題，我為什麼還要堅持。

胡喬木也在討論會上受到指責。有些人說，是不是他作了多年毛主席秘書，怕牽涉到自己，所以對毛也要保護。

對決議草稿，儘管有很多的反對意見，中央都不接受。鄧小平、陳雲等的決心已定。胡喬木表示要「力排眾議」。他後來有一次對外賓誇耀：我們的歷史決議，曾在四千多人

中徵求意見，可見我們黨是多麼講民主。他沒有說，鄧、陳兩位講的才算數，這四千多人的意見基本上等於白說，雖然採納了一些具體意見，但最重要的批評並沒有接受。後來由廬山會議上受批判的黃克誠出面，寫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竭力講毛的歷史功績，以緩和黨內外對毛的不滿。

我的不同意見主要是兩點。一，《決議》說毛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認為應當反過來說，錯誤是第一位的，或者說，過大於功。二，《決議》認為毛發動「文革」的動機還是好的；我認為不然，動機就是壞的，只是要清除潛在的赫魯曉夫，防止他百年之後有人批評他所犯的「反右派」、「大躍進」等錯誤。自然，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發動「文革」，還有制度上的、文化的原因。毛掌握了絕對的權力，這個絕對的權力又腐蝕了他。

世事滄桑。在從神壇上跌落下來之後，毛澤東近年來又以充滿人情味和領袖魅力面目出現，重新「熱」了起來。而他的權謀和殘忍，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和消極影響，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中國，什麼時候才能走出毛澤東的陰影呢？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

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

——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

周恩來大力糾「左」

一九七一年發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機毀人亡以後，中國政局面臨一個轉折點，形勢十分微妙。

「文革」的一個主要任務是解決接班人的問題。打倒劉少奇，確立林彪作為毛主席的副手的地位，這在當時被宣傳為保證中國不變色的偉大措施。劉少奇被指責為中國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劉少奇則反對毛主席，他們都是「修正主義者」。林彪是一貫擁護和緊跟毛主席的，他對毛主席「最忠最忠」，把毛澤東的紅旗舉得「最高最高」，對毛澤東著作學得「最好最好」，把毛澤東思想用得「最活最活」。這樣的人當然是最值

得毛主席信任的。一九六九年的九大，把林彪作爲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毛澤東可以放心了。「文革」接近尾聲了。

正在這時，「九·一三」事件像晴天霹靂，把林彪的神聖形象擊得粉碎；不但如此，它還對毛澤東的英明決策提出了質疑。劉少奇千不好萬不好，還沒有發展到要謀害毛主席的地步啊！如果「文革」折騰了這麼多年，只是爲了讓林彪這樣的大壞蛋當權，那麼「文革」是不是失敗了？

群眾在震驚之餘，普遍覺得，毛主席挑選林彪作接班人是錯了，當初挑選周總理就好了，雖然他們嘴上不敢這樣明說。

深居中南海的毛澤東，是怎麼想的呢？

林彪叛黨叛國的第一個結果是九大正式確立的毛林體制的解體。

在九大上作政治報告的是林彪。本來，按照慣例還應該有一個修改黨章報告；如果要作這個報告的話，這個人理應是周恩來。然而九大的議程中只有「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卻沒有修改黨章的報告。九大黨章草案對早先的黨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關修改黨章的一些問題，只是在討論時由康生作一個發言來加以解釋。可是到一九七三年的十大時，又恢復了修改黨章報告的議程；這一回是由王洪文來作這個報告了。可見，九大沒有修改黨章報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來。表明這一點的另一件事是：在九屆一中全會公報的政

治局名單中，周恩來排名第四，在陳伯達之後；這是因爲在毛澤東和林彪之後，就按姓名筆劃爲序了。這種做法以前是沒有的。

一九七〇年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被清除後，周恩來排名第三了。九·一三事件以後，第二號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來上升到第二位。毛澤東會感到他過去認錯了人，轉而讓周恩來作他的接班人嗎？

在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過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他在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同志時，爲「二月逆流」平了反。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澤東參加了陳毅追悼會，並對張茜說，陳毅是個好同志。六月八日，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奈克夫人，說：我們的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八月十四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批語，說鄧小平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爲鄧小平的復出開了綠燈。年底，毛澤東對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的來信作了批示，要求「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

毛澤東也顯得很信任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現了轉機。在「文革」期間，周恩來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反對極左的；現在，以陳伯達和林彪集團的垮台爲契機，他加大了糾左的力度。九·一三事件後不久，周恩來指示公安部對監獄情況作一次全面檢查，對看管人員中存在的寧左勿

右思想提出嚴肅的批評。他抓住毛澤東作了批示的機會，採取有力措施，使相當一批老同志恢復了自由，得到醫療照顧和妥善安置。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初，召開全國計劃會議。這個會議的《紀要》經周恩來主持討論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頓企業管理，反對「空頭政治」，反對無政府主義等等。接着，中央又發出關於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針對農村存在的極左思潮的影響，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辦法，要從實際出發；強調不能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做資本主義去批判，等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同葉劍英、李先念等聽取了有關航空工業問題的匯報，明確提出質量問題的重要性，要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查同意的社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求落實黨的幹部政策，並指出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四、五月間，周恩來又批評出口日用工業品和廣交會展品質量問題，指出：「現在是不敢管，無政府主義氾濫，領導機關不敢講話。」針對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傾向，周恩來批評說：「否定一切，不一分為二，這是極左思潮，不是毛澤東思想。」周恩來還把糾左的精神貫徹到文化、衛生、體育等部門，指出過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業務和訓練是錯的。他說：「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文藝質量的提高。」「現在要提倡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齊放。」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周恩來接受揚振寧的建議，當面叮囑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要認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極左思

潮，提高基礎理論水平，把綜合大學理科辦好。他說：「你回去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

這一系列的措施和講話，顯示了周恩來的決心。

然而，周恩來的努力，卻受到了張春橋等人的抵制。我這裏不能詳述，只舉一個例子：那個反對「空頭政治」的《一九七二年全國計劃會議文件》，就是被張春橋否定的。以後，國家計委將這個文件改寫成一個關於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拿到一九七三年的全國計劃會議去討論，全國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都贊成，唯獨上海反對。張春橋還說這是「光榮的孤立」。

爭奪《人民日報》的陣地

林彪集團的覆滅使周恩來的工作負擔大大加重了，可毛澤東還委托周恩來代管《人民日報》。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個最強壯的人壓垮的。本來，《人民日報》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對毛澤東爲什麼要這樣做沒有想過，不過我是很高興的。

那時《人民日報》面臨兩個問題：一個組織問題，一個宣傳問題。

先談組織問題。當時《人民日報》沒有正式的領導班子，只有一個管業務的「宣傳小組」，召集人是從上海《解放日報》調來的魯瑛。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

報》的以陳伯達爲首的工作組成員，排名最後。但他前面的成員都一個一個倒台了，或回原單位了。魯瑛的上海原單位群眾組織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張春橋不同意。這樣，只留下他一個，於是他就自然地成了報社第一號人物。現在看來，張春橋留下魯瑛顯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報社的人員對他不了解，也沒有什麼偏見。可他成了負責人以後，就要上台講話；一講話，就鬧笑話，大家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張春橋、姚文元卻把他當做報社的唯一依靠對象，只跟他一個人聯繫。對於張姚來說，能力弱並不重要；他們重視的是他們的政治標準。這種做法，引起了報社相當多的同志的不滿。

周恩來從一九七二年開始過問《人民日報》的事以後，姚文元雖然還繼續管一些報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來的牽制，這肯定是江青集團不高興的。他們不能容忍周恩來做接班人，當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報》這樣一個重要宣傳陣地落到周恩來手裏。那個時期，周恩來就像一架超負荷運轉的機器，擔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張姚毫無協助之意，反而事無巨細都往周恩來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領導嗎？那你就來管吧！

我們下面的人都爲周恩來的身體擔憂。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論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來那裏去了。周恩來一面改稿子，一面搖頭，嘆息地對魯瑛說：「你們以後不要我當小學教員好不好？」

周恩來決心改變報社領導的現狀。一九七二年夏，周恩來提出，《人民日報》在正式建立領導班子之前，「要組織一個班子看大樣，統管全局」。周恩來還說，「幹部還是老、中、青；老的都靠邊站，都是年輕的，不行」，要魯瑛提出一個名單。幾天之後，未見動靜，周恩來來電話催詢。魯瑛回答說因病未辦。周恩來斥責說：「你病重了，怎麼辦？你死了，《人民日報》就不辦了？」

一向溫和的周恩來，在這裏顯出了他的嚴厲的一面。顯然，他對魯瑛的情況已經有所了解，他不喜歡這樣的人來擔任《人民日報》的領導。他是不是要把魯瑛當做一個釘子而拔掉呢？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報社成立了臨時「看大樣小組」，成員有七人；除魯瑛外，還有新「解放」的前總編輯吳冷西和一些老幹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幹部。顯然，這是未來《人民日報》領導班子的基礎。這裏面的任何一個其他人，都要比魯瑛強。根據預定計劃，報社黨的核心小組要在年內成立。魯瑛的地位搖搖欲墜了。

批「左」還是批右？

另一個問題是宣傳問題。「批林整風」開始時，最初是批判「五七一工程」。這屬於林彪的陰謀，主要是聲討揭發，理論上沒有什麼好批的。接着中央發下來文件，批林彪在

解放戰爭期間的「遼瀋戰役」的軍事路線。那屬於歷史，和現實沒有什麼聯繫，很快就結束了。下一步批什麼，不清楚了。我們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得到什麼指示。批林顯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劉少奇的那種雷霆萬鈞之勢相比，這種情況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數報刊批極「左」，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毛有過「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而現在說林彪是「五一六」的總後台，那麼批林當然要批極左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恩來在人大會堂對駐外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講話，再次強調批左。他批評了外交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這幾個單位都是周恩來主管的）。他說，你們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面也有嘛！」「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的還會抬頭。」

這個精神傳達到報社以後，大家都很興奮，覺得這個指示非常正確，應該很好地討論和貫徹。

然而奇怪的是，在宣傳問題上具體管事的姚文元，卻沒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納悶：當年他們批判劉少奇的那股勁頭到哪裏去了呢？

八月八日，在周恩來提出批左一個星期後，張春橋、姚文元來到報社，同報社軍宣隊和看大樣小組的幾個人談話（那次我因病未參加）。在談到領導班子的時候，張春橋裝模作樣地說：「魯瑛同志作為報社的領導，我說他弱得很！在《解放日報》，他也不是最強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調來北京，不是要他來當領導的。」接着話鋒一轉：「現在成了這個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況下，對魯瑛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談到批林問題，張春橋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林彪利用批劉，搞出一套形左實右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在批林時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不要重犯過去批劉時的錯誤。」他又說：現在有些地方批「精神萬能論」，可是毛主席說過「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有人說林彪是「唯意志論」，不對，他是「唯武器論」。

「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都是左的東西，是林彪大肆宣揚過的。批林剛開始，還沒有怎麼批起來，張姚就說批左不要過頭，這不能批，那不能批，這當然是給批極左思潮澆了一盆冷水，和周恩來的觀點形成對立。這種不一致，編輯部的許多同志都感覺到了，並對張姚的說法很不滿意。

編輯部同志的另一個不滿意之處是覺得《人民日報》這麼多有能力的人，張姚都不依

靠，只信任一個草包，這明明是「任人唯親」。十一月間，在討論建立黨的核心小組時，同志們紛紛提出：魯瑛不能當第一把手。有人激動地說：「報社有很多老幹部、好幹部都沒有使用，魯瑛這樣的人卻當上了主要負責人。魯瑛這樣的水平，放在領導崗位上，與其說是愛護他，不如說是坑害他。這對黨不利，對他也不利。這件事，講起來實在令人痛心！」

九月，周恩來再次說：極左思潮不批透，你們就沒有勇氣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這時快到國慶節了。報社準備了一篇社論，吳冷西根據周恩來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話：「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錯誤傾向，特別要批評極左思潮。」送審時，姚文元把這句話刪去了，說，全國形勢如何，還要再看一看。

一塊版引起的風波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國務院業務組的華國鋒、李先念、余秋里接見黑龍江的同志，聽取他們匯報哈爾濱三個「老大難」工廠的問題。那時，經濟工作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主義，生產沒有人管，工廠沒有紀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國務院領導同志指示，要反對無政府主義。後來，省委寫作組寫了一篇文章，署名龍岩，交給《人民日報》理論部；理論部認為可用，又送給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題為《無政府主義是假馬

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一篇是書評，介紹一本關於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書。這三篇文章組成了一個版。當時，張春橋、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這個機會，就在十月十四日把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發出去了。

這塊版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記者當天就發了一條電訊，說這篇文章是為老干部講話的，是批評紅衛兵的。與此同時，上海方面來了電話，是市委常委、張姚的紅人朱永嘉打給魯瑛的，詢問這篇文章的作者是誰，誰組織的，是否送給什麼人看過，等等；還說了一句：「上海工人對這篇文章反應強烈。」

不久，《文匯報》的內參《文匯情況》三二二期（十一月四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談這篇文章的報道。的確是「反應強烈」，說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眾頭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匯報》過去也曾大力批判過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這次卻來個大轉變，而所有發言人的觀點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從上海叫新華社把法新社的電訊稿送來，叫我們看一看；接着又把十一月四日的《文匯情況》轉給我們，要看大樣小組和理論部討論，說「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卻不表態，推說對那篇文章還沒有看。

玩這種拙劣的把戲，是沒有幾個人願意上當的。理論部首先拒絕討論，說要討論也要

由看大樣小組先討論。當時胡績偉是理論部黨支部書記，他私下對我說：「怎麼討論啊？你說同意吧，它是錯的；你說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見。對工人意見，我們怎麼好去反駁？」確實如此。那時是工人階級領導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兩難局面。姚文元說「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實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樣小組先後討論了四次，也沒有什麼結果。第一次開會就討論不起來。多數同志心裏不服，嘴上不敢說，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們討論不積極，又要我們好好學習中央文件。這一次我倒認真學了。不學也罷，越學越覺得自己有理。毛澤東批發的關於批林整風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對無政府主義。七二年以前的且不說，單是七二年當年就有二十六號文件、三十一號文件、三十八號文件、四十二號文件，都提到反無政府主義。最後這個文件是十一月一日印發的，時間還在十月十四日我編發那塊版之後。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紅旗》第十一期（十一月出版），也還有批無政府主義的內容。其中說：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當時還沒有在報刊上點林彪的名字）散布無政府主義，是妄圖從「左」的方面來否定黨的正確路線。此外，十月十四日那篇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曾經列入理論部擬定的「批林整風選題計劃」，並送姚文元審閱過的。姚文元沒有表示不同意。爲什麼出爾反爾呢？

事情的變化，看來是發生在張春橋、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張姚每次去上海，

下車伊始，就要找《文匯報》《解放日報》的負責人去，滔滔不絕地講一通。不久，「新精神」就從這兩家報紙上透露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得去注意《文匯報》。

「新精神」果然出來了。十一月六日，《文匯報》的一篇評論說：「要反對劉少奇一類騙子所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過了幾天，又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類騙子」一貫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搞一點形「左」實右的東西。這種提法在報社編輯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議論紛紛，因為中央文件上不會有過。

十一月二十四日，《文匯情況》第三三五期再次批評《人民日報》。這一期的內容是《人民日報》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文章對各地報紙的影響，說全國有九個省市的報紙轉載了，有八家報紙「雖未轉載，但也發表了批判無政府主義的報道、文章或評論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國。它還舉出了報紙上的若干論點，包括「劉少奇一類騙子是煽動無政府主義的罪魁禍首」，「反對無政府主義是批修整風的一項內容」（當時報紙上只提「批修」而沒有公開提「批林」）。雖然《文匯情況》並沒有對這些論點加以評論，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這些作為反面觀點拿出來加以示眾。我看了很激動，心想：難道這也錯了？難道林彪沒有煽動無政府主義？難道批林整風不能包括反對無政府主義？這不是篇文章或幾篇文章的問題，是批林整風的方針問題，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問題。

我的一封信

當時批林方針上的混亂情況還可以從下面幾件事看出：

(一)十一月份剛發下的中央關於河南省批林整風問題的文件，還在提要反對無政府主義。

(二)十二月一日出版的《紅旗》的提法變了，說「劉少奇一類騙子象游蛇一樣，時而從右的方面，時而從『左』的方面，來干擾和破壞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這和第十一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匯報》一致。看來，它既想要轉彎，又要照顧和上一期提法的銜接。

(三)十二月一日《安徽日報》登了頭版頭條消息，報道安徽省農業學大寨會議，李德生出席並講了話。消息說：要排除「左」右干擾，當前主要是批極左思潮，同時注意和防止右的傾向。

(四)北京軍區黨委舉行第二十三次全體擴大會議，會上批評了山西省軍區副司令員、國防工辦黨委書記張照遠，認為他在所在的單位「不是把批林當做頭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當做頭等大事，這是一個原則性的錯誤」。當時紀登奎是政委，他在十二月十一日的講話中說：不能說林彪推行的是極「左」路線；林彪是要復辟資

本主義，叛國投修，這是他的修正主義路線實質。他還說：「有一些提法值得考慮，如空頭政治、唯意志論、精神萬能論。」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觸，就派我去旁聽這個會議，讓我體會一下「新精神」。但我當時聽到紀登奎的講話時，卻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員（李德生）在安徽強調反「左」，政委在北京強調反右……。

這種方針上的分歧，外國記者也注意到了，並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斷。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從北京發了一條消息，題為《北京的官方報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說：「《人民日報》是攻擊下層的黨員，並且要嚴厲鎮壓；《紅旗》是提倡下層抵制。按照中國的習慣，在清一色的內部，正在進行着爭權鬥爭。」

當時已經有些報社的同志上書中央，反映魯瑛的無能，表示他們不贊成魯瑛當總編輯。理論部的同志也在醞釀寫這樣的信。我卻想，最重要的是解決對反「左」的干擾。問題還不僅是誰人來當總編輯，問題是張姚兩人在推行一條什麼樣的方針。「左」的根子在張春橋、姚文元身上。在這種情況下，寫信給政治局或周恩來是沒有用的，於是，我索性直接給毛澤東寫信。

我的信是十二月五日發出的。信的底稿我後來燒掉了，因為追查得緊。但信的主要內容，我曾多次交代。現在複述如下：

開始我說，現在《人民日報》陷入宣傳上的混亂，主要是批林方針問題。總理在八月一日說，批「左」還沒有批透；但張春橋、姚文元在八月八日卻說，批「左」不要過頭。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是沒有批透呢，還是批過了頭？我認爲周總理講的是對的。他雖然指的是幾個單位的運動，但我認爲也適用於報紙宣傳。

我報告了《文匯情況》對《人民日報》的批評和《文匯報》對林彪路線性質的提法。我說這種情況有些像批《海瑞罷官》的局面。到底《文匯報》講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匯報》怎麼有那麼大的膽子？但如果是，《人民日報》爲什麼不知道？我說，我不相信《文匯報》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爲如果是中央精神，不會不向《人民日報》傳達。中央文件剛剛說過批林整風中要注意反對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就是極「左」。中央精神要變也不能這樣快。

我在信裏表示我不同意《文匯報》說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只是在「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搞一點形『左』實右的東西」。我說，劉少奇有右的表現也有「左」的表現，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現也有右的表現，主要是「左」。當前實際工作中的主要干擾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極「左」思潮。

我還引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話，表示了不同意見（我想，在寫給黨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隱瞞自己的觀點）。姚文元說，林彪反對黨的領導，這是右。我說，就其表現形

式來說，反對黨的領導可以從右的方面來反，也可以從「左」的方面來反。五七年右派進攻是從右的方面來反對黨的領導；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是從「左」的方面來反對黨的領導。我還摘引《紅旗》雜誌第十一期上的話（「劉少奇一類騙子散布無政府主義，是妄圖從『左』的方面來否定黨的正確路線」），說姚文元的話和《紅旗》雜誌上的話不一致。張春橋不同意批「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我說：我不懂爲什麼因爲毛主席講了「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萬能論」，我認爲這是兩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論也是唯意志論；這兩種東西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蔣介石和希特勒就是這樣。

以上是我寫給毛澤東的信的主要內容。我估計，我這樣一封信，由於涉及高層領導人，毛澤東不大可能會有直接的反應。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過，這是重要的情況和問題，毛澤東即使不批示，也會放在心上的。我也考慮到，這封信是冒風險的，爲了避免連累別人，我沒有給任何人看，寫好後就發出了。

信剛發出兩天，就聽到一個不利的消息：十二月六日，張春橋、姚文元有一次談話。姚文元說：「主席說，林彪歷史上一貫是右的。」「林彪在教育問題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右的。」張春橋說：「大亂是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亂是主席號召紅衛兵造反。……當時亂有些損失，如鐵路，沒什麼了不起。……停止黨的生

活，這是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文化大革命』剛剛過來，怎麼能忘掉？沒有大亂，哪有大治？《人民日報》的同志要到工農群眾中去，聽聽工農意見。到上海去聽聽，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見。」「生產搞不好，主要是階級鬥爭，班子不團結，不是群眾的無政府主義。」「只講極左思潮說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個發展過程，只講極『左』怎麼行？最後投靠蘇修是極右。」

這些話應當說已經很明確了，但在當時，我仍然不為所動。我怎麼也不能相信，毛澤東會在那樣的時刻，把反右作為重點。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把糾「左」變為反右，給當時「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來的是三年災難。這個教訓太慘重了，毛澤東怎麼能不接受呢？！

周恩來的講話

十二月十九日晚，我還在北京軍區開會，一個電話把我叫回報社。隨後，魯瑛、報社軍宣隊負責人、吳冷西和我坐着一輛小轎車，直奔人民大會堂。誰也不知道有什麼事。就身份說，四個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魯瑛也許作了某種猜想，在車上拍拍我的肩膀說：「若水同志呀，以後報紙的工作你要多發揮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會堂，汪東興先招呼我們在江西廳坐下等待。原定八點開會，推遲了。到

八點半，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隔壁房間走出來了。看樣子他們是剛剛商量完畢。握手時，周恩來是很親切從容的樣子，江、張、姚三人卻面帶慍色。但此刻我還猜不出發生了什麼事。汪東興雖然也是政治局委員，卻不時跑出跑進，做些照料，自始至終很少講話。

沙發擺成一圈。坐在周恩來左邊是江、張、姚三人，我坐在周恩來右側。當時我沒有想這種坐法有什麼意義；後來才悟到，這三個「左派」永遠是要坐在周恩來左邊的，而這意味着坐在周右邊的人是右派。

正式開會前，周恩來和我交談了幾句。他問我是從哪個大學出來的，什麼時候參加革命，有沒有去解放區，去那個解放區，等等。我雖然是第一次和這個我所敬仰的偉人談話，卻毫無緊張之感。周面色紅潤，看上去很健康。——我當時還不知道，這時他已身患癌症了。

會議開始。周恩來作為主持人，第一個講話。他說：「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給我們辦。」還有理論部和其他人的，「都聯繫到你所提的問題，就是『左』和右的問題」。

這時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疊信。我彷彿看到我的信就攤開在那裏。張春橋、姚文元也拿着幾封信翻來翻去。糟糕！我的信怎麼落到了他們手裏！

接着周恩來講話的主要內容是：

王若水同志聽到八月一日我的講話。我講極「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還有工作上的一些問題，不是講林彪的整個路線。林彪叛黨叛國，那是極右了。中央報刊上曾經指出過極「左」思潮，《紅旗》十一期也提過，但是我們沒有定性為「左」。至於表現形式，也有形「左」實右。說林彪是「左」，在原則上是錯誤的。這是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的同志。當然群眾有極「左」思潮，他來利用，到後期就右得很。

黨報和黨刊應該一致，否則敵人就利用，把黨報和黨刊，《人民日報》和《紅旗》對立起來。只要我們有一點不同，他們馬上抓住。這次是美國記者，說北京的官方報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報》批判無政府主義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從王若水的信來了以後才看的，覺得文章是錯誤的，因為理論上沒有說清楚，聯繫實際也不恰當。把林彪說成是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也是不對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個時候，群眾中有極「左」思潮，無政府主義是個別的。當然在有些文章中有這樣的提法，我們沒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責任。如有些地方說批林就是批極「左」思潮，這就批錯了，批到群眾頭上了。不能把群眾中的一些自由主義說成是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現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這是我們批判的主要矛盾。當然我們個別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對這方面的理論工作，沒有好好研究，務虛不夠，這是有缺點的。

《紅旗》和《人民日報》相互之間，交換意見，互相切磋勉勵，只有好處。

現在《人民日報》好像有幾個對壘似的。國際部、理論部，都給我寫信，又不是原則爭論，都集中力量攻魯瑛同志，我們覺得不妥當。魯瑛同志是上海《解放日報》來的，當時唐平鑄倒了，他在困難條件下主持報紙，上面還有陳伯達干涉。如說魯瑛同志弱一些，可以這樣說，但還是好同志嘛。《人民日報》遭遇也複雜。現在要建立一個領導小組，議論很多，表現有些爭權。

兄弟報紙要互相幫助。《文匯報》提點意見，是在內部情況嘛！《文匯報》反映情況是應該的。彼此應該互相切磋，雙方可以交換意見。

以上是周恩來講話的主要內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話，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沒有直接關係的部分。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機會直接聽到周恩來作報告，當時他的講話的邏輯力量和有魅力的風度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就在十個月以前，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訪華，和周恩來作了長時間的會談。後來尼克松在《領導人》一書中對周恩來作了很高的評價，說他「講話邏輯性很強，並且熱切和具有說服力。」然而，這一次我對周恩來的講話卻沒有這種印象。他講得很長，至少一個鐘頭，內容有些散亂。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鋪得很開，沖淡主題。我還感到有時句子不完整，有時語氣不連貫。剛剛批評龍岩的文章是錯誤的，接下去又說「理論上沒有說清楚，聯繫實際也不恰當」，這又似乎說這篇文章只是有缺點而不是有錯誤。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可以理解，總理是在說違心的話。許

多話顯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評，但他仍想保護我。他說中央務虛不夠，不能完全責備報社的同志，這是主動承擔了責任。其實，他本來沒有任何責任，因為他是正確的；如果有責任的話，也決不是他一個人的。毛澤東說過要反「左」，中央文件說過要反「左」。即使張春橋、姚文元在八月八日的講話中也說：不能「把批林、批陳同批極『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對立起來」，「批林批夠了，極『左』思潮也解決了」。然而江、張、姚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自我批評的話，反而裝出一副「一貫正確」的樣子。

周恩來講完，說「我開個頭，你們三位講吧」。江、張、姚三人都不講，張春橋要報社的人講。報社軍宣隊負責人先匯報。接着魯瑛匯報，他的話幾次被周恩來打斷。當魯瑛說到他沒有別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樣就刪時，周恩來打斷說：「那也不是辦法，如果實際上是極『左』也不能刪。」

輪到我講了。我說，今天中央首長的講話明確了要反右，這一點是我過去不明確的。林彪叛國投敵，實質是右的，這一點大家容易理解，龍岩文章上也有這樣的話。但林彪的表現形式主要是極「左」，也就是形「左」實右。這個「左」的表現形式欺騙性很大，流毒很廣。從實際工作來說，「左」右兩方面的干擾都有，這是大家承認的，問題是哪個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總理在「八一講話」中講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來理解了。總理本來是講幾個單位的內部問題，還有外交方面的問題，我卻認

爲，這個精神也應該適用於批林整風的宣傳。實際上，我的想法並不是在聽到總理講話以後才產生的。早在一九六七年，王力、關鋒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時，就提出了批判極「左」思潮的口號，包括反對無政府主義。毛主席也作過這樣的指示。一直到這次批林整風的文件中，也多次強調這一點。

我翻開了筆記本，念了一九七二年第三十一號中央文件（關於四川的批林整風問題）上的一句話：「『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總頭子就是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總根子還是林彪。」我說，就實質說，「五一六」反革命團體和林彪沒有區別，都是極右，但他們都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既然林彪是煽動極「左」思潮的總根子，我就以爲這樣批是可以的。我還再次提到《紅旗》第十一期上說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從「左」的方面否定黨的路線的話。最後我說，對於這些問題，我還要好好想通。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講話。她一開口，就放炮了：

「你組織的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着群眾。《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鬼標題可長了。我也勉強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門）這不是對着林彪，是對着群眾！我對《人民日報》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個感覺，這封信不管動機如何，客觀上對中央起着挑撥作用，我

看了以後很高興。拿着總理在某一個場合某一個問題上講的話來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了。至於他在某一時間，某一事情上，利用極左思潮，實質上也是極右。你這封信，好像春橋、文元同志跟總理鬧警扭，我認爲過份了。全篇不是很講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麼可以把兩個政治局委員和一個常委對立起來呢？還提到現在形勢好像《海瑞罷官》，會是《海瑞罷官》那種形勢嗎？我今天還收到一封信，是理論部部分同志寫的。我還突然收到幾個口袋，都是對魯瑛進行人身攻擊。我當然不是說你這個同志（指魯瑛）沒有缺點。我也有官僚主義，沒有看。」

姚文元插話：「有些信那樣寫，把一個人的缺點搜羅在一起，簡直少有，只有黃色小報才那樣寫。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說過，論戰可以，但這種手法我不欣賞。」

這時，周恩來也作了插話。由於我再次提到《紅旗》十一期的文章，他叫秘書把這一期《紅旗》拿來翻閱了一下，說：「無政府主義那篇文章，矛頭不是對着林彪的本質問題。《紅旗》十一期有篇文章，提到劉少奇提倡奴隸主義，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那樣說可以。當然不一定這樣分類，好像一個代表『左』，一個代表右，但總的觀點是對的。」

這裏周恩來作了一點巧妙的反擊。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紅旗》雜誌上說的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的話，說這是可以的。這是肯定了《紅旗》，但在肯定《紅旗》的同時實際上也肯定了《人民日報》（《紅旗》可以這樣說，別人就不行嗎？）。周恩來接着說，不

一定要把林彪作爲「左」的代表；這又是對《紅旗》的糾正。但這裏周恩來是用姚文元批評《人民日報》的標準，轉過來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紅旗》雜誌上。就算江張姚對別人的批評是正確的吧，難道他們自己就是「一貫正確」嗎？周恩來這樣說，叫姚文元啞口無言。

然而，周恩來所能做的僅此而已。在毛澤東表態以後，他已經是無能爲力了。

江青的講話突然提高了調子，這顯然使周恩來感到意外。周恩來講話的調子是溫和的，江青卻提高了嗓門。周恩來說我的錯誤是認識問題，江青卻斷定我心懷叵測。江青說那篇文章是矛頭對着群眾，說我挑撥兩個政治局委員和一個常委的關係，說理論部同志的信是對魯瑛進行人身攻擊，這些都是周恩來沒有提到的。本來，這次接見怎樣對我們談，在接見我們之前的小會上應該是商量好的，統一了口徑的；江青這樣一講，氣氛突然緊張起來了。她批評我把中央領導人對立起來，可是她又用自己的發言顯示了和周恩來的不一致。這顯然出乎周恩來的意料。在以後的發言中，周恩來爲了掩蓋這種分歧，不得不用插話來彌補這一點，把調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會發現其間仍有微妙的區別。

當時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寫信的第二天（十二月六日），毛澤東就約見江青，要她將王若水的信轉給周、張、姚等，由他們一起找王若水談話，解決一下這個問題。當日，江青就將我的信轉交了。關於找王若水談話的事，江青提出：「建議我們先談談，統一一

下認識。否則冒冒失失地找他們來，各說各的不好。」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王若水十二月五日的信和對批極左問題的認識。十二月十七日，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毛澤東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參看《周恩來年譜》）這樣看來，「統一口徑」的會，不但開過，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還是蓄意在會上造成「各說各的」局面，陷周恩來於被動。

張、姚的表演

江青講完，張春橋、姚文元就好辦了。他們都表示：「同意總理意見，同意江青同志意見。」好像周恩來和江青的意見是相同的，實際上他們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見。

姚文元講了一些話，都是即興式的插話。他把身子埋在沙發裏，一條腿蹺得高高的，擱在沙發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像說：「你們擁護周恩來，告我們的狀啊！好吧，看誰勝利了？」

張春橋則接過江青的話加以發揮，他的語調很嚴厲：

「怎麼能設想工農兵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呢？上海工人對這篇文章意見大了，覺得受了侮辱。我爲了維護黨中央機關報的威信，一句話都不敢說。……」

張春橋在撒謊。粉碎「四人幫」後，據揭發，參加座談的工人本來不覺得龍岩的文章有什麼問題，但他們被告知：「春橋同志看了這篇文章，覺得不好，認為『不要以為《人民日報》登的都是定論，這一篇就可以討論。』」發言者是根據事先定的調子講的。這證實了當時我們的猜想。

「一方面說，無政府主義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方面怎麼能說群眾搞無政府主義？我說非要反面教員教育不成。叫敵人抓住了！怎麼能說千千萬萬的工農群眾是無政府主義？怎麼能說他們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這是極右的思想！」

今天看來，我所編發的龍岩文章是有缺點的，但並不是如張春橋批評的那樣。龍岩文章並沒有說工農群眾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說無政府主義是這樣的工具。張春橋說被「敵人」抓住了，指的是外電。他是把西方記者都當做敵人的。這種事本來是常有的，不足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報》，而應當怪張姚自己。《人民日報》的文章發表於前，《紅旗》的文章發表於後。張姚對《人民日報》文章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明說，叫《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文章，進行糾正就是了。他們不這樣做，卻通過《紅旗》來公開唱對台戲，這才被「敵人」抓住的。周恩來說黨報黨刊要通氣，正是指這一點。

張春橋試圖對我的兩個論據加以反駁，一是林彪路線的表現形式，一是中央文件的提法。關於前一個論據，張春橋說：「林彪的反黨叛國不僅是實質，而且表現形式也是如

此。他的極右有行動……我認爲只是有些時候，有些問題上表現爲極左，但主要的，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張春橋以爲，既然有行動，那就是表現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動也有公開的行動和秘密的行動。林彪的陰謀行動是見不得人的，和他公開宣傳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後無可奈何之時才投奔「蘇修」，這當然暴露了他的真實面目。但這已經是赤裸裸的叛國，不是通常的黨內路線鬥爭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蘇聯，他還會宣稱這是爲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爲了結束「文革」，用這些好聽的詞句來掩蓋他的權力鬥爭的實質。

關於我提到的中央關於四川問題的文件，張春橋這樣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糾正梁興初批極左，轉移大方向。爲了照顧批極左的同志，才說了那樣幾句。如同你在總理和文元同志之間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樣，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這個人真有意思，從中央文件找根據，從總理找根據。」

在周恩來講話時，我已意識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來的話，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匯報時，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沒有想到，張春橋會說出這樣的話。從總理找根據不行；從中央文件找根據也不行嗎？批「左」還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問題，當然也是原則問題，原則問題能夠「照顧」嗎？中央文件能夠爲了「照顧」一些人而犧牲原則嗎？況且，我怎麼知道那幾句話是「照顧」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顧別人，那麼爲什麼對我又如此不能

容忍呢？

後來我才悟到，張春橋是有一個最高權威做根據的，和這個最高權威相比，周恩來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麼了。

「我跟冷西、魯瑛有次交換意見，說批『精神萬能論』值得研究。我是當做一個問題提出來的。還有『唯意志論』，是蘇聯罵我們的，我們爲什麼用這個詞？『空頭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麼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過。……」

張春橋的這些論點，正是我在信中批評的，但張春橋下面的話使我的心打鼓了：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話，好像我反對批極左。其實那些話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麼，這些話還能是誰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誰頭上了？

姚文元接着說：「主席說，舊的心理學分知、情、意，其實是一個東西。我覺得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講的唯心論的先驗論，最能抓住問題的本質。蘇修罵我們唯意志論，爲何要用敵人的語言？主席還說，在這裏講話，難道我們只有思想，沒有意志、感情？」

從張姚的這個話裏，我推測，毛澤東有一次談話，時間應該在八月八日張姚在《人民日報》社談話之前，內容涉及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

治」。還可以推測，張姚是在獲知毛澤東表示要批林彪的極右路線之後，才趕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語言來說，這叫做「搶旗幟」。這個精神並非中央討論後做出的正式決定，它只是江張姚的「獨家新聞」，不但《人民日報》不知道，也沒有向周恩來透露。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十一月初發出的中央文件還在提反對無政府主義，而十一月份的《紅旗》雜誌也保留了同樣的內容。張姚十二月六日的那次談話，其實就是對我的信的答覆。江青說要先統一一下認識再找我談，不要「各說各的」，但張姚已經知道了毛澤東的看法，所以就搶先說出來了，以表示他們的高明。

下面的談話比較零碎和重複，我只得概括地轉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對這次批評有保留，就窮追不捨）：「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這個問題講清楚。」「你還有什麼話，都講完，不要把時間浪費了。」「這個版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不是批林。」「壞事也可能變成好事。《人民日報》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個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燒身？」

張春橋：「這封信反映出來，不是王若水同志一個人的問題，《人民日報》還有人。這究竟是什麼問題，需要研究。」「我總覺得《人民日報》內部有一股邪氣，一股勢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們報社不但利用總理和我們之間，而且還利用中央、國務院各部分看稿提的意見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這種挑撥，你們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階級鬥爭這個時刻，你站到哪裏去了？」（這句話意味深長，使我一驚。）「還有一種講法，說魯瑛是上海來的。不應該這麼講。這種說法是沒有原則性的。這是林彪的宗派主義的說法。」「理論部來了兩次信沒署名，不署名不好。國際部還署了名。理論部的支部書記是胡績偉。」「理論部我提了好幾次，叫他們討論，爲什麼不討論？」

周恩來：「你對文化大革命有怨氣沒有？有一點吧？稍有一點也不好。」「主席認爲你這封信是不好的。這篇文章不對，這封信超過了這篇文章。當然你寫過《桌子的哲學》，學了一點馬列主義，你是不是都讀進去了？」「王若水同志這封信，一個是把報社形勢看得漆黑一團，像《海瑞罷官》那時的形勢一樣；一個是從中央找空子。要徹底認識這個問題。對上海的好事不贊成。你的錯誤嚴重些說是立場問題。」「如果你確實感覺錯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傳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學的，應當在這方面表現出來。」

批「左」還是批右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至於《人民日報》正式領導班子問題，會上這樣決定的：暫緩成立。魯瑛也訴說了一番他的苦衷，說他實在幹不下去了，建議讓吳冷西來幹。張春橋批評了他，說：「現在叫吳冷西同志出來主管，這是不切實際的。他身體不好，又脫離了一段，這樣子叫他去，非犯錯誤不行。總理和我們都是支持你的，你

爲什麼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適宜繼續擔任看大樣工作，也沒有得到同意。會上還提出這樣一個原則：多讓青年人出來工作。江青說：「要發現新的力量，要讓他們講話，不要怕。」張春橋說：「就在批林問題上分清是非。通過這一場，領導班子可能出來。」還說到《人民日報》的「一股邪氣，一股勢力」要解決。江青說：「要從這篇文章入手，從這塊版入手，從理論部入手。」

會議足足開了五個半鐘頭，從十九日晚八點半開始，到結束時已是次日凌晨二時了。會議結束時，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來的手緊緊握住，努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來的臉變得沒有任何表情。

我能夠理解，在這種場合，周恩來是絕不會、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實情感的。但是，向來是表情豐富的他的臉變成這樣沒有表情，也傳達出某種信息。

這次會議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夠從近距離觀察這幾個高層領導人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在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張春橋、姚文元兩個人分開的，只是覺得張、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們包圍。我還以爲，毛澤東是信任周恩來的，他們之間是完全一致的。從這次會後，我才知道我過去錯了。

這次會議「端正」了《人民日報》社的鬥爭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氣，一股勢力」。首當其衝的是我和胡績偉，還有理論部。一場暴風雨到來了……

一顆新星升起

這次會後，我除了參加整理會議的記錄，做檢討，接受批判以外，暫時還回到北京軍區開會，因為那裏的會議還沒有開完。

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二時，我在睡夢中被叫醒了。是紀登奎找我談話。他似乎也習慣於夜間工作，剛剛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對我很客氣。他說十九日那次政治局會議他沒有參加，因為他有個外事活動。他對我的談話，有幾句我是記下來的：

「我讀過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學》，向部隊推薦過。主席十七日接見我們，還談到了你，說『我認識這個同志』。你知道嗎？不知道？那我不對你說了，因為中央也沒有叫我同你談。不過主席是很器重你的。」

實際上，紀登奎已經在前一天的會上透露了毛澤東十七日對政治局成員談話的精神了。現在許多書上敘述毛澤東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還說：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這是根據姚文元當時作的筆記，比較簡單。我聽到的紀登奎的傳達要多一些，講了兩個問題，大意是：一是形勢問題。林彪事件後，部隊有些灰溜溜。當前形勢是一團漆黑，還是略有光明？另一個是批林問題，林彪路線是極右。在這裏說到，收到王若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

寫過《桌子的哲學》。他在信中提出批極左思潮，我看也並不高明嘛！

「並不高明」這個話，同「器重」顯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澤東對我有好評，但那是過去的事了。紀登奎大概不知道十九日晚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具體情況，否則也許他不會對我這樣說話。

後來外面傳說，毛澤東對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說，《桌子的哲學》的作者並不高明。據我所知，這就是毛澤東十七日講話的內容，並不是批示。毛澤東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請政治局辦」幾個字，這就是周恩來說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給我們辦」。毛澤東已經肯定了要批右這條原則，但「並不高明」這個批評，並不是那麼嚴厲的。政治局如何辦，是有頗大機動餘地的。周恩來顯然是想嚴格按照「並不高明」四個字的字面意義，說我是認識問題。然而江、張、姚卻想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他們這樣做也不是毫無根據。我在信中批極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總理的指示。毛澤東直接批評的是我，間接批評的誰呢？

這件事的含義，在紀登奎和我談話的第二天就看出來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軍區黨委會議結束，中央首長接見。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個王洪文。葉劍英在講話中提到接班人問題，說：「主席從六四年起就講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貧農出身，參

加抗美援朝，又當過工人，三十多歲；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養。」

周恩來的講話傳達了毛澤東的意圖，他說：「毛主席說，外國人說我們年紀大了，寄希望於年輕人。其實老的中間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見，是要搞些年輕人當軍委副主席、黨的副主席。」接着周恩來說：「我講一講，讓你們有個精神準備，讓你們震動一下，看你們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滿，也會摔跤。主席講年齡要在三十到四十之間，工人農民。」這時，全場的眼睛都注視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本來已經很左了，卻仍要反右。這樣的事建國後發生過多次了。從大的說，這次事件以前有批彭德懷的例子，在這次事件之後有「批鄧」的例子。爲什麼會這樣呢？

後來我才省悟，批左會產生一連串問題：如果林彪路線是極左，那麼有沒有一條與之對立的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呢？這兩條路線是如何鬥爭的呢？「九大」是哪條路線的勝利呢？這樣一來，不僅會批到江、張、姚頭上，甚至難免會否定「文化大革命」，會有損毛澤東這面旗幟。即使主張批左的人（如我們）主觀上絲毫沒有這種企圖，但是事情的發展會有它本身的邏輯，不以個人的意志爲轉移。比如批「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空頭政治」，這些錯誤難道只屬於林彪嗎？張春橋說「大亂」、「紅衛兵造反」，「停止黨的組織生活」，這些都是毛主席號召的，是毛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他要這樣辯護，正因爲害怕有人會說這是無政府主義；而他之所以害怕，正因爲這些事情確實是

無政府主義。如果說毛澤東也有這樣的擔憂，是不奇怪的。

毛澤東講漢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

從這次事件後，周恩來就不再過問《人民日報》的事了。接着，一九七三年，《人民日報》社展開了一場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績偉爲代表的「一股邪氣，一股勢力」的運動，其聲勢之大，時間之長，是報社歷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過。我想，區區我這樣的幹部，值得這樣大動干戈嗎？他們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誰呢？

從那時開始，我已預感到周恩來的前途多舛了。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次毛澤東在聽取姚文元匯報《人民日報》情況時，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對《人民日報》編委會的一次談話，說他當時講過漢宣帝批評太子劉爽的故事。毛澤東說：看來他們沒有聽進去，或者沒有聽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把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談話整理一份記錄給他。當年聆聽過那次談話並仍然健在的人有四個：胡績偉、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們在一起回憶談話的內容。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毛澤東召見《人民日報》編委會成員（當時我不是編委，因毛澤東點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當衆批評鄧拓。那是爲「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方針宣傳的事。毛澤東在那次接見中發了很大的脾氣，批評鄧拓「專唱反調」，「死人辦報」。在狠狠批評了一通鄧拓以後，他又對着幾個副總編輯說：

「難道你們都同意他（指鄧拓）嗎？是不是鄧拓會團結人，你們的意見都那麼一致？幾個副總編輯像鐵板一塊，不敢批評他，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有意見可以爭論嘛！要敢於給鄧拓提意見，頂多撤職。爲什麼一點風都不透，沒有一個人寫信給中央報告情況？你們只要不到馬路上去鬧，什麼意見都可以講。大概鄧拓有德，你們不忍心反對他。……」

毛澤東說到西漢後期的幾個皇帝——「元、成、哀、平」，每況愈下；說到這裏，他轉過臉對鄧拓說：

「我看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當時我們都很驚訝，不知毛怎麼會冒出這樣一句話。我看他滿屋都是線裝書，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讀得入迷了，看到鄧拓一副溫文爾雅的樣子，就想起劉爽。

雖然時隔十五年，但因爲是毛澤東的談話，印象還很深。毛在這次確實講到了漢元帝（即劉爽）；但我們四人都不得記得毛澤東當年講過漢宣帝批評他的故事。看來是毛澤東自己記錯了。*

漢元帝即劉爽，史稱他「柔仁好儒」。毛澤東講的那個故事見之於《漢書·元帝紀》。劉爽作太子時，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

噤辭語爲罪而誅」，有一次吃飯時說他父親「持刑太深」，建議宣帝用儒生。宣帝變了臉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評了一通儒生的無用，說：「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說完嘆了口氣：「亂我家者，太子也！」

毛澤東有沒有在一九五七年講過這個故事，並不重要，反正他兩次提到了漢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從這個故事中悟到了什麼，他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什麼。

劉爽的立場是儒家，而宣帝對他的批評是法家觀點。刑名之學屬於法家。劉爽認爲他父親「持刑太深」是因爲採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繩下」的辦法，所以建議他用儒生。在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上，儒家和法家是爭論很激烈的。他們之間的一個重要爭論點是：儒家講「王道」，強調仁義教化，而法家講「霸道」，認爲「仁義不足以治天下」，主張用嚴

* 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據說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對《人民日報》負責人的談話，說：「歷史上不是提什麼『文景之治』嗎？實際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維持會，庸碌無能。從元帝開始，每況愈下。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他說他父親持刑太深，主張起用儒生。宣帝生氣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並說：『亂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敗。」我要說明的是，這個講話記錄是我在一九七三年根據在場的人的回憶整理的。整理稿上本來沒有宣帝批評太子的故事，是後來有的同志建議：索性順着毛主席的意思，把這個故事加上去。這才在定稿時添上。稿子的另一處修改是刪去了毛澤東當時表揚我的話。

刑重罰治國。

據史書載，漢宣帝對太子劉爽這一次講的話如此老大不高興和憂心忡忡，以至於從此對太子疏遠而喜歡好法律的次子劉欽，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劉欽為太子。毛澤東講這個故事，是意味深長的。

然而劉爽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建議的呢？

宣帝在晚期濫殺好人。被殺的或是能臣，或是賢人，不過是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慘遭殺身之禍；其中震動最大的殺大臣蓋寬饒和楊惲。

蓋寬饒是司隸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樸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許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當時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蓋寬饒上書反對，講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惱火了，下令逮捕。蓋寬饒用佩刀自刎。百姓無不痛惜。

楊惲的父親當過宰相，他本人是個廉潔無私的人，但也結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報告，說楊曾經說過「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場」等對皇帝不敬的話。楊惲被貶為平民。楊惲回到家鄉後，沒有閉門思過，做出一副惶恐可憐的樣子，反而大興土木，廣交賓客，毫不收斂。這就犯了忌。朋友寫信勸他，楊惲回信說：「我自問罪過很大，行爲也有欠缺，決心當一輩子農夫，所以帶着妻子兒女種田。現在我受到懲罰滿三年了，自己過過快活日子，也不圖富貴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書，說楊惲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

辦。搜家時，查到了這封信稿。於是楊惲被判大逆不道，腰斬。

這兩件事，前一件事發生在紀元前六十年，劉爽十八歲；後一件事發生在紀元前五四年，劉爽二十四歲；顯然都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劉爽是在楊惲被殺的第二年對宣帝提意見的，這就是他說話的背景。蓋寬饒、楊惲都是有德的人，不過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嚴，宣帝就容納不下，非要置於死地，也難怪劉爽要說一句「持刑太深」了。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是宣帝告訴兒子的統治秘訣。其實，這不僅是「漢家制度」，以後各個朝代，莫不如此；口頭上是尊儒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實際上使用嚴刑峻法，所謂「陽儒陰法」是也。專制君主並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揀其中對他有用和他所喜歡的來實行。平心而論，法家並不是只要刑罰，而是要有賞有罰；刑罰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謂刑名，就是循名責實，而定賞罰。刑罰的目的是消滅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殘民以逞」。所以，不當罪而誅，是違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義，法家希望君主依法辦事，都是不那麼容易的。在專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實現的，只不過成了王朝統治的兩種互相補充的工具而已。

毛澤東對宣帝批評太子的話很欣賞，可是對漢宣帝的枉殺良臣，他卻沒有任何批評的表示。在他眼中，誰不滿意「文化大革命」，誰就是「是古非今」；誰不贊成「階級鬥爭為綱」，誰就是純粹講「王道」。一九七二年批評我的信，矛頭直指周恩來；這和一九五

七年罵鄧拓，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欣賞法家，只是因為他認為法家講專政，他自己卻是不受法律約束的。他不但從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訓，反而自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如他。一九七二年的這件事，可以說是一九七四年「評法批儒」的先聲。毛澤東不讓周恩來作繼承人，固然可以說是因為周恩來已患惡疾，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擔心周恩來將會糾正「文革」的錯誤。周恩來不是儒家，他也不是像漢元帝那樣無決斷力的人，但他內心深處傾向溫和路線，這樣，他不為毛澤東所喜歡就是自然的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周恩來九十誕辰前夕脫稿）

（一九九八年四月修改補充，紀念周恩來誕辰百周年）

評毛的一段曲折

「所以，我說，若水同志，不要……不要……」

胡喬木無法「不要」下去了，他的聲音哽咽，他的兩眼含淚，停頓了十幾秒鐘。會場上一片寂靜，大家都看着他。

起草決議產生分歧

這是一九八〇年在北京萬壽路的一個招待所裏，參加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成員開會，聽胡喬木講他的意見。胡喬木在涉及到對毛的評價問題時，講了一大通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希望我對毛澤東不要批評得太多。講到這裏他動了感情，但也許兼有一點老年人的病態。我已不是第一次看見他有這種表現了。

胡喬木是毛澤東的忠實追隨者。文革後期，他響應毛的號召起來揭發批評鄧小平。文革結束時，胡喬木和胡繩、吳冷西等人都是投靠華國鋒的。一九七八年，《人民日報》發表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文章後，吳冷西打電話給《人民日報》，批評這篇文章「很壞很壞」。《人民日報》有個編輯在社會科學院召開的會議上嘲笑了吳冷西。胡喬木當時是院長，爲此事還把我叫去，表示不滿，「不就是一個電話嗎？」但後來「實踐派」勝利了，胡喬木轉了過來，又提議《光明日報》給這篇文章的作者發獎。

接着又出現了怎樣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分歧。一九七九年初，我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說不僅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效果是不好的，毛發動文革的動機也是不好的；對毛的品質提出了質疑。在另一次發言中，我還提出，我們不能完全肯定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中正確的部分我們擁護，但毛澤東思想也有錯誤部分，要一分爲二。別的與會者也提出了對毛的批評意見。李洪林作了《領袖與人民》的發言，後來還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當時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完全合理的。既然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既然否定了文化革命，那麼順理成章地接下來，應當是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批判的檢查，分清那些是對的，那些是不對的。

不能丟掉毛澤東這面旗幟

然而高層領導人不高興了。他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一面旗幟，不能丟。三月份，鄧小平對會議作了講話，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稿是胡喬木負責起草的。其中說到，「有些同志說，我們只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我們堅持的和當作行動指南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
本原理，或者說是由這些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系。至於個別的論斷，那麼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都不免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但這些都不屬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

鄧小平認為，問題在於對毛澤東思想作「完整準確」的理解。他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上說，「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到起草歷史問題決議時，他仍然說，要對毛澤東思想作出完整準確的解釋，這樣來統一全黨思想。但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指導思想並不是一個別論斷，而是有一套體系，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無論怎樣「完整準確」地解釋也是錯的。如果這是毛的早期觀點，那好辦，可以說那時毛澤東思想還沒有成熟。偏偏這又是毛的晚期理論。毛澤東本人很重視這個理論，認為這是他的思想的重要部分，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因此他同意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個里程碑」。他到死也沒有改變這個觀點。如果說這不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本人會同意

嗎？又要堅持實踐標準，又要先驗地堅持毛澤東思想，這就陷於矛盾。

到開始起草「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我提出一個意見：是不是把毛澤東後期的思想從「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中分出來，稱之為「毛澤東晚期思想」，並對這個晚期思想加以批判。胡喬木一度接受了這個意見，並讓我起草這一節。但後來，這一部分作廢了。

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作出了三個決定，一個為劉少奇平反，二是起草歷史問題決議，三是公審「四人幫」。這三件事，目的都是想給粉碎「四人幫」和結束文革以完全的合法性，從黨的歷史上肯定下來，防止再出反覆。但是，這三件事都碰到毛澤東這個難題。《人民日報》起草了一篇為劉少奇平反的社論，胡喬木把題目改為《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他還很得意，可讀者給《人民日報》寄來了一大堆信，提出批評。他們首先對題目覺得莫名其妙，好像不是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或者是毛澤東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說，這好像不是為劉少奇平反，而是為毛主席平反；有的反問，為什麼不說是恢復劉少奇的本來面目，或者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審判「四人幫」，也不能不牽涉到毛澤東。江青看準了這一點，一口咬定：「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至於起草歷史問題的決議，評毛更是中心問題。開始時，陳雲說，「要在這一代完成評價，把毛主席的功過是非一個釘子一個眼地定下來。」胡耀邦說，「成績要講夠，錯誤要講透。」但講成績容易講錯誤難。

從科學態度說，錯誤要講透；從政治上考慮，似乎就不行了。所以，鄧小平、陳雲先後多次對起草小組發出指示。陳雲提出要專門加一篇，講解放前的歷史，寫黨的六十年，以便突出毛主席的功績。鄧小平至少講了九次話，中心意思是不能丟掉毛澤東這面旗幟，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他看了一次決議草稿，說「不行，要重新來」，因為這一稿對毛的批評較多。鄧說：「在前一段時間裏，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於是，毛的錯誤愈改愈少，對毛的成績愈講愈多。本來，這個決議只是針對文革的，後來爲了要突出毛的功績，就從建國時講起。實際上已經不是對「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是一篇建國以來的歷史大綱了。

最後拿到四千高級幹部的會議上討論，普遍地是不滿意，認爲對毛批評得不夠。會上一些老幹部談到毛時火氣很大，意見十分尖銳。有人說毛主席和曹操一樣，「寧願我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我」。有人說：「什麼文化大革命？這是文化反革命！」有人糾正道：「不對，是武化反革命！」許多人批評胡喬木的起草工作，甚至說，「是不是因爲你作了多年毛主席秘書，怕牽涉到自己啊？」

儘管有這樣多的反對意見，但鄧小平、陳雲等的決心已定。胡喬木表示要「力排衆議」。他後來有一次對外賓誇耀：我們的歷史決議，曾在四千多人中徵求意見，可見我們黨是多麼講民主。他沒有說，鄧、陳兩位講的才算數，這四千多人的意見基本上等於白

說，雖然採納了一些具體意見，但最重要的批評並沒有接受。

最後，這個決議提出了一個奇怪的說法：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檢驗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要「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爲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這是胡喬木的發明。就是說，只有正確的才是毛澤東思想，不正確的就不是毛澤東思想。我曾經評論說，這意思是：毛澤東思想是沒有錯誤的，而毛澤東的錯誤是沒有思想的。

我曾在一九八三年寫了一篇批評毛澤東關於「一窮二白是好事」的觀點的文章。鄧力群指責我批評毛澤東思想。我說我沒有批評毛澤東思想，我只是批評毛澤東的錯誤。

用這種辦法去定義一個人的思想，無論如何是不行的。此例一開，國民黨也可以說，孫中山思想不包括錯誤在內；擁護斯大林的人也可以說，斯大林的思想不包括他的錯誤觀點。這樣一來，豈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思想、主義都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嗎？

一九八三年初，秦川（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和我一起到醫院見胡喬木。那年是毛九十周年誕辰。秦向胡匯報了《人民日報》的宣傳計劃——準備出四十個版。胡喬木曾多次批評《人民日報》對「四項基本原則」宣傳不力。我們滿以爲，這一次胡喬木會點頭表示讚許，至少他不會批評我們不重視。出乎意料的是，胡的反應冷淡。聽完匯報後，他表示：四十個版太多了，「那麼多文章，誰看？」「九十周年出四十個版，一百周年豈不

要出一百個版？」

接着，胡喬木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紙來。那上面是他事先開好的十個社論題目，都是宣傳即將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的。

說實話，我當時對他的少宣傳毛的意見是贊成的。但這樣直率地說話，在胡喬木是極少有的。我只是奇怪他爲什麼變了，三年前他對我說話還是那樣語重心長，老淚欲垂啊。

我繼而一想，毛畢竟死了六年了，而鄧還健在。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附錄

附錄一

一九二一年*

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一部充滿痛苦和屈辱的歷史。先進的中國人，千方百計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向西方學習；開始還只是感到西方的「船堅炮利」，後來才認識到還要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這種背景的產物。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滿清，按照西方國家的榜樣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國家。就後一點來說，這個革命失敗了。但是，向西方學習的浪潮並沒有停止。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提出「科學」「民主」兩大口號，這個「民主」，指的是

*編注：附錄所收的三篇文章（本文及《民主·引論》、《王實味文字獄剖析》所探討的範圍，原來並未包括進作者一九九六年十月重新修訂的寫作框架。九十年代初，作者探討毛澤東發動文革之謎，只是上溯到赫魯曉夫情結，後來，延伸到延安整風。而在研究延安整風如何樹立毛的絕對權威時，作者又發現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蘇區肅反。通過對蘇區肅反資料的研讀，他又開始往前推進到蘇聯肅反，以及中共建立之初對俄國革命的解讀和借鑒。這個過程，反映了作者研究過程中不斷追根溯源的思考軌迹。

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即立憲共和。

那個時期，西方的各種思潮紛至沓來：亞當斯密、約翰穆勒、尼采、托爾斯泰、赫胥黎、達爾文、斯賓塞、盧梭、孟德斯鳩、克魯泡特金……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受到注意。原因很簡單：馬克思主義被認為不適合中國的國情。馬克思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產生的種種弊病和苦難，是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私有制帶來的人的異化，而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反對資本主義的問題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從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病來批判地看待資本主義。接着，十月革命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國。中國知識分子把眼光從西歐、美國移向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次年，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三篇文章，歡呼「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

在此之前，中國人並看不起俄國。儘管中國也被俄國欺負，中國人仍覺得俄國不是一個先進的國家，很少有人覺得要向俄國學習。十月革命帶來的福音，使中國人覺得要對俄國另眼相看了。

中國要走俄國的道路嗎？

俄國的情況是怎樣的呢？當資本主義社會在西歐正被認為走下坡路時，在俄國，資本

主義還剛剛起步。俄國仍然是農業國，還沒有實現工業化。這些，和中國的情況有些相似。連列寧也承認：「俄國在許多重要方面無疑是一個亞洲國家，而且是一個最野蠻的、中世紀式的、丟人地落後的亞洲國家。」（《列寧選集》第二卷，二九〇頁）這個話是列寧在一九一二年說的。

十九世紀末，有些學者還在探索俄國能否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俄國的一個特點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數左右仍然是農民公社的公有財產。這種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國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呢？

老年馬克思曾應俄國學者的要求，研究了這個問題。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論俄國的社會問題·跋》中又相當詳盡的論述了這個問題。

恩格斯的回答實際上是否定的。「俄國的公社存在了幾百年，在它的內部從來沒有出現過要把它自己發展成高級的公有制形式的促進因素。」「事實上，從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農業共產主義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除了本身的解體以外，都沒有從自己身上生長出任何別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四四一頁）「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解決只有高得多的發展階段才產生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和衝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同上書，四四二頁）

聯繫到一九五八年中國建立的「人民公社」，問題是一樣的。

在十九世紀末，不要說俄國，甚至在西歐，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也被推遲了。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在他逝世前幾個月追述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的西歐情況說：在當時的情勢下，馬克思和他都絲毫不懷疑，偉大的決戰已經開始，而結局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恩格斯承認，歷史表明他們錯了，當時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同上書，五一〇頁）

這個話是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寫的序言中說的，恩格斯繼續說：

「歷史表明，我們以及所有和我們有同樣看法的人，都是不對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程度；歷史用經濟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從一八四八年起經濟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切都是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可見這個基礎在一八四八年還具有很大的擴展能力。」（同上書，五一二頁）

大家都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一種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生產力全部發揮出來以前，是不會滅亡的。

甚至在馬克思死後，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仍在發展，證明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形態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沒有全部發揮出來。由此可見，《共產黨宣言》中宣告的「資

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二七八頁）這個論斷是過早了。恩格斯在上面的話，是較清醒的對現實的初步承認。

在二十世紀初，俄國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根據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引用的一八九七年的調查材料，當時經營農業的人口約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這一點有力地說明了俄國資本主義的落後。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同樣斷言俄國不能避免資本主義道路。他在《兩個策略》中說：

「馬克思主義絕對相信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那些對俄國說來是勢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會經濟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來說，不僅不會摧毀資本主義，不僅不會摧毀資產階級的統治，反而會第一次為資本主義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即歐洲式的而不是亞洲式的發展，真正掃清基地，第一次使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統治成爲可能。」（同上書，五五四頁）

列寧批評民粹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關於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夢囈。「除了資產階級自由和資產階級進步的道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無產階級和農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同上書，六一六頁）「除了使資產階級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像俄國這樣一些

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因此，資本主義的最廣泛、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同工人階級有絕對的利害關係。」（同上書，五五六頁）

當然，列寧認為這樣的革命要有工人階級來領導並在勝利後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但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的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同上書，五四八頁）「它不能觸動（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一系列中間階段的話）資本主義的基礎。」（同上書，五四七頁）

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列寧就發動政變，來了一個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業收歸國有。那時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遠沒有完成，而且並沒有「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更談不上「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就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範圍，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在《兩個策略》中提出過要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可是列寧並沒有提到這個過渡的經濟條件，而這本來是最重要的。

然而不管怎麼說，十月革命勝利了，布爾什維克掌握政權了。

這個事件似乎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不對的。俄國並不是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勝利地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

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改變。陳獨秀斷言：「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一定的軌道，中國也難以獨異的……我以為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

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能夠很快實現社會主義嗎？陳獨秀樂觀地說：

「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共和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國慶紀念的價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三號）

陳獨秀本來相信民主加科學就可以救中國。他在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仍然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黑暗。」（《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到了這一年的年底，他改變了。是什麼東西使得陳獨秀從民主主義者變為共產主義者？

一個重要原因是共產主義似乎提供了更高遠的理想。這時的陳獨秀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新青年宣言》，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這種理想的社會，顯然不是資

本主義社會能達到的，而應該是一種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進步的社會。這並不意味着拋棄民主，而是追求更高階段的民主。陳獨秀開始認為，民主是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民主高於資產階級民主：「十八世紀以來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興財產工商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帝王貴族要求權利的旗幟。」「如今二十世紀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興無產勞動階級，因為自身的共同利害，對於征服階級的財產工商界要求權利的旗幟。」（《告北京勞動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晨報》）

這個理想雖然高遠，卻似乎並非不切實際：俄羅斯的例子不是證明嗎？

「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

這既不是「革命壓倒啓蒙」，也不是「救亡壓倒啓蒙」；這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壓倒西方民主自由的觀念。

一九二〇年九月，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到中國，發表文章，認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開發實業，發展資本主義。張東蓀也著文，說：「中國的物力太窮乏，而窮乏的原因不是純由於資本主義。故救窮也不當專在打破資本主義一方面下工夫。」又說，中國的資本主義方在萌芽，應該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政治及資產階級的經濟，然後才說得上社會主義。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張東蓀、梁啟超等挑起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的爭

論。他們的說法是：中國經濟落後，「缺少真正之勞動者」，大多數人民無知識，因此絕對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勞動階級身上，「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也不能建立共產黨。和胡適不同，他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壓迫是中國落後的根源，但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症就是窮，救治的辦法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實業。他們說，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自然的趨勢」，紳商階級的發生「是個潮流，不可能抵抗」；至於發展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弊病，則可以通過「溫情主義」、「勞資協調主義」加以「矯正」。他們自稱信奉基爾特社會主義，贊成社會主義理想，但又斷言中國必須依靠「紳商階級」來發展資本主義。

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人紛紛發表文章，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辯護。他們說：十月革命後，整個世界已處在「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中國若要發展資本主義，實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這不僅「理所不可」，而且「勢所不能」；同時，中國早已是「萬國的商場」，國際帝國主義是不允許中國發展自己的實業的，中國要獨立地發展資本主義，同帝國主義進行「經濟戰爭」，只不過是空想；用「溫情主義」的社會政策來「矯正」資本主義的弊病，也只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幻想。馬克思主義者承認中國必須發展實業，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態，但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的出路在於社會主義。

如果這些人當時讀到了列寧論述孫中山的文章，他們會怎樣想呢？

列寧批評孫中山說，他的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產階級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列寧選集》第二卷，二九二頁）列寧說，孫中山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但他的土地國有化的政策卻只是摧毀封建主義，而對於資本主義來說，卻會使之獲得最迅速的發展。列寧一方面高度評價孫中山，說他不同於西方的資產階級人物，而是「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同上書，二九二頁）另一方面批評孫中山認為中國可以防止資本主義，認為中國既然落後就比較容易實行「社會革命」的看法，都是「極其反動的空想」。（同上書，二九四頁）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不同的國家和人民引起不同的反應。資產階級不消說是恐懼和仇恨，但在進步的左派知識分子中，反應也是不同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老資格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他們不像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那樣，對俄國革命採取非批判的態度，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來對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和實踐進行審查。用盧森堡的話來說，「把俄國革命放在它的全部歷史關係中進行批判的探討。」（《盧森堡文集》，人民出版社，四七七頁）當然，這種批判的探討，仍然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的。

盧森堡和考茨基一派不同，後者認為，俄國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只適合推翻沙皇制度，但俄國的社會條件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盧森堡是肯定這場革命

的，她熱情歡呼：「這是工人階級專政的第一次世界歷史性試驗。」（同上書，四七六頁）

但正因為這樣，盧森堡認為俄國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是完善的。當陳獨秀對俄國的所謂無產階級民主歡呼的時候，對俄國的現實情況有更多了解的盧森堡卻對布爾什維克取消民主，實行恐怖統治的做法提出了批評，認為：獨裁暴力，嚴酷的處罰，恐怖統治，這一切不僅只是治標的辦法，而且是敗壞道德的；正確的辦法應該是最廣泛的民主。

「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的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着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日益限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着和統治着，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中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小集團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就是說，純粹資產階級意義上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同上書，五〇四頁）

盧森堡認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這一專政必須是階級的事

業，而不是極少數領導人以階級的名義實行的事業，這就是說，它必須處處來自群眾的積極參與，處於群眾的直接影響下，接受全體公眾的監督，從人民群眾日益發達的政治教育中產生出來。」（同上書，五〇五頁）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附錄二

民主·引論

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

一八九九年，列寧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黨」。他在一九〇二年發表的《怎麼辦？》中系統地闡述了這個主張：在俄國這種專制國家，革命組織必須是一種密謀組織，必須嚴格選擇成員，培養職業革命家。列寧回答那種主張實行「廣泛的民主原則」的意見說：民主原則包含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完全的公開性，二是一切職務經過選舉。這在具有政治自由的國家的黨，例如德國社會黨，是可以做到的，但在俄國的專制制度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只是一種「毫無意義而且有害的兒戲」。（《列寧選集》第一卷，三四八頁）

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以列寧為首的「火星派」同馬爾托夫一派在組織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馬爾托夫主張「自治制」或「聯合制」，即

建立一個鬆懈的，容許各種成份的黨。列寧認為，這樣的黨不能適應革命鬥爭的需要，應該建立一個一元性、戰鬥性和組織嚴密的黨，即「集中制」的黨。列寧要求的不僅是組織上的集中，而且是思想上的統一。這次爭論導致俄國社會民主黨分裂為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兩派，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勝利。

由此可見，列寧最初的確是在某種程度上把集中制作為民主制的對立面提出的。當時列寧只提「集中制」，後來才加上「民主的」這個定語，成為「民主（的）集中制」，與「官僚主義的集中制」相區別。一九〇六年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章規定：「黨的一切組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

在當時的條件下，列寧是對的。一個在專制主義國家進行暴力革命的黨，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和鐵的紀律；否則不但不能奪取政權，連自身的存在也不能維持。集中制的建黨原則，是適應當時的情況的。布爾什維克這種類型的黨的領導，保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

問題在於，這個本來只適用於一種特殊情況的制度，以後卻被推廣為一條普遍原則。一九二〇年，舉行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提出了《加入國際的條件》，把布爾什維克的經驗推廣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文件的第十三條說：「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的。在目前激烈的國內戰爭年代，共產黨必須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在黨內實行軍事紀律那樣的鐵的紀律，黨的中央機關必須擁有廣泛

的權力，得到全體黨員的普遍信任，成爲一個有權威的機構。」（《列寧選集》第四卷，三一—三二頁）

從那以後，民主集中制就成爲所有加入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可動搖的原則。

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僅推廣到各國共產黨內部，它也適用於整個共產國際，就是說，共產國際與其成員的關係，也要照此辦理。共產國際實際上是一個統一的國際性的黨，每個成員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接受國際的一切決議和指示；其關係是上下級關係，而不是各個黨的聯合組織。

不但如此，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還被擴大爲整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機構的指導原則。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寫的《國家與革命》中就把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政權稱爲「最徹底的集中制」。（《列寧選集》第三卷，二一六頁）

一九一八年，成立了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按照憲法，它包括了八個自治共和國和十三個自治州。雖名爲聯邦，集中的程度卻很高，地方政府並無多大權力。列寧認爲各民族應該走向融合，他把這種融合爲一個民族的狀態稱爲「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儘管列寧在臨終前覺悟到對解決民族問題不能操之過急並從而批評了斯大林，但他還是把聯邦制設想爲向「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過渡階段。

民主集中制是列寧的思想，並不屬於馬克思。過去蘇聯理論界追隨列寧，把這說成是來自馬克思的思想，這是缺乏根據的。

恩格斯寫過一篇《集權和自由》的文章。他說：每個國家，不管政體如何，都需要某種集權，問題只在集權的程度。在一定的條件下集權「有其存在的歷史的和合理的權利」，正因為這樣，國家就總是以集權的需要為借口，無限擴大自己的權力，消滅個人的自由，使自己成為至高無上者。因此，「集權的歷史是同專制的歷史平行發展的」。

恩格斯的這個思想是和馬克思一致的。馬克思認為：「民族的統一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三七頁）

從這裏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關心的是避免權力的異化。他們認為，國家起初是社會的工具，是保護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後來逐漸脫離社會而獨立，成為凌駕在社會之上的統治力量，這就是異化。這種危險，即使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仍然存在。為了防止無產階級的代表和官吏由社會的公僕變為人民的老爺，他們總結了巴黎公社的經驗。這就是：（一）普選制；（二）低薪制。這個經驗不能說是完備的；例如，這裏沒有提到青年馬克思捍衛過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巴黎公社存在的時間畢竟太短了，不足以從

中總結出成熟的經驗，馬克思以後也沒有把這個論點加以發揮。到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在批評《愛爾福特草案》時，仍然聲明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這個觀點為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普遍接受，以致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提出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時，遭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許多批評。幾十年實踐經驗證明，蘇維埃的形式是失敗的。

列寧提出民主集中制，本意是克服黨員的毛病。以後到斯大林和毛澤東，卻蛻化為一種強求統一思想，推行錯誤路線和整人的工具。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

附錄三

王實味文字獄剖析

在延安整風期間，中央研究院的整風是出了名的，而中央研究院的整風之所以出名，是因為出了王實味*事件。王實味事件開了中共黨內文字獄的一個先例，它不但引發了當時的審幹運動以及「搶救」運動，而且樹立了建國以後的多次政治運動的模式。因此，對這個事件作一個個案分析是值得的。

李維漢說：「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整風和發揚優良傳統的一個典型。」「延安整風教育了整整兩代人，也就是當時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北京，四七九頁）一些當時的青年人後來回顧整風，也說是

*王實味，河南人，一九〇六年生。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學文學學院預科。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失去聯繫。後因繳不起學費，未能畢業。一九三〇年開始創作和翻譯小說，靠稿費為生。一九三七年重新入黨。同年十月去延安，分配到馬列學院編譯室。後馬列學院改組，王實味又調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

自己「深受教育」，「終身難忘」。那麼，這個教育，真的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那樣是一次偉大的思想啓蒙運動嗎？

整風的主要對象，本來是要解決黨內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要批判以王明爲代表的教條主義的路線錯誤，這主要體現在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身上，其中包括留蘇的知識分子。那麼爲什麼轉向了新來的知識分子呢？

二篇文章的背景

中央研究院是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級研究機關，直屬中央宣傳部。中宣部長張聞天兼任院長。當時張聞天率領一個農村調查團到陝甘寧邊區和晉西北的農村去作調查了，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代張聞天領導中央研究院工作。李維漢也兼任兩個研究室的主任。

延安中央研究院主要是由兩部分人員組成的：大部分是原馬列學院留下的同志；少部分是延安其他單位選送並經過考試擇優錄取的。人員的基本情況是：從未做過任何工作的佔百分之六十八，來延安後受過短期學校培訓的佔百分之八十四，抗戰以後入黨的佔百分之七十四，二十至三十歲的佔百分之七十九，知識分子出身的佔百分之八十二。因此，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新黨員。李維漢說：他們的革命熱情很高，但世界觀基本未改造，「很多事情他們沒有經歷過，革命的道理也不太懂，也不真正了解我們

的黨。」（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四七九頁）

是的，他們不了解共產黨。

斯諾的《西行漫記》當時起了很大的作用，那裏描繪的延安充滿了對革命青年的吸引力。延安就是未來新中國的雛形。在那裏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等級制度，人人平等，人人可以自由呼吸和自由歌唱。延安的寶塔山上的寶塔就像克里姆林宮塔尖上的紅星，象徵着光明。

和左傾關門主義不同，毛澤東懂得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知識分子。（《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九年，大批左翼青年知識分子投奔延安，此外還有一些知名的文化人。一九四四年春毛在一次講話中，說「延安有六、七千知識分子」，這給了我們一個大概數字。這些文化人的絕大部分都是抗戰爆發後一兩年從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匯集到延安的。他們有的是受黨組織的派遣，更多的則是出於對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二五一頁）毛澤東對其中的代表人物優禮有加，甚至交上了朋友，丁玲和蕭軍都是例子。

延安文化界有以周揚爲首的「魯藝派」和以丁玲爲首的「文抗派」。一九三九年，周揚擔任「魯藝」副院長，實際主持魯藝工作，在周揚的周圍逐漸集合了何其芳、周立波、陳荒煤、沙可夫、沙汀、劉白羽、林默涵、賀敬之等。一九三九年五月，經張聞天同意，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文抗）成立，主要成員有丁玲、蕭軍、舒群、艾青、白朗、羅烽等。兩難人經常在延安打筆墨官司。在這種紛爭的背後，實際上存在兩種創作思想的分歧。周揚稱「魯藝派」主張「歌頌光明」，而「文抗派」主張「暴露黑暗」。（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三三八—三三九頁）

其實，文化界對延安生活產生的某些不滿，並不是由於他們出身於非無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而是由於他們天真地完全相信了共產黨宣傳，對邊區懷着浪漫的幻想。他們所受的思想影響，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在他們那裏，五四的口號「民主」與「科學」和馬列主義是一致的。馬列主義就是科學，而蘇聯的民主比西方國家的民主要民主萬倍。

關於整風的主要對象，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致聶榮臻的信中說得很明白：「此次整風是全黨的，包括各部門各級幹部在內……所謂各級，就是不但有下級，而且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只要把他們教育好了，下級幹部的進步就快了。」因此，外來的知識分子，本來不是整風的主要對象。不但如此，毛澤東看到他們受老幹部歧視，還要借助他們的力量來整一整老幹部。

「整頓三風」包括整頓宗派主義。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將「宗派主義」解釋為排斥、歧視知識分子的「首長本位觀」：

宗派主義現在也有。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義是排擠非黨幹部的一種風氣，即排外主義。同時也排內。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解放日報》在社論中遵照毛的口徑，批評宗派主義「對於黨內的同志則輕視疏遠，少團結，少幫助。對於黨外幹部，則少了解，少關心。對『三三制』的實行，又是不堅決、不徹底」。

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由胡喬木撰寫，經毛澤東修改的一篇社論。這篇社論用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標題：《教條與褲子》。其中批評一些領導幹部（包括留蘇知識分子）在運動中不願觸及自己。「他們高叫道，大家要洗澡啊，大家要學習游泳啊，但是有些什麼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了，他們總是不肯下水，總是不肯脫掉褲子。」

「於是你也來呀，我也來呀，大家把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尾巴割下來呀，大叫一通，割尾巴完事，那麼我們的黨豈不就十全十美了嗎？可惜尾巴是叫不下來的。大家怕脫褲子，正因為裏面躲着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又必須用刀割，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

「延安的某些幹部與名流，難道不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大師嗎？他們現在真的是已經覺悟，已經轉變，查有實據了嗎？」

「有些好心的同志說，褲子是要脫，但是只能秘密地脫，在群眾面前脫不但有傷大雅，而且敵人和反共分子還會在旁邊拍手。但是群眾難道不是共產黨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監督者和審查者嗎？……自然，敵人的宣傳機關如同盟社和各種漢奸報紙之流，一定會借此製造更多的謠言。但是他們是以造謠為生的，他們說是黑，群眾就知道一定是白，所以他們的斷章取義是毫不足懼的。」

社論責令「紅色教授」們「脫褲子」：為什麼要脫褲子呢？因為「問題發生在他們的貴體下」，還因為褲子下「躲着一條尾巴，必須脫掉才看得見」。而每個人「尾巴的粗細不等」，割尾巴所需用的「刀的大小不等，血的多少不等」，因此只有先脫掉褲子，才談得上「用刀割」。「褲子上面出教條，這就是教條和褲子的有機聯繫，誰要是誠心誠意地想反對教條主義，那麼他第一着就得有脫褲子的決心和勇氣。」

三月中下旬，《解放日報》連續發表反宗派主義社論。三月十九日，發表《發揚民主作風》，再度批判一部分黨員的排外主義情緒，要求中共黨員「虛懷若谷」，「傾聽各種不同意見」。

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解放日報》發表了蕭軍的雜文《論同志之「愛」與「耐」》。其中說到：「近來竟常常接到一些不相識的同志們的信，信裏大致是述說自己的痛苦和牢騷。不滿意環境，不滿意人，不滿意工作……甚至對革命也感到厭倦了

……。」這裏說的給作者來信的「不相識的同志們」，大概都是一些外來的知識青年。這篇文章反映的問題，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其實是一樣的。但這篇文章是經過毛潤色和修改過的。

顯然，這些言論的主要矛頭，是對着黨內的老幹部和留蘇知識分子的；對新來的知識分子的牢騷，則是給予同情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王實味和丁玲的三篇文章。

《政治家·藝術家》

王實味的《政治家·藝術家》原載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谷雨》第一卷第四期，大意是：

政治家的任務偏重於改造社會制度；藝術家的任務偏重於改造人的靈魂。但人的靈魂中的骯髒黑暗，乃是社會制度的不合理所產生；所以社會制度的改造過程，也就是人的靈魂的改造過程。政治家的工作與藝術家的工作是相輔相依的。政治家對事更看重；藝術家對人更求全。在進行實際鬥爭方面，政治家比藝術家優越。但藝術家也有他的優越性，就是自由地走進人的靈魂深處，改造它。政治家和藝術家也各有弱點。政治家必須熟諳人情世故，善能縱橫捭闔，但除非真正偉大的政治家，總不免多少要為自己的名譽、地位、利

益而使用它們，使革命受到損害。一般藝術家的弱點則是驕傲、褊狹，孤僻等等。我們要求靈魂工程師首先把自己的靈魂改造為純潔光明。

魯迅先生不會不懂得，改造舊中國的任務，只能由這舊中國的兒女——帶着骯髒和黑暗的——來執行；但他那顆偉大的心，總不能不有些寂寞，因為，他是多麼渴望看到他的戰侶是更可愛一點，更可愛一點啊！革命戰士是從舊中國產生出來，因而我們的靈魂總不免帶着骯髒與黑暗。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

「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和黑暗，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只是消極的，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有人認為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點，便予敵人以攻擊的間隙——這是短視的見解。我們的陣營今天已經壯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點，但它還不夠堅強鞏固；正確地使用自我批評，正是使它堅強鞏固的必要手段。至於那些反共特務機關中的民族蠱賊，即令我們實際沒有任何弱點，他們也會造謠誣蔑。他們倒希望我們諱疾忌醫，使黑暗更加擴大。」

《野百合花》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二十三日《解放日報》。

文章有一個「前記」，懷念一個犧牲的女共產黨員、作者的北大同學李芬。說：「每

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的影子」；「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循環得更有力！（在這歌嘯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罷，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在第一節「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裏，說「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不起勁，而且肚子裏裝得有不舒服」。作者不同意說是由於伙食差，營養不良，或是生活單調，找不到愛人，因為這些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爲了回答這個問題，作者敘述了一天晚上他在路上偶然聽到兩個女青年的談話：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的XX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

只能給你添難受。他的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文章第二節「碰《碰壁》」是對報紙上的一篇《碰壁》的文章表示不同意見，為青年人「發牢騷」辯護。作者說：青年的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我們不但不應該討厭這種『牢騷』，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依《碰壁》作者的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其實，正因為他們在外面認識了「醜惡和冷淡」，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第三節批駁幾種為延安的消極面辯護的觀點，題為「『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作者說：不錯，黑暗是有必然的，「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裏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每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卻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

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裏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是文章第四節的題目。

作者說：「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相同的題目，在他本機關的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入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稍麻煩一些。「有人用『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為等級制度辯護。作者說，「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軀體支撐着煎熬，許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上『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責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

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全文最後的話是：「老是講『愛』，講『溫暖』，這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三八節有感》

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就在《解放日報》發表《教條與褲子》的當天，該報的副刊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作者着重描繪了來到延安的女同志由於婚姻問題所受的種種壓力和歧視。她說：「延安的婦女是比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幸福的。……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卻不能免除那種幸運：不管在什麼場合都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而且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非議。」「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一方面，有些藝術家議論：「一個科長也嫁了麼？」「延安只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另一方面，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着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她們總得結婚（不結婚更要被作為製造謠言的對象），然而她們究竟應該嫁給誰呢？不是騎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藝術家就是總務科長。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不同的命運，有的抱在保姆懷裏，有的被扔在床頭啼哭。「被逼着帶孩子的一定

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次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聽的誹語悄聲地傳播着……」那些被逼着做了回到家庭的娜拉，則不能免除「落後」的命運，而這又成了離婚的口實。

丁玲說：「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寬容來看一切被淪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們，尤其是其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這些女人的過錯看得與社會有聯繫些。少發空議論，多談實際的問題，使理論與實際不脫節，在每個共產黨員的修身上都對自己負責就好了。」最後她也對女同志提了幾點希望。

可見，《政治家·藝術家》想說明的是政治家和藝術家的不同職能，呼籲重視藝術作品的改造靈魂的作用，為此就需要揭露黑暗。揭露黑暗和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這是希望作家批評現實的權利得到尊重。

這個問題，詩人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報》）一文中也談到。他說：「希望作家能把癩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的醜陋的勇氣都沒有，更何況要他改呢？」「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以外，不要求其他特權。他們用生命去擁護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為民主

政治能保障他們的藝術創作的獨立精神。因為只有給藝術創作以自由獨立的精神，藝術才能對社會改革起推進的作用。」艾青最後感嘆地用詩人李白的詩句來結尾：「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野百合花》究竟反映了什麼問題呢？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湧入延安，他們在這裏尋找他們的理想。他們看到了好的東西，但也有一些東西使他們失望，這倒不是延安生動的艱苦，而是上下級之間的隔膜，精神上的缺乏關懷和溫暖。而這種需要，卻常常被那些老幹部視爲「小資產階級感情」而予以漠視。

這兩篇文章引起了共鳴，因為它們反映的問題是有普遍性的，是客觀存在的。丁玲在批判王實味的會上說到：「王實味的兩篇文章考驗了延安的文藝家，這兩篇文章是經過了編者們的眼睛而在文藝的副刊和雜誌上登出來的。刊登以後沒有一個文藝家向編者或讀者提出注意，直到今天也還沒有一篇批評的文章是出之文藝家之手的。誰登載的，文藝家；誰發現着文章有毛病的，誰提出注意的，卻又不是文藝家……」

其實，丁玲本人的《三八節有感》也是針砭時弊的。丁玲在一九八二年發表過一篇《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談到她當年寫《三八節有感》的起因說：

「三月七號，陳企霞派人送信來，一定要我寫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章。我連夜揮就，把當時我因兩起離婚事件而引起的爲婦女鳴不平的情緒，一洩無餘地發出來了。……那時

的文抗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裏怪氣的女同志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衛生的」，說這話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對跳舞，但看這些人不順眼，就順便捎了他們幾句。」（《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後來，在鬥爭王實味的大會上，丁玲作檢討，也透露了一些真實情況，說那篇文章是她「灌注了血淚」，「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熱切的希望的」。「到昨天我還接到署名『同感者』的來信，問那篇文章的缺點在那裏，表示對某些批評認為不適當。」

《三八節有感》和《野百合花》都對延安的跳舞晚會有所批評，這當然涉及黨的高級幹部。我並不認為在延安跳跳舞有何不可，但我想一些農民和農民出身的幹部肯定看不慣，知識分子中則會有的贊成有的反對，這也很自然，他們發表一些批評意見也無不可。這不是什麼大的原則問題，他說他的，你跳你的就是了，當然也可以辯護，但用不着憤憤然。

中央研究院整風動員大會的風波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領導召開全院整風動員大會。大會由副院長范文瀾主持，他講了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及檢查本院工作的意義和方法。李維漢在講話中宣布：院務會議決定，院長、秘書長及各研究室主任應該是整風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

員。他還提出：「檢查要同時着重領導作風和個人思想兩個方面。」（這是針對多數人認為只着重檢查領導說的）關於牆報，他說應「有組織地進行，共產黨員在黨內不應匿名」。那天李患感冒，講完後即提前退席。

對李維漢提出的意見，王實味帶頭反對，主張檢查委員全部由選舉產生，牆報文章可以匿名。選舉問題，會上兩種意見爭持不下，范文瀾決定舉手表決。王實味的意見獲得八四票同意，而同意院務會議決定的只有二八票。最後二一名檢查委員名全部由選舉產生。實際選舉結果，院方提的名單大部分都入選了，只有兩個主任（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張如心，中國經濟研究室主任王思華）落選。

事後，王實味在牆報上指責李維漢「還保留着過去黨內家長制作風的殘餘」，「他不了解，各研究室研究員都是文化上、政治上很有基礎的同志，有的可能（比）主任在某一點上更高明，群眾的更大限度的民主，將對檢查工作有更大的好處。他只強調些什麼『主任是中央派來』，『要來也來，不要來也非來不可』，『不但來，而且要來領導』，他不從把工作怎樣做得最好看問題，只心心念念不忘『領導』。從牆報可以不記名投稿問題，他就聯繫到『無政府狀態』這樣使人害怕的詞類。也許本院研究員同志都是些幼稚無知的小孩子，非有家長照顧才能生活吧？」（《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王實味文存》，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一三七—一三八頁）從這裏敘述的

李維漢的話來看，的確有一副領導架子。

張如心和王思華落了選，中央研究院的群眾爲民主的勝利感到高興。可是不久，在四月一日的第二次檢委會會議上，經李維漢提名，又把這兩個落選的人補了進去。

李維漢這種做法，是對群眾意見的藐視，是違反民主程序的。檢委會是群眾選出來的，群眾沒有通過的人，檢委會有什麼權利把他們吸收進去呢？群眾沒有選這兩個人，總有他們的理由，應該引起這兩位同志和領導注意。可是，後來批評的不是李維漢違反民主，卻是王實味的所謂「極端民主化」！

中央研究院本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整風試點單位。既然是試點，就帶有試驗和探索的性質，目的是尋找出一套可行的較好的整風方法。院務領導是行政領導和業務領導，檢查委員會是整風和思想領導，不是一回事。當然，由若干業務領導幹部來兼任整風領導，在工作上方便之處，但不一定每個領導都要是「當然委員」。能領導業務的人，思想作風未必都好，他們有可能是整風的重點對象，因此未必能領導整風。如果真是誠心誠意地搞試點，那麼就應該吸收王實味代表的多數的意見，看看效果如何。這扯得上什麼「極端民主化」？

會後，在《矢與的》牆報上，就出現了王實味的兩篇文章。

第一篇《零感兩則》。（一九四二年《矢與的》創刊號）

「我們的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該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黨，因為有些邪氣家伙正在打着反邪氣的旗幟，企圖打擊比他們正氣多的人，雖然，這些人本身也不是毫無邪氣，『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

「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第二篇《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矢與的》第三期）

「我決不否認我那天發言之尖刻和過頭。羅邁同志威勢逼人的家長武斷作風，確實使我十分激動，因而聯想到不知斷送了多少同志性命的『比豬還蠢』的領導。我罵了羅邁同志，爲了這，我願意接受一切批評。」

「王實味充分自信，他的骨頭從未軟過，而且不比任何人軟！」
除了文章外，還出現了漫畫。

《矢與的》牆報本來貼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門口的一間大平房裏，外單位有不少人跑來看。後來貼在布上，掛在延安鬧市區南門外的新市場，看的人更多，像趕廟會一樣。中央研究院的群眾不僅辦了牆報，還敢於在牆報上批評領導，這在延安還是新鮮事，人們至少是對這件事感興趣的。這件事一時轟動了整個延安。

可以肯定的是，王實味的觀點曾得到多數人的擁護。當時在中央研究院黨委工作的溫濟澤在全院研究人員中作了一個調查，發現對王實味思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佔百分之九十五。（溫濟澤《征鴻片羽集》，七六六頁）李維漢說：「在中央研究院《矢與的》牆報出來以後，我記得只有政治研究室的李宇超同志寫了文章表示不贊成，多數人都贊成《矢與的》上的錯誤觀點，這是一股潮流。」（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長沙，四一五頁）

四月七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負責幹部和積極分子開會。會議從上午九時一直開到夜裏十二時，發言非常踴躍，但旗幟鮮明地反對王實味的，卻只有早在上海就與同鄉康生有來往的李宇超一人。凱豐親自講話，嚴肅地批評了該院整風中出現的「偏向」。

那麼，王實味是怎樣由得到多數人擁護而變得徹底孤立了呢？多數人的觀點，是通過一種什麼樣的機制轉變的呢？這種轉變，是由錯誤的觀點轉變到正確的觀點嗎？這就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王實味代表什麼思潮

前述三篇文章和牆報文章在群眾中的反應和在領導幹部中反應，是截然不同的。最早對王實味和丁玲提出批評的是兩位將軍：王震和賀龍。

三月下旬，王震到中央研究院看了牆報上的王實味文章以後說：「前方的同志爲黨爲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另據戴晴稱，一九四三年賀龍曾在大會上把《三八節有感》的作者罵爲「臭婊子」。（戴晴《梁漱溟 王實味 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南京，一〇二頁）

大概是聽到了一些老幹部的議論吧，毛澤東在一個晚上打着馬燈和火把看了《矢與的》。有些人以爲這表示了毛澤東對牆報文章的支持，很高興。實際上，毛澤東說：「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四八三頁）

據胡喬木回憶：在一次會上，賀龍、王震都批評了《三八節有感》，批評得很尖銳。賀龍說，丁玲，你是我老鄉，你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胡喬木感到問題提得太重，跟毛澤東談了。毛澤東卻批評胡喬木說：「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問題，你就看不出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五五—五六頁）

據胡喬木回憶，當毛澤東看到《解放日報》上連載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後，氣憤地「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毛當即給《解放日報》打電話，要求報紙作出深刻檢查。（《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四四九頁）毛澤東感到情況不妙，擔心運動將失去控制，迅速改變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義」打擊

教條主義的策略，在親自前往看過《矢與的》壁報後，毛召集高幹會議，決定拋出王實味作為靶子，先行將「自由化」打壓下去。

一九四二年四月初，毛澤東主持高幹會議，代表文藝界參加的只有周揚和丁玲兩人。會議的議題是批判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八個人發言中，有七個人都提出對《野百合花》和《三八節有感》的批評。曹軼歐、賀龍等在發言中都嚴厲指責了丁玲。毛在總結中將丁玲和王實味區別開來，聲稱王實味是托派，而「《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參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載艾克恩編《延安文藝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二頁）

這個話真有些莫名其妙。「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好像批評就是不好，建議才好。有批評就必須有建議嗎？沒有建議就不行嗎？《野百合花》的內容是希望黨傾聽外來青年的意見，改正那些缺點，這可不可以說也是建議？

毛澤東說過，整風的主要對象，本來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這一點李維漢也承認。他說：「整風的對象，主要是老幹部（當時是中年幹部）。但整風開始時，中央研究院一部分青年知識分子出來颺了一陣小資產階級歪風，影響很廣，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風納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時間內，整風矛頭首先對準了青年知識分

子中的這股歪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十一—十二頁）

據當時被指定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陸定一（《解放日報》總編輯）解釋說，這樣做的原因，是全黨「八十萬黨員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新黨員，而這些新黨員中又有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小資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出身」。（《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三一—二頁）

李維漢分析說：「整風開始前，延安已經存在一種極端自由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潮，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的一些年輕人辦的文化溝《輕騎隊》牆報上存在這種思潮，院內以王實味為代表的一些人也存在這種思潮。」（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四八一—四八二頁）這意思是說，以王實味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颯起了歪風，干擾了整風，迫使黨加以打擊，以端正整風方向。因此，首先要解決的已經不是馬克思主義同教條主義的矛盾，而「主要是無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的鬥爭」。

時任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的李言也說：「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任務，是反對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可是在中央研究院整風初期《矢與的》牆報上發表的許多文章、漫畫，卻把矛頭指向早已有了轉變，正在批判教條主義、反對王明錯誤傾向的少數領導同志，因而偏離了整風的方向。」（《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一〇五頁）

整風既然是反對教條主義，當然要涉及受過教條主義影響，犯過教條主義錯誤的人。

從白區來的青年知識分子也有教條主義，但這種教條主義主要表現為迷信書本知識，輕視實踐經驗，而受王明影響較大的，還是黨內一些高層領導幹部，他們不是一般的迷信書本知識，而是迷信蘇聯，不是一般地輕視實踐經驗，而是輕視本國革命的實踐經驗，這才是反對教條主義的重點所在。他們應當是整風的重點。整風剛剛開始，怎麼就斷言他們「早已有了轉變，正在批判教條主義」，從而把他們保護起來呢？他們究竟有無轉變，對教條主義的批判是否深刻，是否聯繫自己，正是要在整風中考驗的事，怎麼說把矛頭指向他們就是「偏離了整風的方向」呢？用《解放日報》社論《教條與褲子》的話來說，「延安的某些幹部與名流，難道不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大師嗎？他們現在真的是已經覺悟，已經轉變，查有實據了嗎？」

其次，整風並不僅是反對教條主義，而且反對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王實味所批評的現象，正是毛澤東在整風報告中要反對的宗派主義黨風，其中包括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問題。在《整頓黨的作風》報告中，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忱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不錯，新幹部是有缺點的，他們參加革命還不久，還缺乏經驗，他們中間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殘餘。但是這些思想是可以從教育中從革命鍛煉中逐漸地去掉的。他們的長處，正如斯大林說過的，是

對於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覺，因而有高度的熱情和積極性，而在這一點上，有些老幹部則正是缺乏的。新老幹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進行共同的事業，而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在老幹部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幹部和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麼，老幹部就應該負主要責任。」（《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二四—八二五頁）

所以，《野百合花》提出的問題，是新老幹部之間的關係問題，是防止宗派主義的問題，而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正是延安整風的目標之一。說什麼「偏離了方向」，是完全錯誤的。

對於來自毛澤東的批評，老幹部是不能說什麼的；但外來的知識分子居然也批評起他們這些「老革命」來，他們就惱怒了，就可以反擊了。王實味事件的出現，給這些老幹部一個機會，宣稱這是「攻擊黨」。

李維漢說，以上事實證明了這樣一條真理：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王實味「把《矢與的》這張牆報當作攻擊黨的領導幹部，特別是攻擊我的工具。」（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四八四頁）

他認為這個階段的整風，有三個問題：第一，整風方針問題。不懂整風目的，把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看成了只是整少數幾個領導人的活動。第二，檢委會組成問題。不

懂組織原則，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有否認和擺脫黨的領導的傾向，在下表現為極端的自由主義，在上面表現為放任主義。第三，思想方法問題。「大膽」第一，「揭露」就是一切，不講實事求是，不懂辯證唯物主義。其思想根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也充分暴露了教條主義教育的根本弱點。

「放任主義」指的是范文瀾。李維漢說：副院長范文瀾同志是一個學者，是老實正派人，但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大熟悉。他主張整風需要採取民主方法也是對的，但他在牆報上寫文章也說了要『徹底民主』，『絕對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誰阻礙民主，誰就會在民主面前碰出血來』的話。」（《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四八五—四八六頁）（這個話有什麼不對呢？）

延安整風本來是要反對教條主義，現在變成了也要反對自由主義。通過反對自由主義，教條主義又復活了；不過復活的不是對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而是對毛澤東的教條主義。

立場問題

一面是白區來的知識分子對老幹部的作風、官僚主義、對新幹部的冷漠、等級制度的不滿，一面是老幹部對知識分子的批評的反感，認為是不尊重領導、自由主義、極端民主

化。毛澤東在這兩者之間權衡，最後決定了支持後者，從而改變了他自己說的批判宗派主義的立場。

毛澤東曾讓胡喬木向王實味轉達自己的意見：「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胡喬木說：「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有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只要是黨員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注意這裏的「首先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提出要學習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首先是立場：立場正確了，才可能有正確的觀點和方法：立場一錯，觀點和方法必然都錯。毛澤東在三月三十一日《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講話就提出了警告：「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首先是「立場」不正確，然後才有「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所以，立場先於觀點和方法。觀點問題和方法問題可以討論，立場卻是簡單地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沒有什麼好討論的。毛澤東既然首先斷言王實味的立場是錯誤的，不僅是有敵意，而且「充滿了」，這當然是問題嚴重了。毛澤東說過，如果把同志當敵人，那就使自己站到敵人立場上去了。這樣一來，王實味的所有言論當然都不可能是正確的了。

然而，毛澤東又是根據什麼斷定王實味的立場是錯的呢？

是不是因為王實味的言論有挑起一般同志對領導者「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那麼，毛

澤東自己就沒有對領導幹部「鳴鼓而攻之」嗎？他在整風報告中說：「總之，這種反科學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又說，要弄得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那還不是敵意？王實味批評的對待白區來的青年同志的官僚主義和冷漠態度，不正是毛澤東說的「宗派主義」這個「怪物」嗎？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指的思想，不是人；目的是「治病救人」。那王實味不也可以這樣說嗎？他也不是要把領導幹部整死啊！何況他也根本做不到。

羅邁就緊緊抓住了立場問題作文章，他在《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發表的《動機與立場》一文中說：

「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事變的面前，首先要求自己站穩立場，立場不對，就是根本不對，立場錯了，就是根本錯了。」

「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立場，革命冒險主義是破產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極端民主主義和平均主義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它們都是反無產階級的立場。」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其立場是錯誤的，自由主義、極端民主主義、平均主義，其立場也是錯誤的，一句話，都是反無產階級的立場。在整風運動中，要肅清主觀

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殘餘，又要克服自由主義、極端民主主義、平均主義的傾向。」

這樣，把自由主義、極端民主主義、平均主義和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放在同等地位，列為整風的對象，就有理論根據了。

當時任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的李言後來回憶王震對牆報上的王實味文章的評論「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這句話時說：「真是一針見血。老同志的眼光為什麼那樣敏銳，我們當時為什麼看不清？就是因為我們的立場、觀點、方法有問題。」（《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一〇八頁）

現在重新審視這個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高明之處，只是因為觸犯了他們而使他們惱火罷了。王實味在什麼地方罵黨了呢？他只不過批評了某些老幹部，這就是罵黨？「立場堅定」就不能批評老幹部？難道老幹部就批評不得？那麼還整黨幹什麼？丁玲不過說了一句「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次最衛生的交際舞」，可以不同意這種說法，但作為政治家，宜大度一些，用不着憤憤然。

批評者的手法，就是把王實味文章中的負面的話收集起來，集中起來，脫離了上下文，把對局部的批評變成對整個延安的批評，把對某些老幹部的批評變成對黨的批評。如李維漢批評說：王實味的兩篇文章，說「延安『歌舞昇平』，對幹部『缺乏同志之愛』，

『漠不關心』，『到處烏鴉一般黑』，攻擊領導人是『異類』、『不僅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他號召青年向黨發『牢騷』，就是說，向黨開火。」（同上書，一四頁）

從這裏就發揮下去：

「王實味卻借黨內整風機會，誣蔑黨和謾罵黨，造謠惑眾，挑撥離間，製造分裂，破壞團結……。王實味慣於使用『左』的詞句掩蓋反動實質，利用和迎合青年中未改造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自封為青年的『代表』，利用黨在實際工作中的個別缺點錯誤，加以曲解、誇大，造謠中傷，耍兩面派，鑽空子，被揭露後抵賴頑抗等。」（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四九一頁）

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中談到「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時說，「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相同的題目，在他本機關的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入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這件事很值得注意。由於批評而遭到打擊，以致精神失常，這是令人氣憤的。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應該調查清楚。如果是傳聞失實，就應該澄清；如果確有其事，就應該追究。可是在批判王實味的文字中，這件事根本沒有提及，好像這件事根本不值得一提。

觀點和方法問題：所謂「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

說「偏向」，首先是立場的問題，隨之而來的就是觀點問題和方法問題。

三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對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進行了批評，說：「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王實味曾申明他不贊成平均主義，說：「我並非平均主義者」，「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他還說：「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不但如此，在實行薪給制的三三制政府中，「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

這是主張「絕對平均」嗎？當然不是。分歧只在於這個具體的差距應該多大才算合理。王實味並不主張消滅差距，只是要求縮小差距，不搞特殊化。他的理由是「我們今天

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軀體支撐着煎熬，許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鐵一般的團結」。這不是有道理嗎？可以不同意他的具體意見，但是不能說他主張平均主義，更不能說是絕對平均主義。批評王實味的人並沒有拿出他是平均主義或絕對平均主義的證據。既然證據還沒有，怎麼能不由分說給他戴上這頂帽子呢？

說王實味的方法是「冷嘲暗箭」，那麼毛澤東還送了主觀主義者一副對子：「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還不是挖苦諷刺？說教條主義者的教條比屎還沒有用，既不能喂狗，又不能肥田；又說一些領導人的褲子藏着一條尾巴，必須脫下褲子割尾巴：這些還不是冷嘲？王實味的批評，遠沒有這樣尖酸刻薄，為什麼就不可以？至於「暗箭」，從王實味的文章中實在看不出來。

王實味批評等級制度、特殊化，並不是因為他自己享受不到。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分爲特別研究員、研究員、研究生三級，王實味是中國文藝研究室的特別研究員，有四個口袋的制服，吃小廚房。可他仍然認爲自己享受的這種待遇是不合理的，這不簡單。他的文章引起某種轟動，主要是講出了許多人的心裏話，這裏面不但有青年學生，恐怕一些農民和農民出身的下層工作人員也會產生同情。

毛澤東並不去具體分析王實味的言論怎麼不對，而是用「工農兵」這樣的大帽子來壓人。我把「工農兵」這個詞加引號，是因為實際上只是農民和兵士，在前面加上一個「工」字，無非說自己屬於無產階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毛澤東不是對王實味的具體言行進行具體分析，而是用抽象的革命的詞句激起人們的義憤，以感情代理智。

毛在七大談到王實味時說：「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立場上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一四三頁）

這兩句話是矛盾的。「反對我們」，這個「我們」是誰呢？肯定不是勤務員一類的普通的工農兵，而是穿有四個口袋的制服，吃小廚房的領導幹部。

如果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那就不會去挑動勤務員反對黨的領導幹部，而應該是反對勤務員。其實對勤務員，王實味在文章中是很尊重的，說自己並不主張平均主義，而且沒有半個伙夫「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在「伙夫」這個詞後面加括弧說：「（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的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

這些話既不能證明王實味「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也扯不上「挑動勤務員」反對什

麼人。如果一定要說是「挑動」，王實味挑動的也不是「勤務員」（當然對跳舞之類，勤務員可能是看不慣的）；他是對青年學生表示同情。如果一定要說是「反對」什麼人，王實味反對的也不是工農兵；他的矛頭所指的是某些領導幹部。《野百合花》第一節說的就是他偶然聽到的兩個女青年發牢騷；這兩人顯然是外來的學生，她們的不滿是對着領導幹部的。全文都是爲從白區來的青年學生說話，呼籲領導幹部愛護他們，對他們要有同志的溫暖。最後在批評等級制度時，也是爲「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鳴不平，說「另一方面有些頗爲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這裏同情誰，批評誰，不是很清楚嗎？

那麼毛澤東爲什麼一定要說王實味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呢？他把王實味批評領導幹部的意見，硬說成是對着「工農兵」，這倒是挑動「工農兵」來反對知識分子。

如果王實味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和毛澤東辯論，毛澤東就不能簡單地下「絕對平均主義」、「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的斷語，而需要拿出論證，這對毛澤東並不是輕鬆的任務。毛澤東當然不會這樣做。他只是作結論，不作具體的論證，好像這個結論既然是由他講出來的，就是無可置疑的，不需要論證。詳加論證反而降低了毛的身份，降低了毛的權威性。這應該是那些同王實味進行面對面鬥爭的同事的任務，可是，他們也沒有這樣做。

背景分析

說王實味是立場錯誤，還有一種貌似深刻的分析，那就是聯繫到當時國共鬥爭的形勢來作階級分析。

李維漢說：「當時我們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時期，經歷着抗戰中的空前困難，又面對着新的反共高潮，特別需要全黨團結一致，戰勝困難，此時此地，王實味卻借黨內整風機會，誣蔑黨和謾罵黨，造謠惑眾，挑撥離間，製造分裂，破壞團結，不給予堅決回擊，就不能團結內部，一致對敵。」（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四九一頁）

李言說：「對當時已經在延安部分青年中出現的一股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輕騎隊》，《野百合花》）……我也沒有及時引起注意。因此，未能充分發揮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

「中央研究院整風初期出現的錯誤傾向，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當時，大批在抗日戰爭初期入黨的青年知識分子，懷着高度的革命熱情，衝破艱難險阻來到延安追求革命真理。他們積極學習馬列主義，但是缺乏實際鬥爭的鍛煉，不善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更不善於運用馬列主義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一般還帶着比較多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見溫濟澤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一〇六頁）

但無論是王實味本人還是他所反映的外來青年的意見，都和「缺乏實際鬥爭的鍛煉，不善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不善於運用馬列主義改造自己的思想」不相干，也扯不上什麼「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

可是李言就從這裏發揮下去了：「……當抗日戰爭處在相持階段，延安經濟生活十分困難的時候，遇到有人用『左』的詞句出來煽惑，就容易發生搖擺，甚至迷失方向。對於我們黨內存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如果不在整風中加以改造，它就很可能成爲危險的腐蝕劑，以種種方式來腐蝕黨、破壞黨。」

李言說：「當時，抗日戰爭正處在相持階段。一方面，我們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另一方面，陝甘寧邊區又處在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軍隊的層層包圍、嚴密封鎖之中，並面臨着新的反共高潮，邊區經濟空前困難。在這樣的時刻，特別需要全黨團結一致，艱苦奮鬥，中央領導同志和廣大幹部群眾就是這樣做的。然而，王實味卻乘黨整風之機，說延安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缺乏同志之愛』，『到處烏鴉一般黑』，咒罵黨的領導同志是『異類』，『不僅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等等。這究竟是對還是不對？對誰有利？爲誰說話？」（同上書，一〇八一—一〇九頁）這就是立場問題。

要問「這究竟是對還是不對」嗎？那麼首先要弄清的是王實味批評的那些現象存在不

存在，該不該糾正。毛澤東不是教導「實事求是」嗎？李言只說王實味「乘黨整風之機」「咒罵」，卻回避了這個最重要的問題。

關於「對誰有利？爲誰說話？」（這就是所謂立場問題吧），這個問題很好回答：王實味是爲從白區來的青年學生說話，要求改善和他們的關係，而這樣作正是幫助黨整風，對黨有利。王實味也是爲了使黨能夠更好的「團結一致，艱苦奮鬥」，才提出關心青年，傾聽他們的心聲嗎？他呼籲領導幹部和下層同甘共苦，「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鐵一般的團結」，這不就是「團結一致，艱苦奮鬥」的意思嗎？

至於王實味的有些話叫領導幹部聽了不舒服，那一方面可以勸王實味對用詞斟酌一些，但對批評的領導幹部來說，卻用得着這句古話：「言者無罪，聞者足誠」。這也是毛澤東教導的。毛澤東批評知識分子的話更加厲害啊，他說他們要求按照小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黨」，因此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裏毛澤東還在「同志」一詞上加了引號。難道這不是把知識分子當作異類？

至於國民黨利用王實味的言論進行反共宣傳，這個王實味的文章已經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有人以爲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對外』，如揭露自己的弱點，便予敵人以攻擊的間

隙——這是短視的見解。我們的陣營今天已經壯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點，但它還不夠堅強鞏固；正確地使用自我批評，這是使它堅強鞏固的必要手段。至於那些反共特務機關中的民族蟲賊，即令我們實際上沒有任何弱點，他們也會造謠誣蔑；他們倒更希望我們諱疾忌醫，使黑暗更加擴大。」

其實，這個問題在《解放日報》的社論《褲子與教條》已經談到了：

「……有些好心的同志說，褲子是要脫，但是只能秘密地脫，在群眾面前脫不但有傷大雅，而且敵人和反共分子還會在旁邊拍手。但是群眾難道不是共產黨的天然的和法定的監督者和審查者嗎？……自然，敵人的宣傳機關如同盟社和各種漢奸報紙之流，一定會借此製造更多的謠言。但是他們是以造謠爲生的，他們說是黑，群眾就知道一定是白，所以他們的斷章取義是毫不足懼的。」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溫濟澤對此有解釋。他說，邊區物資條件困難只能買進少量灰藍色斜紋布，只夠首長和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穿，其餘的人穿的是邊區自染的灰色土布。一般勤雜人員穿的都是一樣的土布。幹部服的上衣有四個口袋，戰士服只有兩個口袋。至於伙食，當時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加上病號飯，也算不出「五等」。（但我聽說還有「特灶」）他的這個解釋是有說服力的。當然，我們還不知道這三等伙食的差別大不大，大到什麼地步。

不過王實味文章的主要內容不是這個，他主要說的有些領導幹部對外來的青年幹部「缺乏同志之愛」。他聽到的兩個女青年的竊竊私語就是抱怨這一點。「到處烏鴉一般黑」就是其中一個女青年的話，意思是她那個單位的情況和她的同伴所談的一樣。至於「異類」，倒是王實味的話，原話是說，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難道這就是「咒罵黨的領導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王實味的文章也提到經濟困難，但這些話並不是對物質生活的困難表示不滿，而是強調，正因為這樣，領導幹部就更加要注意同下級同甘共苦。而李言的意見正相反：不該反對等級制度，不該批評缺乏溫暖，因為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是對黨的「危險的腐蝕劑」。

王實味的性格是愛憎分明，心直口快，容易衝動。他的整個言論使人感到，他是以主人翁的氣概說話的。他以為陝甘寧邊區既然是共產黨管轄的，那就應該是一個民主的、平等的、合理的社會。如果有不盡如意的地方，他有權批評。批評的目的是使邊區變得更好一些。他是革命者，是共產黨人，用不着怕這怕那。他沒有顧慮，因為他是出自公心，甚至以自己的「硬骨頭」自豪。然而他錯了。他不懂得，毛澤東讚揚魯迅的「硬骨頭」，那是對「敵人」，對國民黨的；對共產黨講什麼「硬骨頭」，豈非太歲頭上動土！他太天真

了，缺乏「革命世故」，鋒芒畢露，這就惹了大禍。

「四三」決定

整風轉折的信號，是「四三」決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李維漢承認：「在開始階段，在中宣部『四三』決定前，我確有不小的困難。」（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卷，四八五頁）「四三」決定給了那些受到群眾批評的老幹部一件武器，幫助他們擺脫困境。

這個決定是有針對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風所遇到的問題。但它說得比較巧妙，兩方面都說到了，只有仔細琢磨才能從字裏行間看出它的真正側重點。

「決定」要求「根據文件的精神實質來檢討本部門的工作及每個同志的工作與思想」。

明哲保身、有話不說是不對的；避開自己，專攻別人的態度也是不對的。

討論及檢查的方式，應以上面領導和發揚民主同時並重，不可偏廢。

在某些機關內應組織檢查委員會，此委員會內包括該機關領導同志及從工作人員中吸收的人員。

在討論中要發展爭論，在規定檢查期間內，不管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意見，都得自由發表，不得加以抑制。但領導應善於注意把錯誤意見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去，不得將錯誤意見變成結論。

討論與批評的態度，應該是嚴正的、徹底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坦白的、實事求是的、與人為善的態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誣蔑謾罵、捕風捉影、誇誇其談，都是不正確的。

在討論與檢查期間可以出牆報，並設牆報委員會領導之。

規定十八個文件：《毛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紅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等等。

李維漢對這個文件的精神實質看得很清楚，他概括為：「四三」決定指出整風是改正幹部及黨員思想作風，而不是對付幾個領導人。整風應由各部門負責人領導，要把錯誤意見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去。討論與批評應是嚴正的，又是與人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誣蔑謾罵，捕風捉影，誇誇其談。這個決定標誌着延安整風運動健康發展的開始，也回答了整風初期提出的各種問題。

「我們的武器是二十二個文件，我們的立場是二十二個文件。輕視二十二個文件，離開它們去找法寶，或自作聰明，或單憑主觀願望，單憑熱情與信仰，是不行的。」（羅邁

《動機與立場》，《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四月六日，在毛澤東召開的中央高級學習會上討論「四三」決定時，李維漢在發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風初期的主要偏向：不懂組織原則，不懂思想方法，這要歸咎於過去的教條主義教育。（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四八六頁）

四月七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的負責幹部和積極分子開會，凱豐在會上進一步闡述了「四三」決定的精神，嚴肅批評了研究院整風中出現的偏向。這樣，就使大家頭腦一步一步地清醒過來……（《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一〇六頁）

「四三決定」後，中央研究院的各級領導同志，進一步總結了前一段的經驗教訓，開始自覺地帶頭學習文件，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李維漢比較全面地講了自己在遵義會議前犯的錯誤……范文瀾同志也在群眾中和報刊上，多次對照文件精神，誠懇、坦率地檢查了自己在整風初期領導工作中的偏差及其性質和根源。所有這些，都使同志們深受教育，非常感動。這時候聯繫整風初期的思想實際，再來學習《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反對自由主義》、《論平均主義》、《論自我批評》、《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整風文件，就感到特別親切，好像其中的話語都是針對自己的缺點講的。

康生的話：「我們領導上的方針是，強調《四三決定》的民主，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共

產黨是半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那時反革命的兩條心也出來了。……所以你們看一看，這個暴露階段，暴露到什麼程度！」

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

爲了糾正王實味造成的影響，中央研究院從五月二十七日起召開全院的座談會，主題是「黨的民主與紀律」，目的是糾正極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風引向正軌。座談會到六月十一日結束，一共開了十六天，其間開了十四次大會。（溫濟澤《征鴻片羽集》，七六〇—七六一頁）

五月二十七日到三十一日，這是第一階段。座談會第一天有十一個同志發言，大家都反省到整風運動開始時我們所表現的極端民主化傾向。有好幾個同志說，我們在動員大會上否決了各研究室主任爲當然委員，我們把整風運動看成只是「割大尾巴」（領導方面的「尾巴」），這些都是極端民主化的表現。

其實，「割大尾巴」，正是《解放日報》社論的意見。社論把「延安的某些幹部與名流」稱之爲「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大師」，責令「紅色教授」們「脫褲子」以便割尾巴。這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關於主任經過選舉才能擔任檢委的問題，會上也有少數同志說，這是范副院長在動員

大會上同意的，不能說就是極端民主化傾向。

這使范文瀾陷入尷尬地位。作為副院長的他在主持動員大會時順從了大家的意見，把王實味的意見付諸表決。於是，范文瀾出來作自我批評，承認這是缺點，說：「我在開始階段的領導方式，缺點大於優點。因為我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麼，平時教條主義的學習，遇到實踐，就不自覺地與所謂理論完全脫節。主觀地高唱民主，忽視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領導。」「這是我不能不認為衷心抱歉，難以忘懷的一次痛苦經驗。」

當時任中央研究院機關黨委書記的李言後來評論說：「范文瀾同志是一位誠實、正派的學者，深惡痛絕各種不正之風，對毛澤東同志的整頓三風的號召是積極擁護的。可是他缺乏黨內鬥爭經驗……對整風中可能出現什麼問題缺乏思想準備，因而在實際已經出現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時，還把它當作檢查工作要發揚民主的一般問題。我自己更因為世界觀改造得不好，對錯誤傾向認識遲鈍，整風一開始就陷於被動，出現偏向後更不知所措，沒有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見溫濟澤等編《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一〇四頁）

這幾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天李宇超的發言，他提出「王實味的錯誤與一般同志的偏向根本不同，……他的錯誤是一貫的，是嚴重的，不是偶然的」。

李宇超的發言是有來頭的。

據溫濟澤回憶：在開座談會的前一天，「李言找我，要我發言說明王實味的錯誤與其他同志的偏向性質不同。我沒有這種想法，也沒有同意發言，就反問他：『這是誰的主意？』」他說：『總學委。』我領會這是康生（黨中央直屬機關總學習委員會主任）的意見。就推辭說：『我調來黨委工作，如果我這樣發言，大家會誤認爲是黨委的意見，不是會把大會的方向引偏嗎？』李言沒有勉強我，他說：『那我就找李宇超吧。』李宇超是中國政治研究室研究員，也是在白區工作過的老黨員，因爲有一段歷史未找到證明，還沒有恢復組織關係。」李言也許認爲李宇超不會放過這次表示自己積極性的機會。黨事先把意圖告訴你，讓你出來講話，你會感到這是一種榮幸。

李宇超的發言當時引起有的同志反對，說：「我們應該深刻地反省自己，我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是很深厚的，在這一點上說，我們的偏向和王實味的錯誤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不同。」第二天，還有人批評李宇超「有捕風捉影的說法和主觀主義的殘餘」。但也出現了贊成的意見，說：在組織上說，王實味雖然還是我們的同志，但在思想上他已經成爲我們的敵人了。隨着討論的發展，李宇超的觀點逐漸佔了上風。

從形式上看，這種思想上的轉變並沒有強迫，但是有一種無形的支配力量。你放心，批判王實味，不會批判到你頭上來，因爲王實味的錯誤和你的錯誤有本質的區別；但是，爲了證明有區別，你又必須批王實味，同王實味劃清界限。點名批評把被批評者從人群中

劃分出來，使壓力集中於個別人身上，而使多數人獲得解脫的輕鬆。這就有利於動員其他人參加批評，從而形成群眾運動。你若是反駁黨和群眾的批評，就是說黨和群眾都錯了，那豈不是說你比黨和群眾更高明？就等於是反對黨，反對群眾。所謂「端正態度」，就是要求被批評者從一開始就承認對方的善意，對方的正確，也就是從一開始就放棄任何可以抵制批評的理由或立場。

黨更樂於作出語重心長、熱情鼓勵的親切姿態，更樂於向你反覆申明革命大義。這就使你在被迫屈從時，倒好像是作出了一件充分主動的光榮壯舉。

在三十日的會上，李維漢又對民主集中制的問題，既要發揚民主又要執行紀律的問題、爲什麼主張「徹底民主」「絕對民主」是錯誤的問題作了系統的發言。他說：「黨的民主永遠同集中制連結在一起。同集中制分離，就會產生絕對民主，絕對民主就是絕對自由，而絕對自由是違反黨的統一和團結，違反社會生活秩序的。」（《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二四頁）

不對。民主是一種政權形式，意味着「少數服從多數」。少數可以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但在行動上必須服從多數的決定。所以，民主制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絕對自由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它不但反對專制政府，也反對民主政府。

「場內鴉雀無聲，每個人都認真地聽講、做筆記，和整風動員大會時的情況就完全不

一樣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一〇七頁）

李維漢在三十日下午的發言中，還表示他「同意」李宇超的意見，說：王實味的立場是與我們黨對立的，這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他的錯誤絕不能與我們的偏向相提並論。我們的偏向的產生是偶然的，是天真的。

把王實味的言論性質同多數人的區別開來，這本來是領導的意見，是一種鬥爭的策略。現在卻變成了是群眾提出來的，李維漢不過是接受了下面的意見。這就使這場精心策劃的「運動群眾」有了一種「群眾運動」的外觀。

溫濟澤是個軟心腸的人，他回憶說：

「我在會外不斷地耐心地找王實味談話，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作個誠懇的檢查。我說過：『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來，還不是爲了革命，爲了抗日救國？你寫文章批評延安，站錯了立場，用了不正確的觀點和方法，應該參加大會，作個檢討，大家會諒解你的。』他似乎有點觸動，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錯，但是，我的確出於愛黨的好心啊。』我把這情況告訴了李言，希望還是作爲思想問題批評他，幫助他，不要把思想問題上升爲敵我的政治問題。……」

然而溫濟澤錯了，黨的領導可不會「諒解」王實味，它需要拿王實味開刀，樹立一個反面典型，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溫濟澤得到的回答是：

「李言沒有說什麼。第二天，他找我，說是已經把我的意見匯報給康生了。康生批評了我，也批評了他，說我有『溫情主義』。他還轉達了康生的話，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又是國民黨藍衣社特務』，叫我們『不要麻痺』。康生來自共產國際，身爲中央社會部部長，他的話，我自然相信了。」——「知識即權力」——「權力即知識。我們總擔心自己的立足點不夠高，掌握的材料不夠充分，看不清全局，因此不敢妄加判斷。等級化的學習制度造成了政治信息、政治知識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因此加強了人們的逐層依從性。」

六月一日到三日，座談會名字沒有變，但實際上變成了對王實味的批判會，鬥爭會，這種形式完全不適合平等的討論。結論是事先就有了的，依靠的是人多勢衆，施加壓力。它對聽取王實味的辯護根本不感興趣。王實味爲自己作的任何辯護，不管有理無理，都會遭到批駁。

機關黨委書記李言發言。他首先報告了一個統計材料：本院研究員，在初讀《野百合花》時，有許多人對他是或多或少地同情的，有些對這篇文章有反感的人，在起初也沒有看出作者立場有根本的錯誤。經過兩個多月整風文件的學習，特別是經過中宣部召開的座談會，「反對自由主義」、「平均主義」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文件的討論會，關於《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兩篇文章的討論會，一步一步地，到現在大家才一致認識清楚《野百合花》一文立場和方法的錯誤的嚴重性。（思想改造是需要如何細膩的功

夫啊！整風文件的學習又是多麼重要啊！）其次，報告了黨委與王實味六次談話的經過，至今王實味還沒有承認他的錯誤。

六次談話不算少。

接着一些同志發言，向大會提供許多王實味和托派關係的材料（此事他在一九四〇年向中組部交代過）。到現在，他還常向人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蘇聯對於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等等。還有人說王實味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曾與托派分子王凡西、陳清晨（陳其昌）有過來往，幫助他們翻譯過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等等（這是王實味自己向黨組織交代過的）。由於這些揭發，反王實味的鬥爭迅速升了級，成爲「托派思想」，「敵我問題」。

在以前討論《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時，有人說：「王實味的立場是錯誤的，但動機是純潔的。」有人說：「動機是不純潔的。」這個爭論未決的問題，今天解決了，今天已經沒有一個人再說他的動機是純潔的了。（溫濟澤《征鴻片羽集》，五九四頁）

六月二日，休會一天，個人閱讀文件，包括《聯共黨史》和《斯大林選集》中關於聯共粉碎反動派陰謀的一些經驗和教訓的論述。

上午，王實味向黨委提出退黨的要求，他說他「個人與黨的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幾乎無法解決的」，他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他是一個這樣頑固的人，不願接受黨對他的教育，他將走上一條多麼危險和不可救藥的道路啊！」胡平說得好：「在這裏，你的觀點並非由於錯誤而危險，而是因為危險而錯誤。對方不是站在是非的角度反駁你，而是站在利害的角度勸阻你。可見一般人之所以拒絕非正統觀點，首先是出於恐懼。」（胡平《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亞洲科學出版社，香港，一九九九年，第七三頁）

溫濟澤仍然擠時間找王實味談話勸導他不要與黨對立，要承認錯誤，讓他自己撤消退黨的要求。黨委也派了幾個同志同王實味談話。

六月四日到七日這四天裏，只在頭一天開了一次大會。鬥爭又升了級，從批判王實味的托派思想到追查他的組織活動。

這次大會，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都來了很多旁聽的人。王實味從五月二十七日以來，這天是第一次出席座談會。你又看到那麼多人都說黨是對的，而你是錯的。這個巨大的多數本身就具有威懾力。即使它不對少數個人採取暴力手段，個人也會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這使你不由得懷疑自己，努力說服自己，採取迎合、順從的態度。雄偉壯觀的群眾性場面給人一種力量感，那其實是黨的力量。集體儀式的最大功能是使個體一時消融於集體情緒，使個人產生小我消融於大我的幻覺。

王實味表示撤銷他「前天在變態心理下對黨委提出來的要求」（指退黨的要求），並說這是「我所尊敬的幾個朋友的愛感動了我」。這句話引起了紛紛的批評和質問。質問他的問題大都是有關於托派的問題，如：「爲什麼你到現在還認爲蘇聯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幫的走狗」，「爲什麼一直到今天仍說一些托派分子的人性是好的？」等等。（溫濟澤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三，北京，四三頁）

現在看來，王實味關於托派、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說的那些話，其實是有道理的。他能說出那些話，表明他對托派有一定的了解。但這個會雖然名爲「座談會」，實際上是鬥爭會，會上的氣氛完全是不適合心平氣和的討論的。參加會的人，恐怕大都弄不清托派是怎麼回事，而只是從康生的講話中得知的。^{*}所以，王實味就有口難辯了。

這時候，艾思奇同志向全院傳達了毛澤東同志在文藝座談會上的結論，幫助我們進一步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王實味的言行，就更加看出他的所謂「異類」、「黑暗」、「人性」、「邪氣」、「硬骨頭」等等，都是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完全把是非看顛倒了。（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收入溫濟澤等編

^{*}據溫濟澤敘述，康生「在一九三七年從蘇聯回到延安以後，就常以『反托洛茨基英雄』自居，常在大會上批判『托洛茨基匪幫』，常說『托匪和敵特（日本特務）、國特（國民黨特務）是三位一體的好細。』他還說過：『托洛茨基這個名字不好記，你們可以記作『兔子吃雞』，就容易記得了。要記住，對托匪活動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七頁）

《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一〇八一—一〇九頁）

六月八日到十一日。鬥爭進入最後階段。

八日早晨七點多鐘，就有來自七十多個機關和學校的一千多人擁來旁聽。

直到九日，也就是第十四天的大會上，還有一個同志發言，認為王實味有托派思想，「但是我們還不能肯定地說他在組織上有什麼問題。」接着有六七個同志反對。

丁玲的過關

丁玲在對王實味的批判會的最後一天發了言，駁斥了王實味對延安文藝界的侮辱，並作了自我批評，給人以深刻印象。她一上來除了給王實味戴上「反黨」「托派思想」的帽子外，又對王實味進行了人身攻擊：說王實味「爲人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是『善於縱橫捭闔』陰謀詭計破壞革命的流氓」。

「王實味之所以寫這兩篇文章，是發現了青年人（連文藝家也在內）外來的部分知識分子對延安某些小缺點抱着不滿和文藝家們所感到的作家不被了解，而在一種應該開展自由論爭，還是雜文時代的空氣之下，攫取了這個機會再進行他的反黨反階級的陰謀活動，因此他在短時間還能得到一些擁護，這充分證明了我們對政治的鈍感和濃厚的自由主義。」

「馬馬虎虎的發表了這樣的反黨文章在黨報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恥辱和罪惡。我永遠不會忘記這錯誤，我要時時記住做爲自己的警惕。」

談到自己的《三八節有感》那篇文章：

「到昨天我還接到署名『同感者』的來信，問那篇文章的缺點在那裏，表示對某些批評認爲不適當。……我要向一切同感者說：這篇文章是篇壞文章。你們不能因爲那篇文章替你們說了話就固執着成見說那是篇好文章，並表示對我個人的同情。」「儘管我灌注了血淚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熱切的希望，但那篇文章仍舊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話。那文章裏只說到一些並不佔主要的缺點，又是片面的看問題；那裏只指出了某些黑點，而忘記肯定光明的前途。」

「在整頓三風中，我學習得不夠好，但我自己已經開始有點恍然大悟，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都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回溯過去所有的煩悶，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顧慮和過錯，就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看到自己的軀殼隨水流去的感覺，一種幡然而悟、憬然而慚的感覺。我知道，這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正確認識的開端，我應該牢牢拿住這鑰匙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走下去。前邊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着呢。」（延安《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

這段話有不少語病：既然是「恍然大悟」，那就不是「有點」，也不是「漸漸」想明

白的；既然「最多也不過是一個正確認識的開端」，那就只是小悟，不是大悟；既然已經「像唐三藏站在到達天界的河邊」，那就不能又說「前邊有九九八十一難在等着」。這種邏輯上的混亂，反映了作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要強調自己的學習已經取得很大成績，她已經悔過自新，以表示和王實味有區別，並取得黨組織和聽眾的諒解和讚許。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給人以「思想改造得差不多了」的印象，搞得不好會受到「自滿」「翹尾巴」的批評，這對知識分子來說是犯大忌的。這樣她又要加一些話，實際上把前一方面的成績否定了。所以，我認爲丁玲的這段話不是真心話，而主要是爲了取得某種政治效果。

不過，就政治效果說，她成功了。在座的聽眾中有人在多年之後評論說：「這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我們許多同志經歷這場鬥爭之後的共同心情。」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引了這一段話，評論說：「這段話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小資產階級弱點的作家，在毛主席的啓迪下所發生的思想認識上的超越。這也正是丁玲後來在文藝創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新起點。」（《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二六四頁）

四十年之後，丁玲回過頭看《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是怎麼想的呢？她說：我的確缺少考慮，思想太解放，信筆所之，沒有想到這將觸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也沒有想到文章可能產生的影響和對被批評者應有的體諒，更想不到敵人可以用來反對黨的。四十年之後，現在我重讀它，也認爲還是有錯誤的。毛主席對我說過：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

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這話給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記在心上。幾十年來，我在這一方面就比較審慎了。」「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謝他老人家。文藝整風時期，只有個別單位在牆報上和個別小組對《三八節有感》有批評。……原來，思想不能「太解放」，有些地方是批評的禁區，觸犯不得的。丁玲觸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他批評了在對待婦女和婚姻問題的錯誤態度，也涉及跳舞這樣的事，這都觸犯到一些領導幹部，還有江青，甚至有毛澤東。他們是觸犯不得的嗎？「文章可能產生的影響」是什麼？不包括好的影響嗎？對被批評者應有「體諒」，怎麼不說被批評的男同志要體諒婦女呢？怎麼不在這裏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呢？

丁玲沒有說到的是，延安整風時期她逃脫厄運，不過是暫時的罷了。儘管她把毛主席的教誨放在心上，也還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丁玲說的「九九八十一難」沒有錯。建國後的一九五五年，丁玲已和陳企霞一起被打成「反黨集團」。一九五七年文藝界反右派鬥爭時，他們又遭受批判。一九五八年《文藝報》刊出「再批判」特輯，受到「再批判」的文章，有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還有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都是在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丁玲和陳企霞主持）上發表過的。在延安整風中，除《野百合花》以外，這些文章也受到過不同程度的批判，但都沒有被說成是「反革命」。可是這一

次，編者按語卻說它們都「是反黨反人民的」，並且說：「一九四二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編者還說這些文章都是「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這個按語改變了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給丁玲文章定的調子，可這個按語是毛澤東本人修改定稿的。一九四二年毛澤東保了丁玲，說丁玲是同志，這使得丁玲心裏一直感謝他老人家，並且從此吸收了教訓；可是到一九五八年，同一個毛澤東又說丁玲的文章是反革命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的。可見，即使丁玲吸收教訓也沒有用，因為那是老帳。一九五八年四、五月間，丁玲、陳企霞、羅烽和艾青被劃為「右派分子」。這回是毛澤東整丁玲了。所以，丁玲變得「審慎」了的結果，是她的罪名更重了。那麼，丁玲在內心裏仍然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嗎？

既然《三八節有感》是反革命文章，為什麼毛澤東在十六年前沒有看出來呢？文章還是一樣的文章，可是毛澤東是喜怒無常的，過去他要保丁玲，現在他對丁玲的態度變了，於是毛澤東的評價完全變了。還有蕭軍《論同志之「愛」與「耐」》，明明是毛澤東潤色和修改過的，現在也變成「反革命」文章了。這種評價的變化，並不表明認識的深入，而只是反映出一種主觀隨意性。在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條件下，作家的命運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從思想問題到政治問題再到敵我問題

十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和院部工作人員支部，中央政治研究室支部，一致要求開除王實味黨籍。

十一日，最後一天會上，李維漢作總結性發言，題為《論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論戰——從動員大會到座談會》（發表於《解放日報》六月二十八日），說：「支配着王實味思想的，是托洛茨基思想。」大家抱着「與人為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來挽救他，實際上他拒絕了大家的幫助。「對於王實味我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現在是他嚴重地考慮自己的問題的時候了。」王實味利用抗戰困難在黨內散布悲觀失望情緒，製造謠言，破壞團結；利用黨在實際工作中的某些弱點，加以渲染和誇大，公開誣蔑黨和咒罵黨，為敵人提供反共材料；故意曲解整風運動為派別鬥爭，造謠誣蔑黨的領導，進行挑撥離間，等等。「對王實味的這類反黨的行為能夠不允許我們黨激起高度的義憤和進行嚴正的鬥爭嗎？」王實味有他的一套陰險的狠毒的手法，比如：使用一些「左」的名詞掩蓋反動實質，裝着青年的代言人，挑撥離間一些立場不堅定的黨員和黨的關係；兩面派和鑽空子，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不對王實味的言論和行動，實行具體的揭發，進行嚴正的論戰，能夠暴露他的實質，肅清他的影響，提高黨內的政治警惕性嗎？」（《延安中

央研究院回憶錄》，二七頁）

「他的言論和行動，不只是有政治目的，而且也有組織企圖。」「我同意把他的黨籍問題提交黨委處理。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申明，王實味還有最後的機會從反革命的茅坑裏爬出來。」

最後發言的是范文瀾。

康生已經肯定王實味是托派分子。在當時的條件和情況下，大家都信以為真。溫濟澤說得好：「所謂『挽救』，只能是王實味承認自己加入了托派，並且要徹底交代、清算和懺悔作為一個托派分子的罪行。今天已經查明，王實味的確沒有加入托派。他當時不胡亂承認還是對的。這就使他個人和組織之間的要求無法調和。」

六月九日起，《解放日報》發表了范文瀾、陳道、伯釗、蔡天心、陳伯達、周文、丁玲的批評王實味的文章。到六月十七日，張如心的題為《徹底粉碎王實味托派理論及反黨活動》的文章。同日，《解放日報》還發表了一則通訊，報道延安文藝界舉行了三天座談會，「作家們一致表示了對於托派王實味之憤慨」，「一致認為王實味是政治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文藝界的敵人。特別駁斥了王實味《政治家·藝術家》中的一些荒謬的觀點：把進步的政治家與進步的藝術家對立起來；極盡挑撥之能事，為文藝家所痛惡。」並建議文抗開除其會籍。

思想鬥爭以周揚在《解放日報》七月二八、二十九日整整兩個版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為結束。

可是康生沒有就此罷手。……在反王實味鬥爭結束之後，他爲了繼續「擴大戰果」，使「鬥爭深入」，七八月間，又用「打迂迴」的辦法，在中央研究室發動了一場鬥爭。

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維漢由中央研究院調到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臨行前，他在全院大會上作《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的報告。據李維漢自己說：「這時會議的氣氛，同動員會上鬧哄哄的情況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報告完了全場鼓掌，大家情緒很高。」（《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四頁）

「五人反黨集團」除王實味外，有成全、王里夫婦和潘芳、宗錚夫婦。其中潘芳在德國留過學，其他三人全是復旦大學畢業。成全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王里在丈夫機關裏養病。王里在三十年代就認識王實味，王實味又住在潘芳夫婦隔壁的窑洞，這樣這兩對夫婦和王實味就有了幾次來往。康生想把這兩對夫婦和王實味打成反黨集團，但群眾不支持。康生想出一個辦法，讓中央政治研究室開會「檢查領導」。當時研究室的主任由毛澤東兼，具體的領導工作由副主任陳伯達做。康生要陳伯達迴避一下，好讓大家毫無顧忌地發言。用康生的話說，在頭幾天的會上，把陳伯達罵得狗血淋頭，「到第五天他們夫婦兩口子（指成全和王里）破口大罵陳伯達，從上午罵到下午，……罵出一個人性論來」。這

時，就在康生的操縱下，說王實味是講「人性論」的，是「托派思想」，成全和王里講「人性論」，跟王實味一樣，也是「托派思想」。這樣，「打了一個迂迴」（康生的話），又把鬥爭的矛頭轉過來對着潘芳和宗錚。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聯合召開的鬥爭會上，繼續揭發成全、王里、潘芳、宗錚和王實味的「托派思想」以及他們的「反黨陰謀、小組織活動」。揭發出的主要事實是他們同情過《野百合花》的思想。（溫濟澤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群眾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四八頁）

十月二十三日，中央研究院黨委會作出決定。決定說王實味「從一九二九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有停止過托派活動」。把他發表《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以及在整風運動初期的言行，都說成是爲了「反黨」，「以達到其托派活動之目的」。決定最後說：「王實味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始終對黨表示仇視，與其他黨員犯了錯誤經過教育因而改悔完全不同，故決定開除其黨籍。」（同上書，四四—四五頁）

第二天，王實味突然不見了。院黨委派人四處尋找，結果在中組部找到了。他跪在地上，哭訴自己沒有參加過托派，要求不要開除他的黨籍。這自然沒有用。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將王實味逮捕。

與衆隔離會使你失去參照系，而陷入自我懷疑；孤立於集體之中則使你面對顛倒的參

照系而自我否定。

不少黨員和知識分子，在昔日遭到國民黨壓制時尚能表現得相當頑強，但一輪到在共產黨自己的政治運動中挨批挨鬥時則完全變成了另一副模樣。因為，國民黨指責你是共產黨而打擊你，你正以身為共產黨員而無比驕傲，你的精神當然不會垮。如今，偏偏是共產黨來指責你不是共產黨，指責你是反黨分子，偏偏是「人民」和黨一條心，參加黨對你的鬥爭，你就徹底地失去了精神支柱，因為沒有另外的精神資源。

王實味並沒有稱王稱霸，他也沒有妨礙共產黨前進。

毛認為，王實味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而是冷嘲暗箭，誣蔑謾罵，捕風捉影，誇誇其談。

那麼，這種對王實味的批評是與人為善，實事求是的嗎？

中央研究院開始召開的是座談會，參加的有院內的一百多人；後來參加的人越來越多，最多時達到一千多人，來自七十多個單位，這就成為大規模的鬥爭會了。你又看到那麼多人都說黨是對的，而你是錯的。這個巨大的多數本身就具有威懾力。即使它不對少數個人採取暴力手段，個人也會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這使你不由得懷疑自己，努力說服自己，採取迎合、順從的態度。

在座談會以前，康生就把王實味定為「托派分子」和「國民黨特務」。座談會一開

始，康生就把他的意圖往下貫徹。十六天的會，接連升了四級：由糾正一般偏向引導到對王實味的鬥爭，由一般思想鬥爭轉變為對托派思想的鬥爭，由對托派思想鬥爭升級為對托派分子的鬥爭，由對托派分子鬥爭進而進行組織處理。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與中央政治研究室聯合鬥爭會上，把反對王實味的鬥爭擴大為反對「五人反黨集團」的鬥爭。每升級一次，都把康生的意圖貫徹得更深一層。每一次有人提出比較正確的、與領導想法不相符合的意見，都會受到更多人的批評、反對甚至圍攻。這實際上是運動群眾，逼着群眾屈從於上級的意圖而起哄。現在看來，比較正確的意見在當時受到孤立，倒是「左」的意見得到鼓勵和讚揚。至於王實味本人，只能承認那些強加於他頭上的不實之詞，實際上被剝奪了為自己申辯的權利。（溫濟澤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五八一—五九頁）一聽到申辯和保留意見，就不問青紅皂白，一概斥之為「態度不老實」。

思想改造不同於思想發展。思想改造是對獨立思考的否定。它要求從一開始就認定自己是錯的，黨（或領導）是對的，要以別人的是非為是非。思想改造指世界觀的改造。承認必須改造，就意味着，你承認你認為是對的東西其實是錯的，而你認為是錯的東西其實是對的。在思想改造開始時，目標已經有了，結論已經有了。而且這種轉變，還是一種道德的要求，意味着你從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改變為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信仰先於理性，還是理性先於信仰？誠則靈。）

爲什麼你在還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是錯的情況下就承認自己是錯的呢？因爲你看到黨是那麼強大，令人生畏，本能地感到得罪它不起，幾乎是下意識地向它靠攏。因爲你看到共產黨成功了，而你自己的思想碰了壁。（投降，低頭）許多人急切地向共產黨乞憐討好，甚至不惜對自己橫加誣蔑。他們這樣做，絕大多數不是爲了往上爬，而是惟恐往下掉，因爲往下掉實在太可怕，也太容易了。

社會上的每一群體都有一套言行模式或規範，這就對任何一個希望被該群體接納的人構成一種群體壓力。一種是內化，一種是屈從。大多數人的從衆性（隨大流）介乎兩者之間。事實上，往往沒有自己的明確的觀點。問題在於，我們常常形不成自己的意見。（懶惰，缺乏交流和討論）一個社會越專制，越封閉，越一元化，其中的個人越難形成自己的獨立意見，而堅持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所付出的代價也越大。

歷史決定論美化了趨時附勢的心態，人民崇拜美化了迎合多數的心理。

先有觀點，然後把它套在事物上。

逆來順受。努力把逆境合理化，把無辜視爲有罪，把迫害視爲考驗，轉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否定自己。不這樣，就很難得到周圍人的肯定與認可，從而獲得自我的肯定。（用否定自我的方式求得自我肯定……？）浪子回頭。

反面教材。從一開始就讓你知，這是錯誤的。那不是在啓發人們辨別什麼思想正

確，什麼思想不正確，其實是在警告人們，什麼是你們可以想，可以說的，什麼是你們不准想，不准說的。那不是在解放思想，而是在設立禁區，不是在提高認識，而是在壓抑理智。

一旦確定了王實味是托派分子，黨就快引申出王實味的一切言論和思想都是錯誤的，反動的。

黨宣布某種思想是反動的，然後再啓發我們去找出所以反動的根據。這就養成我們定向思維的習慣。以後，只要黨扔下一句話「某某思想很反動」，我們就會自動努力搜尋證明這一結論的種種論據。你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一種積極的理智運用，人們同樣也可以從中獲得一種動腦筋的興奮和愉快。有時候，我們興致勃勃地指出「某某文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那既不是因為我們對作者懷有私仇公憤，也不是因為我們對文章表達的觀念深惡痛絕，而是因為我們急於表明自己有高出衆人的識別能力。

共產黨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築在唯有自己才正確這一前提上，因此絕不能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尤其不能承認別人比自己更高明。

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礎是強制，即對敵鬥爭。

被動的強制和主動的放棄結合。既然我們出於恐懼而不敢涉入禁區，那麼由於我們不涉入禁區而不再恐懼。出於恐懼，多數人不得不遠離政治，而一旦遠離政治，就不再感到

壓迫的存在，因此他們就自以為生活得自在而瀟灑。

我們的信仰往往不是批判性思考的產物，而是因為我們不會懷疑。不會懷疑的原因則是我們下意識地懂得懷疑會招致可怕的後果。也就是說，我們由於不敢懷疑而不去懷疑，由於不去懷疑而沒有懷疑，到後來連我們自己都以為我們真是百分之百地信仰了。

黨完全控制着你的命運，正因為如此，黨根本用不着直接發出任何威脅的言詞。它也不正面侵犯你的自尊，它努力提供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讓你能以體面的方式去完成那很不體面的轉變。

一個人的行為也可以影響他的觀點。——為自己的行為找出根據。

思想改造運動去強化人民的忠誠。這種忠誠可以被強化到這種地步，以至於一個人可以極為痛苦而又相當真誠地相信自己犯下了自己實際上從未犯過的罪行。你會變得糊塗起來，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壞人還是好人。（參見胡平《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一〇三頁）

完成這樣一類複雜曲折的心理活動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開始，幾乎人人都想不通，不服氣，到後來才表示自己通了，服了。

黨的策略：「給出路。」一旦你悔過自新，放下包袱，黨和人民就會歡迎你，重新回到革命工作隊伍中來，否則就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死路一條。

對最高權威的絕對正確性的無條件的維護和屈從。如果那個權威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從而使其絕對正確性可能受到損害時，這種無條件的維護就變得更加必要。毫無怨尤就成了義舉。放棄自己的正確性而保全對方的正確性，成了最寶貴的犧牲，還帶着悲壯與光榮。

我們常常不是思考事物本身而是思考事物的名字。同一事物或同一行為，給它安上什麼名字，會對我們的思考產生巨大的影響。不同的名稱暗含不同的價值傾向和感情色彩。當我們採用某一套語詞而不採用另一套語詞時，其最終結論往往在一開始就已經包含於其中了。（壓制、迫害改爲考驗、鍛煉）

當衆進行自我批評自我揭發的普遍後果是，它摧毀了人的尊嚴。

李維漢在回憶錄中對王實味的問題說了一段話：

「我已經向中組部建議重新審查王實味的問題。現在看，有幾點是明確的：第一、王實味的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不是敵我矛盾。第二、王實味同托派關係是歷史問題，不是現實問題。第三、王實味的問題是個人的問題，而不是進行組織集團進行反黨活動。王實味本人的問題是否錯案，有待重新審查。如果確屬錯案，即使人死了，也是應該平反的。」（《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一〇一—一一頁）

對王實味的平反的正式決定，是中央公安部作出的，僅限於糾正加給他的「托派奸細

分子」的罪名；至於如何對王實味當時的言論行動作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評價，決定沒有涉及，這很自然，因為不屬於平反範疇，不是公安部的事。黨內的意見，仍認為王實味在延安整風中的言論是錯誤的，代表了整風運動中出現的一種偏向。這大概是雖然承認王實味是「同志」，卻沒有給他恢復黨籍的原因。王實味的夫人劉瑩在一篇紀念文章中說，她希望有人「客觀地分析實味的文藝觀和他所寫的文章究竟有多少正確因素？有多少錯誤？哪一方面主流？實味寫雜文究竟是忠言還是壓根兒就包藏禍心？」她顯然是有看法的。

被毛澤東扣之以「對知識分子採取宗派主義極左態度」的張聞天等人，在對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個性特點、生活習慣等方面都表現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態度遠較毛澤東溫和。他提出「應該在實際上保障他們寫作的充分自由」。張聞天的較為開明的意見，源出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他的影響，以及三十年代初在上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時的經驗。儘管張聞天不能徹底擺脫中共黨內長期存在的反智主義的影響，但是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上，張聞天以及博古等人卻比毛澤東多了一份寬容，而少了許多農民式的狹隘。（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三四五頁）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十六時五十九分，

最後一次化療後）

作者歷年來寫作和發表的有關文章

- 一 《「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最早見《明報月刊》，香港一九八〇年一月號，二一—五頁；後收入《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九年）
- 二 《「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思想》（一九八〇年末—一九八一年初，本來是為決議起草，後不被接受，後收入《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九年）
- 三 《探索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一個討論會上的發言，後收入《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九年）
- 四 《「毛熱」還要繼續下去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 五 《舊錯誤，新辯護》（一九九四年三月）
- 六 《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探索》，紐約，一九九四年三—五期）
- 七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明報月刊》，香港，一九九六年，十月號）
- 八 《〈文匯報〉和〈人民日報〉唱對台戲——「文革」期間的一段插曲》（《文匯報回憶錄》）

- 九 《毛澤東與霸道》
- 十 《王道乎？霸道乎？——毛澤東緣何兩次提到漢元帝》（《星島日報》，舊金山，二〇〇二年一月三十日、三十一日）
- 十一 《毛澤東的反人權思想和實踐》（一九九三年九月，發表於《人與人權》，中國人權，一九九四年）
- 十二 《重評〈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怎樣放棄了一次政治改革的機會》（寫於一九九七年十月）
- 十三 《辯證法和毛澤東的「鬥爭哲學」》（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第二十七期，四三—六七頁，一九九九年秋季號）
- 十四 《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當代中國研究》總第七十五期，二〇〇一年冬季號，普林斯頓，一一九—一四九頁）

王若水的「美麗境界」

馮 媛 哈佛大學尼曼訪問學者

最近，一部名為 *A Beautiful Mind* 的電影在美國上映，這裡的中文報紙將它譯作「美麗境界」。每看到這個片名，就想起大夫對若水腦CT照片的讚歎：「多漂亮！」我也曾再三端詳那些角度不同的輪廓，那些明暗更替的區域和往復綿延的溝迴，不免好奇——什麼造就了這顆大腦，使它在醫生的眼光中也堪稱美麗？

也許，是永遠活躍的思想讓這個大腦如此美麗？

在我們的筆記本電腦中，有一個叫做「新見解」的文件。這是此次若水的第一篇口授，是他對中國民主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這篇文章創建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四點多，他做完幾個小時的治療之後。當時，我記錄了七百多字。元旦上午，若水精神比頭天更好。大夫說他治療時，我們也可以工作。於是，若水回到他的思路，進行到十二點多，大致完成，約二千六百字。

誰也沒料到，午餐後，治療即將完畢之際，在大夫和我眼皮底下，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難——對治療產生了強烈的反應作用。轉眼間，醫生護士擠滿了一屋子。也許是覺得我這

個外行在旁邊傻站着反而礙事，也許是擔心目擊搶救會讓我更加不安，當班負責的醫生讓護士把我帶到家屬休息室。過了好一會兒，他來找我，說沒事了，可以回病房了。我道了謝，回去看到若水平靜安詳的樣子，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剛才的反應正是死神對醫學發起最後挑戰的信號。傍晚，重新看一遍那些記錄，發現除了我打字時的誤植和需要查對原文的引語之外，幾乎不需要有什麼編輯，若水的思路還是那樣清晰，語言還是那樣乾淨：

「毛本人和中共黨史的說法，都是民主革命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現在看起來，民主革命沒有取得勝利。民主革命有兩個必要內容：一是土地革命，第二是資產階級取得一定的權利。擺脫知識分子的積極影響，這就注定了中國革命要失敗（所謂失敗，不是指取不到政權）。

「我認為，馬克思對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這種傾向，要負責任。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時代精神說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認為無產階級肩負着歷史的使命。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共產主義者就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對自己的使命堅信不移，類似宗教。列寧所謂的『共產黨人的自大狂』，也是類似於此，他們好像說『真理在我這裡跪下來了』。這種信心，成為許多共產黨人前仆後繼不怕犧牲的精神力量的泉源，但也產生一種盲目的信仰。這個思潮，屬於歐洲的理性主義，和英國的經驗主義是不同的。」

也許，泰然自若的態度也使他的大腦如此美麗？

一九九六年七月，若水做了肺癌腫瘤切除。手術前夕，大夫半開玩笑：「手術不會死人，只是人沒從麻醉中醒來。」為了預防萬一，當晚，他倚在牀頭口授，我在電腦上敲下了三篇文章：《失樂園——我看〈紅樓夢〉》、《哲學基本問題批判》、《中國共產黨研究寫作計劃》。第二天，上手術台之前，他告訴我：「昨晚失眠了。腦子裡淨想的是這輩子的好事。」照許多人看來，他的一生歷盡坎坷。他祖籍江西，生在上海，四歲時隨家遷居湖南。十一歲時抗日戰爭爆發，他們全家又逃難到四川。幼年多病，經常輟學，直到以同等學力報考高中。短暫的大學生活，是他的黃金時代，以後則經歷了個人迷信歲月裡自我的喪失。當他在七十年代初終於逐步恢復獨立思考後，卻因此招致十年之內兩次被撤職、被兩代最高領導人點名批判、被限制發表文章的厄運。而他得出的教訓竟是「我再也不放棄我的自由權力了」。他相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並在《論人的本質和社會關係》（一九八八年）中，提出了「克禮復己」的口號。儘管這有限的自由沒能享受幾年，在那樣一個失眠夜，他的心中，洋溢的卻是對生命的美好回憶！

二〇〇〇年初，醫生在若水的淋巴裡發現了另一類型的低分化轉移癌。二〇〇一年初，這種很猖狂的病魔開始侵襲他身體的其他部分，這些都使他有一種緊迫感，不過他仍然不改那不厭其煩地修改的寫作方式。五年來，為破解毛澤東發動文革之謎，他先後發表了十多萬字的文章。他還寫作了一系列的散文隨筆和論文，隻身到印度、美國和香港參加

學術會議。

二〇〇二年一月四日上午，他的醫生、親切的拉賓大夫來到牀前告訴我們，看來要做最壞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大夫走後，若水對我說：「這回是頭一次有瀕臨死亡的體驗。很奇怪，對那些鼓勵你戰勝癌症的談話仍然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什麼呢？「周恩來的悲劇，這是個大工程。還有哲學的基本問題，以那篇發表在《馬恩研究》雜誌上的文章為基礎，關於哲學的基本問題，許多人都想突破，但突不破。」於是，他繼續口授。這當中，他的思路偶爾又會跳回來：「在人民日報社種一棵樹。不要雕上我的名字。無名樹，知道的人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知道了。」

一月八日，他最後的一個白晝。早上，他對值班醫生說：「現在我知道了，要做最壞的打算，而不是最好的打算。」說這話時，竟帶着一抹微笑。我站在牀邊，看着被感動的醫生，第一次忍不住淚水，為他驕傲，也為他悲哀——他還有好多沒完成的思想。醫生離開後，他說：「我腦子還行，但身體已經不行了。」

我安慰他：「既然如此，看淡些。從我認識你開始，你的身體就跟不上你的腦子了。」

一九八三年冬天，我們在人民日報社大院邂逅。那時，以他為主要批判對象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還沒有塵埃落定。那場運動給剛剛進入研究生院的我帶來了精神危機。正

是一九七九年後的思想解放過程，使我和許多同齡人一樣，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並對中國前途有了信心。而當時對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的大肆批判，不啻扼殺我們脆弱的興趣和信心。因禍得福的是，因若水被免職，使我們可以平等相處。由於身體不勝負荷，他晚上都不工作，於是我們有了很多聊天的時間。幾年來過從甚密，奠定了我們十五年婚姻的基礎。

也許，永遠年輕的心理也使那顆大腦如此美麗？

一九九〇年，為從「六四」慘劇的創痛中走出來，我父母請我們遊覽九寨溝。那次旅行的間歇，若水撿起大學時代學過的德文。當時是希望能對照中譯本，研讀馬恩原著中的一些關鍵地方，以利他「回到馬克思，超越馬克思」。後來，尼采的散文、海涅的詩也給他帶來極大的精神享受。在北京時，有一次若水做化療，不巧我與人有約在先，而那天我弟弟和若水的兒女都沒時間來陪他，情急之下，我只好讓人家來醫院會客室。當若水知道來訪的是一位德國人時，便問我：「你們談完後，能不能請她來糾正一下我的德文發音，把海涅的《羅洛萊》錄下來？」事後，他興奮了好幾天。

這幾年，他同病魔作鬥爭，我也特別忙。上下班路遠，還不時離開北京幾天，節假日也不一定都能陪他。我們曾經湊了一首打油詩戲謔我的忙碌，但對追求性別公正和平等的工作，他始終充滿興趣，並盡力支持。有時候，我趕完一篇稿子，實在不想再檢查一遍，

便求他替我看一看。他常常用欣賞和驕傲的口吻評價我的工作，並認為我介紹給他的一些書和文章對他也有啓發。聊天時，他總說：「你應該寫出來發表！」儘管有時對某些女權主義學派的具體觀點和方法不盡認同，在他心目中，「女權主義」始終是一個非常積極正面的字眼。他總是在這個意義上，向人宣稱我是「女權主義者」。

若水一直希望我申請哈佛大學的尼曼新聞工作者進修和研究項目。他再三說：「我去給你當家屬，好用哈佛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圖書館，繼續毛澤東和文革研究。」去年八月，我們如願以償，到了哈佛。他一邊治療，一邊盡量利用圖書館。這期間，他最有成就感的，是最後回答了「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這篇哲學和科學小品（即《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開始於兩年前他在北京住院期間，和他一九四六年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同題。十月底，聽麻省理工學院幾位教授關於生命和基因科學的講座，他在提問中趁機講了自己文章的結論，得到了權威的首肯。對此，他不無得意，成了慶祝他七十五歲生日那天最津津樂道的話題。

一九七八年，若水初次訪問哈佛，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新聞代表團的成員。這一回，他第五次到哈佛，卻是第一次在美國做病人。即使是久病纏身之軀，即使已經不良於聽，他都很快在新環境裡贏得了尼曼仝人、鄰居、醫生、護士和病友的敬重和喜愛。一位朋友去醫院探視時，正好碰上護士們換班，目睹了他們爭着「我來管王先生」。一月

八日，一位護士要休假幾天，下班前特來告別，含着淚對他說：「很榮幸有機會照顧你。我在醫院工作很多年了，要制伏癌症，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而他已經走完了自己的路，用他自己的方式——「我斷然拒絕宿命、無奈這種哲學。這種哲學是一種異化了的哲學，是甘居異化狀態而不想超越、自拔，而自以為正常。到底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能讓人絕望？」是的，從來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他絕望。如果有人請他題詞，他不是寫「克禮復己」，就是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仁者有憂」。如果說這也是夫子自道的話，他的確不惑不懼卻有憂。他不能不憂國憂民。在一篇最終未能面世的自述中，他寫道：「最近一二十年來，我的思想有很大變化，但我還像少年時代那樣愛我的祖國，還像青年時代那樣追求真理。我還要用我的餘生求索。」

也許，這種憂患，抑或智慧的痛苦，也使那顆大腦如此美麗？

（《明報月刊》二〇〇二年四月號）

編後記

從一九九二年開始，王若水就計劃寫作一本關於毛澤東和「文革」的書。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和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期間，完成了二十多萬字的書稿。這兩個中心的圖書館的南希和戈定渝兩位女士，給作者提供的便利和幫助是巨大的。後來，在書稿即將完成時，一些新出版的關於建國前黨史的著作，使他突破了最初的研究框架。他開始追溯到延安整風和蘇區肅反，乃至中國共產黨建黨時期。最初，他的主要着眼點在於從性格和心理分析的角度來探索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後來，他試圖在歷史的視角中同時展現出毛澤東能夠發動「文革」的制度因素的形成。

在國內，無論是毛澤東研究還是「文革」研究，都有許多禁區，這樣的搜集還是觀點的探討都大受限制。而且，圖書館系統也有種種欠缺和使用上的不便。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軀，盡量克服這些困難，先後完成和發表了若干論文，並使本書大致成型。

遺憾的是，作者未能完成他很重視的一章：「周恩來的悲劇」。在一九九六年十月

草擬的提綱中，作者寫道：中共把發動「文革」說成是毛澤東的悲劇所在，其實真正的悲劇人物是周恩來。這個悲劇是由他的性格和他所受的黨文化的教養造成的。他既要忠於毛，嚴格遵守所謂黨性原則和黨的紀律，又真心實意地想為民族為人民做一番事業，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這兩方面是矛盾的，周卻想兼顧。儘管周對毛畢恭畢敬，馴服地執行毛的指示，毛對他還是不放心，因為毛看出來周在內心深處是不同意「文革」的。周在「文革」初期多次制約紅衛兵的胡作非為，保護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這一點連普通群眾也看得出來。早在延安整風時期毛已經表現出他對周的強烈不滿。儘管從這以後周再也沒有反對過他，可是這並未消除毛對周的怨恨和嫉妒心理。毛在六十年代猛烈地批評過周的「反冒進」，並想把周從總理的職位上撤下來，換上善於投毛所好的柯慶施，但未能成功。周違心地做了檢討，此後更加小心謹慎，即使在廬山會議那樣的場合也沒有表現出動搖。但毛並不就此罷休。有迹象表明，在劉少奇等人被打倒之後，下一個犧牲者就將輪到周恩來。但「文革」已亂到不能控制，而又沒有別人能代替周恩來這樣的大管家，毛只能暫時容忍，把這個任務推到下一次「文革」。儘管「文革」是「左」得不能再「左」，但毛的公開講話和指示卻往往不是那麼極端的，而往往是留有餘地，似乎合乎情理，兼顧到事情的兩個方面。毛知道，他的所有講話和指示都是歷史文件，要受到後人的審查。周利用了這一點，在執行時盡量採取緩和的方針。毛對這點也是看在心裏的。毛並不讓周白白地留

在總理的位置上，他要周執行周最不願意執行的方針，如打倒劉少奇。「文革」中許多逮捕令，是周恩來簽署的。這一點令一些研究者吃驚。毛知道周的溫和態度博得許多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好感，他正是要用這種手段敗壞周的聲譽。二〇〇二年一月，彌留之際，作者仍在口授有關想法。但他實在無法繼續研究了。也許，其他研究者今後的成果會彌補這個遺憾。

王若水向來追求平易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的統一，他總是不厭其煩地修改，因為希望自己向讀者呈獻的都是精品。但是，由於寫作跨度長達八年、由於病魔的侵襲，以及其他種種因素，這本署有他的名字的書，不能由他自己最後完成，因此也無法始終貫以他向來的標準和風格。這是要向讀者道歉的。不過，也許正因為如此，這本書更能反映出他思考的過程，一些剛完成了史料的羅列和分析大綱的章節，更便於讀者和作者一起探索。

將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寫作計劃，變成一本書，我不得不做一些整理工作。為了既保持原著風貌，又適合出版標準和可讀，我所做的事情限於：一、校讀已經和大致成型的章節，刪除某些重複之處；二、核對注釋，盡量標明引文出處；三、將作者後來的少許思想片斷插在原先寫好的文稿的我認為適當之處；四、在每章後面標出時間，表明作者中止寫作或修改該章節的日期，或標注出作者其他相關文章供讀者參考。此外，「見證」部分，是我加上的，包括作者的回憶文章，其主要部分是「偶像的幻滅」。我還將作者發表在其

他地方的有關文章，編了一個目錄，以便查閱。

儘管我盡了最大的努力查找和標明引文出處，但可能仍有一些地方作者轉述或引用了別人的分析和觀點而未及標注。敬請讀者和有關作者諒察，以便有機會時修正這些無心之失。

感謝潘耀明先生和明報出版社編輯部同人的熱情建議和決策，以及責任編輯花費的心力，使這本書得以問世。早在一九八〇年二月，《明報月刊》就在海內外率先發表王若水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他晚年關於文革和毛澤東的研究，也多在《明月》與讀者見面。現在，本書由明報出版社出版，真是一種機緣。

馮媛

二〇〇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